

第二分册目录

第二部分 扩张时期

- 第十三章 墨西哥和得克萨斯(1823—1845年)3
- 第十四章 墨西哥战争 地峡问题(1845—1859年)23
- 第十五章 东北边界和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
(1783—1842年)46
- 第十六章 俄勒冈(1776—1871年)61
- 第十七章 权利要求和商业(1815—1861年)79
- 第十八章 辉格党的短期当政(1849—1853年)107
- 第十九章 奴隶制和外交(1853—1861年)119
- 第二十章 近东,太平洋和远东(1783—1868年)139
- 第二十一章 南北战争(1861—1867年).....164
- 第二十二章 门罗主义 南北战争以后的扩张(1823—
1872年)186
- 第二十三章 几件重大的英美仲裁(1870—1914年)209
- 第二十四章 古巴问题和对西班牙的战争(1868—1898年) ...236
- 第二十五章 中太平洋岛屿(1875—1899年).....257
- 第二十六章 1898年的重大偏差271

第二部分 扩张时期

第十三章 墨西哥和得克萨斯

215

(1823—1845年)

拿破仑被推翻以后，人类在一个世纪间幸运地避免了另一次世界大战。1823年以后，美国在外交方面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从欧洲的灾难中得到好处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的冲突，新世界的第一个共和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共和国已经牢牢地扎根在国际土壤之中，以致欧洲君主国家不能把它们拔除了。在十九世纪的剩余年代里美国以自己的力量向本大陆整个空旷的西部地区进行扩张。这种扩张的目的是要使美国成为一个濒临两个文明大洋并随时可以控制两洋之间的人工航道的世界强国。这是一个有意识地进取的扩张时期，这个扩张时期只是由于南北战争的日益深重的苦难和所引起的国际风险才中断了一段时间，甚至为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有几十年能消除人们的疑虑的平静所掩盖，但直到1898年美国扩张力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告结束。扩张本身表现了美国的民族精神的被禁锢的力量正在发展。这时美国的民族精神还保存着它的主要方面和最成功的显示。扩张的整个过程体现在1845年首次使用的“明显的命运”这个名辞中，而为从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到西沃德^①和查尔斯·萨姆纳^②这些美国政治家，更不必说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马汉^③派，洛

① W.H.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 美国国务卿(1861—1869年)。——译者

② 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 1811—1874年), 美国政治家。——译者

③ A.T.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 美国海军军官和海军史学家。——译者

奇^①派和罗斯福^②派，在言词中或行动中从精神上所召唤。“明显的命运”代表着一个普遍的和日益流行的信念，即认为共和国的明显的命运就是以和平办法凭借共和政府制度的模范和原则的力量在整个北美大陆进行扩张。它不是以黩武主义为基础的。在扩张运动的全部历史中，美国始终(南北战争时期例外)是一个只有一支最小的陆军和海军，没有征兵制度的国家。哲学家们^③不表同情地把“明显的命运”分析为在虔诚的辞句掩饰下的实质上的利己主义；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在一个实际上是渺无人迹的大陆上进行扩张的，没有非正义地夺走任何国家的地方，而且今天也没有一个美国人宁愿当时不进行扩张。也许把“明显的命运”称为“明显的机会”要好得多。

本书第二部分就是叙述这个扩张的过程的。我们首先谈谈墨西哥和得克萨斯。

前面已经讲过，在1803年到1821年期间，为了佛罗里达的问题而与西班牙的关系紧张，路易斯安那和西班牙边界地区的省份之间的边界线仍然没有划定。美国和西班牙都声称具有占有权利的得克萨斯实际上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地方，虽然在圣安东尼奥、洛斯-阿代斯、纳克多奇斯和拉巴希亚的一些孤立的定居点比外交文献更足以证明西班牙事实上的占有。顶多有几百名西班牙兵士守卫着沿萨宾河^④的一些前哨地点。假如发生任何战争，冲突将

① H.C.洛奇(Henry Cabot Lodge, 1850—1924)，美国参议员(1893—1924年)。——译者

② T.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美国总统(1901—1909年)。——译者

③ 最出名的著作是艾伯特·K.温伯格(Albert K. Weinberg)的《明显的命运，美国历史上的民族扩张主义的研究》(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公司，1935年)。

④ 当时在得克萨斯地区的东部边缘地区美国也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定居点。边疆居民菲利普·诺兰同杰斐逊和威尔金森都有联系，他曾不断地深入得克萨斯猎取野马。西班牙当局发给他的护照未能使他免于遭到西班牙军队于1801年在雷德河的南岔口对他的攻击。诺兰和他的几个随从人员被打死，其余的人被囚禁。六年之后，西班牙政府下令将其中的一人用抽签的办法抽出处死。

首先在得克萨斯东部平原上开始。在1806年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杰斐逊总统派了一队美国兵来守卫这个地区的边疆。指挥官是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他是包括路易斯安那在内的西部地区的军事长官。威尔金森的军队在数量上稍少于西班牙人。他有权通过一些明显的行动挑起一场战争。美国西南地区的人特别想这样干。但是他和西班牙的指挥官都谨慎地同意在萨宾河和东面的阿洛约翁多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两支人数很少的军队于1806年在这个地带隔着中立区相对峙。在1812年路易斯安那加入联邦，把该州的西部边界定在萨宾河以前，这个中立区一直是一条事实上的大致边界。

威尔金森一直同那个道德败坏的艾伦·伯尔在策划阴谋，但是直到今天无人确切知道其内容。有些人认为，他们计划把西部地区从联邦分割出去并希望与邻接的西班牙的领地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甚至更多地方合并成一个新的国家。有些人认为^①他 217
们策划的只是一桩大规模的海盗冒险事业，在美国同西班牙发生战争时会对这个事业有利，而在1805—1806年，这场战争似乎是迫在眉睫的。在很久以后，历史学家从对英国和西班牙的档案的研究中发现伯尔曾向英国和西班牙的公使要求资助他的事业，他把他的事业说成是一个革命和脱离本国的运动。他确实从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伊鲁约那里拿到了两三元。

威尔金森的军队驻扎在阿洛约翁多一带，他可以帮助也可以挫败伯尔。他可以很容易地挑起冲突，把西部置于战火之中，从而为阴谋家提供完善的活动场所。但是读者知道这时指挥美国军队的威尔金森长期以来已经秘密卖身投靠西班牙国王，成为天主教

^① 亨利·亚当斯在其前述著作《历史》一书中确信伯尔计划使联邦分裂，但 W. F. 麦凯莱布(W. F. McCaleb)在《艾伦·伯尔的阴谋(The Aaron Burr Conspiracy)》(纽约，1903年)一书中则认为伯尔只是一个可能成为海盗的人。亚当斯似乎对这个阴谋了解较深。

国王陛下的雇佣了。与他的同伴比起来，他是一个更卑鄙的恶棍。他决心出卖伯尔。当那个美国的谋叛者乘船自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的时候，威尔金森以一个爱国军官的姿态，向杰斐逊总统告发伯尔，而他本人则赶到新奥尔良宣布戒严，以防止任何叛乱。他并没有忘记把他破坏了伯尔的计划这件事报告墨西哥总督，并要求二十万元的酬劳。他究竟拿到这笔钱没有，或者拿到多少，至今仍是一个秘密^①。

伯尔见到大势已去，在纳切兹抛弃了他的追随者，自己逃入荒野，当他在莫比尔上方的斯托德特堡出现时被捕。

杰斐逊积极主张对伯尔判罪。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举行的，由最高法院院长马歇尔主持的这次叛国审判^②中，马歇尔决定，根据宪法对一个明显的行为要有两个证人才能判罪。政府不能提出这样的证词，陪审团作出没有证据的裁决。马歇尔判决裁决成立，宣布无罪。

当伯尔活到看见萨姆·豪斯顿成功地使得克萨斯获得独立时，他宣称：“怎么样，你们看见没有？我做对了！我只不过做早了三十年。三十年前说我是叛国的行为，现在却是爱国的了！”对于这样一个说谎成性的人讲的这些话，我们不必过多地相信。

伯尔失败之后，别的一些冒险主义分子还在覬覦着这块西班牙以薄弱兵力防守的有争执的得克萨斯平原^③。

① V. 萨拉多·阿尔瓦雷斯(V. Salado Alvarez):《艾伦·伯尔的阴谋,及美国西部人征服墨西哥的最初的尝试(La Conjura de Aaron Burr y las primeras tentativas de conquista de México por Americanos del Oeste)》(墨西哥, 1908年); T. M. 马歇尔(T. M. Marshall):《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西部边境的历史, 1819—1841年(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Boundary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1819—1841)》(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1914年)。

② A. J. 贝弗里奇(A. J. Beveridge)带着对伯尔有几分同情和敬仰马歇尔的心情在前述他的重要著作《约翰·马歇尔的生平(Life of John Marshall)》一书中讲述了这次叛国审判的史实。

③ 墨西哥革命家柏纳多·德·古铁雷斯(Bernardo de Gutierrez)于1811年

这些掠夺者和西班牙军队之间在得克萨斯的争斗使这个省份丧失了它的为数不多的居民的一大部分。当墨西哥在1821年独立的时候,这个大草原还是渺无人烟的,只有很少的军队驻守。从此再也没有人起过组织掠夺性远征的念头。新的墨西哥政府一开始就执行一项以最宽大的移民法和土地使用土地法来从美国吸引居民到它的北部省份去定居的政策。到头来这对墨西哥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虽然最初的定居者是忠诚的,但得克萨斯很快充满了对管理得很不严的墨西哥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很快成为一种威胁的外国人口。如果需要,美国可以从墨西哥对得克萨斯的移民政策知道:美国今天鼓励和吸引大量外国的,譬如说东方的人口到加利福尼亚定居会意味着什么^①。

在这些有利的法律之下,大约一万五千美国移民在1825年到1830年之间涌入得克萨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越过一段开放的边界,实际上未受到任何检查或办理任何规定手续。墨西哥在得克萨斯没有足够的移民或关税机构,也没有足够的巡逻部队。到1836年,在努埃西斯河以东的盎格鲁-美国人口大约有三万人,再加上约五千名黑人奴隶^②。当美国于1850年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得克萨斯的人口约为二十五万人。其中有五万八千一百六十一人是当时的奴隶。

在美国前军官奥古斯塔斯·马吉(Augustus Magee)的帮助下,发动了一次掠夺性进攻。他们的行动在1813年被西班牙军队扑灭,人员遭到屠杀和残酷迫害;西班牙人说这是对他们背信行为的报复。古铁雷斯逃脱,后来又参加了由纳切兹的詹姆斯·朗(James Long)于1819年在密西西比和肯塔基组织的另一次没有成功的远征。

① 参阅本书第三十五章,关于东方移民的问题。

② 据杰克逊的观察员墨菲(Morfit)估计,1836年得克萨斯本土有三万美国移民,五千黑人和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印地安人。里夫斯的前述著作,第一卷,第391页。L.G.巴格比(Bugbee)在《早期得克萨斯的奴隶制(Slavery in Early Texas)》。(载《政治学季刊》,第八卷(1898年),第389—412页,第648—668页)一文估计,1829年有一千名奴隶,以后一直继续到1843年都只占一个小的比例。参阅E.C.巴克(Barker)著作,载《密西西比评论》,第十卷,第141—152页。

外国人带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政治背景迅速流入,这使墨西哥的官员们感到日益增长的焦虑。早在1825年,有一个名黑登·爱得华兹的乐队经理在路易斯安那边境的纳克多奇斯附近叛乱,宣布成立他称之为弗雷多尼亚的独立共和国。由美国来的乐队经理的先驱者斯蒂芬·F.奥斯汀和他的归化墨西哥的同伴们帮助他们的归化国把叛乱平定下去。但是毫无疑问,前途是充满麻烦的。一位能干的墨西哥政治家卢伊斯·阿拉曼在1830年给墨西哥国会的一份著名的报告中指出了这点。墨西哥国会利用了1824年的联邦土地法和移民法的有利条件,通过一项法律(1830年),禁止外国人以任何借口越过北部边界进入墨西哥,除非持有正式的墨西哥的护照。它禁止邻国公民(当然唯一有关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墨西哥的边境各州和领土上定居;并且宣布停止执行与这个新法令相抵触的一切尚未执行的拓殖合同。1832年的另一项联邦法令规定由于未履行拓殖合同而由国家收回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合法的墨西哥公民。但是,大门即使关上,却关得太迟了。

这项立法在试图执行的时候引起了同新来的移民的冲突。从美国来的定居者自称他们有法律上的保证不得对拓殖法作任何更改,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这种说法由于以前制定的各项法律从来没有执行而得到加强。从1832年到1835年爆发革命,得克萨斯不断发生不服从统治的动乱。大多数不满意的人直至1835年主张修改宪法,如同1776年以前的英国殖民者那样。但在1835年以后,赞成从墨西哥完全分离出去的人占了上风,这时已很清楚,不可能有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①。1835年,公开叛乱和战争爆发了。1836年4月21日,由萨姆·豪斯顿将军率领

^① E.C.巴克(Barker):《墨西哥和得克萨斯,1821—1835年》(Mexico and Texas, 1821—1835)。(得克萨斯,达拉斯,1928年)。

的得克萨斯军队在圣哈辛托决战中打败了墨西哥总统桑塔·安那将军指挥的军队。从此，得克萨斯实际上已经独立，即使墨西哥从未承认。

因为美国这个毗邻共和国不断试图收买全部或部分得克萨斯，墨西哥对来自美国的移民的限制越发加紧了。诚然，同西班牙签订并于1821年批准的重要的横贯大陆条约把边界划定得非常明确；而且墨西哥从西班牙继承了这条边界线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无可辩驳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19年亲自同奥尼斯制定了这个条约。但作为总统(1825—1829年)，亚当斯不愿对墨西哥确认这条横贯大陆的边界线。他对于在自己制定的条约中未曾得到得克萨斯的一部或全部感到遗憾，他依照门罗内阁的建议在接受萨宾河线的时候说明了这个缺点。亚当斯派遣刚从南美回来的乔尔·R·波因塞特为美国驻墨西哥第一任公使^①。国务卿亨利·克莱在1825年，以后又在1827年的指示中命令波因塞特向墨西哥提出如下的建议，以分期付款的办法来“修改”边界线，尽可能向西移到布拉佐斯河，得克萨斯的科罗拉多河，“雪山”^②或格兰德河—佩科斯河一线。当波因塞特把这个问题向墨西哥总理阿拉曼试探的时候，阿拉曼立即回答愿意修改这条边界线——从萨宾河向东移至密西西比；亚当斯最后只得满足于签订(1828年)一项确认1819年的横贯大陆条约并规定进行测量的条约。

墨西哥没有很快批准这个边界条约。以后，亚当斯的继任杰

^① W. R. 曼宁在他的《美国和墨西哥的早期外交关系 (Early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巴尔的摩, 1916年)一书中根据未公开的墨西哥和美国档案叙述了这些早期交涉的情况。

^② 根据1820年的“梅利什地图”，“雪山”即现在的桑格里得克里斯托山脉，是格兰德河的东部分水岭，有一突出的支脉往南伸展到埃尔帕索的纬度线，但过了这条线以后就分成佩科斯河以东和以西两个支脉。

克逊总统(1829—1837年任职),也一心想收买得克萨斯。他发现了一个便利的情况即萨宾河的确切的界线还没有划定。新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准备出多达五百万元来获得一条他可能得到的最好的边界:布拉佐斯河,科罗拉多河,勒瓦克—科罗拉多线,或者努埃西斯河和格兰德河之间的分水界。波因塞特一贯喜欢干涉驻在国的内政。长久以来他已经成为一个不受墨西哥政府欢迎的人了。墨西哥政府要求把他召回。为了实行购买得克萨斯的计划,杰克逊改派安东尼·巴特勒去代替波因塞特。巴特勒后来在墨西哥当了七年(1829—1836年)的美国代表。

巴特勒表露出他的使命——与波因塞特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的真正目的之前他同墨西哥签订了(1831年)一个友好通商条约;即与当时美国正在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交涉签订的相似的条约^①。墨西哥在美国批准1828年的边界条约之前一直拒绝批准这个条约。两个条约都于1832年4月5日得到批准而生效^②。1835年8月巴特勒接到指示,授权他出几百万元交换一个新的横贯大陆的边界:从格兰德河上的北纬三十七度往正西到太平洋,或者任何把旧金山湾——也是杰克逊所觊觎的——包括到美国之内的其他界线。总统确实准备发给巴特勒一张空白支票让墨西哥在上面填写,只要墨西哥肯把它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北部领土,割让一百万平方英里^③。当巴特勒写信报告说除了间接向墨西哥官员们行贿也许可能,看来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完成这样一桩巨大的不动产的交易。杰克逊在信的背面批了这几个字:

① 参阅本书第201页。

② 这并不妨碍杰克逊继续坚持萨宾河是两条汇集在路易斯安那边境上的萨宾湖的河流的西端而不是东端。那里的边界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直到以后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和美国最后划定在东端。

③ 得克萨斯到格兰德河包括390,000平方英里。从得克萨斯到太平洋,在埃尔帕索的纬度与北纬四十二度之间——美国的南部边界——有565,000平方英里。这个计算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志处为我做出的。

“A. 巴特勒，一个多么无用的家伙！”虽然如此，他却允许A. 巴特勒这个无用的家伙继续留在墨西哥。但是，墨西哥不愿把得克萨斯更不必说加利福尼亚出卖给美国，犹如杰克逊不愿把密苏里更不必说上路易斯安那出卖给外国一样。

学者和法学家们关于美国政府，特别是杰克逊总统对待得克萨斯革命的态度——是否真正遵守了中立；以及杰克逊是否参与煽动那个最后证明对美国是那样有利的革命讨论得很多。虽然杰克逊总统同萨姆·豪斯顿的关系很亲密，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同得克萨斯的革命者们有任何勾结。事实上，即使杰克逊希望得克萨斯反叛墨西哥并取得独立——以便后来合并于美国——也无须与他人同谋。一旦时机成熟，革命本来是会到来的。杰克逊既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阻止革命^①。

中立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墨西哥政府自然希望美国不要正式承认得克萨斯的交战地位。承认它的交战地位就等于在道义上鼓励得克萨斯人。但是那样做也将使美国承担国际法的遵守中立法的义务。杰克逊总统没有对世界发表中立声明，虽然他命令军队和地方官员们遵守中立，在说到中立时似乎是国际意义上的中立；在给墨西哥政府的声明里也是这样的^②。从外表上来说，这是

222

^① 这个问题在 J. S. 巴塞特 (Bassett) 的《安德鲁·杰克逊的生平 (Life of Andrew Jackson)》(共二卷, 纽约, 1916年), 和 E. C. 巴克 (Baker) 的《杰克逊总统和得克萨斯革命 (President Jackson and the Texan Revolution)》, 载在《美国历史评论》, 第十二卷 (1907年), 第 788—809 页, 这两部著作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采取比较怀疑观点的是 R. R. 施滕贝格 (Stenberg) 的《杰克逊, 安东尼·巴特勒和得克萨斯 (Jackson, Anthony Butler and Texas)》, 载在《西南社会科学季刊 (Southwes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第十三卷 (1932年 12月), 第 264—287 页; 和《杰克逊和豪斯顿的得克萨斯计划, 1829—1836年 (The Texas Schemes of Jackson and Houston, 1829—1836)》, 同上书, 第十五卷 (1934年 12月), 第 229—251 页。

^② T. M. 马歇尔的前述著作中评论了其中几个文件。参阅 E. C. 巴克仔细撰写的另一篇文章:《美国和墨西哥, 1835—1837年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835—1837)》, 载《德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 第一卷 (1914年), 第 3—30 页。还可参阅 1836年 5月 17日 检察长的意见 (《美国检察长的正式意见》[华盛顿, 1852—1929年], 第三卷, 第 122 页)。对墨西哥政府的声明附在 1835年 11月 9日 给墨西哥代办安东尼·巴特勒的指示中。也可参阅 1835年 11月 14日《奈尔斯记录 (Niles Register)》上的可能是由别人授意的声明。

一个执行本国立法的问题，执行禁止向友好国家派出敌对的远征队的 1794 年，1817 年和 1818 年制定的所谓“中立法”。对得克萨斯人的同情是激昂的，声名远扬的，特别是在南部各州，因为有很多得克萨斯人移民就是从那里迁移去的。对加入得克萨斯军队的移民所发给的优厚的土地赠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越过国界。他们成群结队地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吹奏着军乐，船上飘扬着（美国）国旗，这些一望而知是有组织的、招募来的好战的移民们全都前往得克萨斯的各个港口，另一些人则越过没有人守卫的陆地边界迁徙过去。美国的中立法，即使经过 1817 年和 1818 年的修改^①，没有任何规定阻止“向外移民”，也不禁止美国公民为美国以外的外国王公或人民服兵役。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美国的法律从未允许外国在美国国内招募兵士。当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试图这样做的时候，美国立刻加以禁止，并坚持要求把有这种不正当行为的英国公使和领事们召回^②。1836 年，得克萨斯的招募人员几乎是公开地组织这些“外迁移民”离开美国^③。当墨西哥的使节戈罗蒂萨抱怨这种做法的时候，美国政府为自己辩解说对执行这项法律已做了一切努力，并叫对方拿出违反这项法律的具体证据来。一旦能够提出具体证据，所说的这种违反就将无法挽回了。

政府还提出联邦当局缺少权力的问题。中立法律的不完备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可以不彻底遵守中立义务的理由。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就成功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向英国政府索取“阿拉巴马号”和其他掠夺事件的赔偿。当时美国的论点是：一个主权国家“不

^① 参阅本书第 199 页。

^② J. B. 布瑞伯纳(Brebner):《约瑟夫·豪和英美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募兵的纠纷 (Joseph Howe and the Crimean War Enlistment Controvers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载《加拿大历史评论》，第十一卷(1930 年 12 月)，第 300—327 页。

^③ G. L. 里夫斯 (Rives):《美国和墨西哥，1821—1848 年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821—1848)》(共二卷，纽约，1931 年)，第一卷，第 362—388 页。

能把自己国内刑法规定上的缺陷作为辩护或减轻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所做的国际损害的理由”^①。当1837年加拿大发生叛乱的时候，一些美国公民越过边界前往参加，但在规模上比前一年越过墨西哥边界时小得多。在这件事上美国虽然没有承认加拿大叛乱者的交战地位，却作出了维持中立的很认真的努力。范布伦总统在致国会的一份特别咨文中说，北部边界实际情况和南部边界的经验表明，我们的现行法律是不完备的。国会很快在1838年3月10日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政府拘捕任何准备对一个毗连的外国采取敌对行动的船只，以及拘捕所有可疑的船只^②或车辆，或武器弹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邻近地区如果发生比较轻微的骚动就会使截至当时为止不完备的国内法律很快得到修改，但是在一个软弱混乱的拉丁美洲共和国的与美国毗连的省份里发生的一场可怕的革命却没有促使美国对国内法律作必要的修改。1838年法案（期限为两年）的通过充分证明美国在得克萨斯革命期间的中立是不充分的。承认法律的不完善，但考虑到普遍的同情心理。美国的任何政府能够在1836年采取比当时更严格的态度而不冒被公众舆论拖入战争的危險，是令人怀疑的。欧洲的外国外交观察家们在这方面没有对美国加以严厉的指责^③。在此期间，范布伦的政府坚持调整美国公民对墨西哥提出的权利要求。

在1836年7月至11月革命期间，盖恩斯将军率领的一支美国军队暂时占领了纳克多奇斯，这个惊人的行动受到了比“中立” 224

① 菲什(Fish)给摩特莱(Motley)的信件，第七十号，1869年9月25日。前述穆尔的《国际法汇集》第七卷，第1015页。

② 这个法案清楚地不干涉“同任何外国港口由海上船只进行的”武器和弹药的贸易。

③ J. H. 史密斯(Justin H. Smith):《得克萨斯的合并(The Annexation of Texas)》(纽约,1911年),第1—33页。

法律不完备更加苛刻的责难。其实这是更加无可非难的。盖恩斯接到陆军部长的一个笼统的指示，他理解为，在边境情况混乱到足以引起印地安人暴动的时候，允许他越过这条“想像的边界线”。他所侵入的地方至少在墨西哥与美国之间是有争议的；而且1832年的条约可以解释为在墨西哥的军队不能有力地镇压印地安人的时候，采取盖恩斯的“入侵”这样的措施是正当的^①。在这次小的远征中，有些兵士逃跑并参加了得克萨斯的军队。

我们已经说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向得克萨斯移民及其成功的对墨西哥的反叛可以归因于安得鲁·杰克逊总统的阴谋。也不能解释为想像的侵略成性的南部“奴隶主政权”在控制美国政府方面的一个蓄意策划^②。不过得克萨斯确是有希望的奴隶地区。那里的人民赞成奴隶制度。它的新宪法坚定地维护奴隶制度。虽然不是所有南方的领袖们都想要得克萨斯，不过毫无疑问，在美国正在发展着一种维护奴隶制度的力量。二十四年以后，这股力量试图成立一个公然以奴隶制为“基石”的新国家。在得克萨斯革命期间，卡尔霍恩和其他几个赞成奴隶制的领袖们主张合并那个新共和国。它在将来有分为几个美国州的可能，合并之后势必扩充了美国奴隶主的力量，并在国会内抵消在最近将来从买来的旧路易斯安那在1820年妥协线以北左方那一部分肯定会产生的一些“自由土地”^③州。这些赞成奴隶制的政客们辩解说，他们只是在保卫

① 关于盖恩斯的占领纳克多奇斯，也可参阅 T. M. 马歇尔的前述著作；里夫斯的前述著作第 378—381 页；和 E. C. 巴克的前述著作，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一卷。

② 这是 H. E. 冯·霍尔斯特(Hermann E. von Holst)在他的《美国的制宪史和政治史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英文版，八卷本，芝加哥，1881—1892 年)一书的论题。反面意见，参阅 C. S. 鲍彻(C. S. Boucher)著：《关于侵略性的奴隶主政权》，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八卷(1921 年)，第 13—77 页。

③ 原文为 Free-Soil，在美国历史上指禁止使用奴隶的地带。——译者

他们的合法的政治地位。

奴隶制扩张分子受到决心制止这种悲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这种制度的政治势力的、日益坚决的北方代表的极力反对。其中一位最有口才、最有力量的人物是曾任国务卿的总统，他最近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最初从西班牙、以后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得克萨斯。对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说，现在阻止奴隶制的发展比他以前的扩张到格兰德河的目标意义更为重大。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奴隶制的问题拖延了而不是促进了合并^①。假如不是为了奴隶制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得克萨斯在它的独立一旦得到世界承认的时候，本来是会毫不延迟地合并于美国的。

根据他们的独立的宪法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得克萨斯人就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与美国合并。他们派了一个外交代表威廉·H. 沃顿到华盛顿，请求承认他们的独立和缔结一个合并条约^②。据他报告，杰克逊总统私下鼓励得克萨斯人向太平洋扩展边界，以使美国北部和东部无法反对合并^③。但是杰克逊派到得克萨斯去察看形势的一个观察员对于得克萨斯人是否一定会抵抗墨西哥的另一次军事进攻来保卫他们的独立没有把握。总统表面上把承认问题交给国会去讨论，却谨慎地向国会建议说：最好的方针是严格按照我们在西班牙和它的反叛的殖民地的斗争时期所遵循的原则办事。总统解释道，“那就是：我们不介入，不仅等候到那些新国家充分具备了保卫自己的能力，而且要等到它们重被征服的危险完全过去。那时，而且只是到那时，才能承认它们。”1837年3月1日

① 这个观点在J. S. 里夫斯(Jesse S. Reeves)的《在泰勒和波尔克领导下的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under Tyler and Polk)》(巴尔的摩, 1907年)一书中作了有力的强调。

② 1836年12月20日, 他第一次非正式会晤杰克逊总统。

③ W. C. 宾克利(Binkley), 《得克萨斯的扩张运动, 1836—1850年》(The Expansionist Movement in Texas, 1836—1850) (加利福尼亚州, 伯克利, 1925年), 第28—29页。

参议院作出决定，得克萨斯的独立已经确立，应当予以承认。第二天众议院拨了一笔款项在总统认为得克萨斯已是一个独立国，派一位公使到那里去是适当的时候，作为驻在得克萨斯的外交代表的经费。国会的这个行动，如果不说是实际上由杰克逊推动的话，也是他所最愿意接受的。他开始担心，为了得到一个外国对其独立的承认，得克萨斯人可能给予英国一些独占的商业权利，得克萨斯可能把它的外交关系搞得错综复杂而使得以后的合并极其困难^①。行将退休的总统立即派一位公使到得克萨斯去(1837年3月3日)。在西班牙的军队被赶走以后，美国等待了七个月才承认墨西哥本身的独立。在圣哈辛托战役以后将近十一个月得克萨斯的独立才为美国所承认。这个行动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墨西哥却提出抗议，如同西班牙在1822年曾提出抗议一样。

马丁·范布伦总统拒绝了(1837年8月25日)得克萨斯的合并请求。他通过国务卿福赛思解释说，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合并一个独立国家是不适宜的，这件事在宪法上也许是成问题的。而且，得克萨斯同墨西哥还处于交战状态，而美国同墨西哥曾订有一个友好条约。范布伦与杰克逊不同，他倾向于反对扩展奴隶制。得克萨斯人正式收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现在转而从事一项宏伟的独立发展事业，即向太平洋沿岸推进，在北美建立另一个横贯大陆的说英语的共和国。法国于1839年承认得克萨斯独立，英国、荷兰和比利时于1840年承认了它的独立。八年之间，得克萨斯成为一个有充分资格的独立国家，除墨西哥不承认外，它同几个海洋大国都有条约关系。在1837年以后至少五年之中，得克萨斯问题从美国的政治中消失了^②。

^① 前述史密斯著作，第60—61页。

^② 乔治·P·加里森(George P. Garrison)教授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年度报告》(1907年,1908年)里把得克萨斯共和国外交档案分为三卷编辑发表。

泰勒总统在 1843 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想在 1844 年选举之前为他的信誉低落的政治地位树立威望。这时，前总统杰克逊催促泰勒在外国阻止合并以前赶快把得克萨斯拿到手。他一再说，我们必须占有得克萨斯，“如有可能就用和平的方法；如果必要就用武力”。英国和法国自然想阻止合并。因为这意味着在国际均衡上给美国增加很大的重量。此外，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奴隶制度是英国的国策，这不仅出于一贯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原因，而且还由于大陆奴隶制地区同它的西印度殖民地竞争，而在西印度殖民地，作为一种人道主义措施，已经在 1833 年废除了奴隶制度。英国特别希望得克萨斯废除奴隶制，并且，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代价，要求批准(1842 年)废除奴隶买卖以及相互有权检查搜索贩卖奴隶的嫌疑分子的条约。此后英国和法国同得克萨斯的外交的主要点就是调解墨西哥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但以得克萨斯不得合并于美国为条件^①。英国对得克萨斯、墨西哥和奴隶制的政策正是二十年以后美国对古巴、西班牙和奴隶制的政策^②。 227

英国和法国还想把得克萨斯作为它们的工业品的一个低关税或自由贸易市场，并且作为它们的日益增长的纺织工业的在美国以外的供应棉花的另一个来源。

得克萨斯的外交家们在同华盛顿的交涉中聪明地运用了这些可能性。一个独立的得克萨斯对美国具有严重的含义。它阻挡着

^① 英国在 1840 年同得克萨斯签订了三个条约：一个商业和航海条约，一个废除奴隶买卖以及相互有权检查搜索的条约，和一个“关于公共债务的安排协议”，其中规定英国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进行调解；假如导致签订和平条约，得克萨斯须承担墨西哥在 1835 年 1 月 31 日以前所借的一百万英镑的债务。由于得克萨斯迟迟不批准奴隶贸易的协定，英国也拖延批准这几个条约。双方最后在 1842 年 6 月 28 日批准了所有这三个条约。E. D. 亚当斯(Adams)在他的《英国在得克萨斯的利益和活动，1836—1846 年(British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Texas, 1836—1846)》(巴尔的摩，1910 年)一书中从未公开的英国档案材料中分析了英国与那个共和国的外交。

^② 参阅本书第二十四章。

美国进一步向西扩张。假如得克萨斯成为一个自由土地的共和国，它将为从美国南部逃亡的奴隶提供一个邻近的避难所。作为一个新的奴隶制共和国，它对美国国内即将爆发的由奴隶制引起的斗争必将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美国的南部奴隶制各州脱离旧的美国而成立从墨西哥湾伸展到加利福尼亚湾和太平洋这样一个庞大的新联邦。不管是由于政治权谋或不是由于政治权谋，任何一个爱美国的总统都不能不看到这个情况。在安得鲁·杰克逊极力推动下，约翰·泰勒提出了签订合并条约的问题。杰克逊经由萨姆·豪斯顿总统劝告得克萨斯人接受这个谈判。豪斯顿写信给这位年老的将军说，“我的尊敬的朋友，现在你将理会得克萨斯如同一个装饰好准备出嫁的新娘呈献给美国……假如不理睬她，她就会去找别的朋友。”泰勒的国务卿，弗吉尼亚的艾贝尔·P. 厄普舍，正在把交涉进行得很好的时候，在美舰普林斯顿号上的一门炮走火的意外事件中丧命。一位南方的权利和扩张奴隶制度的热诚拥护者约翰·C. 卡尔霍恩^①继任国务卿，他是一个决心不让欧洲人插手得克萨斯事务的人。在1844年4月12日签署泰勒的条约的人就是他。得克萨斯人在得到卡尔霍恩正式允诺他们，美国的陆海军队将集结起来应付“在条约未订定期间”发生的任何意外时，才在条约上签了字。

总统在4月22日，也就是1844年总统竞选的前夕，把条约送交国会。辉格党^②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准备于5月1日在巴尔的摩开会，民主党提名大会于5月27日也在这个城市召开。正当两

^① R. G. 亚当斯 (Randolph G. Adams) 和圣乔治·L. 西奥萨特 (St. George L. Sioussat) 在《美国国务卿和他们的外交》第五卷中对厄普舍和卡尔霍恩的得克萨斯外交分别作了很好的描述。

^② 原文 Whig，在美国革命时期是指反对保皇党的革命党员。自1834到1855年之间指反对民主党的一个政党，即现在共和党的前身。——译者

党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参议院开始辩论这个条约^①。主要的候选人感到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辉格党提名的亨利·克莱完全不理睬这个政治背景，他从北卡罗来纳的罗利写信反对合并，因为那就意味着同墨西哥开战。但是克莱的信意味着条约的失败，除非参议院的辉格党的多数人想在人民面前抛弃他们所挑选的领袖。辉格党的政治纲领上完全没有提到得克萨斯。政府方面，由于卡尔霍恩的轻率行动，竟把合并得克萨斯与维护奴隶制和“南方的权利”等同起来提到国人的面前。

在英国上院八月份的辩论中，英国反奴隶制协会发言人布鲁厄姆勋爵和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曾发表了同情的谈话。布鲁厄姆说奴隶制度应当在得克萨斯并且最终在美国废除，他希望英国朝这个方向作出努力。厄普舍国务卿注意到南方派驻英国的非官方通讯员^②的报告，同时受到卡尔霍恩的怂恿（如果他确实需要别人怂恿的话），指示美国驻英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向阿伯丁要求说明英国反对奴隶制度的政策。外交大臣在致女王驻华盛顿外交代表帕克南的信中作了说明，他以相当温和的口气说道“英国希望”，并且一贯以一种公开和光明正大的方式“不断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全面废除奴隶制度”，它将非常高兴看到得克萨斯 229 废除这种制度，特别是作为墨西哥承认得克萨斯的一个条件（英国当时正在调解此事）。阿伯丁否认英国有任何在得克萨斯树立一种统治的影响，或者“通过得克萨斯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美国采取一种政治性行动”的意图。

^① W. S. 霍尔特 (Holt): 《被参议院否决的条约 (Treaties Defeated by the Senate)》，(巴尔的摩, 1933 年), 第 66—75 页。

^② 他们是得克萨斯驻伦敦的外交代表阿什贝尔·史密斯 (Ashbel Smith) 和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派去的一个华盛顿报纸编辑达夫·格林 (Duff Green)。格林是卡尔霍恩的亲密朋友。泰勒和厄普舍对这些通讯员的报告比对正式公使马萨诸塞的爱德华·埃弗雷特的报告更加注意。J. H. 史密斯的前述著作, 第 117 页, 暗示说史密斯曾直接写信给泰勒。史密斯和格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卡尔霍恩对这个信件作了进攻性的回答，在厄普舍死前不久留有这封信的一份抄件。新国务卿是一个坚决而雄辩的南方斗士，他在给帕克南的一份照会中声称，英国要废除奴隶制正是美国同得克萨斯签订合并条约的原因——阻止奴隶制在那里被废除！这是虚假的，但却证实了得克萨斯条约与维护奴隶制是一回事，而且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目的而很快公布了这个条约。假如要问除了拒绝合并外还有什么事情使得辉格党的提名人需要否决这个条约的话，这就是那件事情。参议院以三十五票反对，十六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条约（1844年6月8日）。

在参议院对这个条约实际表决之前，民主党人在一次热烈的会议争论（1844年5月27—29日）之后，提出了田纳西的詹姆斯·K. 波尔克为总统候选人，抛弃了拟订得克萨斯条约的泰勒和反对这个条约的范布伦。波尔克是可尊敬的扩张主义者前总统杰克逊训练出来的一匹政治“黑马”^①。他曾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得克萨斯问题上的立场：他赞成合并这个国家，也赞成合并整个俄勒冈^②。民主党的纲领强烈主张这两个合并。波尔克得到了泰勒和所有主张合并的人们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杰克逊的支持。

1844年的选举是十九世纪中唯一的一次以外交为主要问题的总统竞选，在美国历史中是三次这种选举中的一次，其他两次是在1796年和1920年。群众对合并的热情使克莱感到吃惊。他开始动摇、模棱两可。他声称，他将高兴看到“在没有屈辱、没有战争、联邦一致同意和公正公平的条件下”得到得克萨斯。这是只想当总统而不管是非的政客所说的刁滑言词。波尔克和民主党人主张合并和扩张，以微弱多数赢得了选举。不过，国民投票的选举地

^① 原文为 dark horse，指赛马中一匹素不出名而出人意外获胜的马，此处用来喻突然被提名的不知名人物。——译者

^② E. I. 麦科马克(McCormac)《詹姆斯·K. 波尔克的政治传记(James K. Polk: a Political Biography)》(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1922年), 第226页。

图^①上没有表示出区域划分。假如不是因为力量微弱的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G·伯尼在纽约这个自由土地选区分去了他的选票的话,亨利·克莱本来就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无论如何,波尔克的获胜可以认为人民要求合并得克萨斯。由于条约被否决,总统 230 一直力促通过国会两院的联合决议来达到合并。这只需要参议院多数通过就行了。1845年3月1日,他高兴地在联合决议上签了字,这个决议规定合并要在总统同得克萨斯政府作出安排下,允许得克萨斯作为一个州直接加入联邦。这个新州的边界则留待美国将来调整。

泰勒在离职前三天拿到了得克萨斯。波尔克就任总统。1845年6月8日,安德鲁·杰克逊带着满意的心情逝世了。

这次总统选举的投票是在要求合并俄勒冈和得克萨斯的情绪的支配下进行的;而国会关于合并的表决比起这次总统选举来更富于地区性表决的味道^②。

得克萨斯人在1845年有机会在合并于美国与按照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图谋,接受墨西哥的条约^③之间作出选择。这个条约规定墨西哥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但以永远不得合并于任何第三国为条件^④。得克萨斯人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在这样条件下的独

① C. O. 波林(Paullin)和 J. K. 赖特(Wright),《美国历史地理地图(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卡内基学会及纽约美国地理协会,1932年)。

② 密苏里、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等州在两院中坚决主张合并。新英格兰、纽约及其西部“殖民者”在众议院投票反对合并。在参议院,新罕布什尔、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及伊利诺斯等州的两名参议员都赞成合并;缅因州和康涅狄格州各有一名参议员也投票赞成。前述波林著作,第113页,第114图表;及前述里夫斯著作,第一卷,第693页。

③ 墨西哥国会正式表决假如得克萨斯拒绝同美国合并,就接受这样一个条约。条约中把边界问题留待将来双方谈判解决,但外交部长奎瓦斯(Cuevas)又说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待解决。里夫斯前述著作,第一卷,第704—710页。

④ 英国政府曾想把英法保证得克萨斯的独立作为拟议中的安排的一部分,把希

立,而几乎全体一致地赞成合并^①。

得克萨斯合并于美国从而摆脱了欧洲外交的纠缠。但是最终²³¹ (而不是立刻)导致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战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得克萨斯的合并怎样导致与墨西哥发生战争。

望寄托在美国内部的地区分歧来使合并运动瘫痪。但法国政府认为应当谨慎一点,不作这种保证。玛丽·K.蔡斯(Mary K. Chase)著,《欧洲关于得克萨斯共和国问题的交涉,1837—1845年(Négociations de la république du Texas en Europe, 1837—1845)》(巴黎,1932年)她曾利用了英国和法国的档案材料(J.H.史密斯或E.D.亚当斯无法找到法国材料)。

① 合并过程是这样最后完成的: 1845年3月1日,泰勒总统在美国国会关于合并的联合决议上签字。1845年6月21日,得克萨斯参议院一致拒绝墨西哥条约。得克萨斯国会一致赞成美国关于合并的联合决议,并定期召集大会制定新的州宪法。1845年7月4日,得克萨斯代表大会以五十票对一票表决通过合并,全体一致签署了一项合并法令。代表大会也一致通过了一个州宪法。1845年10月13日,得克萨斯州宪法由公民投票接受,并以公民投票的方式特别批准了合并法案。投票采用口头表决方法,表决情况似乎从未公布过(史密斯著《合并》,第460页)。1845年12月29日,波尔克总统批准国会接纳得克萨斯为一个州的决议。1846年2月16日,新的得克萨斯州政府成立。

第十四章 墨西哥战争 地峡问题

232

(1845—1859年)

从国家对国家的角度来说，向得克萨斯移民和得克萨斯爆发革命都不应由美国担负责任。发生移民和爆发革命，乃是由于墨西哥的不得当的国内立法以及它对广大北方省份和边界的控制薄弱所使然。如果墨西哥对美国的不完备的中立法曾有所抱怨的话，它却未曾催促美国解决这个问题。同承认墨西哥本身的独立相比较，美国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并不算为时过早。得克萨斯政府和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并为他们所不可阻挡地热烈赞成的合并进行得有条不紊，是正当的，是两国人民所共同愿望的。得克萨斯已经有九年的独立国家的经历，为世界上的一些大海洋大国所承认，并且同其中几个国家建立了无可非难的条约关系。最有力地证明得克萨斯的合法独立的是墨西哥政府在1845年表示愿意同得克萨斯签订条约只要它同意永远不合并于美国。

墨西哥驻华盛顿公使阿尔蒙特曾宣称假如美国合并得克萨斯，他就要闭馆回国，他的政府就要宣战。墨西哥政府照会美国驻该国公使，它将“认为美国通过合并得克萨斯的领土的法案就等于对墨西哥共和国宣战；这件事一经证实就是立刻宣战的充分理由。”^①当美国国会仍然通过合并法案以后，墨西哥政府撤回了它的公使并断绝了与美国驻墨西哥公使的官方关系。

至少面对着墨西哥的这种战争威胁——假如愿意的话，确实

^① J.H.史密斯：《同墨西哥的战争(The War with Mexico)》，第一卷，第84页。

可以认为已经宣了战——新任总统，詹姆斯·K. 波尔克派兵到得克萨斯保护那个共和国在完成合并的过程中免遭攻击。他还派遣美国海军到墨西哥湾和加利福尼亚沿海岸的战略要地去，自1842年以来美国的一支舰队已经一直在这一带海面上巡弋^①。鉴于墨西哥正式表明的态度，作这些军事部署是有充分理由的。波尔克的朋友访问了得克萨斯之后力促将得克萨斯军队开进努埃西斯和格兰德河之间的有争议的地带，从而在合并之前重新采取与墨西哥敌对的态势。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在合并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就可以在最后和约和边界问题上全权行事了^②。波尔克本人和他的政府则指示不参与这个共谋。得克萨斯总统安森·琼斯并不想为这个谋略出力，因为他已向英国代办保证在英法调解下缔结拟议中的墨西哥和得克萨斯之间的条约期间他将不采取一切敌对行动。

敌对行动并未立刻发生。波尔克想在合并成为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同时他想同墨西哥解决所有其他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新合并的美国领土的边界和一些已经裁定的美国权利的偿付问题。作为这种解决的一部分，他愿向墨西哥购买位于得克萨斯和太平洋之间的领土。如同杰克逊一样，他对有着旧金山海湾的优良港口的正在迅速扩展的加利福尼亚地区也是贪图得到的。在载运阿尔蒙特及其家眷回墨西哥的同一艘船上，波尔克派了一个名叫威廉·S. 帕罗特的秘密使者，去试探墨西哥政府是

① 1842年10月19日，一个过于积极的海军军官T.A.C. 琼斯舰队司令听到墨西哥的部长包卡尼格拉(Bocanegra)的好战言论便认为战争肯定会打起来，乘机占领了芒特雷(Monterey)和加利福尼亚，但是发现那里却十分平静。他马上降下国旗，向墨西哥国旗鸣放礼炮致敬，然后驶离那里。

② R.R. 施滕贝格(Richard R. Stenberg):《波尔克的1845年战争阴谋的失败(The Failure of Polk's War Intrigue of 1845)》，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四卷(1935年3月)，第39—69页。J.H. 史密斯:《得克萨斯的合并(The Annexation of Texas)》，第245—248页。

否愿意同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并愿意接受一个受权以一种友好公平的精神来讨论两国之间所有存在的问题——自然除了使两国关系破裂的合并得克萨斯问题以外——的“公使”。

从墨西哥，帕罗特向国内报告了被认为是同厄累拉政府比较接近的人士所作的含糊的间接的保证：听到墨西哥总统说，假如美国的“公使”来到，他会受到良好的接待^①。他没有同墨西哥的负责当局直接接触。帕罗特在另一封信中说“使节”将受到热烈欢迎^②。波尔克希望得到更明确的保证。他因此指示美国驻墨西哥城的领事约翰·布莱克去向外交部长培尼亚墨西哥政府会不会接受一位“被委以全权来调整两国政府之间所有问题的美国使节。假如答复是肯定的话，这样一位使节将立即被派往墨西哥”。培尼亚说，虽然墨西哥受到得克萨斯事件的严重损害而烦恼，只要美国从维拉克鲁斯附近撤退其海军部队，他的政府准备接受一名全权“专员”，以一种和平、合理和端正的方式来解决现存的纠纷。在这位领事的建议下，舰队开走了^③。帕罗特把布莱克的信件和双方交换的照会在1845年11月9日带到华盛顿。总统立即派了一位全权公使——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莱德前往墨西哥。帕罗特的第一个报告声称“听说”厄累拉说墨西哥准备接受一位“公使”的

① 帕罗特给布坎南的信，墨西哥，1845年8月16日，登载在《文件，墨西哥 (Despatches, Mexico)》第十二卷，1843年11月10日至1845年4月25日，国务院档案。

② 同前注出处相同的信件，1845年8月26日。

③ 照会和答复，1845年10月13日，登载在阿尔伯托·M. 卡瑞诺 (Alberto M. Carreño) 的《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 (Mexico y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墨西哥, D. F. 1922年)，第119页，摘自1846年的《外交部长回忆录 (Memoria de la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参阅里夫斯的前述著作，第二卷，第65页。布莱克在他的1845年10月11日的“私人的秘密的”信件中报告说培尼亚解释说所谓烦恼和损害的措辞是为了给该国国内看的。《领事信件，墨西哥，1840—1845年 (Consular Letters, Mexico, 1840—1845)》，《国务院档案》。

时候，给斯莱德尔的指示已经写好了^①。现在正式批准这些指示，并发给斯莱德尔，这时他正在彭萨科拉等候启程。波尔克可能不清楚知道正式公使与专使在职务上的区别。

236 给斯莱德尔的指示表明，波尔克是愿意以合乎情理的态度对待墨西哥的。他本来会欢迎一场战争和征服所垂涎的领土，而且他决心要占有加利福尼亚，但他却确实给予墨西哥一切谋求和平解决的机会，并不准备取得确实属于墨西哥的任何一平方英里的领土。得克萨斯地区作为“得克萨斯和科阿韦拉的墨西哥国家”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边界没有超过努埃西斯河；但得克萨斯人在革命之后却断言他们的边界是格兰德河——不过未能在那里特别是在这条河上游的圣菲和陶斯地区建立起真实的权力。墨西哥如果同意将格兰德河一线作为美国边界，美国愿意豁免墨西哥偿付经裁定应偿付给美国公民的权利要求的款项，这些权利要求在仲裁后被墨西哥十分不负责任地拒绝偿付^②。

① J. 史密斯的前述著作，第一卷，第 435 页，引用帕罗特在他的 1845 年 8 月 16 日的报告中说：“厄累拉曾说，‘假如美国派公使来，他将受到良好的接待。’”从国务院档案中发现的帕罗特信件手稿中，他实际上是这样写的：“迄今一直得到政府各高级部门一致拥护的总统据说赞成和平解决同我们之间的纠纷，并且据传说假如美国公使到来，将受到良好接待；然而，关于这点，在本月底英国快邮离开之前，我将会得到更多的情报。”

② 这些权利要求是要求偿付美国公民在墨西哥反对西班牙的革命时期向墨西哥政府提供金钱和卖给它的武器和其它物资，以及在墨西哥革命动乱期间美国所遭受的人员和财产方面的损失。

由联合权利要求委员会裁定偿付 2,026, 139.68 元（美国提出来的要求是 8,513, 752.65 元）。1843 年墨西哥开始按照协定数目分期付款，但只付了拖欠的利息，于 1843 年 4 月 30 日停付。还有其它数目达 3,336, 837.05 元的权利要求来不及提到这个委员会裁决，而这两个共和国后来也未能成立另一个委员会来裁定这笔款项。参阅 J. B. 穆尔的《国际仲裁汇集》，第 1202—1359 页。

墨西哥不是美国对之有正当权利要求的唯一国家。美国曾经对英国、法国、丹麦、两个西西里、葡萄牙、秘鲁都提出过权利要求，在所有情况下都由双方协议通过仲裁或者接受一笔总的清偿来解决。经双方同意的数额的款项即将到偿付日期的时候，只同法国（参阅本书第 290 页）和墨西哥发生了麻烦；杰克逊总统迫使法国清偿的坚决程度不下于他和他的继任者谋求墨西哥清偿时所表现的程度。

这是波尔克准备提出的和平解决办法。假如我们接受得克萨斯独立这个事实——如墨西哥于1845年在英国提出的条件下准备接受那样——这的确是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在这些条件之外，斯莱德还试图以多达二千五百万元的代价购买（但不作为必须条件）加利福尼亚及在埃尔帕索纬度线以北的中间地区（大致是1848年的割让地区）；的确，“同获得这块地方的价值相比，钱算不了什么。”^①假如他不能够买到这些地区，他将出五百万元来买当时包括格兰德河上游（埃尔帕索以上）流域在内的新墨西哥。

尽管曾向波尔克作了一些保证，但是墨西哥政府却拒不接待斯莱德。真正的原因是厄累拉担心对美国让步可能给当时威胁要搞革命的帕雷德斯反对派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但是当帕雷德斯的追随者在不久以后真推翻了厄累拉，新的革命政府也惧怕接待斯莱德。在墨西哥还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既不需要怕美国，也不必注意美国。墨西哥外交人士对于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②的援助的可能性作了错误的估计；当时英国仍在与美国在俄勒冈问题上的纠纷之中，它曾经试图阻挠得克萨斯的合并。虽然墨西哥在平息得克萨斯的革命这件事上失败了，但在墨西哥却有一种对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报刊舆论，认为墨西哥在同可恶的美国发生任何战争时，至少能够保有自己的这一切。墨西哥的两届政府，厄累拉和后继的帕雷德斯政府，都使用同一个十分完善的借口说，所同意的只是接待一个受权排解两国现存纠纷的“官员”，而不是

^① 斯莱德的指示以及帕罗特和布莱克的指示登载在J. B. 穆尔编辑的《詹姆斯·A. 布坎南全集(Works of James A. Buchanan)》(十二卷本，费城，1908—1911年)，第六卷。据波尔克笔记，他曾告诉内阁，内阁也同意了：他“估计(三十二度以北的地区)可以用一千五百万或两千万美元买到，但他准备出四千万美元，假如少了不能买到的话”。米洛·M. 奎夫(Milo M. Quaife)编辑的《詹姆斯·K. 波尔克在总统任上的日记，1845—1849年(The Diary of James K. Polk During his Presidency, 1845—1849)》(四卷本，芝加哥，1910年)，第一卷，第35页，1845年9月16日记入事项。

^② J. 史密斯的前述著作，第一卷，第115页。

在一切问题未解决前接待一个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正规的全权公使。虽然理由是正当的^①，但是墨西哥政府当局本来可以放弃这种按照外交原则办事的做法而使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不这样做是非常轻率的。由于拒绝接待斯莱德尔他们却使局势对波尔克有利。当总统听说墨西哥不同斯莱德尔谈判和平，他就把美国军队布置成对墨西哥挑战的姿态。在得知斯莱德尔的使命失败后看来只是由于同英国在俄勒冈问题上的纠纷还没有解决这个事实才阻止了波尔克立刻把一份战争咨文送交国会^②。

如果墨西哥这样谨慎地避免同斯莱德尔交涉和不接受格兰德河的合理边界来交换免除偿付美国权利要求的义务，波尔克怎样去取得加利福尼亚呢？假如墨西哥选择了和平和格兰德河界线，波尔克就可以有办法得到加利福尼亚。当给斯莱德尔的指示正在草拟的时候，一个使者已经走上到加利福尼亚去的旅途，他携带着给驻蒙特雷的美国领事托马斯·O. 拉金的指示和给当时正在墨西哥领土上率领一队兵士勘察加利福尼亚地形的 J. C. 弗里蒙特上校的信件。给拉金的指示^③是叫他密切注视当地形势，着眼于一旦那里发生了威胁到得克萨斯的革命时防止加利福尼亚落入某个欧洲国家的手中。注意着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这位领事要向加利福尼亚人保证：假如他们独立，他们将被欢迎加入美国联邦。我们

① 美国在 1933 年接待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一位使节或者说官员李维诺夫先生，商谈解决一些争端作为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只是在解决这些纠纷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之后才互相交换大使的。这是一个十分相似的例子而且可以证明墨西哥革命政府于 1845 年所采取的外交原则立场是正当的。

② 麦科马克的前述著作：《詹姆斯·K. 波尔克》，第 405 页。

③ R. W. 凯尔西(R. W. Kelsey)著，《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领事馆(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in California)》，载《太平洋沿岸历史学会(Acad. Pacific Coast History)》，第一卷，第五号(1910年6月)。这篇文章及其它谴责波尔克的政策著作的申肯的批评，参阅 E. C. 巴克的杰出的分析：《美国领土扩张的史料编纂(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Territorial Expansion)》，载于《横贯密西西比西部(Trans-Mississippi West)》(科罗拉多大学，博耳德，科罗拉多，1930年)。

不知道给弗里蒙特的信件内容；但在接到上述信件之后，这位军官立刻采取等着看局势发展的结果的态度，以便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他能够使用他的那支小部队(六十五人)^①。波尔克正当地害怕^②英国或者法国会在美国之前获得加利福尼亚。历史研究表明，虽然英国和法国的驻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公使和领事分别催促各自的政府接管加利福尼亚，但英国和法国政府都不准备承担采取这样一种行动的责任；不过英国在太平洋的分遣舰队本来会被引诱来帮助在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当局，假如美国海军在开战之初失利的話^③。如同在得克萨斯那个事件中的情况一样，他们希望加利福尼亚不要落入美国手中。波尔克在1845年12月2日的年度咨文中重申门罗主义“是我们的既定国策，将来任何欧洲殖民地或属地不会在我们同意之下建立或设置在北美大陆的任何部分”。三年以后，关于尤卡坦的革命者要把对他们的统治权和国家转移给美国，或者甚至给英国或西班牙的谣传，波尔克在1848年4月29日(即在对墨西哥的战争期间)的特别咨文中重复了他的声明^④。他祈求于门罗主义这个事实加强了那个宣言作为一个确定

239

① J. 罗伊斯 (Josiah Royce) 著, 《加利福尼亚, ……美国性格的研究 (California, ... a Study of American Character)》(波士顿, 1886年), 表明弗里蒙特的急切心情如何促成在旧金山湾附近同墨西哥守卫部队的冲突(“熊旗反叛”事件), 从而破坏了拉金组织一场叛乱的努力(拉金试图利用这场叛乱在发生战争时把加利福尼亚和平地纳入美国), 最后不得不在发生的战争中以武力占领这个地区。

② E. D. 亚当斯著, 《英国对合并加利福尼亚的关心 (English Interest in the Annexation of California)》, 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十四卷(1909年), 第744—763页。

③ E. D. 亚当斯的前述著作和 A. P. 纳萨蒂尔 (Nasatir) 著: 《法国在加利福尼亚的领事馆 1843—1856年 (The French Consulate in California, 1843—1856)》, 载《加利福尼亚历史协会季刊》, 第十一卷(1932年9月), 第195—223页; (1932年12月), 第339—357页; 第十二卷(1933年3月), 第35—64页; (1933年6月), 第155—172页; (1933年12月), 第331—357页。E. A. 韦尔西 (Wiltsee) 著: 《英国驻加利福尼亚的副领事和 1846年事件 (The British Vice Consul in California and the Events of 1846)》, 同上书, 第十卷(1931年6月), 第99—128页。

④ 波尔克在解释门罗主义的范围的时候强调北美, 而不是美洲大陆, 这是他的独特的提法。

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的原则的地位。但是，在展示这个主义来阻止非美洲的入侵者在美国可能选择或不选择划分给自己的地区插手这件事上，波尔克为门罗总统这个著名的宣言揭示了新的可能性^①。

当波尔克听到墨西哥拒绝同斯莱德尔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他才命令泰勒将军从争议地区的东部边沿的科珀斯克里斯提进至西部边沿的格兰德河。假如总统不让泰勒进入争议地区的话，他本来可以避免同墨西哥军队发生冲突；但很难责怪他在当时情况下的行动，因为他已经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来调整边界，而墨西哥却利用一个外交术语来回避谈判。这种态度是墨西哥想采取以前讲的战争状态已经存在的立场的明确表示。按照墨西哥的立场，不仅努埃西斯—格兰德河地区而且全部得克萨斯都是属于它的。在这种情况下，泰勒很难静坐等待墨西哥军队开进一个一旦真实的敌对行动开始时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泰勒已经接到命令：“假如墨西哥集结大量军队于格兰德河，并且以相当多的兵力越过该河，必须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对美国的侵略和敌对行动的开始。”^②在泰勒留在科珀斯克里斯提期间，墨西哥的军队还没有越过这条河开进这个有争议的地区。当这位将军到达格兰德河（1846年3月28日）之后^③，波尔克就等待那里的消息。

几个星期都没有消息。难道沿格兰德河一带全都平静无事吗？不耐烦的波尔克终于在5月9日上午召集内阁会议并送交国会一份战争咨文，要求授权使用美国军队去征收已经裁定的权益赔款。当决定送交这样一份咨文的时候，只有海军部长乔治·班

① “这是将不干涉原则转变为干涉原则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开始。” D. 珀金斯 (Dexter Perkins) 著：《门罗主义，1826—1867年》(Monroe Doctrine, 1826—1867) (巴尔的摩，1933年)。

② J. 史密斯的前述著作，第一卷，第144页。

③ J. M. 卡拉汉 (Callahan) 著：《美国在与墨西哥关系方面的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Mexican Relations) (纽约，1932年)，第157页。

克洛夫特表示反对。然而当天下午传来消息说泰勒在格兰德河的这一边遭到墨西哥军队的攻击。在不久前的4月23日,帕雷德斯总统已经宣布了^①“防卫战争”,两天以后阿里斯塔将军的军队同泰勒将军的军队就发生了一场小冲突。当这个冲突的消息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泰勒已经在格兰德河的这一边同墨西哥的军队发生战斗(帕洛阿尔托之战,1846年5月8日)。内阁急忙在5月9日^②晚间召集会议,这时全体一致认为由于墨西哥的行动,已经存在着战争。国会在听取了总统咨文说墨西哥已经“宣布战争开始”之后,于1846年5月13日发表声明说:“由于墨西哥共和国的行动,美国同该国政府已处于战争状态。”^③

我们只能简略地提一下这场战争的军事发展过程。美国共进行了三次主要的军事进攻。在1846—1847年的秋冬两季泰勒将军率领一万人推进到墨西哥境内(布韦纳维斯塔战役,1847年2月23日),远至塔毛利帕斯的首府维多利亚。经过几次激烈战斗迫使桑塔·安纳^④的北方军队后撤。然后他沿着他的已经变得很窄的交通线返回格兰德河,自此以后未再遭到侵扰。同时,在斯蒂芬·W.卡尼将军率领下的一支小队伍从密苏里由陆路出动占领圣菲并越过亚利桑那向加利福尼亚推进。在那段海岸(离基地一万英里以外)外面游弋的舰队在斯托克顿司令指挥下得到弗里蒙特的犹豫不决的帮助,已经能够夺取了旧金山和蒙特雷。卡尼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就到达加利福尼亚,掌握了统治权,并宣布成立军

① 卡拉汉的前述著作。

② 前述波尔克日记。

③ 5月11日众议院的表决情况是173票对14票;5月12日参议院的表决是42票对2票。经总统的签署这个议决案于5月13日成为法律。

④ 桑塔·安纳在1836年在圣贾辛托被得克萨斯人打败和俘虏后成为一个被流放的人。他提出来他可以劝说墨西哥早日按照波尔克愿望的条件媾和,他被允许在维拉克鲁斯(从古巴)登陆。但他远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而是使自己再度当权来继续进行战争。战争失败之后,他又再次被流放。

事管制下的临时美国政府。美国军队向墨西哥首都作决定性的推进。一支一万二千人的远征部队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指挥下于1847年3月9日在维拉克鲁斯登陆。9月间这支部队已抵达墨西哥城门前的高原。桑塔·安纳面临着失败和首都陷落。

波尔克独特地放弃了竞选第二任总统；但他对他的将军们的军事上的威望有些嫉妒，因为这种威望可能使泰勒或者斯科特成为1848年可畏的总统候选人。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希望以最小限度的战斗和军事荣誉来取得这场战争的成果。他派了国务院的一个主任科员尼古拉斯·P. 特里斯特作为行政官由陆路随同斯科特的军队充任和平谈判专员。总统给特里斯特的称号是“全权专员”，给他一份由波尔克签字并盖有美国大印的委任状；但他却没有正式外交身份。他被认为是这样一个低级人士，无论怎样大的外交胜利也无法把他提升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他的成功也就是波尔克的成功。他的职务上的身份大致类似同北非伊斯兰教国家谈判和平的专使，并且，姑且这么说，类似1898年同西班牙进行和平谈判的特命代表，类似1919年代表美国参加巴黎和会的那些人员，也类似1921年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单独条约的那些人员。这样的专使在美国外交中往往起着比正式任命的外交官更重要的作用^①。假如墨西哥政府拒绝特里斯特带去的条约草案，或者他们坚持要求派去全权代表，特里斯特就据实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打算派遣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作为正式和平代表到墨西哥去。特里斯特带去的条约草案要求墨西哥接受从格兰德河到埃尔帕索的边界以及割让这个纬度以北直到太平洋的所有领土，作为交换，美国承担总数为三百万元的权益赔款并再付给一千五百万元。此外，他可能付出多至三千万元来交换下加利福尼

^① 关于专使和正式任命的外交官在宪法地位上的区别，以及这些专使的全部历史，参阅 H. M. 里斯顿的前述百科全书式著作：《美国外交关系上的行政官员》。

亚半岛和墨西哥南部的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过境权。他随身带去了用来订交易契约的三百万元支票。1848年波尔克的最低限度的和平的必须条件相当于斯莱德尔曾经“试图”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条件，但高于1845年他所提出的必须条件，假如墨西哥没有坚持要打仗的话。

最初特里斯特同斯科特将军相处得不大好。专使带有一封致墨西哥外交部长的封口信件，布坎南在其中指出说，从墨西哥领土上撤走对美国来说是放弃了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利益，尽管如此，将派一个“在国务院属于第二等级”的专员在军队里随时准备进行谈判和平。虽然特里斯特得到允许向斯科特披露上级给他的指示和给敌人的封口信件，但他没有这样做；因而斯科特拒绝通过 242 前线递送这个神秘的文件。将军和专使的不和达到这样程度以致有一个时候他们彼此不说话。特里斯特通过英国使馆把信件送交墨西哥当局。英国公使建议有必要贿赂墨西哥官员来进行和谈。斯科特将军不久后就同特里斯特和解了。他很愿意动用他的特务基金来帮助特里斯特做这件事。他答应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前通知废除的短期停战，当时桑塔·安纳正在预料会被迫撤出城市从而获致和平。墨西哥的领导人愿意按照特里斯特提出的必须条件（非常容易地透露出去的）媾和，然后用这笔钱来为自己建立长久的政权。在停战期间为这个目的举行的谈判遭到日益强烈的抗议，反对割让领土，以致焦躁不安的桑塔·安纳不敢继续谈下去。停战终止了。斯科特占领了墨西哥城（9月14日）。桑塔·安纳逃走。当一个改组了的墨西哥政府准备恢复和谈的时候，世界各地都知道波尔克总统对特里斯特的外交工作，特别是关于停战感到不满，因此已经把他召回。总统决定让墨西哥在波托马克两岸乞求和平。要求得到全部墨西哥的一种不祥的情绪迅速增长起来。国务卿布坎南和财政部长R.J.沃克就有这种情绪；但是波尔

克要使墨西哥问题超出政治范围而成为自己个人的光彩^①。

特里斯特在被免去所有职权之后，做了一件异常的、轻率的事情。在敌人的唆使下，又接受斯科特的建议：假如他带一个得到墨西哥政府批准的条约回到华盛顿去，参议院将会批准这个条约；他于1848年2月2日^②在瓜达卢普—伊达尔戈村庄签订了一个包括已经取消了的对他的指示里面的必须条件的条约：以格兰德河为边界和割让该河与太平洋之间的领土^③。它划进了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各州，怀俄明的一角和科罗拉多的西部斜坡。美国要为此支付一千五百万元——在墨西哥批准条约时立即付三百万元——并且承担偿付达三百二十五万元的美国公民的权利要求。特里斯特是在违背对他的指示和没有权力的情况下签订这个条约的，因为他怕拖延签订会使墨西哥陷入无政府状态并加强国内的索取更多或全部墨西哥领土的运动。此外，他还怕更大规模的合并将招致北部各州的强烈抗议，因而引起它们脱离联邦和联邦的分裂^④。

① L. M. 西尔斯(Sears)著：《尼古拉斯·P. 特里斯特，一个有理想的外交家(Nicholas P. Trist, a Diplomat with Ideals)》，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十一卷(1924年6月)，第85—98页。E. G. 鲍恩(Bourne)著：《美国和墨西哥，1847—1848年(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847—1848)》，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五卷(1900年4月)，第491—502页。

② 在同一星期中，加利福尼亚的萨特矿场第一次发现了金矿，但这件事自然是在条约已经批准之后墨西哥才知道的，当时美国也不知道。

③ 按照1847年在纽约发行的狄斯特纳尔(Disturnell)地图，这个条约的界线上升到格兰德河的中部(新墨西哥的南部边界)从那里往西而后往正北绕过新墨西哥边界到希拉河的第一条支流交叉点，然后向下到科罗拉多河。从那里越过科罗拉多河沿上加利福尼亚与下加利福尼亚的分界线到太平洋。规定美国可以自由航行科罗拉多河和加利福尼亚湾；双方在希拉河和新墨西哥南部边界以下的格兰德河都可以自由航行。

④ 西尔斯的前述著作。在另一方面有一种反奴隶制的正当情绪赞成把全部墨西哥吞并过来，认为这样就会在地理上和社会上反对奴隶制了。事实上，某些赞成奴隶制的领袖们，如卡尔霍恩，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反对再作进一步的合并。约翰D. P. 富勒(Fuller)著：《奴隶制问题和获取墨西哥运动，1846—1848年(The Slavery Ques-

特里斯特的不服从激怒了波尔克，他立刻使他丢脸地被解除一切公职；但总统心里却不能不喜欢这个条约的条款，因为它为美国取得了他所想使美国得到的东西。同时他希望在1848年总统竞选举行之前解决整个墨西哥问题。他把条约送到参议院；参议院以三十八票对十四票的表决批准了这个条约（1848年3月10日）。直到1871年经过国会表决特里斯特才得到对他个人开支的补偿和薪金^①。由于违背了对他的指示，他使国家得了利，却使自己蒙受重大的损害。波尔克信守他于1844年接受提名时所表示的决定，拒绝充当1848年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提出了被忽视了了的军界英雄扎卡里·泰勒将军（波尔克由于惧怕他的政治潜力曾经不尽心竭力地支持他的军事行动）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在纽约州的一场派系争吵之后提出了刘易斯·卡斯为总统候选人；泰勒将军击败了卡斯而当选为总统。

假如波尔克把泰勒立即调离格兰德河以北的有争议的地区并且采取如同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1917年对墨西哥那样的耐心和等着瞧的政策，他本来可以在不损害美国的重大利益和国家荣誉的情况下避免同墨西哥打仗。波尔克让墨西哥先发动战争，而这一点，要促成这场战争他也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不体面的行 244
动。这场战争给美国增加了一大块领土，总的代价是一亿一千八百二十五万元——加上双方各损失几千人的生命——其中一千五百万元是“购买的”领土的代价，三百二十五万元用于为墨西哥偿付美国公民的权利要求，一亿元是军费^②。这些新地域的获得使在美国领土内的奴隶地位问题上的剧烈而且是长期潜在的争论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这个争论曾经由于1850年的妥协而暂时得到

tion and the Movement to Acquire Mexico, 1846—1848)》，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二十一卷（1934年6月），第31—49页。

① 西尔森的所述著作。

② 钱宁的估计，前述书，第五卷，第600页。

缓和,但是在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赢得 1852 年大选的胜利之后,由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以及以后发生的直接导致南部各州脱离联邦和南北战争的一系列可悲的事件而很快重新爆发。这次战争使美国死了五十万人以上,使美国人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假如再加上借款利息和直到现在的恤金,总共花费了不下于战争之初的 1861 年的国家(包括北方和南方)的全部财富。尽管如此,今天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美国公民会想要取消波尔克总统的外交,波尔克总统的战争,以及由波尔克总统的不服从命令的国务院主任科员谈判缔结的瓜达卢普—伊达尔戈条约。

只是到 1848 年墨西哥割让新的领土之后,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才严肃地注意到由谁来控制任何未来的地峡运河的重要性。这是真实的,尽管美国和外国对挖掘运河的可能性具有一贯的普遍的兴趣,尽管国会多次决议对这个问题采取外交行动,却未曾引起美国行政部门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在瓜达卢普—伊达尔戈条约批准之后立即传来了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人群拥向太平洋沿岸的这些金矿,这件事十分明显地着重提出了在两个大洋之间的未来水道的重要性。很奇怪,一位名叫本杰明·A. 比德拉克的美国外交官近来(1846 年 12 月 12 日)曾在波哥大同新格拉那达(即哥伦比亚)缔结了一个对以后的地峡运河外交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条约。该条约的关于将来运河的第三十五款不曾在美国给它的公使的任何指示中提到过。比德拉克试图解决一个关于差别税率的老的纠纷,即新格拉那达对自己的船只载运货物到自己港口按优惠的税率而对经营运输业的外国船只则按差别的税率征税。对英国要控制巴拿马地峡的露骨野心新格拉那达感到担忧,对不久前英国宣布把莫斯基托海岸置于自己保护之下非常吃惊。那就意味着英国的无拘束的领土要求向南伸展到无可争议的格拉那达领域:巴拿

马省内的博卡—德尔托罗。那时正在伦敦装备航海用品的厄瓜多尔的革命领袖弗洛里斯将军所指挥的远征对新格拉那达的领土构成又一个威胁。它曾经试图同英国和法国，单独地或联合地，签订一个保证地峡的中立和那里的格拉那达的领土主权的条约，这样一个条约也是美国和其他海洋国家愿意遵守的，但是毫无结果。由于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拒绝，而且非常怀疑那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动机，格拉那达政府^①转向美国要求给予外来的保护，提出愿意在差别税率问题上让步并以让与巴拿马地峡的通行权来交换美国保障新格拉那达对通道的主权和地峡的中立。新格拉那达停止对美国船只征收差别保护性关税作为交换这种保障的条件，附带解除了新格拉那达对同它订有最惠国条约的其他国家停止征收差别保护性关税的必要性。格拉那达人非常积极并十分秘密地提出了这个请求。在还没有接到关于他的政府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保障的指示的情况下，比德拉克完全出于主观愿望，很快地签了这个条约。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件。比德拉克知道这个条约具有联盟的性质。

这个条约保证美国及其公民为“合法商业”“以任何现行的或此后可能建造的交通方式穿过巴拿马地峡的通行权”，征收不高于对新格拉那达公民征收的数额的通行税。这是一种非排他性的权利。这个条约的第三十五款包括这样一些重要词句：

并且，为了使他们安宁而经常地享受这些利益，以及作为上述利益的特别补偿，和他们从本条约第四、五、六款（关于税率）所得到的优待，美国按照本规定向新格拉那达明确而有效地保证上述地峡的完全中立地位，以使得在这个条约存在期间的任何将来时候从一个海洋到另一个海洋的自由通行不致受到阻碍或困扰；因

246

^① 这项谈判是在新格拉那达总统莫斯克拉将军的推动下由外交部长曼努埃尔·M. 马拉里诺进行的。

此，美国也同样保证新格拉那达的主权和它在上述地域所有的和所据有的财产权利。

以后在本卷中我们将看到美国政府在 1903--1904 年间，根据上面为读者以异体字标出的词句争辩说这包含了反对国内革命的对巴拿马地峡的中立的保证。没有人提出任何证据来表明条约的谈判人员或批准条约的当局的心目中除了保证中立外还有什么对其他国家的意向。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和注视着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波尔克在不是没有一些犹豫的情况下，赞同了这个条约；而参议院在同墨西哥媾和不久之后以二十九票对七票批准了这个条约（1848 年 6 月 8 日），对所承担的义务也不是毫无疑虑的。波尔克赞成中立，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控制。他对参议院说他希望英国和法国也签订类似的条约。这也是新格拉那达地峡政策的目标。至于保证新格拉那达的主权问题波尔克向参议院解释说，“这是保证它的中立的自然的结果，看来要获得这块领土的中立地位，不可能有任何其它实际可行的方式。”^①

同新格拉那达缔结的条约是一项重大的外交成就。不幸的是它仅只在一条主要的航道上为美国保留了通行权。经过尼加拉瓜

① 瑞索多·里瓦斯 (Raimundo Rivas) 著《哥伦比亚和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1810—1850 年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tre Columbia y los Estados Unidos, 1810—1850)》(波哥大，国家出版社，1915 年)，根据哥伦比亚的档案文件，而不是根据美国方面的档案材料，描述了这些谈判。R. R. 麦克·格里戈尔 (Mac Gregor): 《1846 年条约 (美国—哥伦比亚关系的十七年，1830—1846 年)》(The Treaty of 1846 [Seventeen Years of American-Columbian Relations, 1830—1846])，载《克拉克大学论文摘要》，1929 年 (马萨诸塞州伍里斯特，1930 年)，根据美国的档案文件以及里瓦斯的著作，来描述这些交涉。J. B. 洛契 (Lockey) 著：《地峡外交的一个被人忽略的方面 (A Neglected Aspect of Isthmian Diplomacy)》，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四十一卷 (1936 年 1 月)，第 295—305 页，对弗洛里斯 (Flores) 插曲做了补充说明。参阅 E. T. 帕克斯 (Parks) 著：《哥伦比亚和美国，1765—1934 年 (Colum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65—1934)》(公爵大学出版社，1935 年)。

的那条航路在当时以及以后的长时期中被认为是最好的一条航路。自墨西哥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之间开展了危险的竞争,双方都通过同中美洲各国的外交安排谋求阻止对方对尼加拉瓜航路的任何控制。

英国海盗在十六、十七世纪对南美洲北岸的侵占导致在伯利兹(现在的英属洪都拉斯)建立了没有法律根据的木材采伐居留地。²⁴⁷这些居留地在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中是作战的目标,而在和平时期则是两国外交纠纷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1783年的和平条约如何把英国在“西班牙大陆”上的木材采伐居留地限制在伯利兹和翁多河之间,而不损害西班牙在那里的主权。后来英国外交家们争辩说中美洲不是“西班牙大陆”而是“美洲大陆”。尽管如此,在1786年和1815年同西班牙订立的条约中,英国放弃了对伯利兹的主权的一切要求。当西班牙的统治权转移到中美洲联邦以及后来又转到不承认英国对伯利兹的主权的若干单独国家的时候,英国的伐木者仍然居住在那里。危地马拉在1835年请求美国帮助来对付英国对它的这些边境的侵占但未获结果。后来英国任命了驻节在伯利兹的政府,并于1840年宣布了在那里实行英国的法律。驻在官员在1840年宣布伯利兹为英国殖民地;但这个法案被伦敦否决;直到1862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以后才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英国殖民地。1841年从伯利兹任命了一些英国行政官员来为在控制着洪都拉斯湾的有战略价值的但不利于健康的巴亚群岛上居住的英国居留民服务。伯利兹的历史是说明成功的海盗行为怎样导致侵占领土,居留地,势力范围,不断扩展边界的保护领,最后导致实际的主权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另一个英国保护领通过类似的方法已经在沿中美洲的大西洋海岸从格腊西亚斯—迪奥斯角到博卡—德尔托罗,包括整个大西洋通往任何可能的航道的地方建立起来了。如上所述,这件事使

新格拉那达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因而一再请求美国订立1846年的条约。在西班牙人统治时代，英国侵夺者就带着到内陆殖民地去贩卖的走私货物从牙买加渗入这个防卫薄弱和对健康有害的海岸。这些秘密的接触在西班牙殖民地革命之后就扩展成为统治这个地区的莫斯基托印地安人的保护领(1820年)。1844年在布卢菲尔兹出现了一名英国的常驻官员。这时美国正专心注意得克萨斯问题；但在合并之后由于墨西哥问题的威胁，波尔克重申门罗主义(1845年,1847年)可能被解释为适用于中美洲和加利福尼亚。248 1848年1月，尼加拉瓜的位于圣胡安河(所有河道中最可信的大西洋界限)口上的圣胡安镇即格雷镇被英国指挥下的“莫斯基托”军队占领，并把尼加拉瓜的守军逐出该地。尼加拉瓜向美国求助。当时美国仍在同墨西哥作战，但波尔克立即派了一个外交代表伊莱贾·希斯到中美洲去调查情况。1848年媾和以后不久，比德拉克同新格拉那达签订的1846年条约就被批准了，从而为美国保留了通过巴拿马的任何运河的通行权。在1849年6月，希斯同尼加拉瓜订立了一个较比德拉克同新格拉那达签订的那个条约更强有力的条约。希斯的条约会给美国以建设、设防和控制运河或铁路或两者的独占的权利；并在尼加拉瓜建立一个保障其主权、统治权、和平和中立的保护国^①。

美国1845年向格兰德河的迅速进展和1848年向加利福尼亚的迅速进展(这种进展是英国外交所曾竭力阻止的)，再加上1846年与新格拉那达订立的条约的批准，促使英国外交部加快实现对尼加拉瓜通路的完全控制的步伐。因为英国公使查特菲尔德在进行为他的国家取得对运河通道控制的活动美国外交家希斯才在未

^① 这个条约和希斯的信件刊载在 W. R. 曼宁(Manning)编辑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的《美国外交通信录，美洲事务，1831—1860年(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American Affairs, 1831—1860)》，第三卷，《中美洲》，1831—1850年(华盛顿，1933年)。

接到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他的条约。当时一个美国公司已经获准开凿一条运河,正在等待获得条约上的安排。

希斯是作为波尔克总统任命的一名外交代表同尼加拉瓜签订这个条约的,但此事发生在泰勒将军的辉格党政府已经上台以后,而希斯的继任者伊弗雷姆·乔治·斯奎尔正在到中美洲去的途中。新政府不同意希斯条约上的保证政策。但是泰勒总统把这个文件搁置备用。斯奎尔同洪都拉斯签订了一个条约(1849年9月28日),把封塞卡湾内尼加拉瓜通道的太平洋岸的重要地方提格雷岛至少是暂时割让给美国,并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①。作为对应措施,查特菲尔德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一个英国条约,保护哥斯达黎加对圣胡安河北岸的要求权,因而抵消了希斯在他的 249 条约里可能为美国获得的任何通行权。在希斯那一方面,他为纽约太平洋船舶运河公司从尼加拉瓜获得了修建运河的特许权。在泰勒的代表所签订的一个新条约里,美国同意在其公民享受这项特许权的期间保护这条运河通路的中立。这个条约承认尼加拉瓜对这条运河通路的所有权和主权,但不象希斯条约那样予以保证;更没有给予美国在这条运河通路上设防的权利^②。在查特菲尔德的命令下,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占领了提格雷岛,并在取得对洪都拉斯的要求权的借口下把英国旗在那里升了起来。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后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取消了这个行动,因为他知道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是反对这样做的。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英国全权代表亨利·布尔沃担负着解决地峡问题的特别使命正启程前往华盛顿。帕默斯顿勋爵宁愿来华盛顿进行谈判,因为新国务卿约 250 翰·M. 克莱顿对英国驻美公使说过,他不固执门罗总统关于非殖

① 同前注中所引用的书。

② W. R. 曼宁,《美国外交通信录,美洲事务,1831—1860年》(华盛顿,1933年),第三卷,第360页。

民地化的原则^①。然而,占领提格雷岛的消息于1850年初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激动。

这时事态接近紧急关头。在泰勒总统的办公桌上摆着希斯和斯奎尔同尼加拉瓜签订的两个条约以及斯奎尔同洪都拉斯签订的条约,他可以把全部三个,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条约送交参议院。但是批准其中任何一个条约都会导致同英国的冲突。泰勒将军的辉格党政府不想引起这样一个冲突,英国的约翰·拉塞尔勋爵的自由党政府也不想这样做。双方都不愿意让对方单独控制运河通路,但是任何一方也不想为自己的国家制定一项单独控制运河通路的政策。因此妥协是可能的^②。

双方政府为了和平的利益把有可能引起冲突的危险的他们新签订的条约搁在一边,而制定一个在联合控制的基础上的不完全的妥协方案,即1850年4月19日国务卿在华盛顿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主要的是第一款,其中宣布任何政府不得为自己获得或维持任何通过中美洲任何部分的运河的任何单独的控制;也不得在上述地方及其附近设防,也不得在中美洲设立殖民地或僭取任何属地;“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别国提供的保护,这种保护使得能够或者可能使得能够在中美洲设立殖民地,或者利用已有的或可能有的同任何国家或民族的联盟来建立或保持任何这种防御设施,或将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莫斯基托海岸或中美洲的任何部分加以占领、设防或殖民地化,或者在这些地方僭取或实行统治;美国或者英国不得利用可能拥有的同上述运河可能通过其领

① G. F. 希克逊(Hickson):《帕默斯顿和克莱顿-布尔沃条约(Palmerston and the Clayton-Bulwer Treaty)》,载《剑桥[英国]历史杂志》,第三卷(1931年),第295—303页。

② 我在这一点上根据玛丽·W. 威廉斯(Mary W. Williams)教授的卓越论文,《英美的地峡外交,1815—1915年(Anglo-American Isthmian Diplomacy, 1815—1915)》(华盛顿,1916年)。

土的任何国家或政府的任何亲密关系或任何联盟、联系或影响来直接或间接为自己的公民或臣民取得或保持商业方面或在上述运河上航行的为对方的公民或臣民所不能同样享受的任何权利或利益。”其余条款把同样的原则引伸到穿越连结南北美洲的地峡的任何其他运河或铁路，保证其中立，并规定对每一方的公民和臣民应征收同一的通行税和其他课税。 251

在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条约以后，但在交换批准书以前，布尔沃向克莱顿国务卿送交了一份正式照会：“女王政府不认为该协定的规定适用于女王陛下在洪都拉斯的居留地或其属地。”这明显地把伯利兹撤出条约的条款之外，但它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例如把巴亚群岛包括进去呢？在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W. R. 金商量之后克莱顿回答说，根据这个条约的谈判者的理解，这个条约并不“包括英国在洪都拉斯的居留地（通常被称为英属洪都拉斯，以区别于洪都拉斯国家），也不包括附近可能被认为是它的属地的一些小岛”。在交换批准书之后，布尔沃发表了一份为时过晚的反声明：他理解克莱顿对他的第一个照会的答复的意思是：国务卿完全认识到条约的意图并不包括英国在洪都拉斯的居留地，不管在这个名词之下包含了什么，也不包括它的属地，不管这些属地可能是哪些地方^①。

从开始起，这个条约的含义就成为争论不休的题目。在美国它被看作是英国放弃了对莫斯基托印地安人的保护者的地位而受

^① 关于布尔沃于1850年7月4日发出的这份最后照会的递交的正规性和克莱顿在那时看到这个文件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几乎可以肯定，在交换批准书时或在此以前并未递交这份照会，但可能是在交换批准书之后立即递交的。参阅M. W. 威廉斯著：《美国国务卿(American Secs. State)》，第六卷，第69页。约翰·比吉洛(John Bigelow)著：《英美条约的违背(Breaches of Anglo-American Treaties)》(纽约，1917年)，第116页以后，及J. D. 沃德(Ward)著：《亨利·布尔沃爵士和美国档案(Sir Henry Bul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载于《剑桥历史杂志》，第三卷(1931年)，第304—313页。

到喝彩。但是英国外交部声称第一款的慎重推敲出来的字句不是放弃现存的保护领地，而只是同意不利用它来对运河进行任何统治。1852年，巴亚群岛，在布尔沃上述保留的掩盖下被宣布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这使得美国非常愤怒。美国认为该群岛不属于在英属洪都拉斯附近的小岛。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整个时期——在这十年内美国外交日愈卷入各种向古巴和墨西哥扩张的计划之中，在此期间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适应南方各州的奴隶制扩张主义分子的希望在尼加拉瓜建立了他的短命的独裁统治——莫斯基托保护领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沃克倒台之后，英国分别同尼加拉瓜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进行谈判，结果于1859年签订了两个条约；英国放弃了保护领，在为印地安人保留一部分土地和付给他们十年年金的条件下^①，把土地分别并入这两个国家的版图。巴亚群岛被并入洪都拉斯。英国外交部早就准备向美国作出这些让步，唯恐纠纷会导致对英国的棉花供应的中断。在南北战争的前夕，1860年12月，布坎南总统向国会宣布美国对问题的这样解决感到满意。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件幸事。

没有任何条约比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更不得人心，在美国外交史上没有任何条约比这个条约受到更猛烈的批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务卿为了一次谈判比克莱顿受到更粗野的攻击。诚然，克莱顿对英国公使说他不固执门罗主义的非殖民地化的原则，这确实是轻率的。但同样肯定的是，帕默斯顿从来也不认为他对门罗主义有过一点退让。事实上他没有退让过。至多，这个条约不过是一种妥协，一种美国在交涉过程中颇感不快，但其后却信守不渝的妥协。从长远说，这个妥协被证明是违背美国的最大利益的。我

^① 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多次告诫之后继续坚持监督这个条约的如关于保留边界等条件的正确执行，直到1894年。

们现在相信帕默斯顿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特别放弃莫斯基托保护领的^①。但我们必须记住在1850年以及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国际共管地峡运河的观念和这种通道的完全中立在美国和英国都是主导的概念。我们也应记住美国参议院批准同英国的这个妥协的时候正值国内一些地区的紧急的奴隶制问题有动摇国家甚至可能分裂联邦的危险。当泰勒总统在他去世以前四天，即7月9日，宣布这个条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肯定1850年的这个重大妥协方案会在国会通过。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当时愿意在地峡问题上或任何其他问题上惹起一场同英国的战争。必须从历史上根据这个事实来评价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① 希克逊的前述著作。

第十五章 东北边界和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

(1783—1842年)

美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同英国结束和解决了和平和独立条约遗留下来的两个重大的边界纠纷：在近东北和在远西北。

东北部边界在条约上规定得很精确。交涉人员使用的是米契尔的1755年北美洲地图——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正确或不够充足，但在当时还是一本最好的地图——但忽略了把它附到条约本身中去。美国的代表们，可能还有英国的全权代表们把全部边界标在米契尔地图的贻本上，但后来这些标划过的贻本遗失了，因此无法证明当时划定的边界是怎样的了。当地方当局实地查找这条条约线的时候，他们发现在米契尔地图上画成流入帕萨马科迪湾的“圣克鲁瓦”河实际上同该处附近任何一条河流不完全符合。有两条河流入那个海湾。代表新不伦瑞克(1784年从新斯科夏分出来)的英国官员争论说斯库迪阿克河就是圣克鲁瓦河。马萨诸塞边疆州的代表则说在斯库迪阿克以东相当远的一条河马加瓜达维克河才是真的圣克鲁瓦河。当分别涉及这两条水路以上的地方时，这两条河之间相差的距离就越更大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可以明瞭一大片地区的主权如何依赖于这条国际边界是划在从这两条河流的发源处的东顶端还是西顶端的正北方。当条约签字的时候，只是这个地区的沿岸部分有许多居民；但在哪一条河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确定下来并得到双方同意之前，那里的人是不知道他

们属于哪一个国家的。

在西北部分，这个条约把边界划在从伍兹湖的“西北顶点”往正西到密西西比河。我们已经提到^①，由于制图上的错误，在那里产生了一个空隙；那是西北边界问题的开始，这个问题一直继续到 1818 年，然后发展成为更大的俄勒冈问题。

同英国的这些边界纠纷，加上同西班牙和墨西哥的西南边境问题，成为自 1812 年战争之后一代时间内美国的最严重和最缠绵的外交问题之一。由于这些问题牵涉到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因此它比西南边境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定居者跟随毛皮商人到北部边境的未确定的部分，这些问题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杰伊的 1794 年条约已经涉及这些边界上的困难问题^②。它规定成立一个三人联合委员会来确定圣克鲁瓦河并划出其路线。该委员会在 1798 年开会，同意圣克鲁瓦河同西边的斯库迪阿克河（而不是美国所认为的马加瓜达维克河）相符合。这就是说承认了当时争议中的英国人的领土要求。他们在这条河的发源处树立了标记。在圣克鲁瓦河以上穿过荒野地带的界线仍未测量：1783 年条约声称这条线应当从新斯科夏的“西北角”直往北方，“就是说：由圣克鲁瓦河的发源处的一条往正北的线和把流入圣劳伦斯河的河流与流入大西洋的河流隔开的高地所形成的角度”。同时，杰伊的条约规定成立的其他委员会^③——为了裁定战前欠款和海洋掠夺事件——陷入争论之中，这个争论在 1802 年之前一直没有停息。在这些问题终于解决之后，驻伦敦的公使鲁弗斯·金同霍克斯伯里勋爵签了一个协定（1803 年 5 月 12 日），来消弥这个西北边界上的空隙和成立另一个边界委员会，从圣克鲁瓦河的发源处

① 参阅本书第 102 页，第 175 页。

② 关于西北边界空隙地带的未执行的规定，参阅本书第 102 页。

③ 参阅本书第 102 页。

划一条线到新斯科夏的“西北角”，再从那里沿“高地”到达“康涅狄格河的西北顶端”，一切如 1783 年的条约所描述那样。麦迪逊国务卿在给金的指示中意味深长地承认了杰斐逊总统在国会公开宣布的说法^①：在有利于方便地划定地理上的分界线的条件下，美国代表们可以不管条约文本的字句，特别是因为“高地”似乎被描写得很奇特。参议院拒绝了 1803 年协定中关于消弥西北边界空隙的条款，这同时也破坏了解决东北边界的企图，因为修正后的协定没有得到批准。1812 年战争的时候，这些边界线仍在纠纷当中，这次军事冲突的结果使它又回到战前状态。

在根特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英国代表曾试图把 1783 年东北边界“修改”为使英国境内有一条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到圣约翰河和哈利法克斯河的军事战略公路，以代替这个在漫长的冬季里同海洋隔绝的冻结的圣劳伦斯河（这个困难在 1812 年战争中为许多事例所着重表现出来）但未获成功。他们还试图把边界线从伍兹湖下垂到密西西比河的可航行的部分来消弥西北方的空隙^②。加勒廷及其同事们在根特会议上拒绝割让缅因地区或其他美国领土的任何部分。根特和约确实成立了要把从大西洋到伍兹湖的任何没有确定的地方，包括从圣克鲁瓦河的发源处到康涅狄格河的发源处的东北边界，明确地标定整条边界的新的边界委员会^③；但它却没有提到伍兹湖以西的边界。它成立了一个二人联合委员会来确定和绘制东北方的边界线；如有他们不能同意的地方，则把争论提交友好的君主或国家仲裁。

在 1821 年联合测量东北方的边界线——从圣克鲁瓦河的发源处到新斯科夏的“西北角”那部分——的时候，边界纠纷发展到

^① 穆尔著：《国际仲裁》，第一卷第 68 页。麦迪逊系依据美国派到圣克鲁瓦委员会的代表沙利文的模糊的建议。

^② 参阅本书第 166 页。

^③ 参阅本书第 168 页。

最重要阶段。英国代表宣称条约上所写的“高地”并不是分开流入圣劳伦斯河的那些小河和流入大西洋的缅因的大河的陆地高处，而是由分开圣约翰河的上游(这条河在芬地湾流入大西洋)和西南方向的次大的河，彭诺布斯科特河的高地所形成。很明显这种论断只是由战略上的考虑促成的；1775年的米契尔地图上的一般标记和新近知道的地形之间的分歧再次促成了双方的辩论和反辩论。这里面包括七百万英亩以上面积的土地，其中有广阔的森林地带和肥沃的河谷。根据1827年的特别条约，“分枝点”被提交荷兰国王仲裁。 256

老练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艾伯特·加勒廷，和威廉·皮特·普雷布尔代表美国参加辩论。加勒廷担心，用他的辞句来说，仲裁者可能“把这块差别的地方分裂开”。这果然发生了。这位君主仲裁者没有严格按照“争执点”的是非来判断，而是建议(1831年)一条妥协线，为了各种实际的目的把这块地方很平均地分成两个部分。英国愿意接受这条妥协线。假如通过对一大块领土的武断的争论就可以得到包括重大战略价值的二分之一的地方的妥协，那就是说只凭提出争论的机敏就得到了一些利益。杰克逊总统也愿意接受这个妥协，但缅因州反对。感到为难的杰克逊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参议院反对接受仲裁者的决定，十分充足的理由是仲裁者越出了他的规定的权限。英国实际上也承认仲裁者没有划妥协线的权限，但愿意接受接近仲裁者决定的一条新边界线。到这个纠纷结束的时候，这一直是英国的立场。在杰克逊之后，范布伦总统甚至采纳反对的辉格党的一个领袖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建议，他主张通过特别交涉制定出一条约定的界线来，但政治上重要的缅因州的坚决反对阻碍了所有这些妥协的企图；而在英国，那位有进取心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也不愿意作有损于他的外交成功威望的任何让与。

另外两个纠纷出现在边界谈判代表们的面前。关于牵涉到十万英亩的康涅狄格河的西北顶端这条线过去没有过协议；在这一点纠纷上仲裁者作出了符合英国争论的决定。在1818年人们发现在康涅狄格河和圣劳伦斯河之间的北纬四十五度北部边界线在已由双方同意的1774年划界线上测量得不正确：它略微过于向北弯四分之三英里，在那里越过香普冷湖的出口。正在那个地点，在控制这个出口的劳斯角，美国不久前曾建立了一个花费很大的堡257 垒而且还正在继续修建中。仲裁人决定重新测量该线，但主张将劳斯角及其周围的一块地方留给美国。这个决定被拒绝了，因而他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也失败了。因此整个东北边界继续成为一个日益麻烦的问题。由于定居者从缅因和新不伦瑞克向阿鲁斯图克河（它在被英国人在1821年发现的高地以北流入圣约翰河）的肥沃流域推进，这个问题呈现出一个更严重的局面：外交纠纷容易引起地方上的对抗，地方政治和地方人士的意外事故^①。一次边境斗争（习惯上称为“雷斯图克战争”）在1838—1839年展开了。新258 不伦瑞克省正在缅因州内授与土地所有权和自称享有管辖权。缅因州力图赶走英国的定居者和英国委任的官吏，武装了一队民团，并开始构筑堡垒。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1839年3月3日），授权总统召集民兵，招募五万名志愿人员加入军队和通过一千万元的贷款。军队指挥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负责镇守边界，他安排了一个缅因和新不伦瑞克双方当局之间的暂时解决方案（1839年3月）。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和平局面在为两国政府所认可的这个定则之下暂时维持下来：缅因的民团保留它所已经占领的领土（阿鲁斯图克河流域）；英国当局保留马德沃斯卡居留地（在上圣约翰河流域）及那里和上游各省之间的未被阻断的交通线。土地占有和管辖权维持不变，虽然每一方反对对方保持事实上持有的领

^① 穆尔著：《国际仲裁》，第一卷，第87页。

土^①。

同英国的其他纠纷点燃了美国人民由于东北边界问题而产生的愤怒火焰,共和国的各个部分: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都被这些纠纷强烈地激动起来;而英国方面,至少在残酷的帕默斯顿担任外交大臣的期间,几乎完全不想向一个被英国文学界访问者们经常攻击其生活方式和政体^②的、其势力日益强大的人民作任何让步。我们不久将详细谈论俄勒冈的问题;在这时,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大的没有解决的潜在问题,但还不是一个尖锐的纠纷。美国方面顽固地拒绝同意某些相互检查禁止贩卖奴隶的权利,^③激起了英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感,同时激怒了本身不愿意废除它的不正当的强迫服役的做法的英国政府。英国对得克萨斯的兴趣及其对废除奴隶原则的支持引起南部各州的政治领袖们的猜疑^④。更直接的是“加罗林号(Caroline)事件”;这件事起因于1837年的加拿大叛乱,对于这个叛乱整个北部边境人民有普遍的同情,同西南部人民在得克萨斯的问题上的情绪相似,虽然还不是那样尖锐和不可控制。加拿大的反叛者得到住在纽约州的同情者的援助。他们雇用了一只美国人的轮船“加罗林号”运送人、枪支和供应品到尼亚加拉瀑布上方的河中的一小块英国领土——海军岛。一群加拿大志愿军,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中,越过这条河,毁坏了“加罗林号”,并把它推往瀑布的方向漂流下去(1837年12月29日)。在纷乱当中,一个名叫德菲的美国公民在美国领土上被杀害了。除非有条约规

① 米勒,《条约》,第四卷,第379页。

② T. A. 特罗洛普(Trollope)夫人著:《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伦敦,1832年);H. 马提诺(Harriet Martineau),《美国社会(Society in America)》(三卷本,伦敦,1837年)。狄更斯(Dickens)的《美国札记(American Notes)》在1842年才出版,这些札记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和意见。

③ 参阅本书第330页以下。

④ 参阅本书第224页。

定的根据或出于绝对必要的情况外，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入侵行为。美国对英国提出了抗议。帕默斯顿勋爵对这个抗议采取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可能采取的同样态度，假如这是一个安德鲁·杰克逊与佛罗里达的事件的话；但不像亚当斯，帕默斯顿没有可以依据的条约，而他也没有达到说那是出于绝对必要的情况的地步。三年之后当这个事件仍然是一个外交问题的时候，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麦克劳德的人出现在纽约州，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毁坏“加罗林号”船的那一群人中的一个并且杀害了德菲的那个人。他马上被逮捕起来（1840年11月），被州政府判为谋杀罪。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抗议，说麦克劳德是奉它的命令行事的。英国政府对那个事件承担全部责任，迫切要求释放麦克劳德，并认为联邦政府对他负有责任。

麦克劳德案件于是在即时的重要性上取代了一切其他的纠纷。同情加拿大反叛的人们叫喊要对麦克劳德报仇。韦伯斯特害怕暴民的行动。他认为那就意味着“在十日之内战争就会爆发”。在另一方面，即使经过司法判决而将麦克劳德正法，那也会成为一
260 场战争的信号^①，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将竭力通过武力来解决边界和其他问题。这样一场战争如果发生在1842年，那就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在泰勒和波尔克治理下的美国扩张的成就。

幸而两国都换了政府。在1840年的大选中，辉格党推翻了民主党政府，1841年3月新政府上台，由丹尼尔·韦伯斯特任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不久又任泰勒总统的国务卿。在英国，自由党的梅尔本政府在欧洲政策问题上被保守党推翻。皮尔出任首相（1841年9月3日），而以阿伯丁继帕默斯顿为外交大臣。在双方国家里，不管政党给自己起什么名称，每个政府都愿意通过友好方

^① 帕默斯顿这样告诉退休的美国公使史蒂文森。里夫斯著：《泰勒和波尔克的外交(Diplomacy of Tyler and Polk)》，第19页。

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麻烦的麦克劳德案件必须首先加以解决。

如同缅因州在东北边界这个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那样，纽约州在麦克劳德案件——一件主要是外交上的事务——上的立场阻碍着联邦政府（即使是在明智而和解如丹尼尔·韦伯斯特那样的政治家的领导下）维持和平的努力。对外国交往的事务是由联邦政府负责的，但任何一个美国的联邦政府也不能轻易地忽视它的一个州的脱离联邦的政治影响。此外，宪法及在宪法下通过的法律过去没有规定，现在也并未充分地规定个别州对外国政府的责任。韦伯斯特提出了可供用来辩护的意见，使用人身保护传票把麦克劳德案送纽约州最高法院受理，以便将犯人释放。他接受英国的立场，认为麦克劳德系奉政府的命令行事，不应由外国的民事法庭审理；他认为是英国，而不是其臣民应对武装侵入美国领土负责。纽约最高法院拒绝释放麦克劳德。审判继续进行。但西沃德州长秘密地告诉国务卿说，据知麦克劳德（不管他的自夸）有一个很好的辩解，在很久以后可能作出的判决中他将会得到赦免^①。在一次法庭上被告得到释放（1841年10月）之后，紧张局势缓和了。现场不在的证明历来屡被滥用而这次却起了有益的作用。关于麦克劳德案件的外交往来通信形成了一个国际法中的著名案件。它导致在国会中通过了（1842年8月29日）一个由韦伯斯特起草的法律，规定把在一个外国君主的命令下做了违法事情的任何犯人释放或由州法院转移到联邦法院审理。在麦克劳德被释之后，侵犯美国主权的“加罗林号”事件仍然有待解决；但释放本身使两个怀着良好愿望的政府有可能作出新的尝试来解决东北边界纠纷以及其他存在的问题。

在释放麦克劳德之前，韦伯斯特已经通知英国驻华盛顿的公

^① C. A. 达尼韦(Duniway)著：《美国国务卿》，第五卷，第16页。

使说美国愿意考虑一条新的习惯的东北边界。这同他在大约三年前准备的并向范布伦总统陈述的意见是一致的^①。这意味着是一个妥协，因为承认一条新线是双方讨论的对象了；它还意味着缅因州必须被说服接受它似乎决心不接受的 1783 年条约上规定的交出领土。联邦政府曾经接受了这个州的宪法上的论据，即它的领土不得在未经它同意的情况下割让。缅因州的代表们以及马萨诸塞州的代表们实际参加了后来的几次交涉^②。

英国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派一位特别全权代表亚历山大·巴林即阿什伯顿勋爵来同美国国务卿交涉。阿什伯顿是一位六十七岁的人，曾同一个美国漂亮的财产继承人费城的安妮·宾厄姆结婚，在乔治·华盛顿任总统时期回国。他是一位卓越的英国贵族，伦敦的大财主巴林公司的家庭成员，致力于维护和平和增进英美之间的友谊，如同渴望被任命为驻伦敦的美国公使的韦伯斯特本人一样。

阿什伯顿的指示非常接近于在边界上让步：在西北太平洋方面，至少坚持在哥伦比亚河到它的同第四十九纬圈的交点这条线上；在东北边境上他要努力取得包括从魁北克到哈利法克斯这条战略公路在内的一块地方，并在超越 1831 年荷兰国王建议的那条
262 线以外不作任何重大的让步。他被允许对缅因州提供金钱上的补偿来取得一条满意的界线。他还被指示为“可悲的”入侵美国领土的“加罗林号”事件辩护，并且坚持在和平时期检查为了逃避英国巡洋舰对贩卖奴隶的侦察而假冒悬挂美国旗帜的嫌疑船只的权利^③。在华盛顿，阿什伯顿毫无困难地与韦伯斯特达成了一条新的

① 里夫斯的前述著作，第 13 页。

② 米勒著：《条约》第四卷，第 383—403 页。

③ 阿伯丁给阿什伯顿的几个指示在 E. D. 亚当斯的《阿什伯顿勋爵和华盛顿条约(Lord Ashburton and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载在《美国历史评论》第十七卷(1912 年 7 月)，第 764—782 页一文中作了评论。还可以参阅 C. A. 达尼韦著：《美国国务卿》，第五卷，第 20—21 页。

妥协边界线的协议。他们实际上在缅因州“劈开了那块差别的地方，美国从其中得到的比十一年前它可能从荷兰国王的裁判中的领土略少一点。英国那一方面承认了不正确地测量出的四十五度线作为纽约和弗蒙特的北部边界，并对美国对康涅狄格河源头提出的要求的主要部分做了让步。结果就是现在的边界。英国要取得在蒙特利尔和圣约翰之间的一条公路的战略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美国保留了劳斯角和控制香普冷湖出口的要塞。在缅因州边境上，一块面积为 7,697,280 英亩的土地曾有争论；其中 4,489,600 英亩由美国保留，3,207,680 英亩划归新不伦瑞克，但韦伯斯特认为美国保留了那些具有真实价值的土地。无论如何，双方政府都满意了^①。

缅因州对交涉及最后解决方案的同意是由落到韦伯斯特手中的一个很有趣的工具所取得的。历史学家贾雷德·斯帕克斯曾在海外做研究工作，在这个期间他正在查看法国外交部档案里面的地图。在那里他发现 1746 年丹维尔地图上把美国边界用红色粗线划出。斯帕克斯回国之后，他认为这张地图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 1782 年 12 月 6 日给韦尔让伯爵的一封信上所传达的一幅“用红色粗线”标明的美国边界地图相符合。斯帕克斯于是按照他脑子里记忆的法国地图绘制出来并送交韦伯斯特。这条线支持英国于 1842 年提出的东北边界要求。韦伯斯特同时购买到一份米契尔地图——我们还记得 1782 年的边界交涉使用的就是米契尔 263 地图，上面标明的东北边界也同英国的要求相符合。这张地图是属于斯图本将军的，他的后人拿到市场上出售。没有人知道谁，或

^① 但在新不伦瑞克却引起许多长期的反对，威廉·F·甘农(Wm. F. Ganong)的有价值的专门著作《新不伦瑞克省边界演变专论 (A Monograph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Province of New Brunswick)》，载在《加拿大皇家协会的会议录和议事录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第二辑，第七卷(1901—1902 年)，第二节，曾有记述。

者什么时候,在这张地图上划出那条线的。

虽然韦伯斯特并不认为,斯帕克斯在那个问题上也不认为,这些地图是支持英国要求的无可非难的证据,但国务卿还是派斯帕克斯秘密到缅因州去把这些地图送给该州的当局看,劝说他们最好接受韦伯斯特和英国公使共同划定的新妥协线。阿什伯顿送了2,998 镑(约合14,500 元)作为斯帕克斯的“开支”^①。缅因州为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制图上的论据所降服,终于如马萨诸塞州那样(该州在1820 年分离之后保留了在缅因州公地上的财产权)接受了对让出去的土地的金钱报酬,每州各得十五万元,并不是如阿什伯顿的指示中本来想允许的由英国支付,而是由美国支付。此外,美国还同意补偿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在纠纷中用于防卫本土的一切开支。在缅因州代表的要求下,这条规定成为条约的一部分。阿什伯顿甚至对把这种纯粹内部义务事项破格地放在条约里提出抗议,并申明他的政府在执行这条规定上不负任何责任。

在最后拟定的条约签字之前,给阿什伯顿看了支持英国争论的斯帕克斯的地图和米契尔地图的韦伯斯特-斯图本膳本。在英国政府的外交部里——阿什伯顿不知道,也许阿伯丁也不知道,虽然反对党的帕默斯顿沉默地知道——有一个米契尔地图膳本:“乔治国王”地图,上面的边界标志着“奥斯瓦尔德先生线”。它同美国的要求完全相符。这个乔治国王地图直到1843年美国政府才知道^②。我们还不能肯定“奥斯瓦尔德先生线”这几个字在签订1783 年条

^① 《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美国外交政策基础(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纽约,1949 年),第二十三章。

^② 关于米契尔地图的已经知道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概述,和它们同和平条约及其它外交谈判的关系以及关于同1842 年交涉有关的其它地图,参阅亨特·米勒(Hunter Miller)在劳伦斯·马丁(Lawrence Martin)协助之下(关于米契尔地图),在他的《条约……》第三卷,第328—351 页,和第四卷,第403—413 页所做的注解。米勒博士对阿什伯顿-韦伯斯特条约的注解是对这个问题和这次交涉的篇幅最大的、最博学的评论。

约的时候已经标在地图上，虽然这是十分可能的。没有人使用过斯帕克斯的红线地图。在1933年，在马德里发现了富兰克林用红笔标注边界线的米契尔地图**264**，这是西班牙驻法大使阿朗达伯爵送给西班牙政府的。它同美国的要求完全相符，也同在阿什伯顿—韦伯斯特交涉之后发现的米契尔地图的杰伊的**264** 图本完全相符。假如在1842年知道了这一切的话，就不必割让领土了。但历史是不能在过去的假设事件中写成的：东北边境在1842年已经明确划定了，在韦伯斯特领导下的美国为了和平作出了一个大的让步和妥协。

这个著名文件的其他款项是：双方的公民和臣民可以在圣约翰河在两国领土之间的一段河道上自由航行，美国公民有从缅因州在该河道上运出林产品和农产品到英国领土内的河口的权利。这个文件宣布双方可以在底特律河和圣克莱尔河及圣克莱尔湖，以及边界两边的圣劳伦斯河的一些支流自由航行。休伦湖和伍兹湖之间的边界线上的一些小的纠纷^①在依据根特条约成立的边界委员会上未能达成协议，此时对这些纠纷作了一般说来有利于美国的解决。这个条约还包括一个有用的关于引渡逃犯的条款。杰伊的条约上规定的引渡条款由于1812年的战争而失效；韦伯斯

^① 1815年依据根特条约成立的联合测量委员会在1822年完成工作之后对于边界线应当在哪里离开苏必利尔湖以及经过哪条路线到达雷尼湖未能达成协议，1783年的条约在这点上是不清楚的。美国代表主张经由多格湖，米尔湖和斯特尔斯湖的一条在现行边界以北很远的线；英国代表主张一条在现行边界以南同样远的线，经由方德拉克圣路易斯河和弗米利恩湖。双方愿意妥协在大致从皮金河经过塞加纳加湖，博伊布朗克和拉克鲁瓦的一条线，但英国代表不愿意放弃在皮金河以南，绕过这条河的急流的大连水陆路。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同意采取以皮金河为起点的一线，并在其余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上按照联合委员会以前建议的妥协来划定。虽然从技术上说有争议的面积同东北边界纠纷差不多大，但没有由于人口定居而变得复杂。大连水陆路的据有，到远西北的毛皮贸易的通道是主要的争论之点。

详细情况可参阅包林(Paullin)和赖特(Wright)著：《美国历史地理地图(Atlas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32年)，第57页和图版91B。

特—阿什伯顿条约在以前的可引渡的罪行上又加了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在1889年、1900年、1905年续有增加，达到包括除了政治性罪行以外的所有严重罪行。这就关闭了“去加拿大”的美国犯人十分容易的避难的门路。这个条约，在韦伯斯特的假造的地图的帮助下，迅速地在参议院以三十九比九的表决通过。

在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个烦扰外交家们的问题。一艘美国沿海贩卖奴隶的商船“克里奥尔号 (Creole)”载运一船人从汉普顿碇泊场前往新奥尔良，途中奴隶发生暴动(1841年11月7日)，杀死了一个奴隶贩子之后把船开进拿骚。英国殖民当局把被认定的凶手绞死而把其余来到英国领土上的奴隶恢复为自由人。英国人自然对这个船的水手和船主是没有什么同情的。这件事激起了南部各州的敌对情绪。这件事是这种可恨的贸易的那些悲惨的特点的一个表现。关于奴隶贸易在后面的一章中我们还要详细谈到。韦伯斯特认为国际法上的款待规则保护了遭遇灾难的人和财产。阿什伯顿称，这件事发生在他离开英国之后，他还没有接到关于此事的指示。他要求在条约上不谈这件事而把它交给伦敦解决。他自负责任地宣布，今后“不会对由于事故或暴力被赶入那些港口(在美国南部边境上的英国殖民地)的美国船只进行官方的干扰”。韦伯斯特接受了这点，但没有能在1842年条约中用“在船上发生的暴乱”的定则^①写进一条涉及奴隶暴乱者的规定。在条约的另外一款上，美国同英国约定成立一支非洲海岸联合巡洋舰队^②来帮助消灭奴隶贸易，但不同意英国同一些小海军国家所订的相互检查来确定一个有嫌疑的奴隶船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韦伯斯特可以容易地避开这点，因为在英国那一方面不会放

^① “克里奥尔号”事件被交给根据1853年协定设立的英美权利要求委员会处理，裁定人判给美国110,330元。

^② 参阅本书第332页。

奔在战争时期强迫服役的做法。在一个给阿什伯顿的照会中，韦伯斯特提出关于强迫服役的美国立场：“在每一只正式注册的美国商船上，驾驶该船的水手们将要受到悬挂在上面的旗帜的保护。”这个照会没有得到答复，只是被有礼貌地承认收到了。阿什伯顿曾向伦敦要求允许加入一条反对强迫服役的款项，但是阿伯丁严厉地拒绝接受这个“相当于完全而绝对地放弃英王固有的不论在任何地方号令其臣民忠顺和服役的不可取消的权力”的提议。但是，英国自1814年以来并未做过任何向韦伯斯特的声明挑战的公开行动。 266

解决克里奥尔事件的以及关于强迫服役问题双方交换的这些照会，必须认为是条约本身的不可缺少的附件^①，虽然参议院没有正式承认它们。另一个就是“加罗林号”事件的问题。

韦伯斯特向英国宣称，英国政府“必须表明那是出于自卫的必要，突然以压倒之势出现，没有可供选择的应付方法，不容加以周密的考虑”。阿什伯顿回答说正是那样情况。他继续说，“回忆那一段时期的情况，或者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立刻对这个事故作出一些解释和道歉；一个坦白的对这个事件的必然性的解释可能，而且大概本来会防止许多对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愤怒和随后的埋怨和互相责难。”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道歉，但是“加罗林号”事件就这样最后幸运地平息下去了。

具备了韦伯斯特当时所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是因为美国代表加勒廷和普雷布尔在1828年处理这个美国案件的时候还未发现）地图资料而回顾这段纠纷的历史学家们可能认为英国在1842年似乎赢得了一个很大的外交上的胜利。英国获得了战略性的边界修正，而这是在1814年签订根特条约时它的外交家们所努力争取而没有做到的。事后的知识不能说明对韦伯斯特在当时情况下

^① 米勒著：《条约》第四卷，第457—468页。

所做的让步加以谴责是正当的。假如不是由于双方的有争取和平的精神的政府的明智，同英国的纠纷是充满着演成悲剧的可能性的。

第十六章 俄勒冈

267

(1776—1871年)

韦伯斯特和阿什伯顿未能就另外一个大的边界纠纷即俄勒冈问题达成任何解决办法。现在应当叙述一下这个广阔的领土的纠纷,在两国政府刚刚清除了那么多的误会之后,不久又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尖锐的问题。

俄勒冈的问题最初牵涉到四个国家,西班牙、英国、俄国和美国对旧金山湾以北一片未经确定的海岸地带的权利;但到了1825年,问题缩减到只是英国和美国之间对于在北纬四十二度和北纬五十四度四十分之间的区域的主权分配上的纠纷。海岸背后的陆地延伸到落基山脉的分水界。

西班牙的权利系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的训谕和1494年陶得西拉斯条约^①,以及在1542和1792年之间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港口以北所做的一系列探查航行^②。西班牙的探险家们第一次在十六世纪的中叶标出了加利福尼亚海岸;一个西班牙的船长第一次(1774年)驶入后来证明为温哥华岛的努特卡海峡港口;一个西班牙旅行家埃斯塔第一次(1775年)观察到西部大河的河口——后来命名为哥伦比亚;西班牙的航海家同英国航海家竞相沿着海岸

① 参阅本书第4页。

② H. R. 瓦格纳(Henry R. Wagner)著:《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到美洲的西北海岸的航行(包括到1602年的)》(Spanish Voyages to the Northwest Coa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cluding those to 1602])>(旧金山,1929年);和《西班牙在胡安·德·富卡海峡的探查》(Spanish Explorations in the Strait of Juan de Fuca)>(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1933年),叙述了以后航行的详细情况。

推进到阿拉斯加。他们于 1779 年在北纬六十度以上的地方，看见圣伊莱亚斯山那个巍峨的界标，贝林在 1741 年是看到并给它起名字的第一个欧洲人。竞争的各国在太平洋，甚至像他们在大西洋的沿岸所曾做过的那样，对西班牙的主权提出异议。通过 1790 年的努特卡海峡协约，英国强迫其竞争对手承认英国臣民在北美的未被占领的海岸上有贸易和定居的权利。北方最远的西班牙占领区是旧金山湾（1776 年）。这不是西班牙在旧金山以北的全部权利的割让：它只是放弃了它在那里的独占垄断。西班牙在四十二度以北的地方的权利在 1819 年签订的条约中让给了美国，这个条约划定了第一个横贯大陆的边界。

英国人的权利可以追溯到 1579 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他的著名的环绕全球的航行中闯进太平洋的时候。他在那年的夏季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上住了几个星期，大概扎营在金门稍北一点的现在的德雷克湾，为伊丽莎白皇后占有了这个地区，给它起名为新阿尔比昂。西班牙人沿加利福尼亚海岸比德雷克登陆更早（卡布里略，1542 年）；自从德雷克之后，再没有英国人占领或甚至访问过这里。稍后，西班牙占领了加利福尼亚（1769—1776 年）。只是在整整两个世纪之后，另一个英国人才访问过美洲的西北海岸。库克船长在一次正式的发现和探查航行中在 1778 年在那些地方升起了英国国旗。库克来到接近努特卡海峡的地方，又一次宣布西北海岸属于英国国王，他环绕这个大陆的海岸，在北方最远到圣伊莱亚斯山。从那里，他启程航海驶回英国^①完成他的著名的环绕全球的其余部分。过去曾是库克船长指挥下的一名年轻的官员的温哥华船长被派去执行努特卡海峡协议，并且正式画制这一地区的地图和进行探查，这是另一次英国正式的探查远征。温哥华的部下发现了现在名为普季特湾的地方，进入哥伦比亚河一百多

^① 库克本人在夏威夷群岛一次同土著的争吵中被杀害。

英里(1792年10月);温哥华是从一个美国商人即波士顿的罗伯特·格雷船长那里知道有这条河的,格雷在前一个春季里乘船越过沙洲进入河口并以他的船名命名这条河。在1792年之后,英国的、美国的、西班牙的,以至其他国家的商人经常来到从哥伦比亚河往北到阿拉斯加的西北海岸,在这里收集水獭皮运到中国去做获利的生意。

英国人在航行之后接着就从加拿大进行大胆的陆路远征。蒙特利尔的一群最有冒险精神的毛皮商人所组织的西北公司在这里非常活跃。他们之中的一个拓荒者亚历山大·麦肯齐在1793年穿过落基山脉到达太平洋水路的贝拉库拉河口,他是人们所知道的在墨西哥以北越过大陆的第一个白种人。几年之后(1806—1808年),西蒙·弗雷泽也穿过现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内地向西推进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到达现在的温哥华城附近的这条河的河口。第三个西北人大卫·汤普森穿过山口到达哥伦比亚河的源头,并在它的支流和库提奈河上建立了(1807—1810年)一连串的贸易站。这些贸易站都座落在落基山脉分水岭的西坡,只有一个例外在后来的四十九度国际边界以南很远地方^①。汤普森接到命令要按照麦肯齐和弗雷泽的计划,建立一连串把哥伦比亚河口同加拿大大草原各河流的上游连接起来的贸易站。通过库克和温哥华的官方航行及麦肯齐,弗雷泽和汤普森的探查和贸易远征,英国迅速把贸易扩展到哥伦比亚以北地区,以及落基山西坡在那条河的以东和以南相当远的地方,这样就确立了对这条河的流域的要求权。

^① 这些站是:在英属哥伦比亚的温德米尔湖附近的库提奈旅馆;在蒙大拿州林肯郡,现在的利比镇附近,设在库提奈瀑布的一个临时站;在爱达荷州庞多雷湖上的卡利斯佩尔旅馆;在蒙大拿州克拉克福克河上汤普森草原的萨利什旅馆;及距现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城九英里的斯波坎和小波坎河的汇流处的斯波坎旅馆。参阅 T. C. 埃利奥特(Elliott):《1811年以前在哥伦比亚河盆地的毛皮贸易(The Fur Trade in the Columbia River Basin Prior to 1811)》,载在《俄勒冈历史季刊》,第十五卷(1914年12月),第241—251页。

最初出现在西北海岸的美国人是在库克船长手下的两个水手。其中一人康涅狄格的约翰·莱迪亚德传播了海岸和中国之间的毛皮生意的获利情况。就是这个人最初引起了当时任驻法公使的杰弗逊对地球上那块遥远地方的兴趣，那块地方成为以后美国外交的重大的持久的兴趣所在。在两只波士顿贸易船的桅顶上最初飘扬着美国旗帜于1788—1789年航行到那里，一只是“哥伦比亚号”，船长是约翰·肯德里克，一只是“华盛顿夫人号”，船长是罗伯特·格雷；他们在努特卡海峡、在夏洛特皇后岛和沿海岸一带进行贸易。他们见到西班牙在1789年在努特卡劫夺英国船只这个引起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著名的外交纠纷的事件。格雷船长在1791—1792年把哥伦比亚号驶回俄勒冈海岸。他在1792年5月11日将船驶入那条以后就以那只船的名字命名的河；这件事发生在第一只英国贸易船^①出现在那条河的仅仅六天以前。

没有证据说明商人格雷或紧接着来到的英国商人曾正式占有哥伦比亚河地区。几年以后，当俄勒冈问题具有国际上的重要意义的时候，有人拿出了一份当时水手之一约翰·布伊特保存的用各色墨水各种笔迹写成的航海日记上的补注，其中有这样几个字：
270 “为美国占有。”^② 布伊特只记载了有些水手登了岸，显然，格雷从未想到为美国占有这个地方。后来的窜改者想弥补这个疏漏。温哥华尊重美国商人格雷，在自己的航线图上记上了哥伦比亚河的名称，这就明白地承认了美国的船先到了那里。

俄国人雇用的丹麦船员维塔斯·白令在1741年第一次到达阿拉斯加，从此产生了俄国对那里的要求权问题。以后冒险的俄国人就从事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群岛之间的风险很大的毛皮贸

^① 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双桅船“詹尼”号，船长是詹姆斯·贝克。

^② T. C. 埃利奥特在《俄勒冈历史季刊》第二十二卷(1921年12月)，印载了航行日记的有关部分，附注解，参阅本书第310页。

易。沙皇在 1799 年创办了俄美公司,并给予它经营南面远至北纬五十五度线的阿拉斯加的毛皮贸易专利权。我们曾提到^① 俄国人的活动的这个进展以及沙皇的 1821 年谕旨怎样激起了美国的反对,并成为宣布门罗主义以前的局势的一个部分。

美国到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的第一次正式远征,是杰斐逊总统在 1805 年派出由刘易斯上尉和克拉克上尉率领的一队兵士穿过大陆去的。他们从刚由法国收买来的与美国领土相连的路易斯安那经由清水河和斯内克河沿西边的分水岭而下,到达哥伦比亚,把美国国旗悬在河口南岸一个堡垒上面。他们在那里度过了 1805—1806 年的冬季,正式占有这块温哥华在十二年前也宣称是英王有权占有的领土。刘易斯和克拉克没有像温哥华的部下在普季特湾那样深入到哥伦比亚以北的地带,也没有深入到后来的大卫·汤普森所探查的哥伦比亚以东和斯内克河及清水河以北的地区。六年之后(1811 年 3 月),在美国人 C.W.温希普试图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一个贸易站的努力失败(1810 年)以后,一个由纽约城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管理的公司抢在大卫·汤普森和西北公司之前,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旧堡垒附近,建立了阿斯托里亚贸易站,并在河的上游建立了三个贸易分站。这是第一个美国居留地。产业的主人们由于爆发战争而感到害怕,不久就把产业卖给西北公司(1813 年),但美国国旗继续悬挂在乔治堡(阿斯托里亚后来改的名称)上一直到在 1812 年战争中被一艘英国巡洋舰在 1813 年占领。按照根特条约的规定,双方在战争中夺取的领土须归还对方。英国人在 1818 年,过迟地但诚实地降下自己的国旗,悬起了星条旗^②;但贸易站继续属于西北公司产业,直到 1821 年合并于更

① 参阅本书第 205 页。

② T. C. 埃利奥特著:《1818 年阿斯托里亚的让出(The Surrender at Astoria in 1818)》,载《俄勒冈季刊》,第十九卷(1918 年),第 271—282 页。

大历史更悠久的在加拿大历史上势力最大的毛皮贸易组织哈得孙湾公司。那个公司现在（1821年）获得了一个被授予新的特权的特别执照——超出旧执照上授予的在进入哈得孙湾的河流排水地域贸易之外——包括在美国领土以北和以西的未合并于任何英国省份或不属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地带贸易的垄断权利。按照英国观点，这个提法包括俄勒冈地区，但在那里这种垄断权只排除英国臣民。授与这个专利的议会法案明白地给与这个公司在上述地区对英国臣民行使司法权，使用上加拿大的法律并在加拿大法院上诉。这样，英国的法律进入了俄勒冈地区。在坎宁的建议下，哈得孙湾公司把它的总部从阿斯托里亚迁出并把它的主要工厂和贸易机构设在温哥华城堡；温哥华城堡是就在威拉米特河口以上温哥华角以下的这条河的北岸的一个战略地点，温哥华角是温哥华在1792年访问那里的时候由布劳顿这样命名的。在以后二十年中，它统治着这个地区的为数很少的白种人，并在现在被尊崇的总代理商约翰·麦克洛克林博士的仁慈统治下同印地安人和平相处。它的捕兽员和贸易员们继续探查，并且甚至为从加利福尼亚的沙斯塔山和俄勒冈的胡德山到崎岖的英属哥伦比亚的弗雷泽河流域的山脉和山谷命名。在此期间，一小股新教徒传教士^①来到印地安人中间，贾森·李一伙人来到威拉米特流域，马库斯·惠特曼博士^②一伙人来到沃拉沃拉，斯波坎和内波塞地区；以及还有个别的拓荒者先驱如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欧文·杨；从落基山脉的捕兽场地来的游荡的“山地人”；这些都是意气风发的美国人；后来最重要的一股人是，如以后所叙述的，通过俄勒冈小路乘坐有盖的运货马

① 在威拉米特和乌马提拉流域，以及在现在的爱达荷和蒙大拿地区，同黑脚族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天主教的传道者，但他们自然不带家眷，也不想在那里置地产，因此他们不会变为居留地的中心。

② 在官方文件中找不到有关传教士们在俄勒冈问题的外交活动中是一种影响或因素的记载。

车来的大量移民。哈得孙湾公司的政策符合外交部坎宁的指示，是和善地对待所有这些人，同他们进行贸易，但叫他们在哥伦比亚河以南和以东定居^①。总代理人麦克洛克林以惊人的机智和宽宏大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来此竞争的美国毛皮商人波士顿的纳撒尼尔·韦思，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邦纳维尔船长，在哥伦比亚流域收集毛皮的企图也被坚决而得宜地克制了。事实上公司试图把兽类从河的南边和东边诱赶出来，使那里成为一块不会吸引美国捕兽者前往的荒凉地方^②。

在从伍兹湖到落基山脉的四十九度线上获得协议的英美之间的1818年条约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交涉的一个附属品，亚当斯当时努力使西班牙放弃对已经确定的横贯大陆边界以北的领土的要求权。象西班牙在1819年那样，英国不同意美国把它的边界延长到太平洋沿岸。这会给美国在南海(太平洋)岸的得到明确协议的边界以内一个几乎是(除在1824年才消失的俄国可能提出的要求权而外)完全的主权。不是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严格地说来，1818年的条约并没有规定“联合”占领。它确实宣称英国或美国对在落基山脉以西，以及那个区域内的河流和港口所提出权利要求的任何地方应当在不影响任何一方对这个地区的任何部分提出要求的权利的情况下，在十年内“自由并对……双方的臣民和公民开放”。条约上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阻止美国特许一个类似哈得孙湾公司这样的贸易公司在哥伦比亚河口成立另一个站，或由美国出面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据点(如门罗总统在1824年向国

^① 直到1844—1845年美国定居者才开始有少数人到哥伦比亚以北的尼斯夸利、考利兹、奥林匹亚地区定居，这是违反哈得孙湾公司的官员们的意愿的，但他们也未加以阻挠。

^② F. 墨克(Frederick Merk)著：《斯内克河远征，1824—1825年，毛皮贸易和帝国的一支插曲(The Snake River Expedition, 1824—1825, an Episode of Fur Trade and Empire)》，载《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二十一卷(1934年)，第49—62页。

会所建议的),或在密苏里河的上游水域或密西西比河的其他支流和哥伦比亚河的支流之间建立一条设防的栅栏线,或为俄勒冈境内的美国公民提供美国的法律和法院。当美国对俄勒冈的兴趣日益发展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建议确实曾在国会里提出过,但却总是被否决掉。美国扩张仍然限制在落基山区的这一边。1818年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英美之间的分歧和纠纷,因而国会仍然对于采取在那个边远地区可能引起麻烦的行动犹疑不决。哈得孙湾公司在二十年内继续维持着无可与之抗衡的优越地位。

1821年的俄国谕旨引起美国同沙皇政府的交涉,最后产生出
274 1824年条约。最初,美国向英国建议联合同俄国进行交涉来瓜分俄勒冈地区:北至北纬五十一度归美国,五十一度到五十四度之间的地区归英国,五十四度以北全归俄国。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对乔治堡的恢复感到遗憾,无论如何也不承认美洲大陆不是欧洲进一步扩展的对象的门罗主义的断定,因而拒绝了美国的这个邀请。通过同美国的条约(1824年),俄国同意不允许它的臣民到北纬五十四度四十分以南定居,美国同意不允许自己的公民在那个纬度以北定居。第二年即1825年,英国同俄国订了同样的条约,规定大致以北纬五十四度四十分为它们两国之间在太平洋岸的边界;并规定从那里到北冰洋的俄国领土的东部边界。这条线规定得过于笼统,后来被美国在购买阿拉斯加的时候接收,最后在该世纪末被卷入同英国的阿拉斯加的边界纠纷中^①。由于这两个条约,俄国从北纬五十四度四十分以南的领土竞争中撤退了,放弃了它对那个海岸以外的太平洋上的任何公海的独占主权。西班牙在1819年已经把它的所有要求权转给美国,因此,在北纬四十二度至五十四度四十分之间的领土争端只缩小成为英美两国之间的事情了。通过实际探查,美国对哥伦比亚河以南的地区有更多的

^① 参阅本书第二十三章。

要求权,英国同样对这条河以北的土地和河流有更多的要求权。

然而,英国的要求权被美国通过 1819 年条约继承了西班牙的权利这件事所削弱,虽然在以后的交涉中这一点未被充分利用。英国宣称它通过 1790 年的努特卡海峡协约取得了西班牙的要求权的一部分。美国争论说努特卡海峡协约已经被 1796 年爆发的英国和西班牙战争所取消^①。

美国和英国未能在 1824 和 1826 年之间的交涉中取得协议。275
坎宁愿意作为一个“妥协”接受从四十九度线往西只到它同库提奈河的交叉点,从那里沿那条河而下,到哥伦比亚河,而后下到哥伦比亚河口,双方公民和臣民可以在这一段河道自由通航。他最后甚至向美国提供一块哥伦比亚以北的领土:从胡德运河往西到海洋一线以北的奥林匹克半岛。这是英国的第一次从哥伦比亚线后退。美国提出接受作为一条“妥协”的线:从落基山顶延伸的四十九度线直到太平洋,从这条线以北的英国领土往来于哥伦比亚之间可以自由航行^②。给双方提出的夸大要求打一个折扣,真正有纠纷的面积是一块包括普季特湾的现在的华盛顿州的西北部的三分之二那样大的三角地区:就是说,在哥伦比亚河和北纬四十九度线之间的地带。

① 还有一个始终没有正式印成英文的代替 1790 年协约的英西 1794 年协约。除了其它事情外,它规定了两国臣民可以“经常来往”努特卡港,在那里建筑临时房舍等,并且还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在上述港口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或对那里提出任何排斥其它一方的主权或领土统治权的要求”。(曼宁的前述著作印了它的译文。)虽然这个协约在 1842 年印成西班牙文,它在俄勒冈问题的最后交涉中始终未被利用。假如象英国人所说,1790 年的协约在俄勒冈交涉中仍然有效,那么 1794 年的后续协约也应当有效,这个后续协约使美国从西班牙那里继承的要求权对英国同样有效。假如 1794 年的后续协约不再有效,那么 1790 年的努特卡协约也就无效,这样就使美国保有从西班牙继承的平等要求权。亨特·米勒博士使我注意到这一重要之点。

② 约瑟夫·舍费尔 (Joseph Schafer):《英国对俄勒冈问题的态度, 1815—1846 年》(The British Attitude Toward the Oregon Question, 1815—1846),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十六卷(1911 年),第 291 页。

在不能对一条边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双方批准了一个新协议(1827年)，无限期延长1818年条约的规定，但任何一方可以在通知对方一年以后废除。于是，俄勒冈问题就搁置下来直到1842年韦伯斯特和阿什伯顿谈判的时候。如果说不如他的继任波尔克那样坚决的话，泰勒总统却是一个热心的吞并主义者。他除了想合并得克萨斯外，还认为通过墨西哥自愿割让给美国，他找到了一条把俄勒冈问题的解决同获取包括旧金山在内的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结合起来的道路。阿什伯顿把这作为一个好的政策向阿伯丁建议；但参加谈判的人们认为把俄勒冈的问题提出来会损害消除他们的更加迫切的焦虑即东北边界纠纷，所以他们把俄勒冈问题暂时搁置起来。韦伯斯特可能由于接到美国海军上尉查尔斯·威尔克斯于1842年6月中交来的报告而感到犹豫，威尔克斯从对俄勒冈地区的一次侦察航行回来之后报告说为了战略上的目的应当把四十九度以北的边界线向前推进到包括温哥华岛，弗雷泽河口，和普季特湾在内的地方^①。由于英国政府提出把东北边界作战略上的修正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至少这个美国海军军官认为四十九度线不适当而加以反对。

在批准1842年条约之后的善意的气氛中，双方政府愿意进而解决西北边界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泰勒和韦伯斯特协同采取了总统所喜爱的计划。国务卿私下向美国驻伦敦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指示，美国可以让出哥伦比亚以北的一大块领土，假如英国同美国联合起来对墨西哥施加外交上的压力，要它在得到一笔巨款后割让三十六度以北的加利福尼亚，这笔款的数字将由双方商定，墨西哥可以用这笔钱来偿还英国和美国的债权人。泰勒和韦

^① 这个报告印在1911年7月15日的《国会记录 (Congressional Record)》(第四十七卷，第2977页以下)。一个在海军军需官威廉·A. 斯拉卡姆率领下的前调查团作了1837年俄勒冈状况的情况报告。

伯斯特心意中让给英国的领土是在哥伦比亚以北和从普季特湾之上的阿德米拉提海汉的源头往南直到那条河的垂线以东的地区。这将给美国保留奥林匹克半岛和半岛以南的地方以及普季特湾的港口。韦伯斯特通知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说将要派一个特别使团到英国去^①，通过英国、美国和墨西哥三方协议来解决俄勒冈问题，包括割让连同旧金山在内的加利福尼亚给美国。韦伯斯特期望自己到伦敦去进行这种外交联合，但在总统同众院外交委员会秘密商量之后，该委员会反对为这样一个使团支付款项。韦伯斯特辞职之后，泰勒专心去进行得克萨斯条约的交涉。泰勒与韦伯斯特的联合建议同其他每一个美国外交家在四十九度线上的坚决立场形成鲜明的对照^②。不象坎宁提出把奥林匹克岛留给美国的解决办法而使自己为难的让步，总统和国务卿的这个计划似乎没有超出同阿什伯顿进行非正式的商量。在另一方面，坎宁的建议则记载在大家都看得到的正式外交文件上。

在1842年之后，双方政府都表示解决俄勒冈问题的意愿：英国主张以哥伦比亚线为边界，美国主张以四十九度线为边界。但国务卿卡尔霍恩认为一种“巧妙的静止”的政策对美国比对英国更有利。他拒绝把这个问题提交仲裁。

引起俄勒冈问题并使它成为政治问题又由此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的，是自1841年开始的日益增大的美国移民的份量和西部各州对保护这些移民的关心。拖延边界的明确解决对美国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为从陆上移民提供了时间。在“1843年的大移民”

^① 这个使团是英国公使福克斯按照所接到的指示建议的。关于这点我得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J.O. 麦凯布先生未发表的论文，他曾参阅英国外交部的记录和阿伯丁勋爵的私人函件。

^② 关于这个建议的评论可参阅C.A. 凯里(C.A. Carey)的《俄勒冈历史(History of Oregon)》(芝加哥和波特兰, 1922年)及C.A. 达尼韦(C.A. Duniway)的《美国国务卿》，第五卷, 第57—60页。

中，八百多个先驱拓荒者坐着有盖的马车穿过平原和山脉来到威拉米特河流域定居。俄勒冈在1843年间成为国会中一个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当时有一个正式废除1827年协约和组织一块往北延伸至北纬五十四度四十分的美国的俄勒冈领土的运动。民主党人觉察出在群众中，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合并全部得克萨斯和全部俄勒冈的情绪非常高涨。他们把他们的要求简化成头韵体的口号：“五十四—四十或战争”我们记得民主党人在竞选运动中大声疾呼地提出扩张的问题，因而在1844年的选举中获胜。当一场同墨西哥的战争正在一触即发的时候，假如英国决意不让步的话，这位新扩张主义者的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是否要为五十四—四十而同英国打仗呢？

尽管竞选运动中演讲得多么热烈，波尔克还是宁愿不为五十四—四十而战，假如他能够避免的话。美国公众对于英国议会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的辩论的印象很深；辩论情况表明英国政府不被空话赶出俄勒冈的决定得到英国舆论的一致支持。新总统找到一个避免走极端的方法。他的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对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帕克南说（1845年7月12日），总统愿意撤销五十四—四十的要求，因为“他感到困窘，假如不是被他的前任的行动约束的话”。布坎南提出以从北纬四十九度线延伸穿过温哥华岛到太平洋一线来划分领土，并把在这条线以南的该岛各港口作为自由港向英国开放。帕克南无疑感到对最近的议会的辩论的反应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在向国内请示之前就粗暴地拒绝了这个提议。接到总统的明白指示后^①，国务卿布坎南勉强地但正式地撤回了提议，总统于是宣布了五十四—四十的方针。在他的年度咨文里波尔克不大诚实地^②把用和平方法调整这个纠纷遭到失败

① J.K.波尔克的《日记》，1845年8月26—30日。

② 波尔克已经从驻伦敦公使路易斯·麦克莱恩那里知道阿伯丁愿意接受四十

的责任加到英国身上去。他引用门罗主义来禁止在北美大陆上的任何欧洲殖民或统治的扩张，——他心里想到的无疑是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他主张国会通过决议发出为在一年后废除1827年条约所需要的通知。他在他的从未打算发表的日记里吐露说，“对待约翰牛*的唯一方法是眼睛直盯着它。”但当总统听到英国备战的时候，他的眼睛眨动了①。

如果说波尔克是谨慎的，皮尔政府就更是这样。在美国竞选运动当中，阿伯丁决心承认延伸到海洋的四十九度线，假如美国不把这个问题提交仲裁②。哈得孙湾公司的当地负责人员在1845年接受了俄勒冈地区的美国移居者所组织的临时政府的管辖，同年该公司把它的西部基地从哥伦比亚河迁至温哥华岛，以及以后它对哥伦比亚河流域及其耗尽了的毛皮贮藏的漠不关心，这些情况证实皮尔接受了阿伯丁的让步方针③。政府开始准备舆论④以接受这个长期政策的倒转⑤。阿伯丁曾私下写信给帕克南(1845

九度线，假如英国能保留全部温哥华岛并继续在哈得孙湾公司享受某些权利。当他撤回被帕克南拒绝的四十九度线的提议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见米勒著：《条约》，第五卷。

* 原文为 John Bull，是英国人的绰号。——译者注

① J. W. 普拉特(Julius W. Pratt)的文章载《加拿大历史评论》(1943年12月)，第241—249页。

② 关于这点，历史学家们所引用的阿伯丁给皮尔的重要的信件由 R. C. 克拉克发表在《俄勒冈历史季刊》，第三十四卷(1933年)，第236—240页。

③ F. 曼克(Frederick Merk)著：《俄勒冈先驱者和边界》(The Oregon Pioneers and the Boundary)，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二十九卷(1924年7月)，第681—699页。

④ F. 曼克著：《英国政府的宣传和俄勒冈条约》(British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the Oregon treaty)，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四十卷(1934年10月)，第38—63页。

⑤ 这个决定得到了对西北太平洋的一些特别调查报告的确证：一个是从加拿大陆路去的军事调查团(瓦雷和法法苏尔中尉，这个报告到得过迟，未能对决定发挥作用)；另一个是在阿伯丁的兄弟戈登上尉，和首相的儿子威廉·皮尔中尉的领导下在1846年初乘英国快速舰“亚美利加号”去访问普季特湾之后做的。

279 年 4 月 18 日)说,假如布坎南提出延伸到海的四十九度线,可能证明不是不能接受的^①。他责备了公使武断地拒绝布坎南的那条穿过温哥华岛的界线的提议,并且指示公使再度建议仲裁。波尔克的内阁坚持拒绝仲裁。他们决定备战,不再提出四十九度线(如帕克南所建议那样);但假如英国公使能提出远到富卡海峡的四十九度线,总统至少将谘询参议院是否接受。美国驻英公使的报告表明英国政府可能提出这样提议,同时在准备新的军备。试探一些有代表性的参议员的意见之后可以肯定参议院将会接受这个方案。这样的布置被允许传给英国外交部知道^②。同时波尔克告诉国会扩充了的海军和陆军可以用来保护俄勒冈的移民。在国会的联合决议的授权(1846年4月26日)下,他合乎礼仪地送出了停止条约效力所需要的一年前的通知,同时表示希望这将促进问题的友好解决。

这样做是适宜的。英国政府看到美国至少在把边界定到四十九度线上的立场是认真的,波尔克得到美国舆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有力支持^③。俄勒冈对美国的扩张是关系重大的,对英国殖民帝国来说它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据点。皮尔政府耽于当时在英国流行的政治哲学,认为殖民地正在变为负债而不是资产。衰弱的皮尔内阁,在野的自由党领袖拉塞尔和帕默斯顿以及英国人民都不愿为遥远的俄勒冈而战,如同过去不愿意为得克萨斯或加利福尼亚

① 圣乔治·L.西乌萨(St. George L. Sioussat) 著的文章载《美国国务卿》,第五卷,第 395 页。

② R. L. 舒勒(Schuyler)著:《波尔克和 1846 年的俄勒冈妥协(Polk and the Oregon Compromise of 1846)》,载《政治学季刊》,第二十六卷(1911 年),第 443—451 页。

③ D. W. 豪(Howe)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如果不能得到五十四度四十分以南的领土就开战的运动中(The Mississippi Valley in the Movement for Fifty-four Forty or Fight)》(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记录》第五卷 [1911—1912 年],第 99—116 页)一文中分析了西部的日益高涨的取得全部俄勒冈的要求。

亚而战一样；但美国宁愿同讲道理的阿伯丁而不愿同可怕的帕默斯顿打交道，由于英国的不稳定的政党政治，帕默斯顿随时可能接替阿伯丁的职务。美国实行低关税政策，皮尔的新自由贸易政策使得他保持同美国政府友好的关系，这也产生了缓和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忽略英国海军于1845年和1846年在拉普拉塔河区域卷入同法国的一场麻烦的干涉当中这件事^①。在同反对党^②取得了四十九度线的谅解，并知道这可能被华盛顿接受之后，阿伯丁送出一个条约草案，包含延伸到富卡海峡的那一条边界，但美国必须保证哈得孙湾公司^③在哥伦比亚河的航行自由，并承认该公司及其附属机构普季特湾农业公司的财产占有权。波尔克在送出他

^① R. C. 克拉克(Clark):《英美关税政策及其对俄勒冈边界条约的影响(British and American Tariff Polic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Oregon Boundary Treaty)》，载在《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分会记录(Proc. of the Pacific Coast Branch of the American Hist. Assoc.)》，1926年，第32—50页。T. P. 马丁(Martin):《自由贸易和俄勒冈问题,1842—1846年(Free Trade and the Oregon Question, 1842—1846)》，载在华美的纪念册(Gay Memorial Volume),《经济史的事实和因素(Facts and Factors in Economic History)》(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2年)一文中说,对西部小麦出口者有利的近在眼前的英国谷物税的取消削弱了五十四度四十分的分端分子的要求。亨利·康马杰(Henry Commager)发表了一个对英国让步的动机的有思虑的分析,《英国和1846年的俄勒冈条约(England and the Oregon Treaty of 1846)》，载在《俄勒冈历史季刊》第二十八卷(1927年),第18—38页。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rick Merk)的一篇重要论文:《英国谷类危机和俄勒冈条约(The British Corn Crisis and the Oregon Treaty)》，载在《农业历史(Agricultural History)》第八卷(1934年7月),第95—123页,完全推翻了那种认为英国由于需要不间断地从美国进口粮食而被迫让步的论说。

^② F. 默克:《英国的政党政治和俄勒冈条约(British Party Politics and the Oregon Treaty)》，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三十七卷(1932年),第653—677页。

^③ 布坎南国务卿在签订条约两天之前指示麦克莱恩向英国政府述说参议院的关于哈得孙湾公司的权利将于1859年5月30日期满的“信念”(也就是说,哈得孙湾公司同这些地区的印地安人的贸易特许截止)。回答这一点,阿伯丁指示帕克南(1846年7月1日)坚持说条约的交涉者十分清楚哥伦比亚的航行权利是不受时间限制的。阿伯丁也把这点对美国驻伦敦公使麦克莱恩说明。米勒的《条约…》第五卷。

关于哈得孙湾公司的财产占有权,在1868年的仲裁辩论中,美国法律顾问公开承认“如在第二款中所准确规定的”航行权利。

的对墨西哥交战咨文之前有充足理由期待的这个建议在宣战之后到达美国。波尔克不会不高兴看到这个建议。他立刻(1846年6月10日)把这个建议草案原封不动送请参议院提意见。该院很快(6月12日)以三十七票对十二票的表决赞成这样一个条约。布坎南和帕克南立即(6月15日)完全按照唐宁街所拟定的条款签了字,参议院在三天之后以四十一票对十四票的表决批准了这个条约。这时他们赶忙办事。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已经爆发。皮尔政府有随时下台从而毁掉立刻解决的机会的可能。

281 这样,波尔克总统就取得了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一个巨大外交胜利,可以十分自由地通过战争来解决同墨西哥的问题。甚至在实际划定俄勒冈的边界的消息到达英国之前,阿伯丁勋爵已经通知墨西哥不干预它同美国的战争^①。没有私欲的法国驻华盛顿公使这样写道:“部长先生,只要看一下事物在这个国家如何展开,人们就会说使这个新共和国的各种事业享受荣誉的成功是有一定的天意的,因为它似乎是凭命运的本能而不是出于对自己力量的严肃考虑行事的。”^②历史学家们曾过于详细地谈论当时流行的所谓“明显的命运”^③这个词:它指用和平方法扩张来把全大陆

① 钱宁(Channing)著:《美国史》(Hist. U. S.),第五卷,第561—562页。在把这个条约草案送给帕克南递交的时候,阿伯丁给他斟酌延迟递交的充分权力,假如“在美国发生一些事情,根据你的判断认为最好压住我们的建议不交给这个政府”。帕克南正确地解释阿伯丁的思想,这并不是指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我们可以猜测阿伯丁的心目中大概指的是俄勒冈地区的冲突或地方战争。亨特·米勒在他的《条约》第五卷的长篇的注解中做了关于俄勒冈条约交涉的广泛的论说,重印了有关文件,并第一次印出许多重要的美国和美国文件和指示。

② 引自乔治·维恩·布卢(George Verne Blue)发表的通信集,《法国和俄勒冈问题(France and the Oregon Question)》,载《俄勒冈历史季刊》,第三十四卷(1933年3月和6月),第39—59页,第144—163页。

③ 除了关于这个概念的许多历史论著外,参阅J. C. 帕里什(Parish)著的《明显的命运的观念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of Manifest Destiny)》,这是一篇加利福尼亚大学印行(1932年)的演讲稿,及J. W. 普拉特(Pratt)著的《约翰·L. 奥沙利文和明显的命运(John L. O'Sullivan and Manifest Destiny)》,载在《纽约历史(New York History)》,第十四卷(1933年7月)第213—234页。

置于美国旗帜之下，这肯定俘获了美国人民及其更豪迈的领袖们的幻想。詹姆斯·K. 波尔克从未赞成这个流行观念的过分的表达，但他在最伟大的领土扩张年代中领导美国外交，姑且不提胆量 and 好运气，有勇气和成就却是无可辩驳的。

俄勒冈问题直到两次国际仲裁之后才彻底最后解决；至少其中一次关于水道边界的仲裁本来是可能避免的，假如波尔克在最后一分钟不那样急于完全照字面接受英国的 1846 年条约草案的话。一个仲裁是确定两个英国公司的财产占有权的准确价值并通过购买而取消这种权利。根据 1863 年的一个协定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在 1869 年判定总数为六十五万金元。1846 年条约规定国际边界应从第四十九纬度圈到达海岸线之点起沿分开大陆和温哥华岛的海峡的中部到富卡海峡而后入海。缺乏地图和对边界的准确说明又一次造成了麻烦。问题起于它指的是哪一个海峡，是美国所主张的阿罗运河还是英国主张的罗萨里奥海峡。这牵涉到一个圣胡安群岛的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 1853 年开始解决。更重要的是温哥华岛的战略防御问题，人们认为该岛被只在七英里以 282 外的美国任何岛屿所威胁，假如阿罗水道被接受了的话。这个战略因素，而不是条约解释的文雅言辞，或制图上的辩论，是英国的主要关心所在。圣胡安群岛对美国控制普季特湾入口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航空时代更是如此）。1856 年两国政府成立的确定适当水道的二人混合委员会未能取得协议。

当弗雷塞河发现黄金的消息在 1858 年宣布之后，上述纠纷就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了。群岛上的地方冲突导致双方国家调陆军和海军来保护各自的国民，但军队指挥官明智地避免了冲突。直到 1871 年华盛顿条约才把这个问题交给德国皇帝仲裁来加以解决。 283 在仲裁协议的交涉当中，英国企图授权仲裁者在自己认为适宜的情况下可以划定一条妥协线。它希望这样一个可能性也许至少能

够保存在战略上有价值的圣胡安岛。任何一个妥协办法都会把这个岛判给英国，因为它接连阿罗海峡而且距离温哥华岛最近。参议院拒绝批准一个会允许妥协的协定(1869年1月16日签订)。在华盛顿条约上，美国的谈判人员成功地抵制了任何允许一个妥协判决的可能性：仲裁者必须决定1846年条约真正指的是哪一个海峡，是阿罗还是罗萨里奥。他决定(1872年10月21日)是阿罗运河，因而把整个圣胡安群岛包括它的令人喜爱的避暑别墅地点置于美国的占有之下。今天从富卡海峡到大陆上的温哥华港口去的远洋定期轮船都取道阿罗海峡，因而实际上证实了仲裁者的这是主要航道的判断。

我们可以使同英国解决的这两个主要的边界问题相互间取得平衡。在东北方面，受到英国诘难的美国权利是有充分根据的：近来历史地图方面的研究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①。在西北方面，美国对之提出争论的英国权利则比美国的权利有充足得多的根据。没有一个公平的俄勒冈纠纷研究会认为美国对哥伦比亚以北地区的权利要求的理由与英国的理由同样充足。韦伯斯特稳健地在1842年为了和平而妥协；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当时的妥协实际上就是撤退。阿伯丁明智地在1846年为了和平而妥协，这个妥协实质上是屈服，把自己政府更有权利和前任历届政府坚持固守的领土交给别人。实际上，这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是妥协。新的东北边界是英国的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新的西北边界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上的胜利。二者都是为了和平而取得的胜利。

^① 甚至在发现阿朗达的富兰克林红线地图誊本之前，精明的加拿大历史学家们，如 W. F. 甘农(Ganong)的前述著作；J. 怀特(James White)在《加拿大及其诸省(Canada and Its Provinces)》，A. 肖特(Adam Shortt)及 A. G. 道蒂(Doughty)版(二十三卷本，多伦多，1914—1917年)，第八卷，第824—825页；及 E. D. 米尔斯(E. Dudley Mills)在《联合帝国杂志(United Empire Magazine)》，1911年10月份，曾清楚说明了这个问题。参阅 L. 马丁(Martin)和 S. F. 比米斯(Bemis)，在《新英格兰历史季刊》第十卷(1937年3月)，第105—111页上的文章。

第十七章 权利要求和商业

284

(1815—1861 年)

在根特和约和南北战争^①爆发之间的这一段时期美国外交史上的最卓越的几章牵涉到保卫和扩展政治边界问题。但这却不应当遮蔽我们探视国家成长的其它一些比较平常的发展的目光。在联邦共和国在其间奠定了它的领土基础的这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展的半个世纪当中，国家的海外商业稳步增长，美国建立了最大的商船队，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由过去局限于西欧和波罗的海的沿海地带扩展到遍及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不同于在大陆上的扩展和政策，外交关系越过海洋的日益扩展的范围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应当在这里叙述一下国际要求权和有关对外商业的管理问题。

一些写历史的人的一个相当轻率的假定说美国总是保持着一些金钱上的要求权用来交换它所垂涎的领土。只要这些要求权是正当的，使用那个方法来满足其要求也就没有什么可非难的。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较大的国家把取消这种要求权利作为偿付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部分代价可能是这个不正当的说的根据。事实上是美国，同欧洲各国对比起来，从来未在一项国际金钱权利的问题上发出过一个正式的最后通牒；这可能是为什么美国公民在外国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些年代里损失了多达数十亿美元的缘故。用这种方式来提出和清算要求权，远不是以掠夺为目的的过

^① 原文为“Civil War”，即指 1861—1865 年的美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国内战争。——译者

程的表现，而是一个可以自豪的不朽的和平的记录。

285 构成在当前讨论的这个时期中的美国外交史上这样活跃的一章的国际要求权主要可分为两类：由 1793—1815 年欧洲大战时期的掠夺事件所产生的；以及在横扫西班牙属美洲的革命动乱中对美国公民和他们的财产的不负责的损害所产生的。由于在这个时期中，除了 1812—1814 年的英国外，美国同世界所有国家和平相处，没有受革命暴力的干扰，同时享受到美妙地适合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使所有阶级和个人，不分本国人和外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的好处，外国对美国提出的这种要求权利非常少。1812 年的战争消除了对英国的掠夺的要求权。一个 1853 年的要求权协议以“完全的甚至是幸运的成功”（引用西沃德的后来的提法）解决了两国之间累积的所有各种要求权利问题^①。美国以承担对西班牙的掠夺和其它要求权作为 1819 年佛罗里达交易的一部分。另一类对西班牙的要求权是对在它的对反叛的殖民地战争时期（1821—1823 年）所实行的非法拘捕提出的。这些权利以在 1834 年的所谓范内斯协议上规定的一笔总数来偿付。对法国的掠夺的早期要求权在 1800 年的协议和 1803 年的路易斯安那的收买中得到清算；但由 1803 年到 1815 年的战争中的掠夺事件所引起的另一组要求权仍然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挂念的问题。还有对俄国、丹麦、葡萄牙、尼德兰和两个西西里的掠夺的要求权利，所有^②这些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海上作战所引起的。虽然经过不断的强烈要求，但在杰克逊总统当政以前，美国几乎没有索回什么赔偿。

除了法国外，这些权利要求没有遇到多大困难。经过使人厌

① 穆尔：前述的《国际仲裁》，第一卷，第 391—425 页。判给美国债权人的总数是 329,734.16 元，判给英国债权人 277,102.88 元。

② 一项对俄国的要求权利是由于在 1823 年把“珍珠号”二桅船从西北海岸的水域赶走所产生的损失。

烦的商讨之后俄国和葡萄牙^①接受并且偿付了这些要求，具体方法由行政协议加以安排。这是用行政协议的方法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先例，这种越来越多的行政协议不断侵犯参议院的制定条约的权力，近来这种情况有很大发展。同丹麦，瑞典，两西西里和尼德兰的这种问题更加复杂。对这些国家所提出的权利要求是由于它们执行了拿破仑强迫那些小国执行的专横命令，没收了美国的中立船只。

丹麦政府没有企图回避它的责任。但它拒绝承认它的审理捕获物诉讼法庭（该法庭是按照高度公平原则办事的）的判决可以成为在同任何外国谈判中的检查对象，从而抵制了这类权利要求。一位能干的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作为代办到哥本哈根去，他争辩说，审理捕获物诉讼的法庭并不解脱交战国君主的责任而是为了确定这种责任设立的；在这种法庭证实了捕获者的行为之前，中立国不能提出抱怨，但假如判决不公平的话，中立国可以使交战国君主负担责任；美国正是这样做的。丹麦政府拿出六十五万元来清理所有权利要求^②。美国接受了（1830年的协议）。

瑞典为了所谓的施特拉尔松特权利要求^③，在1825年给美国债权人六万元来了结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所查封的财产。这些权利要求长期以来得到国务院的支持。

向两西西里政府提出的权利要求系由于拿破仑的妹夫若阿基

① 同葡萄牙在1832年的行政协议上所赔偿的权利要求是由于在1829—1830年的葡萄牙王位继承内战当中在亚速尔（Azores）群岛的特塞拉（Terceira）岛的非正规的封锁时期扣留了三只美国船所受到的损失。由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长期未解决的对“阿姆斯特朗将军号”的掠夺的赔偿权利要求直到1851年才通过一个特别协议提交仲裁（后来败诉）。

② 捕获或劫夺事件的总数是一百六十，其中四十二件被确定。债权人向丹麦提出的要求总数在1827年共计2,662,280.36元。参阅穆尔：《国际仲裁》，第五卷，第4549—4573页。

③ K. E. 卡尔逊（Carlson）：《美国和瑞典的关系（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weden）》（宾夕法尼亚州亚林敦，1921年），第45—71页。

姆·缪拉在那里统治时期执行拿破仑命令在那波利水域拘捕了美国的中立船只。在一场长期拖延的纠纷中，那波利政府拒绝偿付这项要求，理由是缪拉的王位是劫夺来的，在拿破仑垮台和缪拉被处死之后从未被恢复王位的合法的波旁王室所承认。美国使两西西里王国从国家对国家的角度担负责任，坚持要求赔偿。在1832年这个王国提出一笔总数的钱来谋求妥协。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安得鲁·杰克逊派到那波利专门处理此事的公使约翰·纳尔逊十分满意地接受了2,119,230元^①的一笔款。他相信这是由于一小支美国舰队的友好访问帮助了他达成这项协议。另一个对他有利的因素是法国政府刚刚同意偿付一笔总数的钱来赔偿在法国发生的掠夺事件，其中许多是在这些同样的命令之下发生的^②。1820年，美国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指导下放弃了向尼德兰王国讨索在法国篡夺统治的时代所做的同样掠夺事件。在法国的命令下，在尼德兰的这种拘捕同在丹麦和那波利的类似拘捕的表面上的差别在于尼德兰事实上在1810年合并于法帝国；那些掠夺的责任因此归法国来负，最后在法国的赔款中得到清偿^③。

1803—1815年，对法国的掠夺的权利要求不是在取得其承认责任方面而是在使其实际清偿这些责任方面呈现了最激烈的争

① 折合为2,115,000达卡(ducats)，从批准协议之日起加百分之四的利率分十年还清。

② 保罗·C. 贝洛达(Paul C. Perrotta) 传教士在他的《美国向那波利王国提出的权利要求(The Claims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Kingdom of Naples)》(华盛顿哥伦比亚区, 1926年)一书中从美国的资料来源叙述了对那波利的权利要求的清偿经过。

③ 彼得·郝克斯特拉(Peter Hockstra): 《三十七年的荷美关系, 1803—1840年(Thirty-Seven Years of Holland-American Relations, 1803—1840)》(密执安州大瀑布城, 1916年)。从法国赔款中按59.8%的比例分配付给债权人的总数达536,907.01元。穆尔:《国际仲裁》,第五卷,第4468—4475页;《国际判决》,第五卷,第350—403页。

论。这些权利要求自然是拿破仑战争时期未得到清偿的最大的一组。根据债权人所提出的没有经过司法检查的缩减的总数，不算利息在内，是一千二百万元。这些包括违反 1800 年协议的财产的擅用和充公事件，不正规的充公或没收，追溯既往的充公，以及在 1810 年 11 月 1 日的假装废除“报复性的”柏林和米兰命令之前和以后的根据这两个命令的充公和其它专横行动。汇集这些复杂的专门事件并把它们提出来要求赔偿的这个繁重任务交给了 1816 年至 1823 年的驻法公使，能干的外交家艾伯特·加勒廷。法国政府并不否认其中的许多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对加勒廷说其他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虽然其中大部分要求都已放弃，但法国同意清偿的其余部分的数目很大，以致法国不能订清偿的协约。他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沉默地延期”到较好的时日来解决。

加勒廷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离开了法国。这个纠纷的专门事项由于时日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了，而且由于缺乏民族感情使得门罗或亚当斯总统很难有力地提出这些要求。当杰克逊将军在 1829 年进入白宫的时候，他比他的老练的外交家出身的前任们更能代表正在高涨的民族意识。在他给国会的第一个咨文中说道他的外交政策是按照“不要求任何不是明显正当的东西，对任何错误的事情不让步”这一个明白宣告的目的制定的。他显然认为对法国的权利要求是明显正当的而不清偿这些要求是明显错误的。杰克逊派强有力的威廉·C.里夫斯到巴黎，里夫斯发觉法国政府当时至少有意商谈最后解决那个问题。作为抵销，法国政府把博马舍的后代的权利要求提出来，这笔钱据说是在美国革命时期博马舍供给美国国会一批物资而欠他的；另提出据争论说是出于对 1803 年路易斯安那条约上的最惠国商业条款的曲解而产生的其他权利要求；英国和其他各国在所有美国港口（包括路易斯安那的港口）取得了商业特权作为他们所提供对等权利的回报，而法国

288

没有享受这种特权。

博马舍的后人的权利要求把一个老的问题又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从法国的中立国的军械库向美国反叛者输送武器的商业管道的虚构的罗德里格·奥尔塔莱公司虽然具有美国国会同意偿付的一纸合同，是否真的应当得到偿付。对于要求偿付这笔款项的真正的意图，后来的历届美国国会都有疑问。法国提出的第二类权利要求产生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有深远影响的问题，那就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否应当按照欧洲现行惯例自动地适用于包括作为对特别协定所提供的某些特殊让与的回报而给与其他外国的各种让与。美国认为最惠国的利益只包括其他国家所享受的没有特别契约的那些利益。它在它的大多数商约上加入大意如此的一款（这实际来源于法国^①），见之于 1778 年同法国签订的美国的第一个条约；双方“相约凡给与其他国家的商业上和航行上的任何特殊利益都立刻照样给与对方；假如让与是自由的，对方也自由享受相同的利益，假如让与是有条件的，对方照付相同的报酬”。在这个条约以后继续按最惠国待遇安排的 1800 年协定取消了这个有条件的保留，而 1803 年割让路易斯安那的条约规定法国和西班牙的船只将“永远”在割让地域的港口“按最惠国的地位”享受待遇。美国同英国（在 1815 年）和巴西（在 1828 年）交涉订约，相互给与
289 签约国的船只以本国船只的同样待遇。这自然适用于包括路易斯安那在内的美国全境；法国争论说它的船只也因此应当在路易斯安那各港口享受英国船只的同样待遇。也许出于失误^②，1803 年的法国条约没有附加任何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由此而引起的纠纷导

^① V. G. 塞色尔 (Vernon G. Setser) 指出了这个条款的法国来源：《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是美国人创始的吗？(Did Americans Originate the Conditional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载在《近代史杂志》，第五卷，(1933 年)第 319—323 页。

^② 这个原因可能是 1800 年的协定和 1803 年移交路易斯安那的协定都不是商业条约。因此它们都没有包含这个通常的条件款项。

致在以后的最惠国条约中更多注意附入这个条件款项。

经过耐心的交涉，并曾由于1830年七月革命而中断过，里夫斯最后在1831年的协定中接受了总数为二千五百万法郎的款项^①来勾消美国的要求，这笔款项分六年由美国政府按比例分发给债权人。在这笔二千五百万法郎当中首先拿出一百五十万法郎来满足法国对美国提出的要求（没有详细列举）。在同一协定中法国放弃了1803年的最惠国条款来换取在十年之内对法国酒类减低进口关税。

法国的1830年新宪法，像美国宪法那样，把国家的钱财管理权交给国家的立法机构。在法国议会为这项取得协议的赔款实际拨出款项之前，美国财政部在按照协定条款第一次分期付款到期的时候，通过美国银行向法国财政部发出一个付款通知单。这时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争论，这个争论是有趣的，因为它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国会在相似情况下^②将会怎样处理。法国外交部长对美国的这种即时的行动提出了抱怨。他说法国的行政部门，同美国的总统一样，没有议会的拨款不能付出款项。行政部门一定尽力执行条约的规定，但它必须等待必要的拨款手续。美国方面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坚持认为法国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迅速忠实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法国下院屡次否决了（1833—1834年）法国政府的必要的拨款议案。一个法国财政部长因此辞职。

① 美国所得数目小于原来提出的不计利息的债权总数一半以上；但当后来一个分配这笔款项的美国委员会审查债权的时候，他们把总数由原来的12,047,286.09元减为9,362,193.27元。每个债权人最后由法国的赔款中按比例得到他的裁定额的59.8%。

② 在许多事例中，特别著名的是1794年杰伊的条约的辩论，1853年的“加兹登的购买”（按1853年詹姆斯·加兹登向墨西哥交涉购买的一块现在包括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方面45,535平方里的土地，代价为一千万元。——译者），以及1867年的同俄国签订的阿拉斯加条约，在美国众议院中曾激烈反对为实施由参议院批准并由总统公布的条约而必须拨款。但没有一件反对得到成功，因此在这一点上从未引起国际争端。

这时，杰克逊派爱德华·利文斯通这样一位人物去任驻法公使，利文斯通不久前曾任国务卿，是一位十分熟悉法国语言和法国法律背景的能干的法律学家。国王热诚地接见了他并且宣称法国一定尊重这个协定，虽然局势阻碍着立刻执行；但政府的必要的拨款议案又一次以八票之差没有在议会通过（1834年4月2日）。利文斯通向杰克逊建议说只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才能使这项权利要求免于落空。杰克逊本人对于在他的1834年度咨文中写进：对法国政府的所有部门执行这个协定的意向表示怀疑的那些字句负有个人责任，他请求通过一项法律，在法国议会再不付款的情况下授权他对法国财产采取报复措施。他说继续交涉已经不可能。参议院在反对的辉格党的促使下，拒绝支持总统的报复办法；众议院发表了一个支持的声明；但任何采取报复行动的立法自然是需要两院通过的。

可能由于华盛顿这种缺乏一个团结的阵线的状况而受到鼓励，法国政府跟着对总统咨文的口气表示忿怒而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它调拨了偿付债务的款项，但只在得到对总统咨文的满意的解释的时候才交付。在利文斯通离开巴黎之前，他解释说这只是美国政府两个部门之间的通讯，美国总统已经明白否认有任何用威胁方法影响法国的意图。大概是新上台的奥尔良王室受不了一场冲突引起的紧张。他通过英国的友好斡旋暗示说在下次的总统咨文里面带上一句合适的话就可以澄清气氛。虽然杰克逊拒绝直接对法国作解释，但他在下届年度（1835年）的咨文中对本国的国会宣称，认为他有意“威胁或侮辱法国政府，其无根据的程度同利用那个国家的恐惧来敲诈他们的理性所认为是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的那种企图是一样的”。美国大众并不知道这是对一个外国的道歉，而事实上它也不是；但法国政府却欣然认为满意，进而热心爽快地偿付了赔款。法国保全了面子和荣誉，而杰克逊也没有

屈服于“任何错误的东西”^①。这两个国家最后同意接受英国来调解他们的纠纷——帕默斯顿勋爵非常积极地进行调解，借以使英国在近东方面反对俄国的一切措施上可以指望得到法国的专诚的支持。正式的调解已经没有必要了^②。

对几个西班牙属美洲国家的权利要求产生于在这几个新的共和国反西班牙的战争中以及在以后的革命动乱中美国公民所受的损失。不管是通过行政协定如像哥伦比亚(1825年, 1829年), 巴西(1829年)的情况, 或者是通过正式条约如同墨西哥(1840年, 1843年), 巴西(1849年), 新格拉纳达(1857年)签订的条约, 所有这些, 除了1840年的墨西哥条约外, 都用现款清偿。我们在另一地方曾经提到^③, 墨西哥的款项是由混合委员会判决的, 1843年的条约规定分期付还判与数目。

由于在两个半球的许多国家里和平解决了美国公民的损失的赔偿要求, 美国的威望大为提高, 这件事表明美国不是一个别国可以玩忽其权利的国家了。这是一长串以后源源而来的自己向别国索取的和别国向自己索取的权利要求的开端, 这从此成为被接受的、和平的、虽然有时令人不舒服的美国的例行外交。本书限于篇幅只能在以后谈谈几个特别重要的权利要求, 如亚拉巴马的权利要求, 1910—1934年对墨西哥的权利要求, 以及由1914—1918年世界大战产生的权利要求等等。没有发生过金钱方面的权利使美

① 对法国的权利要求的历史在穆尔的《国际判决》, 第五卷, 第311—442页中有所叙述。R. A. 麦克莱摩尔 (McLemore) 在他的《对法国的掠夺的要求权, 1816—1836年; 杰克逊外交的研究(The French Spoliation Claims, 1816—1836; a Study in Jacksonian Diplomacy)》这一本1933年范得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出版的小册子中, 作了一些新的阐述。

② C. K. 韦伯斯特: 《英国在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调解, 1834—1836年 (British Mediation Betwee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4—1836)》, 载在《英国历史评论》, 第四十二卷(1927年), 第58—78页。

③ 参阅本书第236页。

国陷入战争的事情。

292

美国独立的期望之一是不受英国航行法的束缚同世界各国和各港口自由贸易。我们曾经看到，这个新国家对它所怀有的这方面的巨大期望是感到失望的。独立使它面对着欧洲各国包括它们的殖民地在内的商业上的限制。依据 1776 年计划制定的新共和国的条约政策是同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尽可能大的贸易自由的基础上缔结通商友好条约。贸易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关税的“自由贸易”——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始终是一个关税非常低的国家——而是说免于征收优待本国航运业和商业的差别税的自由。同美国相互享受最惠国优待的那些国家可以如同美国一样自由地对外国船只和商业制定禁令、限制法规，征收关税、航行税和其它费用，只要它们向美国的船只和货物所征收的税率不超过向其它国家征收的税率。这就是所谓“互惠”的意义，这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实在说来，互惠就意味着平等。

美国是一个没有殖民地但拥有一只壮大的商船队和巨大的向国外出口的天然资源的新兴的国家；反过来它也为工业品提供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热忱地为外国提供一个比较方便进入美国的增长着的市场的通道，以此来解除外面世界对自己的船只和产品所施加的不平等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特别是象征着十八世纪航行法的欧洲海洋大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外国同它们的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

在 1812 年战争以前这一时期，商业上的平等的相互性体现在各个商业条约中：同法国（1778—1800 年），英国（1794—1807 年），尼德兰，瑞典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中。在 1800 年以后同西班牙和法国所签订的其它条约中，贸易关系是根据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相互便利的原则建立的。除了同法国签订的在 1778—1800 年有效的商业条约规定允许美国船只在这些年内在法属西印度群岛

的几个指定的港口进行有限制的贸易而外，这些条约没有为美国船只取得在这些海洋大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港口进行贸易的特权。但是欧洲的灾难又一次帮助了美国。1793年到1815年间的各次欧洲战争带来了美洲殖民地港口的开放，而这却是美国外交家们所一直未能明白地写进一个条约里面去的。1793年以后，法属殖民地港口遵照法国政府的法令向中立国的船只开放。英国在1795年以来的战争时期中以地方紧急宣言的方式向美国船只和产品开放了它的西印度群岛的港口。西班牙同样开放了它的美洲殖民地。从1793到1808年的封港期间美国的中立航运生意兴隆，获得了巨额利润，尽管欧洲交战国对中立权利施加了种种限制，而那些限制是终于把美国拖入同一个冲突之中的因素之一。

美国革命摧毁了在十三个殖民地周围的英国贸易之墙，从而打开了殖民地垄断制度的第一个大缺口。法国革命由于战争本身的困境，打开了第二个缺口。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打开了第三个缺口。美国充分利用了这些国际事务中的偶然发生的局势。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各海洋大国迅速地重新关上了限制它们的美洲殖民地的闸门。美国同这些地区的贸易立刻发生了显著的下降。急于解除这些区别对待，禁止或限制，国会通过了1815年3月3日法案，规定对于取消对在它们的港口的美国船只不利的区别对待或抵销关税的那些国家，取消1789年各法案在美国港口对外国船只和货物所征收的额外的，特殊的课税。

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扩大美国商业的平等待遇和自由成为美国外交的目标。就西班牙的殖民地来说，在它们取得独立之后不久商业就开放了。在其余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西班牙在1823年开放了它们的对外贸易，这种过迟的改革的目的在于帮助把其它殖民地争取回来。我们曾经看到在1823年至1860年之间典型的美国 and 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的商业

条约的谈判情况。这些条约包含了中立权利的“小海军”原则^①以及航行和商业上的最惠国条款。同西班牙美洲的贸易是稳定的、不断增长的——平均约占1790—1860年^②美国总贸易额的百分之十四；这些条约为在以后证明是一个最广阔最有利的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友好的基础。

要取得新世界的英国殖民地的相互平等的贸易和航行权利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通过杰伊的条约和1815年的商业协定，英国对美国的船只和货物开放了它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直接贸易；但它坚持把英属北美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置于皇家航运体系的垄断保护之下。同加拿大的陆上或内湖和内河贸易在1812年战争之后继续开放，双方任何一方在没有条约规定的情况下可做任何规定；但在那里的英属沿海各港，如同在西印度群岛一样，美国船只以及在这两个殖民地地区竞争的美国产品被排除在外。在这些重要地带，这个旧时的殖民地垄断在那个制度在殖民地世界的其它地方已经开始崩溃之后，还在独特的英国航行法的护卫之下维持下去。它为帝国带来据认为如下的利益：（1）为英国船只保留运输业务，（a）在英国诸岛和殖民地之间，（b）在各个殖民地之间（例如，从新斯科夏到英属西印度群岛），（c）在殖民地和外国之间（例如，在美国和英属西印度群岛或新斯科夏或其他沿海省份之间）；（2）为英属大陆殖民地同英属西印度群岛销售食品和木材适当保留市场；（3）在英美之间的贸易中，通过同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③的发展帮助英国的航运。因此美国同英属北美和英属加勒比

① 当时美国的海军力量比起欧洲海军强国来相对薄弱，因此它提倡的对小海军国家有利的一些原则。参阅本书第二十一章关于中立权利的“小海军”概念。——译者

② 参阅本章末的统计表。

③ 英美之间的贸易通常是轻的工业品船货往西走，笨重的原料物资往东走。美国的船只经常是空船回国。由于英国船还装载着销给西印度群岛的附加的船货，它们可以给沿途的美国停泊港口载运货物，因而可以压低美国的货船运费；或者，假如从西

海殖民地之间的沿海贸易就被排除在 1815 年商约及 1818 年和 1827 年续约的任何规定之外。

同英国订的 1815 年商约^①是我们曾经谈到的 1815 年法案所 295 制定的美国政策的第一个结果。它扫除了除英国殖民地外的两国船只进口货的差别税率。由美国船运进口的货物同由英国船运进美国的货物按同一税率纳税,反过来说,对英国各岛的进口货也是一样,两国的船只交纳相同的吨位税。但这个条约不适用于英属北美或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英国的政治家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把皇家航海体系的利益扩及美国,除非这样做对英国或其殖民地也有利。美国的历史学家今天也看不出任何这样的理由来,特别是考虑到外国船只被排斥在美国及其海外领土和属地之间的交通以外这个事实的时候。

无论期望以英帝国之内的商业调节这个较大的目的和促进英国航运来为把美国船只排斥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之外辩解显得怎样自然,无论把竞争的美国货物排斥在英属加勒比海各岛之外,即使这些货物是由英国船运进来的,对加拿大的产业主是多么有利,但还是反对这种排斥的强有力的动机。这些动机来自英属岛屿种植园。它们的产业主绝对依赖进口粮食来养活他们的奴隶或自由工人,以及进口木材来把他们的出口货装箱装桶;英属大陆沿海各省虽然能够供给足够的咸鱼,却不能供应足够的必不可少的其它物品和木材来把价格维持在使得种植园的经营有利可图的范围之内。导致英国种植甘蔗的岛屿的衰落以及其产业主阶级的因而崩溃^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许多年来排斥美国船只。这些产业主和印度群岛出发的时候船货没有装满的话,它们可以就近到美国的一个南部口岸按较低的运费收费来装满船货。

① 参阅本书第 171 页。

② L.J. 拉加兹 (Lowel Joseph Ragatz):《英属加勒比海产业主阶级的崩溃, 1763—1833 年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1763—1833)》(纽约, 1928 年)。

他们的英国分支机构吵嚷着要求直接放进载运廉价食品和木材的美国船只。另一方面，英属北美的木材业和渔业则要求继续进行限制。这个帝国之内的利益分歧，特别是西印度群岛产业主们依赖美国粮食的困难情况，最后招致某些部分的殖民地航行垄断的崩溃。

296 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任国务卿及后来任总统的从1817年到1829年的时期中，处理“西印度问题”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自然了解西印度群岛是依赖着美国的产品及其由美国船以低廉运费运进口的。他决意充分利用这个武器来促进同英国殖民地的相互平等的贸易，而最后做得过了头。在这里他犯了他的经历中的一个大的外交上的错误。在亚当斯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连串的议案（1817年，1818年，1820年），用差别对待来对同美国从事殖民地贸易的英国船只进行报复。在1820年这种立法竟至拒绝从英属殖民地开来的英国船进入新世界和禁止进口它们的货物除非它们直接来自出产这些货物的殖民地（最后一项用来阻止英国船通过加拿大间接进口）。这给英属岛的产业主和英国通过加拿大的运输业一个厉害的打击。为了强制英国开放殖民地港口给美国船而切断了整个西印度群岛市场，这种做法也严重损害了美国南方的农业。而美国的航运业是集中在北部和东部沿海各州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削弱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地位的地域方面的利益分歧，正如在英帝国内部曾经出现过这种分歧，结果使英国停止实行帝国的政策。事情变成了一场英国议会会不会在美国国会向美国的农业利益代表者的抗议让步以前向岛上的种植园主的控诉屈服的竞赛。英议会首先屈服了。通过1822年的法令，它开放了规定的一些英属殖民地港口给美国船，按同英国船的同样条件带进限定种数的美国产品（具体列举出来以便使其同英属北美产品竞争的可能性达到最小的程度），并允许指定的岛屿产品由

美国船装运直接出口到美国。这个法令没有规定美国必须在美国港口给英国船同样的特权。同时它不言而喻地对这些地域的进口货保留了征收特惠税率的自由假如是由英国船从英属北美运去的话。门罗总统根据 1820 年国会法案所赋予的临时变通的权力，在下届国会之前，对直接由殖民地开来的英国船开放了美国港口，但并不豁免这些船缴纳向所有开进美国而未经条约豁免的外国船所征收的外国船差别吨位税和关税(高 10%)。最后一项使这种纠纷继续存在下去。

297

外交谈判没有把这些差别待遇消除掉。亚当斯争论说英国对从英属北美港口完全由英国船运到这些岛屿的英国产品(其中有些还是来自美国的)所征收的特惠税率超过了在美国对外国船征收的关税和吨位税所给与美国船的利益。他拒不承认英国有完全在自己的殖民地之间的航行中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的无可置辩的权利。在亚当斯的建议下，国会通过了 1823 年法案，允许在 1822 年英国议会法令授权下从事限定的殖民地贸易的英国船进入美国港口，但是只在英国废除对从美国以外的“其它地方”运进英国殖民地的相同货物所征收的特惠税率，那就是指的对由英国船从英属北美港口向英属西印度群岛运进的货物所征收的特惠税率的情况下才取消美国对外国船的征税。一个议会法令在 1825 年又做了一些有条件的让步。它大大扩充了由英国船或由美国船按同等条件同美国所进行的迄至当时受限制的殖民地贸易的物品种类，但是制定了对英国货物和英国船的特惠税率制度。最重要的是，它规定只是在美国对从事相同贸易的英国船取消征收外国船税的情况下才继续许可美国船进入殖民地。

国会拒绝取消外国船税。解决这个问题的外交谈判破裂了。亚当斯总统发觉自己的要求过分的时候已经过迟了。直到 1828 年，他的国务卿亨利·克莱才授权当时驻伦敦公使艾伯特·加勒

廷提出相互完全取消所有对外国征收的和差别的关税，不再坚持取消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的特惠关税。在加勒廷提出这个建议之前，英国政府再度对美国船封闭了它的殖民地。英国这样做的时候比以前越发心安理得，因为在它的殖民地贸易即使是在一个有限制的基础上对美国船开放的那一段时期中，那些船很快把西印度群岛和美国之间的十分之九的运输业务抢过去了。因此，由于英国的或是美国的立法，美国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包括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之间的直接海上贸易这时完全封闭了。用一个新闻工作者和教授们非常喜爱的字眼来说，西印度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完全的绝境。

重新得到的西印度的商业的丧失成为 1828 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问题之一。它至少促成了亚当斯的失败。安得鲁·杰克逊的当选使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杰克逊提出在 1825 年英国议会法令的基础上恢复贸易，他说美国人民已经抛弃了亚当斯的政策。英国政府拒绝采取行动除非美国通过正式立法来证实杰克逊的建议。这位总统于是在 1830 年取得了国会的一个法案，授权他在两届国会之间的期间开放美国港口给由殖民地来的英国船只，假如他得到满意的证据表明英国能按照 1825 年议会法令的条件开放它的殖民地港口给美国船只。英国不久就送来了这个保证。在当年年底同英属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其它殖民地的贸易在对英国船和美国船的完全互惠，不对任何一国的船只或船货征收差别关税的条件下完全开放了^①。

杰克逊的“1830 年的互惠”，实质上是纠纷期间双方极端立场的一个妥协，表明已经在 1822 年崩溃了的英国传统的殖民垄断制

^① F. 李·本斯(Lee Bensus)明晰地叙述了《美国争取英属西印度运输业的斗争(The American Struggle for the British West India Carrying-trade)》(印地安纳大学,布卢明顿,1923 年 3 月)(印地安纳大学丛书第十卷)的复杂性质。

度的结束。不久之后英国就变为一个实质上自由贸易的国家，在一个长时期内把英国各岛和世界各地的英国殖民地港口按同英国船平等的条件对外国船只开放。这是英国政治家才能的巨大成就之一。它非常有助于把日益扩张的殖民地和英联邦保留在帝国之内的忠诚结合之中。在这个互惠基础上同美国解决了殖民贸易之后，议会立刻通过对与殖民地贸易的英国货物也给予特惠关税待遇的立法。这个特惠是帝国内部特惠制度的先例，这种特惠制度乃是当今英帝国的由来已久的特点，而且对它的结构说来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济粘合剂。美国同英国随后所订的商约，如同大多数国家所订的一样，以后一直是在不妨害每一方调节其领地之间的商业和航运的权利的情况下，双方按照相互的原则给与船只和货物以同本国船只和货物同样的待遇。 299

西印度问题解决之后仍然留下英美商业关系上的另一个问题：同北美各省份的陆路贸易。这种陆路贸易，以及通过内河航运的贸易，已经在没有差别关税的情况下在边界的两边由双方国内立法加以规定，虽然条约安排已经满期^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1830年的西印度互惠和美国铁路系统的充分发展之间的阶段日益增加。上加拿大正在与湖南边的邻居发展一种比穿过海洋与英国同胞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加拿大内地由于英国对它的自治的束缚和限制而生气，从而成为一个怀有不满情绪的地区，这种不满情绪导致很容易地被镇压下去的1837年十二月的武装暴乱。对加拿大人争取独立的同情在美国是十分普遍的，美国人认为有一种自然的趋势即这个大陆上的所有居民要与欧洲的宗主权分离开来，甚至最后一同聚集在星条旗之下。越过边境逃到纽约的反叛的领袖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北纽约和弗蒙特的较大城镇举行的群

^① D. R. 穆尔：《加拿大和美国，1815—1830年》（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15—1830）（芝加哥，1910年），第99—123页。

众集会上为开始招募志愿军的叛乱者募捐金钱和物资。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海军岛和在加罗林事件上的迅速行动而不是由于联邦当局沿边界线上的果敢机警,这个运动才被消除;但必须公平地注意到国会采取了与对不久前得克萨斯边界事件上的不同的态度,很快通过了堵塞 1818 年中立法法的漏洞的修正法案,政府也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在北部边界上再发生这种事态。

四十年代加拿大出现了一种要合并于美国的普遍的情绪;对这种主张的支持来自保守分子,他们惧怕法属加拿大人和讲英语的人口中的自由主义分子联合在一起的政治统治;来自反对使加拿大屈服于(直到 1847 年)英国航行法的那些人;也来自于从 1846 年英国开始实行自由贸易以来对加拿大货物的特惠税率的消失而受到严重损害的商业人士。“加拿大对英国新政策的抗议未发生效力,许多观察家认为同母国分离而合并于其关税壁垒为加拿大繁荣的最大障碍之一的美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①直到 1850 年,甚至负责的英国政治家都对加拿大独立的可能性表示出惊人的讨好态度,而加拿大的独立普遍被认为只是合并于美国的第一步。自不必说,当时公众舆论对待这样的趋势是处之泰然的。在 1845 年的时候,“明显的命运”这个名词乃是那种要使整个大陆美国化的势不可当的民众热情的具体化。在墨西哥的问题上,这种民族心理支持了战争,但“明显的命运”实质上是一个和平的词——这就是这个词的奇特之点。它的预言者和宣扬者并没有宣传备战。他们依赖的是和平渗透的矛头和政治原则的推动力。

加拿大的这种紧张局势产生了想同美国交涉通过某种互惠协议来废除关税壁垒的要求。赞成保持与英国的关系的大多数加拿大领袖们认为互惠关税是合并的一个有益代替品并认为这样一

^① H. L. 金利赛德(Keenleyside):《加拿大和美国(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29年),第 122 页。

种安排将能够繁荣加拿大的出口贸易。这个要求正投合英国政府的心意,英国政府已经被赋与制定条约的权力,并且觉察到加拿大的经济衰退对于帝国的政治上的意义。有远见的加拿大总督埃尔金勋爵在 1849 年竭力劝告英国政府说自由航行和同美国贸易的低关税互惠政策是阻止加拿大的动乱或与美国合并所必不可少的。美国并无意维持高关税来诱使加拿大把合并作为避免高关税的手段。北部各州有一种意见赞成双方制造或出产的货物穿过边界相互自由贸易,相信这样将会扩大贸易并把份额日益增加的加拿大原料从大淡水湖通过美国的河流、运河和铁路转从美国的港口出口。但地域性的对抗竞争阻止了国会通过适应这样互惠原则的立法,虽然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加拿大的立法机关有着为这样做尽力的热忱。

英国政府现在谋求通过一项条约来达到同样的结果。为此进行了五年的交涉。美国拒绝考虑任何不把英属沿海省份也包括在 301 内的互惠安排,并希望英国超过 1818 年的条约所限定的沿岸范围开放那些省份的所有领水给美国渔民并允许在圣劳伦斯河自由航行。这些要求是英国可以接受的,但须以允许英国的鱼免税运进美国为条件。

这些对等的条件的达成为 1854 年 6 月 4 日的条约铺平了道路。最后的交涉是在华盛顿由国务卿马西和加拿大总督埃尔金勋爵进行的。历史家不能忽略这一事实,那就是埃尔金的过多的流动的款待大大帮助了这个条约在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也不能无视被派到沿海省份“促进”他们赞同渔业条款的一个美国代理人的大量的更不应该的化费^①。真正决定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的是南部各州的参议员们希望做些事情来帮助阻止无奴隶制的

^① C. C. 谭西尔(Tansil):《1854 年的加拿大互惠条约 (The Canadian Reciprocity Treaty of 1854)》(巴尔的摩, 1922 年)。

加拿大的并入美国^①，这种合并如果实现，就会破坏他们的区域的政治优势。得到批准的这个条约规定了把 1818 年条约的捕鱼“特权”扩展到全部海岸并给与英国臣民到南至北纬 36 度的美国大西洋海岸领水捕鱼的互惠特权。英国承认了美国公民可以按英国船只和臣民的同等条件在圣劳伦斯河自由航行；美国允许英国臣民和船只在密执安湖自由航行。在条约上开列了双方免交进口税的制造品或出产品的清单，但不包括工业产品。

1854 年的互惠条约是美国历史中这一类列举产品的自由贸易的第一个协议，也是美国至今所谈判的很少数这类条约之一^②。它在十年有效期限内起了增加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的作用；在商业特权方面它给英国臣民差不多同美国人一样的全部利益，同时
302 还让他们自由制定关税来抵制美国工业品的流入^③，它以这样的办法消除了加拿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满。这个条约补充了西印度“1830 年互惠”，并且同英美 1815 年商业协定（在 1818 年续约并在 1827 年无限期延长）结合起来把英美商业——美国全部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置于一个最公平的基础上。人们希望同加拿大的互惠可以成为同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北美大陆各国，作出其它有限的自由贸易安排的典范。在 1859 年事实上已经同墨西哥交涉了一个互惠条约，但由于它具有一定的扩张主义性质和对布坎南的外交政策的地方性的反对因而在参议院被搁置起来。南北战争之后保护关税政策紧紧地控制着美国，如像控制着世界的其余地方一样。马西-埃尔金条约没有续约，这对加拿大和

① C. D. 阿林 (Allin) 和 G. M. 琼斯 (Jones): 《合并, 特惠贸易和互惠 (Annexation, Preferential Trade and Reciprocity)》(多伦多, 1912 年)。

② 关于互惠条约的以后的尝试, 参阅本书第三十八章。

③ 金利赛德的前述著作, 第 116—137 页, 第 294—300 页有教益地分析了马西-埃尔金条约的经济和政治的效果。参阅 J. L. 拉弗林 (Laurence Laughlin) 和 H. P. 韦利斯 (Parker Willis): 《互惠 (Reciprocity)》(纽约, 1903 年), 第 30—69 页。

美国是很不利的^①。不幸，在 1911 年塔夫脱总统当政时期，通过双方立法来达成相似的安排的努力主要由于政治原因而失败了：西奥多·罗斯福积极攻击塔夫脱并谋求再度当总统，厚颜地放出老的合并妖怪的幽魂来打败他的对手；受惊吓的加拿大议会拒绝配合美国可能采取的减低关税行动。1866 年之后，加拿大和英国在北美的其它省份同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其它国家处于平等地位；1897 年以后；一种超过同美国相同贸易待遇的英国同加拿大贸易的特惠制度出现了。

美国船进入新世界的其它欧洲殖民地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 1852 年^②尼德兰坚持拒绝美国船开进它的美洲殖民地，在那一年订了一个条约，允许美国船和美国货按照悬挂荷兰旗的船只的同样待遇开入上述地带——从母国到荷兰殖民地这一段封闭的运输当然除外。1816 年同瑞典—挪威订立的条约允许美国船同瑞典—挪威船平等地进入瑞典—挪威所有属地的港口；在 1827 年甚至扩展到允许美国船同瑞典—挪威船平等地参加圣巴托洛默夫岛这个小小的西印度殖民地和瑞典—挪威本土之间的运输业。这是帝制国家垄断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航运业的通常原则的一个例外；1898 年当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它也按照一般的做法行事。法国（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或俄国（阿拉斯加）都不会签订允许美国船进入它们殖民地的条约——更不必说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直接航行了——但 1866 年以后法国的航行法允许美国船到法国殖民地去。当然，阿拉斯加在 1867 年被美国以现金购买之后立刻就被置于美国沿海岸航运的垄断之下。

① 在十年有效期满之后，它自动地又继续了两年直到美国正式废除了它。

② 1818 年尼德兰和美国立法规定了两国人民和船只在美国和欧洲的尼德兰之间的贸易上的平等互惠待遇，但不久就为荷兰的 1822 年法律所违背；荷兰 1822 年法律规定凡由荷兰船进口的货物可以退回百分之十的关税。韦斯特曼的前述的《尼德兰和美国》详细讨论了荷兰和美国的互惠问题。

商业关系上的另一个外交问题是优待本国船只的差别税率问题。各国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向本国船征收低于外国船的吨位税；一种是对由本国船载运进口或出口的货物征收低于由外国船载运的货物的关税；以及对本国船在抵制那些从别的国家而不是从其本国从事运输业的外国船只方面给予各种优待。按照根特和约的规定，美国通过一系列权能付与法案，授权总统采取各种办法反对国际间这种差别待遇的做法。或者通过互惠立法，或者通过实际条约，在只有少数例外的直接贸易中以及大量的间接贸易中，这些差别待遇到了1850年都消失了^①。很难说，在取消差别关税之后美国商业和航运的增长究竟是因为这些差别税的取消呢还是因为美国的领土和资源的日益扩张以及人口的日益增长。

504 美国在1815—1861年这一段时期所缔结的条约一般按照以前条约的模式，依据有条件的最惠国原则。例如，在1822年和1831年同法国订的两个条约包含双方互相交换的特别税率；这些条约的条款是根据特别交易的条件制定的，而不根据那个事实引伸至最惠国的原则。同远东的国家（暹罗，中国，日本）和鄂图曼帝国所订的条约中加入了专门的税率表。到了1860年，美国的正规的外交接触和条约关系已经扩展到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②。

在我们考察的1816—1860年这一段时期，是美国对外商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③。这一时期是共和国的少年时代，此时，对

^① L. W. 马克斯威尔(Maxwell):《差别税率和美国的商船队(Discriminating Duties and the American Merchant Marine)》(纽约, 1926)。

^② 从1848到1868年，美国有一个公使馆驻在梵蒂冈。在教皇失去俗世中的权力之后撤回。L. F. 斯托克(Stock)教授曾出版过《美国驻罗马教皇国的公使：指示和文件，1848—1868年(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天主教大学出版社, 1933年)，书中有一篇有教益的序言。

^③ E. R. 约翰逊(Johnson)等:《美国国内和国外商业史(Histor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卡内基学会, 1915年)，第二卷，第5—53页；J. H. 弗雷德里克(John H. Frederick):《美国商业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ommerce)》(纽约, 1932年)。

外贸易主要还是一个从事农业的民族的外贸易。在和平以后的前三年中,在所有战时禁令都废除以后,对外贸易膨胀到反常的比例,以后从1818年开始紧跟着一次急剧的下降和衰退。在欧洲战争时期对美国中立国运输业的这样一个有利可图的部分——西印度群岛物资的再出口业务差不多完全消失了。直到1835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额才超过拿破仑战争当中的1807年,也就是杰佛逊封港的前一年,所达到的高峰。杰克逊的1837年经济恐慌使对外贸易额再次降到高峰之下,直到1846年。那一年是美国的低关税政策和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的一年。从那时起直到1861年,在1854年的马西—埃尔金条约的帮助下,对外贸易才迅速扩展起来。从美国的贸易和航运自1790年(国家统计开始的一年)到1860年这一时期的上升情况中可以看出一些事实来:(1)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营运输业的国家,直到美国自己卷入了冲突之中,先受自己封港的封锁继受英国海军的封锁。(2)1815到1836年是国际实施差别税率和残余的欧洲殖民垄断制度的束缚加重商业的负担的时期——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些差别待遇被条约或立法取消之后,对外商业有显著的增加。(3)虽然贸易额的最大部分继续是同不列颠各岛和英帝国、法国、尼德兰和北欧的国家所进行的,通过把正式外交关系扩展到其余欧洲国家、南美洲和远东而开辟了正规的商业,所有这些都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4)美国人口的增长,领土的扩张,国内交通的改进,以及更多地利用它的不寻常的天然资源——特别是南部临墨西哥湾的各州的底层是黑土的产棉地,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丰产的小麦和牧场,以及1850年以后的金矿和新获得的太平洋沿岸的农业——自然地反映出一项目日益增长的对外商业。在这一时期之初,除了拿破仑战争中的反常的几年而外,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对外贸易中输入多于输出,并把他们的海外贸易几乎完全限制

在西欧。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他们的输出才超过输入——这是这个国家即将来临的工业化的信号——而他们的贸易遍布七个海洋。

美国的商船队继续不断增长。有利于本国的差别税率的取消（根据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协定）并没有使它衰落下来；反而使它更兴盛了：总吨数由二十五万增至六百万以上，由美国船载运的贸易额的比例经过上下波动，由 1789 年的 23.6% 上升至 1860 年的 71%。在取消了差别税率之后继续保持这个占优势的比例，必须大部分归因于那个时代美国人民的先天的航海天才以及在那些年代里吸引水手们改行的与航海业竞争的行业的吸引力较小。

差别待遇，如同自由贸易一样，究竟帮助还是损害一个国家的运输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很可以辩论的题目，但是，当一个国家的出口多于进口的时候，在两个同等熟悉世故的政府之间的执行差别对待政策的斗争中，多半是进口国而不是出口国获得利益。

对美国的 1790—1860 年之间的对外贸易的分析^①表明那是一个农业国的对外贸易。在南北战争的前十年工业品只稍稍超过出口额的 10%，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是这种情况，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这个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巨大经济革命的前夕。在这一阶段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对外贸易差不多二分之一是同英帝国进行的；大约四分之一是同欧洲大陆进行的，大约 15% 是同拉丁美洲进行的。

附 注

在著者指导之下制成的下面表格对于美国在 1780—1860 年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概念：

美国^(*)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商品，黄金和白银方面的贸易：

^① 关于 1860—1936 年之间的商业和外交，参阅本书第三十八章。

1789—1860年^(b)

	进口 ^(c)	%	出口	%	进出口总额 ^(d)	%
世界:	8,641,876,196		7,925,992,146		16,567,868,342	
联合王国:	3,229,926,281	37.37	3,296,517,436	41.59	6,526,443,717	39.39
除法国以外的						
欧洲大陆:	783,995,778	9.07	1,323,293,135	16.69	2,107,288,913	12.72
法国:	932,105,822	10.78	955,110,566	12.05	1,887,216,388	11.39
拉丁美洲:	1,422,294,470	16.45	1,109,508,997	13.99	2,531,803,467	15.28
中国 ^(e) :	336,279,735	3.89	124,087,792	1.56	460,367,527	2.77
日本 ^(f) :	78,734	.0009	142,774	.0018	221,508	.0013
非洲:	39,267,744	.45	58,427,475	.74	97,695,219	.58
其它地区:	1,897,927,632 ^(g)	21.69	1,058,903,971	13.35	2,956,831,603 ^(s)	17.84
大英帝国						
(1790—1860年):	3,732,256,869	43.18	4,051,193,795	51.11	7,783,450,664	46.97
古巴(1821—						
1860年) ^(h) :	522,283,855	8.30	265,241,842	4.34	787,525,697	6.35
墨西哥(1825						
—1860年) ^(h) :	142,659,293	2.38	124,555,844	2.14	267,215,137	2.26
工业品出口						
的百分比 ⁽ⁱ⁾						
(1803—1860年)			782,815,445	10.77		

1851—1860年^(b)

	进口	%	出口	%	进出口总额	%
世界:	2,922,257,539		2,983,986,417		5,906,243,956	
联合王国:	1,180,864,020	40.41	1,533,056,182	51.37	2,713,920,202	45.95
除法国以外的						
欧洲大陆:	288,741,524	9.88	366,186,742	12.27	654,928,266	11.08
法国:	375,074,391	12.83	363,838,457	12.19	738,912,848	12.51
除古巴和墨西哥						
以外的拉丁美洲:	356,998,118	12.21	181,449,847	6.08	538,447,965	9.11
古巴:	254,224,432	8.69	97,702,935	3.27	351,927,367	5.95
墨西哥:	39,275,839	1.34	32,463,715	1.09	71,739,554	1.21
加拿大:	118,445,871	4.05	151,938,466	5.07	270,384,337	4.57
中国(c):	103,527,731	3.54	40,687,008	1.36	144,214,739	2.44
日本(d)	78,734	.0026	142,774	.0047	221,508	.0037
非洲:	21,519,547	.73	23,310,610	.78	44,830,157	.76
其它地区:	183,507,332	6.27	193,209,681	6.47	376,717,013	6.37
大英帝国:	1,430,222,705	48.94	1,858,365,508	62.27	3,288,588,213	55.68
工业品出口的						
百分比:(i)			386,757,001	12.97		

1860年⁽¹⁾

	进口	%	出口	%	进出口总额	%
世界:	362,166,254		400,122,296		762,288,550	
联合王国:	138,596,484	38.26	171,494,531	42.86	310,091,015	40.67
除法国以外的						
欧洲大陆:	34,991,522	9.66	45,537,447	11.38	80,528,969	10.56
法国:	43,219,549	11.93	62,206,278	15.54	105,425,827	13.83
除古巴和墨西哥						
以外的拉丁美洲:	43,573,912	12.03	21,837,935	5.45	65,411,847	8.58
古巴:	34,032,276	9.39	12,382,869	3.09	46,415,145	6.09
墨西哥:	6,935,872	1.91	5,354,073	1.33	12,289,945	1.61
加拿大:	18,861,673	5.21	14,083,114	3.52	32,944,787	4.32
中国: ^(e)	13,566,587	3.74	8,906,118	2.22	22,472,705	2.94
日本:	55,091	.01	138,774	.03	193,865	.02
非洲:	3,746,693	1.03	3,186,618	.79	6,933,311	.91
其它地区:	24,586,595	6.78	54,994,539	13.74	79,581,134	10.44
大英帝国:	177,913,585	49.12	238,887,117	59.70	416,800,702	57.37
工业品出口的						
百分比 ⁽¹⁾ :			91,829,275	22.95		

(a) 本表系根据《美国国家文件, 商业和航运(American State Papers,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美国统计局的正式报告, 和《美国的对外商业和航运(The Foreign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U. S.)》编制, 供着者参考的。

(b) 会计年度。

(c) 从早期进口记录上计算的。这些记录在世界范围总数上是完全的, 但在 1821 年以前在个别国家上是不完全的。因此在本栏内的数字和百分比按比例减少了。

(d) 由于早几年的进口数字不完全, 这些数字比实际上的数字较小。

(e) 包括香港。

(f) 同日本的贸易实际上开始于 1854 年以后。

(g) 这些数字还包括上面的不足的进口数字在内(参阅“c”)。

(h) 百分比系根据所指年代计算的。

(i) 包括制造的食品。百分比数字系根据国内制造的与外国制造的出口货总数计算。

第十八章 辉格党的短期当政

309

(1849—1853年)

在1848年以前，美国的扩张外交控制了政治。在1848年以后，国内政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支配外交。辉格党的胜利和波尔克总统的下台是前四年的巨大扩张主义成就的反动。在辉格党（它的政治家克莱和韦伯斯特反对侵略性的扩张）统治之下，国家致力于在新获得的领地内调整奴隶制的问题，同时采取谨慎的外交政策——1850年同英国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可以作为例证。在丹尼尔·韦伯斯特再次担任国务卿，以及在他死后由他的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继任国务卿的时候，辉格党短期当政的人们试图把奴隶制问题在国际事务中消除，并在国内激励民族自豪感来使南方和北方的人民忘记谈论分裂，而且坚定地站在1850年政治“妥协方案”的立场上。他们没有成功。两个党在1852年都赞成“妥协方案”的定局，他们的公布的政纲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但民主党人能够无保留地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而一些辉格党的领导人则犹豫踌躇或沉默。因此民主党人只背弃了他们曾经保证支持的“妥协方案”而重掌政权。这是北方总统们握住马镫让南方人登上马鞍的年代。为了占据白宫，皮尔斯和布坎南（1853—1857年和1857—1861年）都不得不寻求各地区间的势力的平衡；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使他们的党同南方政客们继续向对奴隶劳工有吸引力的地区扩张的要求妥协，作为增加和巩固他们在国家政治上的势力的手段，因此就保护了已经建立了的奴隶制度。虽然“明显的命运”继续鼓舞着一些北方的扩张主义

者，在五十年代里有一种使扩张越来越变为一种地方性的要求的稳定的倾向。这反过来反对北方，达到有效地使新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无法实行。

310 当美国的扩张正在胜利地往西向太平洋沿岸迈进的时候，革命的自由主义正在以代议制政府的政治理想席卷欧洲。当美国人民从猛烈的领土扩张中回过来看一看欧洲的有趣事物，他们会觉得新自由主义乃是自己国家建国所依据的理想和原则的一个胜利（假如不顾奴隶制度的景象的话）。他们热切而同情地关心德国和匈牙利的正在进行着斗争的共和运动，情况甚至同在前一世纪末叶法国革命震撼欧洲的时候他们成立了民主俱乐部和撞击教堂的钟一样。但他们根本上在1848—1850年并不比在1793年更急于抛弃自己的反对卷入欧洲冲突中去的意见和本能。

鼓舞自己国家的民族精神来压倒地区情绪并唤起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的新意识的一个可靠的机会在韦伯斯特的短促的第二任国务卿的初期呈现在他的面前。给许尔泽曼的有名的照会，说明在一个民主政府里负责的政治领袖们，即使象韦伯斯特这样一位政治家，也会情不自禁地去利用友好国家的国内困难向人民讨好和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奥地利政府通过其临时代办许尔泽曼爵士抱怨美国派了一个密使到反叛的匈牙利省去“迫不及待地”观察“奥地利王国的垮台”，等候“一个有利的时机来承认匈牙利的独立”。这是十分确实的，奥地利政府拿到了写给这个使者A. 达德利·曼的指示，这大概是从美国驻维也纳领事，一个名为施瓦茨的奥地利臣民^①那里

^① 这是M. C. 柯蒂(Merle C. Curti)的推测，他的著作：《奥地利和美国，1848—1852年(Austr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48—1852)》，载在《史密斯学院历史研究》，第十一卷，第三期(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1926年4月)。这是表明任用外国人作美国领事是不相宜的一个好的例证。这种任用自从1855年以后就被法律禁止了。

拿到的。这个使命落了空，因为在曼到达匈牙利之前，匈牙利的叛乱由于俄国军队参加镇压已经平息了。许尔泽曼私下向国务卿克莱顿抱怨这件事情，但直到泰勒总统在他的1849年12月的年度咨文里公开表示对匈牙利事件的同情并发表了(1850年3月28日)曼的使命的有关文件包括给他的指示，才正式提出抗议。许尔泽曼问韦伯斯特假如奥地利派一个这样的使者在1832年到南卡罗来纳的话，美国会怎么办？但不可能因此事而发生对奥地利的战争。韦伯斯特决定用使美国鹰尖声叫喊的方法来取得民众的支持。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假如你说我给许尔泽曼的口气傲慢粗野，我愿意接受这个温和的责难。”“我的辩解有二：(1)我觉得最好直言，告诉欧洲人民我们是谁，是干什么的，唤醒他们，使其对这个国家的无与伦比的成长有一个正当的意识。(2)我想写一个谈到我们民族的自豪感的文件，使那些谈分裂的人们感到羞怯和显得愚蠢。”

在答复许尔泽曼的抱怨时，韦伯斯特不但为曼的使命辩护，并且也乘机把作为一个自由政府的成功例证的美国的自豪的立场加以引伸：“诚然，另一个大陆上流行有利于共和自由的情感，这是美洲影响到欧洲的结果；而这个影响的来源和中心无疑地过去曾经是而现在仍然是在美国。”欧洲君主们有时否认美国政府来源的合法性，但这丝毫奈何不了美国政府；“与美国的富庶肥沃的领土比较起来哈布斯堡王室的属地只不过是地球表面上的一小片罢了”。至于说到威胁报复的暗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十分愿意试试看并听天由命”。^①这个很快发表的照会夸耀了两党中的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甚至一向反对波尔克的扩张政策的韦伯斯特这时都用鲜明的比喻来谈论美国的广阔的范围了。奥地利政府当时对那个照

^① 韦伯斯特致许尔泽曼的1850年12月21日信件。在达尼韦的《美国国务卿》，第六卷，第85—94页中合宜地概述了这件事。

会的感觉犹如美国今天假如接到苏联同样的一个照会一样。它虽然非常愤怒-但却无可奈何。

受到日益增多的群众赞成他给许尔泽曼的照会的鼓励，同时想到自己可能被提名为 1852 年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韦伯斯特再一次以损害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来迎合民众，谋取政治资本。著名的匈牙利爱国者科苏特当时流亡在土耳其。菲尔莫尔总统 (1851 年 3 月 3 日) 在一个国会联合决议上签了字，这个决议是在同新的民族意气高昂相调和的气氛中通过的：“为了救援匈牙利的流亡者路易斯·科苏特及其伙伴们。”一只美国军舰从地中海的巡弋中被派遣去带他们到美国去，但科苏特却相当冷淡地离开土耳其前往直布罗陀去访问英国。当他最后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国会设宴招待。韦伯斯特是主要发言人。这位国务卿后来向奥地利解释说他只是以平民的身份讲话的——他无法以更加普通的方式来说话了——他作了一篇赞扬匈牙利自由的政治演说：《匈牙利的独立，匈牙利的自治，匈牙利人掌握匈牙利的命运》。美国群众又一次对他喝彩，但由于北方辉格党人反对他在 1850 年为了联合的利益坚决主张在奴隶制问题上采取妥协的立场，他未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许尔泽曼在这个演讲之后，从首都撤走了；以避免同这个讨厌的拒绝收回自己的话的国务卿接触。在韦伯斯特死了之后 (1852 年 10 月 24 日)，奥地利政府宣布说，所有关于给许尔泽曼的照会或宴会演说的报怨原因“都已经埋葬在这个伟大政治家的坟墓里了”^①。

除了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在墨西哥的统治权而外，在下一世纪的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只有另一件事影响到哈布斯堡专制帝国和西方这个唯一的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就是 1853 年马丁·科兹塔的案件，他是匈牙利的另一个逃亡者，来到美国按照要求做

^① 引自柯蒂的前述著作。

了愿做一个美国公民而放弃对任何帝国效忠的宣誓。二十三个月以后他回到土耳其。在土麦拿的时候，他被一群不法之徒诱拐到一艘奥地利双桅战舰上囚禁起来。一艘美国单桅战舰凑巧停泊在该港口，舰上的一个美国海军军官调查到科兹塔的困境，在炮口下强迫奥地利军舰把他交出来。他被安置在法国总领事馆，等候做如何处理的决定。奥地利政府向美国要求交出科兹塔，处罚美国军官戴维·A·英格拉哈姆舰长和赔偿。国务卿马西支持这个海军军官，拒绝交出科兹塔。马西成功地认为这个人根据土耳其的对待这种外国人的办法是应当受到他的最初的公民证书的保护的。马西机敏地避开一个归化手续还不完备的人可以得到不容反驳的国家的保护这个可疑的立场。这个成功的外交遁辞，如同韦伯斯特的讥刺，得到国内民众的称赞而未严重妨害国际关系。³¹³

对于美国来说，古巴始终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岛屿，特别自从获得了佛罗里达之后。不管哪一个党当权，这个政府一贯地维持它以前曾经对佛罗里达采取的态度，那就是：美国满足于看到古巴仍旧是西班牙的属地，但它反对（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把古巴交给任何别的欧洲国家，或者甚至是任何一个美洲国家^①。原因是西班牙在新世界以及在欧洲的地位已经衰弱了，而且将一年比一年更加衰弱。任何别的国家占据了 this 岛屿之后就会变得更为强大，因而会成为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邻居。另外是美国想自己占有古巴，假如西班牙准备放弃它的统治权给任何人的话。杰斐逊曾经指望最后占领这个岛屿，甚至整个北美大陆，认为那是新世界事物的自然规律；他是“明显的命运”的第一个提倡者，一位哲学上的使徒。当元老政治家们研究门罗总统在1823年宣布的那个主义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就想到了古巴；他们不愿意约束自己来

^① F. E. 查德威克(Chadwick): 《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 外交 (Th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Diplomacy)》(纽约, 1909年), 第178—223页。

永远反对占有它；他们不愿意承认西班牙以外任何欧洲国家在这个岛屿上的利益。在波尔克以前，美国没有做占有古巴的任何努力，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在墨西哥战争结束的时候，波尔克提出从西班牙手里收买这个岛屿。他怕英国或法国可能抢走它做为西班牙巨大债务的担保品。利用古巴的紊乱和西班牙的政治混乱，他准备出一亿元来收买这颗安的列斯群岛^①的珍珠。假如西班牙愿意割舍它在美洲的这个过去的巨大统治地区的主要的遗物的话，美国的舆论无疑会在1848年支持这个收买的——当时奴隶制的全部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个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特别对巴拿马地峡的关系来说，却是不可抗拒的。但西班牙不愿意出卖古巴，犹如美国不愿出卖长岛一样。西班牙外交大臣对美国公使说，“这是远非任何大臣所敢接受的提议；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想法是在看到把它转交给任何人之前宁愿看到这个岛沉入海里。”^②

在这方面不那么积极的辉格党的外交家们自然在波尔克碰了壁之后不再追求这件事了——他们又回到满足于西班牙的占有，反对转移古巴的统治权和拒绝在世界面前承担美国此后不过问古巴的前途的义务的传统政策上去。但南部各州主张奴隶制的扩张主义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获取古巴作为另一个实行奴隶制度的州的野心。在1850年这个岛的人口是一百二十万，其中一半是西班牙血统的白种人，四十五万是奴隶。这样的一份人口资料为成立一个奴隶制州提供一种很好的人口条件。从政治上看，事情似乎是顺利的。西班牙在这里通过它的总督的专横权力维持着统治，人民不满的情绪是普遍的。当其它大陆殖民地叛乱的时候，冒险的英国侵略者在英国于1819年制定外国征募法案之前，屡屡

^① 西印度群岛上的一连串岛屿，分为大安的列斯和小安的列斯。大安的列斯内包括古巴、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译者

^② 穆尔：《国际法汇集》，第一卷，第588页。

树立(有时是成功地)煽动反对西班牙的革命的范例。于是南方的奴隶制扩张主义分子们想到了：一个成功的革命和独立会不会是仿照得克萨斯式的最终合并的第一步？在“明显的命运”的高涨情绪在国土上传播的时候，主张奴隶制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指望得到北方扩张主义者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假如不是对于进一步扩展奴隶制的反对日益增长的话，这种支持本来还会更大一些的。在古巴白种人中开始赞成同美国合并的人也越来越多；同西班牙的虐政或从任何英国的保护者那里可以料得到的废除奴隶制比较起来，他们认为合并到美国的害处较轻。奴隶主们担心假如发生反西班牙统治的革命的话，西班牙当局可能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来解放奴隶（如以后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所做的那样）；而西班牙总督在1849年确实提出了正是这样的建议，假如局势发展到最坏就这么干。凡是记得半个世纪以前在邻岛圣多明各发生的奴隶暴动的可怕情况的人都会觉得无论如何必须避免那种令人恐怖的解放；而事实上岛上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济如此根深蒂固地建筑在奴隶制之上，以致于岛上的白种人反对任何程度或任何形式的奴隶解放。他们觉得奴隶制可能更巩固一些假如古巴同北方大奴隶制共和国合在一起的话。

古巴的爱国者转向主张合并的想法，他们是以此作为达到最 315
后独立的手段。他们相信一旦通过叛乱的尝试同西班牙分离成功之后，美国内部关于奴隶制的地域分歧将阻止把古巴纳入联邦，而这样就会使这个岛处于一种地位未定下来的独立状态。纳西索·洛佩斯属于这一类人，他是一个米兰达式的冒险的委内瑞拉人，一度曾在西班牙继而在古巴担任过高官，而他本人似乎受到爱国动机的激发^①。他成为古巴叛乱的工具和美国奴隶制扩张分子的傀

^① 在赫米尼奥·波特尔-维拉 (Herminio Portell-Vilà) 著《纳西索·洛佩斯及其时代 (Narciso López y su Época)》(哈瓦那, 1930年)的第一卷中只把洛佩斯的

偏。

在古巴的第一次叛变的尝试未能成功，洛佩斯和其他一些古巴人于1849年到纽约去。最初他谋求找一位有经验的美军军人来直接领导远征。先找到杰斐逊·戴维斯，他谢绝了，但推荐了罗伯特·E.李。经过一些考虑之后，李认为这是同他在美国军队中的职务不相容的。洛佩斯继续同南方领袖如参议员卡尔霍恩，杰斐逊·戴维斯和密西西比的富特等人商谈。其中一次是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堂的大圆屋顶之下深沉的幽暗的圆柱大厅里举行的，好象这种不足道的谈话只应当在那个阴森森的会议室里被沙石柱子的鬼祟影子掩蔽着才能进行似的。

这些古巴侵夺者的活动变得显著了。泰勒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警告所有公民不得违反1818年的中立法案参加任何这种远征，否则他们就将丧失政府的保护。联邦当局驱散了在纽约组织的计划在新奥尔良附近的朗德岛举行集会的第一次尝试。洛佩斯到南方去，那里的群众情绪对他更有利一些。政府又破坏了他在萨凡那的计划。在新奥尔良，他成功了。在密西西比州长奎特曼将军和其他南方著名人士的帮助下，他纠集了一支七百五十人的远征队；这些人大多数是墨西哥战争的老兵，他们从新奥尔良出发（1850年4月），假装去巴拿马地峡和加利福尼亚的新的采金场。他们在尤卡坦乘船赴古巴，在卡德纳斯登陆并宣布造反。当地人民拒绝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逃回到基韦斯特，在那里这些远征的兵士被允许解散，但他们的船则被没收^①。洛佩斯和其他十五

经历和合并运动叙述到1849年。R.G.考德威尔(R.G.Caldwell)著《洛佩斯向古巴的远征，1848—1851年(The Lopez Expeditions to Cuba, 1848—1851)》(普林斯顿敦大学出版社，1915年)，倾向于把海盗们当作英雄看待。他认为1851年的远征是使1850年的妥协失败的第一步。

^① 西班牙海军同时在墨西哥领海的康托岛(Contoy)击溃了其余的远征队。美国政府抗议在西班牙领海之外劫走美国公民，因而这些人被释放或赦免了。

个领导人被逮捕，并在新奥尔良被起诉，但政府不能使地方陪审员们相信这些侵略者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

甚至在被起诉期间，这些侵略者仍然进行他们的准备活动。在1851年8月，洛佩斯带领四百五十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组成连队，离开新奥尔良。副指挥是W. L. 克里滕登上校，他是美国检察长的侄子。他们这一次在离哈瓦那大约六十英里的地方登陆。这个轻率的领导者对于反叛的领导人员的团结一致和人民群众愿意冒生命危险来参与公开造反又一次估计错了。西班牙军队打散了这股人。他们把洛佩斯在哈瓦那举行的盛大的公众集会上绞死。克里滕登和另外四十九个人企图乘小船逃走，被他们捉到，立刻枪决。另百三十五个人被监禁在西班牙，经过驻在那里的美国公使的说项，最后于1852年被释放了。菲尔莫尔总统用最严厉的辞句痛责这种远征。公平地说，辉格党政府取缔这个行动的认真的努力被得到地方领导层公民支持的普遍而热情的地方上的同情所挫败了。但从一个外国的眼光看来，这当然不能为那些煽动分子的离开辩解的。

在哈瓦那执行了罪有应得的正法之后，新奥尔良的暴动者捣毁了当地的西班牙领事馆，毁坏了当地西班牙居民的财产。韦伯斯特谴责了这个暴行，允许给领事赔偿；但他没有提到对普通西班牙臣民的损失问题。鉴于对美国公民在外国的暴乱中，特别是在墨西哥，遭到损失所提出的权利要求，韦伯斯特给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的声明是值得注意的：“西班牙领事系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一位驻在这里的公务官员，他的权利自然同来到这个国家同我们的公民混合在一起从事他们个人的事业的一般西班牙臣民的权利是十分不同的。前者可以要求特别赔偿；后者只能得到给与我们自己的公民的那种保护。”^①美国政府命令在新奥尔良向西班牙的

^① 查德威克的前述的《美国和西班牙》，第224—250页。

国旗行特别敬礼。国会后来听到被囚在西班牙的美国侵略者得到赦免的消息之后，拨款二万五千元来赔偿在新奥尔良的西班牙臣民的损失^①。

若不是辉格党政府采取正直的态度来镇压侵略的远征的话，洛佩斯的冒险行动和在纽约成立的古巴革命者公会的努力一定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洛佩斯的行动却足够使法国和英国政府对于古巴的分离和同美国合并的可能性感到担心。他们对于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前例是记忆犹新的。西班牙恐怕自己无力保护古巴，逼迫英法两国做些事情来保存古巴。这两个国家竟至分别给国务卿韦伯斯特一个照会说一支海军已经派到加勒比海“用武力阻止任何国家的任何冒险分子抱着对古巴岛的敌意登陆”（1851年9月27日和10月18日）。韦伯斯特宣布对美国公民在公海上活动的任何监视都是不能忍受的。他通知法国公使说国务院严重地看待这个形势。英国和法国出于西班牙的“急切的愿望”，（于1852年4月23日）建议订立一个三方协定，宣告它们“单独地和集体地，现在和今后，都没有占有古巴岛的任何意图；它们各自承担义务，反对任何一国或任何个人的这种意图”或“为它们，或为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取得或保持对这个岛的任何垄断控制，也不僭取或实行任何对这个岛的统治”。英国公使克兰普顿认为即使这样一个协定不被采纳，单只这一个建议就足以打消美国合并主义

^① 在1891年新奥尔良几千个暴民私刑处分了十一个被普遍认为犯有杀人罪但由于应用法律遁词和缺乏执行法律（据说是由于秘密的犯罪的马菲亚〔Mafia〕会的阴谋策划的结果）而没有被惩处的人。美国政府承担了十一个死去的人中的三个意大利臣民死亡的责任。根据条约，意大利人被保证“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给与最经常的保护”。联邦政府付与受害者的家属十二万五千法郎；意大利政府接受了，结束了这个案件。J.A.卡林(J. Alexander Karlin)在《华盛顿州学院研究项目》第十一卷，第四期(1943年12月)，讨论了《1891年新奥尔良马菲亚事件的一些反响》(Some Repercussions of the New Orleans Mafia Incident of 1891)。参阅《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十五卷(1945年3月)，第235—246页。

者的主要的论据：担心英国有意自己获取这个地方；他们希望利用这个论据来制造一种有利于合并的普遍情绪。这个推论后来证明是有道理的。

韦伯斯特做了一个谨慎的初步答复。他和菲尔莫尔总统确有意订立这样一个协定——总统还想把夏威夷也包括进去^①——但他们怕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可能受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运动的损害；因此他们劝告英国和法国把这个问题搁置到大选之后再谈。韦伯斯特在大选之前死去；在十一月，具有强烈的“年轻美国”的扩张情绪的民主党赢得了选举。菲尔莫尔是留在美国政府中唯一的一个了解以前的关于三方会谈建议的机密的和同情的谈话的人。当这个建议很快重新提出来的时候，他不愿意再提及这些谈话^②。对这个建议的回答落在韦伯斯特的继任人爱德华·埃弗雷特身上，他给英国公使一份杰出的公文，这个文件表明美国对古巴的兴趣所牵涉到的不止于要在该地实行奴隶制的野心。辉格党人曾经反对侵略，反对合并；但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一个在选举中遭到失败而将要下台的政府试图永远约束国家不对古巴实行统治，那是不合情理的。根据美国传统的反对同欧洲国家缔结政治联盟的政策，辉格党的最后一个国务卿雄辩地谢绝了这个约请，否认他的政府有任何占有古巴的意念，但在措辞上使他的声明投合南北两方人士的心意：

美国……将……约束自己不去获得新的领土，而这种获得是可以在不搅乱现存的国际关系和顺应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古巴岛位于我们的门口。它控制着冲洗我们五个州的海岸的墨西哥湾的通道。它阻挡了疏泄半个北美大陆，以其支流构成世界上最大内河交通系统的那条

① 前述范阿尔斯太因著作，参阅本书第 349 页。

② A. A. 厄丁杰(A. A. Ettinger)：《建议的 1852 年英法美保证古巴属于西班牙条约 (The Proposed Anglo-Franco-American Treaty of 1852 to Guarantee Cuba to Spain)》，载《皇家历史协会会报》，第四辑，第十三卷(1930 年)第 149—185 页。

大河的入口。它监视着我们通过巴拿马地峡同加利福尼亚交通的门口。假如象古巴这样一个岛，属于西班牙国王，守卫着泰晤士河和塞纳河，而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建议订立这样一个协定，那些国家一定会觉得我们所承担的约束远不如我们要求他们所承担的严重……过去——最近过去——的历史没有提供保证二十年后法国或英国将还想让西班牙继续保有古巴……甚至现在总统也不怀疑英国和法国宁愿古巴改变它的现况也不愿那里发生所最害怕的事情，那就是：一种重演圣多明各的恐怖和它的命运的内部动乱。

这两个国家不久之后就把这件事搁下来不再过问了。埃弗雷特的照会不仅适合华盛顿和门罗的政策模式，并且这样清楚而长期地解释了美国对古巴的关系，以致麦金利总统在 1898 年不得不引以为根据去进行辩论，说他没有离开传统的政策。象韦伯斯特一样，并且是同样无害地，埃弗雷特迎合了弥漫全国的谋求将来占有更大的领土的感情。

第十九章 奴隶制和外交

320

(1853—1861年)

全国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一致称赞埃弗雷特的关于古巴的照会的刚强的口气,但新的民主党政府并没有走多远:他们想要古巴,主要是把它当做是另一个实行奴隶制的州。皮尔斯总统大胆地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的政府的政策将不受任何怯懦的得自扩张的凶兆所控制。的确,不必隐瞒,我们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地位使我们获得一些不在我们统治权之下的对于我们的防卫有突出的重要性的领土。”他直截了当地派一些积极的扩张主义者到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上。詹姆斯·布坎南被派到英国,他想当总统的野心被1852年的选举扑灭了,他希望把奴隶制问题置于政治争论之外,但假如不可能这样做的话,将保卫南方的“权利”。弗吉尼亚的约翰·Y.梅森任驻法公使。参议员皮埃尔·苏莱任驻西班牙公使。苏莱是一个激烈的路易斯安那的法国共和党移民,他曾把洛佩斯的远征队员当作英雄来称赞。新的驻葡萄牙公使不是别人而正是约翰·L.奥沙利文,他是纽约州的一位民主党主笔,他创造了“明显的命运”这个魔术性的名词,还曾同洛佩斯和古巴的侵略者合作^①。驻墨西哥公使的职位由詹姆斯·加兹登担任,他是一位著名的南卡罗来纳人,对一项修筑通过仍然是墨西哥的北部领土的到加利福尼亚的南方铁路的计划有个人兴趣。在华盛顿内阁里面,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任陆军部长,在政府

^① J. W. 普拉特:《约翰·L. 奥沙利文和“明显的命运”(John L. O'Sullivan and Manifest Destiny)》,载《纽约历史》第十四卷(1933年7月),第213—234页。

中有着显赫的权势，他在人事任命方面协助过皮尔斯；马萨诸塞的凯莱布·库欣，一度是辉格党员，现在变为一个积极的民主党扩张主义者和在奴隶制方面南方“权利”的北方代表者；纽约的威廉·L·马西任国务卿，他将表明为一位办事有方的能干的外交家，他的关于奴隶制的看法同其他两位北方民主党人皮尔斯和布坎南是相同的。对这一个班底来说，外交事务的焦点集中在古巴上。

南方人士决心获取古巴，假如不能收买的话，就用某种其它方法，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上的重要性使他们能对马西和皮尔斯总统施加影响。不公平的西班牙法律在这个岛上对美国船只和财产引起了惹人愤怒的事件，诸如专横扣留和处罚无辜的“黑战士”号客船^①，他们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强如下的论据：古巴甚至在西班牙的手中日益变成美国安全上的威胁。马西秘密地指示苏莱作收买这个岛的尝试，但假如西班牙不肯以一个合理的代价——美国愿出至一亿三千万美元——出卖的话，那么苏莱就要努力达到“其次的最可取的目的”，那就是“使那个岛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和对任何欧洲国家的依附”。国务卿希望某种美国能够以某种方式帮一手的独立运动会在古巴开展起来，至于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他还不能肯定。由于缺乏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足够知识，因此还不能给公使具体的指示，教他在那样情况之下怎样做法。含蓄的意思是苏莱可以运用自己的判断和策略。马西提到了得到的报告（有些是从美国驻哈瓦那领事那里来的）说西班牙正在准备在古巴实行一种农业徒工制度。“在给你的指示里面附了总统对于学徒制度的意见（在苏莱的书面的指示里面没有透露这些意见）。假如它被广泛采

^① 这个客船来往于纽约和莫比尔，在哈瓦那作短暂停泊。一贯的做法是豁免船只申报它的全部船货单。在它的第十八次航程中，古巴港口官员突然叫它呈交船货详单，并且不给它足够的时间准备；结果他们以船只违反海关规程为理由而劫持了它，后来经过美国的强硬抗议，才释放了这只船但罚了它六千元。在相当时间之后，西班牙做了适当的改正。

纳而且认真实行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把这个岛非洲化。”^①从这些话里，苏莱制定了一个政策，经过他的欧洲同事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不久出现在“奥斯坦德宣言”中：在古巴，解放奴隶的危险可以使从西班牙手中抢走这个属地具有正当的理由，这样才能阻止人类自由的火花引起大火，蔓延到美国而把南部各州非洲化。

西班牙不愿出卖。苏莱在这个国家的外交行为是一系列的错误和无节制的行动，其中包括在“黑战士”号事件上给西班牙政府的一个没有得到保证的最后通牒，同西班牙革命者的轻率的联系，以及同法国大使决斗。由于苏莱的失败，皮尔斯和马西曾想派一个特别委员到西班牙去，但这个想法改变为在欧洲召集一次美国外交人员会议来讨论古巴问题——在华盛顿他们从布坎南得到报告说持有西班牙公债的英国和其它国的债权人看到西班牙出卖古巴以解救财政上的困难会十分满意。结果产生了恶名远扬的“奥斯坦德宣言”，这个宣言由布坎南，梅森和苏莱在埃克斯-拉-沙佩尔起草，后来公布于吃惊的世界面前。这三个奴隶制扩张主义者说道：

(1) 美国应尝试以不超过一亿三千万美元的款项收买古巴。

(2) “我们的过去历史禁止我们没有西班牙的同意而取得古巴岛，除非按照伟大的保存自己的法则来说是正当的。……在我们向西班牙提出一个远远超过其现有价值的收买古巴的价钱之后，假如被拒绝的话，那个时候就应考虑这个问题了：为西班牙所占有的古巴是否严重威胁我们的国内和平和我们所珍爱的联邦的生存。假如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根据人世的和天神的一切法则，我们都应当从西班牙手中把它抢过来，假如我们有这个力量的话；这同一个人可以拆毁邻居的失火的房子，假如没有其它方法阻止火焰烧毁他自己的房子的话，所依据的是同一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应当计较代价，也不应当考虑西班牙可能采取同我们斗争的行动了。”^②

^① 马西给苏莱的信件，1853年7月25日和1854年4月3日，国务院档案，“指示，西班牙”，第十五卷。

^② 异体字是著者所标注的。

那就是，他们断言，假如西班牙不出卖古巴的话，就可以考虑美国是否应当进行战争来夺取它。这个宣言的这种意外的和经过斟酌（谨慎的布坎南把苏莱的更加激烈的见解在语气上改得平和一些）的性质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力量^①；但这个宣言的公布震惊了世界，马西国务卿被愤怒的国内和国外舆论所迫不得不否认这个宣言。虽然这个宣言不是象大家所认为那样以明确的词句表达的，它是一个最含糊最折衷的文件，是奴隶制和外交结合在一起的赤裸裸的暴露；宣言被拒绝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如主张奴隶制的政客们的整个厚颜无耻的方案在人类自由的新兴力量面前彻底破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样^②。

民主党的 1856 年竞选纲领鼓吹合并古巴。宾夕法尼亚的布坎南被提名为候选人，他是奥斯坦德宣言的真正起草人，这个文件使他特别受到南方的拥护。在不久前在国内进行关于本国的奴隶制的麻烦辩论的时候他在国外，因而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个党由于号召投票人不要投那个决心反对扩张国内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以避免地域性矛盾危及联邦，而赢得了那年的选举。近至 1860 年，这个没落了的党的两部分都坚持声称赞成在“对我们光荣、对西班牙公平”的条件下合并古巴。但是事实证明古巴作为另一个奴隶制州是整个国家所不能忍受的。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引诱奴隶制扩张分子的其它方面：更多的墨西哥，以及存在着侵略者推翻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各个共和国并把它们合并到美国的可能性。皮尔斯政府的一个代理人威廉·L·卡兹诺在圣多明各起

① R. F. 尼科尔斯 (Nichols): 《富兰克林·皮尔斯 (Franklin Pierce)》(费城, 1931 年)。

② 关于奥斯坦德宣言和伴随的外交, 除前述尼科尔斯的著作外, 参看 H. B. 勒尼德 (Learned) 的《美国国务卿》, 第六卷, 第 183—216 页, 和 A. A. 厄丁杰的篇幅繁多的著作《皮埃尔·苏莱去西班牙的使命, 1853—1855 年, 美国的对古巴外交政策的研究 (The Mission to Spain of Pierre Soulé, 1853—1855, a Study in the Cuban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耶鲁大学出版社, 1932 年)。

草了一个割让萨马纳湾给美国的条约；但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诱使这个共和制岛国否认了这个计划^①。在此后的许多年中，卡兹诺作为美国合并的先行代理人而经常到圣多明各去。通过美国驻夏威夷的专员，马西谈判了（1854年）一个流产的合并这些岛的条约，他似乎由于英国人劝夏威夷人坚持要写明一个州的地位的条款而未能操胜算。在美国内部政治危机严重的那一年里，这样一个条款必定会使这个条约归于失败。皮尔斯不把这个条约提交参议院讨论，因而这个岛的政府就避免了再继续交涉^②。

1848年的瓜达卢普-伊达尔戈和平条约的执行为民主党奴隶制扩张者开辟了过去辉格党所不愿谋求的侵略外交的可能性。这个条约上规定美国的南部边界应当从格兰德河往西“沿新墨西哥的全部南部边界（在名为帕索的城镇的北方）到它的西边终点”，而324这些边界线是按照1847年在纽约出版的狄斯特纳尔地图所划的。它没有提到经纬度。当联合测量队在1851年会合划这条线的时候，发现狄斯特纳尔地图上的城镇和界线的经纬度不准确，特别是埃尔帕索镇和格兰德河河道的位置。美国专员巴特利特要求更改地图使之同测量出的界标的经纬度相符合；墨西哥专员孔德坚持严格按照条约地图办事。他们最后达成了一条妥协线，菲尔莫尔总统假如继续留任的话，他会乐于接受这条线的。双方的最初要求之间的距离牵涉到埃尔帕索附近的麦西拉山谷的三百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这块地区的人口在1853年的时候大约有三千个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当时农业上的价值不大（虽然现在成为所产粮食可供养二万五千人的一块灌溉地区），但作为一条通过美国的南部横贯大陆的铁路的通路，它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这项铁路工程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国会中的主张奴隶制分子正在

① 前述佩金斯的《门罗主义，1826—1867年》，第268—271页。

② 参阅下面第349页。

积极争取经过南部领土建筑这条铁路来阻止自由土地的农民沿北部路线定居，在那里成立自由州从而在政治势力上超过南方。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反对分给定居者农场的法案以及准许沿北部草原通过自耕农场地区修建铁路的任何权利。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主持当时正在进行的确定修到太平洋沿岸的最佳铁路线的测量，他决定选择政治上对他的地域非常有利的南方路线。巴特利特·孔德边界测量达成的外交妥协在麦西拉山谷阻挡了这条路线。再往西，最佳路线在希拉河之南，那里属于无争议的墨西哥领土。皮尔斯总统很快否定了这个妥协。

325 这项条约的第十一款要求美国约束住在割让地区以内的印地安人不得穿越边界入侵；假如不能阻止的话，以同样的努力按照对在自己自己的领土内，自己的公民所筹划或进行的侵犯行为的处罚办法来处罚侵犯者。沿这条崎岖的漫长荒野的边界上执行这个规定是一项化费很大的任务，政府急于以提供一些外交上相等的措施来解脱这个义务。自从和平以来，有一些美国公民对墨西哥提出各种权利要求，其中有些是非常夸大的；同时墨西哥对据称美国没有适当地控制印地安人也对美国提出了一笔很大的权利要求。皮尔斯想同墨西哥签订一个条约来作总的解决，而这个解决办法中将包括另一项大的割让。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墨西哥的混乱的政治情况以及它需要一笔钱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可能诱使其出卖更多的领土。他派詹姆斯·加兹登将军到墨西哥去。加兹登是一位南卡罗来纳的著名人士，我们已提到过他本人就对一条南方铁路线感兴趣；试图得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那里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铁路）和包括格兰德河南部流域的一大块墨西哥领土。对于这个，他被授权出最高到五千万美元的代价，假如办不到的话，可以按比例地减低代价来交换包括在加利福尼亚湾出口的其它地域上的代替铁路线；作为最后的办法，他可以签一个条约在只要能充分

照顾这个拟议的南方铁路线的条件下修改边界。

加兹登发现桑塔·安纳短期中重掌墨西哥的政权，急需用钱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准备出卖他的国家的少量领土来换取现款。他成功地签订了一个明确划定南部边界的条约，把埃尔帕索包括到美国领土之内，以及用一千万元的代价买了一块从此名为“加兹登收买地”的三角地带（在希拉河以南一块一千九百万英亩的不毛之地）；这个条约废除了第十一款，解除其中美国所负的一切义务（没有提到美国公民对墨西哥的权利要求）^①；并规定美国公民可以在科罗拉多河，加利福尼亚湾及新的国际边界以下的格兰德河（又称“布拉沃”河）上自由航行；以及美国政府和美国公民有穿过特万特佩克地峡的通行权，美国并可以对该地峡实行保护^②。后一项（被 1937 年的条约取消）没有为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所禁止，这个条约只适用于中美洲地峡。这是在某种方式上对英国说他们对莫斯基托海岸的现行的保护权未被这个条约废除^③的那个争论的答复。但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行使过这种保护权。

在 1846—1848 年战争之后，墨西哥遭受了十年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崩溃，继之又一次遭到外国侵略。要塞被拆除了，边界上没

① 通过 1868 年 7 月 4 日的权利要求协议，两方共和国的公民针对对方的“仍然未清偿的”所有权利要求都交一个联合权利要求委员会处理。墨西哥提出由于美国未按照瓜达卢普—伊达尔戈条约的义务制止印地安人的劫掠，要求赔偿三千一百余万元。委员会的英国公断人否决了这些要求，理由是英国由于订立了加兹登条约已经解除了这项义务。在其它项权利要求中，委员会判给美国公民以下数目（原来提出的金额为 470, 126, 613.40 元）：402, 942.04 元美国货币（绿背钞票），426, 624.98 美国金元及 3,296,055.18 墨西哥金元。对墨西哥的债权人，它判给（原来提出的金额为 86,661,891.15 元）89,410.17 元美钞，10,569.67 美国金元，和 50,528.57 墨西哥金元。在支付中，一块墨西哥金元相当于 98.39 美国金分。根据原来条约上的规定，一方对另一方的判决以后对抵的债务差额按一年 300,000 元分期偿付。穆尔：《国际仲裁》，第二卷，第 1287—1359 页。

② 这项交涉在保罗·N·加伯(Paul N. Garber)的《加兹登条约(The Gadsden Treaty)》(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23 年)一书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述。

③ 参阅本书第 251 页。

有任何保护^①，财政破产，军队瓦解，军纪败坏。国家为阴谋和侵略敞开了大门。美国政府在新边界的自己一方维持边境的秩序，阻止无数装备好去颠覆墨西哥政权的侵略者远征队，以及保卫自己的领土抵抗报复性的袭击都是不轻松的。桑塔·安纳在加兹登条约的原稿上曾加了一条取缔侵略者的款项；但参议院注意地勾掉了它，最后双方批准了没有这一款项的条约。辉格党政府曾认真地限制在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组织起来的侵略的远征队，但难于使地方法官判罪，或确实阻止一些远征队的出发。在随后的皮尔斯政府中，杰斐逊·戴维斯作为陆军部长只敷衍地阻拦这些侵略者。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把美国全国的精力都卷进这场战争以及同时的法国对墨西哥的侵略消耗了那个共和国的所有资源之前，边界上是长期骚乱、掠夺、袭击、抢劫和枪杀的场面。

在缔结了实际上被参议院重新写过的 1853 年条约之后，皮尔斯和布坎南政府的驻墨西哥代表加兹登及其继任人继续他们的觅取更多的墨西哥领土的侵略性努力：下加利福尼亚和一块墨西哥的富饶的顶端土地，那是西北部的索诺拉州的大部分。那个国家的混乱状况，日益增加积累的美国公民的赔偿损失的权利要求，以及欧洲自称为了保护墨西哥公债和其它财产的外国持有人的利益而进行干涉的紧迫性，引起了布坎南总统的真正的不安并为他的没有节制的合并野心提供了借口。但他没有能通过外交来得到墨西哥的大部分。在他的 1858 年给国会的咨文(12 月 6 日)里，布坎南要求付给他对北奇瓦瓦和索诺拉予以“暂时保护”的权力，但没

① 墨西哥政府(假如能把作为这几年的特点的令人困惑的一连串短命的内阁和不断更换的总统和独裁者称为政府的话)曾试验在索诺拉(Sonora)边境成立从旧金山的不受拘束的法国移民和冒险分子招募来的法国殖民者的缓冲定居地。经过一两次失败的试验之后，证明这些殖民者并不比侵略者更可靠些。参阅瑞皮的前述著作：《美国和墨西哥》，及 R. K. 维利斯(R. K. Wyllys)著：《加利福尼亚和索诺拉的法国人(The French of California and Sonora)》，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一卷(1932 年 9 月)，第 337—359 页。

有成功；又在 1859 年(12 月 19 日)要求当局为获得过去的赔款和今后的安全派军队进入墨西哥。他说，假如美国不立刻进入并承担充分的责任的话，“其它国家将会这样做，那是不会令人惊奇的。因而在困难增大的情况下迫使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既定政策而最后进行干涉”。后几年的事件强调说明了这个声明的力量；但越来越强烈的美国的地方性政治把民主党分裂成地方阵线，最后南方势力被撵走，民主党的扩张分子的计划因而被粉碎。在主张奴隶制的扩张主义分子失掉党内北方势力支持之前，他们真正完成了的东西只是加兹登条约^①。

一个在 1853—1854 年从加利福尼亚侵入墨西哥的引起两国政府关切的侵略者是威廉·沃克。他在 1855 年离开旧金山到尼加拉瓜去进行侵略远征。象征服墨西哥的科特兹一样，沃克能够利用他所希望统治的人民的内部分歧。他成功地使自己在 1855—1857 年的时候成为那个共和国的独裁者。沃克的远征并不是主张奴隶制的领袖们所策划的，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这个远征并希望从此导致合并，而沃克本人是一个南方人。这只是一个轻率的无节制的幸运儿的一个罪恶，他想自己占有整个中美洲和古巴；而在他的远征开始以后，他部分地得到“合营交通公司”的资助，这个公司是一群从事穿过巴拿马地峡的陆地和水运交通业务的美国资本家开设的。这件可耻的事业所带来的只是尼加拉瓜的苦难大众和沃克的大多数随从者的死亡和流离失所。国务卿 329
马西反对沃克的谋划，但是沃克的这些谋划不止在南方各州而且在所有扩张分子和到处宣扬“明显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引起很大同情。这个冒险者尽量利用了这种同情的感情来支撑他的靠不住的

^① 这段墨西哥-美国关系曾详细记载在前述 J.F. 瑞皮，保罗·N. 加伯和 J. M. 卡拉汉的著作中，并简要地刊载在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的《美国国务卿》，第六卷，第 324—368 页。

地位。在皮埃尔·苏莱访问了他之后，这位入侵者总统着手实行在尼加拉瓜重新建立奴隶制和重新恢复非洲奴隶贸易的计划。

在指责沃克通过在美国招募“殖民者”（这些人在到达尼加拉瓜后就成为沃克的军队的兵士）这种篡夺和违反中立法的行为方面，皮尔斯总统不似马西那样不妥协。这个冒险事业以某种方式起到防止英国对克莱顿-布尔韦尔条约作侵略性解释的作用^①。在英国政府那一方面，它怀疑美国支持使一个国家屈服并使之成为自己在巴拿马地峡的权力的傀儡，而这是那个条约所禁止的。当哥斯达黎加和不久之后另一个中美洲国家对沃克宣战之后，英国和法国不顾克里米亚战争的迫近，各自在巴拿马地峡附近增强了自己的分遣舰队。英国政府从自己的军火库中提出二千支步枪和其它军用品支援哥斯达黎加。皮尔斯一直还踌躇着没有承认沃克的政府。他现在立刻予以承认了，理由是英国不能坐视英国取得中美洲所有国家的完全优势^②。当时适值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这个组织的政客们，包括总统在内，图谋争取南北两方的“明显的命运论”者的支持，以及希望从沃克的活动扩展奴隶制的南方激烈分子的支持。该党的1856年纲领隐约地颂扬了沃克，并期望尼加拉瓜沿着运河路线“再生”。但侵略者的政权就在布坎南总统在华盛顿就职不久之后突然崩溃了，沃克本人经过在中美洲又作了两次尝试最后在洪都拉斯的行刑队前受到他应得的惩处^③。在

330

① 参阅本书第251页。

② M. W. 威廉斯前述的：《英美的地峡外交》，第210—214页。

③ 沃克在1857年在尼加拉瓜被打败。他的生命以及他的残余的随从人员的生命为一个美国海军军官的调停所挽救，这位军官把他们带回美国。他立刻组织另一支远征队并且成功地出发了。他在尼加拉瓜海面被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长海拉姆·保尔丁(Hiram Paulding)的未经授权的干涉所粉碎，保尔丁因此受到布坎南总统的责备并被免职。沃克被保尔丁拘禁起来带回美国，被起诉违犯了1818年法令，但新奥尔良的陪审员没有判他们有罪。在南方他被欢迎招待，象一位能征战的英雄而不象一个失败的侵略者。他又组织成第三支远征队并且出发了，这次被英国海军在洪都拉斯海岸击溃了。英国海军的介入和阻止了自保尔丁事件之后禁止美国海军军官采取的那种做

第二次失败之后，在 1858 年，布坎南虔诚地谴责了这样的侵略但继续谈论和平渗透中美洲，把墨西哥北部地区变为保护领和收买古巴。在 1859 年英国同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缔结了条约，从莫斯基托海岸撤销它的保护地位。这些条约在沃克未被赶走之前一直未付诸实行。巴拿马地峡问题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前夕才平息下来。民主党的下台和奴隶制在这场战争中被废除，立刻结束了美国外交的这个侵略方面。

我们最后不能不讲述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外交，就草草了结本章的主要题目。美国是同英国同时(1807—1808 年)废除这种贸易的，并在 1820 年宣布它是海盗行为，按照本国的法律对犯此种罪行的本国公民可以判处死刑；但美国却坚持拒绝同英国合作，签订一个条约——如英国同其它国家所订的^①——允许在和平时期对悬挂英国或美国旗帜的有嫌疑的奴隶贸易船双方得相互检查以及将罪犯交付联合国际法庭审判，来禁绝这种非法交易。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对旧日的强迫服役的怨恨所产生的对视察和检查的敏感。只有在英国明白表示放弃强迫服役的做法的情况下，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才能同意(即使是为了禁绝奴隶贸易)一种相互视察和检查的权利。此外，英国军官们在实际执行视察和检查的时候对于竞争的商船的权利并不总是十分留意的：在船上只要被一位念念不忘赏金的船长发现可能被他称为进行奴隶贸易的“装 331

法，是有重大意义的。沃克向英国海军的萨尔蒙(Salmon)舰长投降，萨尔蒙立刻把他交给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在 1860 年 9 月 12 日把他处死。关于沃克的生平的标准著作是 W.O. 斯科罗格斯(Scroggs)著：《侵略者和资助者(Filibusters and Financiers)》(纽约，1916 年)。

① 美国曾同西班牙、葡萄牙(只在赤道以北)、巴西、荷兰、法国、海地、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得克萨斯、丹麦和汉撒诸镇签订过相互视察和检查奴隶贸易船和成立联合法庭来审判罪犯的条约。同法国和西班牙订立的补充条约规定假如在船上证明有进行奴隶贸易的装备，即使没有找到黑人，也可以捕获这些船。〔下面提到的苏尔斯贝(Soulsby)的著作。〕美国的超于其外的实际结果以及它的不许视察和检查使得美国旗帜成为除受美国海军的检查外不接受彻底检查的唯一手段。

备”，虽然船上没有装载一个黑人，有时就足以定这只船的罪。同样，曾发生过许多这种抱怨事情：进行无辜贸易的美国商船被仔细检查，耽搁，有时被不当地扣押。在另一方面，很明显的是美国的旗帜被带着黑人，特别是到获利最大的市场古巴和巴西去，为了躲避视察、检查和因而遭到扣押的外国贸易船所经常冒用，也不能否认参加从事这个极恶的贸易的罪犯中也有美国公民，虽然事实上很少有黑人被偷运进美国来^①。

经过细致和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英国政府明白否认在和平时期的任何视察和检查的权利，但继续坚持认为检查一只非法悬挂美国旗帜嫌疑的船只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验实船只的身份是必要的，否则另一国的奴隶贸易船就有可能利用那个旗帜而逍遥法外，而为基督教国家所谴责的这个令人憎恨的交易仍得继续进行。这自然就会使人认为美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来阻止本国旗帜被用来做这种亵渎神圣的勾当，而这种想法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虽然美国巡洋舰自从1820年以来就不时在非洲海岸巡逻。美国一贯认为，非法悬挂它的旗帜的船只可以被检查，甚至捕获和惩罚，它并不关心对外国船所做的事；但是在打扰任何真正的美国船只的时候不可弄错了。假如这样做了的话，就产生必须予以赔偿的认真的权利要求。唐宁街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赔偿是应该的。英国政府并不想干涉真正的美国船只，即使它们彰明昭著地进行奴隶贸易，但它坚持有权至少验明那些真正的非美国的奴隶贸易船。这一点实际上确是当时美国海军自己的做法；拒绝英国这样做，就是说美国政府否认其它国家有做它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权利^②。

^① 圣乔治·L·西奥萨 (St. George L. Sioussat): 《达夫·格林的“英国和美国”》；其中有美国反对1841年五国条约的引论性探讨》(美国考古协会, 伍斯特, 1931年)。

^② 下面提到的苏尔斯贝著作, 第23页, 第73页。

在同英国合作来取缔这种贸易这件事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所能够做到的最多^①是按照 1842 年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的条款所规定的联合对任何允许在自己的领域以内进行这种贸易的国家提出抗议，并同意各自维持巡洋舰队来扑灭这种罪恶的贸易，每个政府各按其本国的法律办事，而没有相互视察和检查的权利。这个问题在此后沉寂了十五年，没有再发生英国视察美国船只的事情。这个条约的规定没有被继任的历届民主党政府积极地或甚至有效地执行，特别是自从英国宣称愿意见到奴隶制在得克萨斯一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废除之后。在 1857 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42 年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的款项大部分变成一纸空文了，英国又重新恢复了查看悬挂星条旗的嫌疑船只。很难期望布坎南政府的国务卿卡斯在执行这些条款上合作。当他任驻法公使的时候，他曾向韦伯斯特国务卿抗议这个条约的这些条款（布坎南则在参议院里攻击这些条款）；在 1842 年他自己负责至少曾帮助劝阻法国不要批准英法发起的五国条约（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该条约同意相互视察和检查的权利并准备使之成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共同政策^②。

① 根据众议院的一项决议，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 1824 年同英国谈判，订立了一个协定，宣布奴隶贸易是海盗行为。假如这个协定被批准，它将根据这一事实而允许检查任何一方国家的嫌疑船只来搜索人类的公敌——海盗，但这些海盗们的审理则须在其本国的法庭中进行。这个协定用这样的规定来避免发生强迫服役：“任何一方的被检查的或被捕获的高船上的任何人不得被检查船上的指挥官或在他的命令下带走。”英国在很快批准了这个条约，并通过了一个议会法案宣布奴隶贸易为海盗行为之后，拒绝接受美国参议院的修正案，特别是其中一项把美国海岸排除在条约范围之外的规定。十年以后，英国政府同意接受附这一个修正案的条约，但美国又拒绝了。这样一个条约本来能够解决这整个问题，但当时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变得过于强烈，以致不能够承认这个条约。可以同最后于 1862 年批准的条约相比较，那个条约把巡逻舰队在某些区域，但没有包括用来抵制强迫服役的词句。

② 假如它被批准，美国将在这个重大道德问题上在基督教世界中受到愈来愈多的孤立。事实是，法国同英国在 1845 年以一个新协定代替相互检查的权利，也就是韦伯斯特的独立的但互相合作的巡逻舰队的原则。

卡斯急于争取在 1856 年总统提名中得到南方的支持，曾完全称赞沃克——那个计划在尼加拉瓜重新建立奴隶制和重新开放奴隶贸易的沃克——在尼加拉瓜的侵略活动。随着英国检查船舶的恢复，有些检查是在墨西哥湾进行的，布坎南政府的抵抗变得顽强起来。两国之间的严重的紧张关系迅速发展了，并且由于最近的招募新兵的纠纷而恶化了。在 1858 年英国政府居然放弃了检查任何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只的权利，并且准备对由于被怀疑是其它国的奴隶贸易船而受到干扰的美国船予以赔偿。同时它向美国呼吁共同拟定出一些方法来证实有悬挂假旗帜的嫌疑的船只的国籍。卡斯只答应执行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的规定。巡逻增加了，两国政府最后同意分别发给各自舰队一系列同样的指示，但国务卿固执地回避任何关于国际行动的建设性提议。尽管美国在非洲海岸和古巴保持了巡逻舰队，但非洲的奴隶贸易在 1860 年却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猖獗。一只船只要悬挂美国旗，虽然有嫌疑，只有美国巡洋舰才能过问它。

南北战争结束了这个讨厌的局面。一个奴隶贩子在 1862 年 2 月被处绞刑，这是在美国第一次判处这种罪行。为了争取欧洲国家的同情和道义支持，国务卿西沃德立即开始同英国交涉，终于在 1862 年（4 月 7 日）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在非洲海岸和古巴的一些指定水域的相互视察和检查权利^①，在纽约，开普敦和塞拉利昂设立双方法官数目相同的联合法庭来审判罪犯。由于南方各州暂时不在联邦以内，参议院一致批准了这个协定^②。英国的取缔这种

① 在 1863 年扩展到马达加斯加、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海岸以外的指定区域。

② 关于这个纠纷的最近的一部明白的批判性的著作是 H. G. 苏尔斯贝 (Soulsby) 的《英美关系中的检查权利和奴隶贸易，1814—1862 年》(The Right of Search and the Slave Trade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14—186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和政治学研究, 第五十一辑, 第二号, 1933 年)。也可参阅 R. W. 范·阿尔斯太因 (Van Alstyne) 的简略札记:《英国的检查权利和非洲奴隶贸易》(The British Right of Search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载《现代历史评论》, 第二卷(1930 年 3 月), 第 37—47 页。

贸易的动机再也不受怀疑了。美国走进了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的行列。没有人去注意美国权利遭到侵犯的事情了。足够清楚的是，一旦赞成奴隶制的力量从国内政治中排除出去，所有反对在横越大西洋的这种万恶的黑人交易上合作的人就都消逝了。反对免费分配西部土地给实际定居者的宅地法案，以及反对许可在北方路线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法案的人也不见了。远西地区的殖民以及用钢轨把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的广大地域联结在一起这两件事减少了巴拿马地峡问题的重要性，而这个问题在南北战争之前对扩张奴隶制分子的野心曾经是有很大帮助的。共和党的第一任国务卿 W. H. 西沃德是一位大扩张主义者和反奴隶制的领袖。在南北战争的前夕，他曾期望有一天美国能“通过公正合法的方法和他们君主的同意”^① 获得古巴和波多黎各。但西沃德的吞并丹麦属西印度群岛和圣多明各的计划（后者为格兰特总统热烈支持），不能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在战争以后一个世代期间，所有超越国界向南扩张的企图都归于失败。这方面的各种动机都已消失了。

在 1853—1861 年民主党当政时期出现了一连串同奴隶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特别的外交问题。这些问题是在最近一章所提到的广泛而活跃的商业交涉范围之外的。克里米亚战争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问题：在美国领土上招募外国军队和美国过去的海上自由的目标。

1854 年秋季的早期的军事失败使英国民众吃了一惊，并产生了补充在克里米亚被击溃的军队的人力的迫切需要。代替征兵法，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1854 年 12 月 23 日），授权在英国军队里面招募和委任一支主要在本国领土以外雇佣的外籍军团。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约翰·F. T. 克兰普顿和他手下的领事们在主要的美

① 穆尔：《国际法汇集》，第一卷，第 589 页。

国城市指挥他们的代理人员招募人员并把这些人员运送到哈利法克斯，在那里正式宣誓编入女王的现役军队。付给他们运输费，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根据事前的谅解从这些人的应募奖金中扣除。代理人们公开登广告进行招募。同对类似的引诱人们到美国邻邦共和国如得克萨斯和尼加拉瓜去的依从态度大不相同，联邦当局立刻采取有效的行动，制止招募美国人到遥远的黑海海岸去打英国人的仗。由于有几个代理人被告发和美国驻伦敦公使的抗议，英国政府吃了一惊，于是发出了不公开的命令，停止在美国的所有招募。经过一些迟延，招募停止了，但这只是在英国驻辛辛那提的领事被逮捕起诉(后来总统命令了结这个案子)和一个代理人被判罪之后才开始停止的。在审判中有大量的证据牵连到克兰普顿公使和三个领事。美国提出抗议之后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马西国务卿于是要求英国调回公使及驻费城、辛辛那提和纽约的领事。英国拒绝这样做。皮尔斯总统于是正式遣返他们。英国的有理智的意见支持美国在这件事上的立场；英国政府没有相应地遣返美国的驻伦敦公使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它的内在的正义感是赞成美国的。同这件事有关值得提起的是几年之后美国在南北战争中招收了许多移民加入自己的军队。其中有些人是被应募奖金从欧洲吸引来的；虽然没有在国外正式招募，美国驻巴黎总领事约翰·比奇洛未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就在大陆的主要报纸上登载招募移民的广告。西沃德国务卿后来写信给他^①，完全没有指责的意思说：“你慎重而聪明地越了权。”所不同于英国在1855年在美国的招募

^① 已故的 H. B. 勒尼德(Learned)在《美国国务卿》，第六卷，第 237—262 页，叙述马西的时候，关于招募纠纷发表了一个博学的摘要；J. H. B. 布瑞伯纳(Bontlet Brebner)通过叙述一个最重要代理人的活动又加以补充：《约瑟夫·豪和英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招募纠纷 (Joseph Howe and the Crimean War Enlistment Controvers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载《加拿大历史评论》，第十一卷(1930年12月)第 300—327 页。

的是林肯的国外代表们做得更技巧和在不触犯法律方面更成功一些。

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的主要国家^①试图把海上自由的解释写进国际法去。他们同意了一些条款，除其中的第一款外，肯定了美国自始坚持的原则：从草拟 1776 年计划时开始，经过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关于中立权利的斗争，这些原则美国曾试图写进 1814 年的根特和约而未能成功。其它国家被约请附和，除了美国、西班牙和墨西哥而外所有国家都同意了。这些原则是：

(1) 永远废除用私掠船进行掠夺。

(2) 除了战争违禁品外，中立国旗帜可以庇护敌方货物。

(3) 除了战争违禁品外，不应夺取在敌方旗帜下的中立国的货物。

(4) 如要有拘束力，封锁必须是有效的；就是说，必须维持足够真正阻止到达敌方海岸的兵力。

美国不附和这些条款的原因是，因为假如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不废除在任何情况下对私有财产(除了违禁品而外)的夺取，对一个海军弱小的国家来说，放弃掠夺似乎是一种过大的牺牲。马西以总统的名义拒绝附和这个宣言，除非第一款加进这样的词句来予以修正：“而且一个交战国的臣民或公民的私人财产，除了它是违禁品外，在公海上应免于被另一交战国的国家武装船只劫夺。”^②这样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同世界其它各国把大部分实质上是美国的原则制定为国际公法。美国未正式附和这个宣言并不意味着这些条款在实质上是美国的原则在程度上有所减少。事实上美国从此以后一直遵守着所有这些原则。不久以后在南北战争初

^① 英国、奥地利、法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土耳其。

^② 卡顿·萨维奇 (Carton Savage): 《美国对战时海上商业的政策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Maritime Commerce in War)》，第一卷，1776—1914(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34年)，第 63—73 页。

期的外交中，我们将要碰到掠夺的问题和这个巴黎宣言。

皮尔斯—布坎南政府中新民主党人的外交成就是同阿根廷共和国签订了1853年的条约；把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①及其主要支流开放给所有国家的商船；以及四年以后丹麦海峡税的了结。四百年来丹麦对从北方到波罗的海去的经过船只征税，在海洋国家，特别是那些海的沿岸国家看来，这是一种损害公众的行为，而这种做法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国际法所认可的。以前的美国外交家们就曾对这种征税提出异议。马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威胁要按照条约上的规定废除同丹麦订立的1826年商业条约，除非那个国家考虑以某种方法来停止这种征税。丹麦政府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目的是把这些税收资本化和做出一些使所有有关国家都满意的政治安排来。马西拒绝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原因是：(1)它回避了征收这种税的权利问题，(2)这样一个会议将把美国牵连到欧洲的政治安排中去，而这是同美国的传统政策不符的。然而，欧洲各国的代表在1856和1857年不时地在哥本哈根集会，安排了一个总的条约，根据提供适当服务，安置浮标和其它海峡航行上的装备所必要的费用总数估计，将税收资本化为当时以及永远交纳的固定数目的款项。通过同丹麦订的一个专门的条约，美国付了自己应出的份额393,011元。虽然美国故意避开巴黎宣言的更大的机会并且在废除非洲奴隶贸易这个海上的腐败的灾祸这件事上没有给予适当程度的合作，美国的这个主动行动至少在这件小事上对海上自由作出了贡献。^②

^① 同巴西交涉通过一个类似条约来开放亚马孙河的努力却未成功；但在1867年，美国的卓越的博物学家阿加西斯(Agassiz)教授到亚马孙去探查，他的一行人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以后巴西政府就宣布把巴西领域以内的这条河及其主要支流开放给所有国家的商船自由航行。此外，1868年秘鲁也发布了一个类似的命令。参阅劳伦斯·F. 希尔(Lawrence F. Hill)的名著：《美国和巴西的外交关系(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杜克大学出版社，1932年)。

^② 已故的查尔斯·E. 希尔(Charles E. Hill)教授在他的可作为标准的著作：

一般美国读者想到马西国务卿的更多的是他在1853年所规定的美国外交家在欧洲朝廷上的服装的著名的通告的模糊的详情，而不是本章所谈到的任何主要的外交问题。忠实于民主的公民们例如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对于美国代表按照欧洲礼节穿宫廷短裤，长统丝袜罩在小腿上，再加上带扣和旧世界社会习惯所规定的全部徽章，感到惊愕。马西自行担负起结束这种装饰的工作。在一个向外交人员发的通告里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美国的正式代表应当按照早期的做法（如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穿“一个美国公民的简单服装”。虽然通告上给每一个外交人员以自行斟酌的很大自由，它实际上是叫他们穿普通衣服，也就是说在正式场合上，有时甚至在中午的强烈阳光照射下穿一套晚会服。最初这样穿法带来一些尴尬的处境和被人故意怠慢，甚至使美国的外交人员有被人误认为招待员或者殡仪馆的承办人员的危险。树立一种适于抛弃了欧洲君主们所有装饰的人民代表的尊严身份的形态是相当困难的。在南北战争期间，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又穿着旧式的服装：短裤、带扣、丝袜等等。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在一次宫廷招待会上曾对他说，“我非常高兴我们不再有美国葬礼了。”^① 国务院的1866年指示允许曾在南北战争中当过志愿军官的外交人员可以在正式场合穿军队制服。但在二十世纪中文官出身的大使和其他代表们又开始不穿简单的民主服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正常”的提倡者乔治·哈维大使竟穿了短裤出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和海外自治领的国王，护教

339

《丹麦海峡税收和对波罗的海的控制(The Danish Sound Dues and the Command of the Baltic)》(杜克大学出版社,1926年),透彻地讲述了这个问题。

① 由S. A. 华莱士(Sarah Agnes Wallace)和F. E. 吉尔斯庇(Frances Elma Gillspie)编辑的《本杰明·莫兰期刊(The Journal of Benjamin Mora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对于宫廷徽章有许多描写。特别参阅第二卷,第828,907页。

者，印度皇帝”的面前。F.D. 罗斯福总统的一道行政命令(1937年2月2日)制止了这种无意识的服装：“外交人员不得穿未经国会准许的任何制服或正式服装。”

一个总的更彻底的外交职务制度的改革由国会1856年的一个法案制定，不到一年又被取消：这个法案制定了外交官等级，固定薪金和酬金和一种见习制度来减轻当时流行的政治任命的习惯的份量。这个做法后来被证明是民主体制的政治所不能忍受的，但它是一个有意思的征兆。在1915年，1924年和1946年的法案以前，还没有任何在外交官和领事官的系统组织方面作出规定，以使从事这门工作的年轻人免受政治漩涡的影响的立法。幸而在1861年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文官任期制度，为了继续任职必须坚定地忠实于联邦。在我们继续讨论伴随这个战争的在严重局势下的外交之前，先谈一下美国与太平洋、远东和近东各国人民的最初的接触是适当的。

第二十章 近东,太平洋和远东

349

(1783—1868年)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现在美国的大陆领域的创立已由以前各章加以叙述;当它的外交关系扩展到西方世界各国的首都的时候,商业的引诱又把美国商人吸引到亚洲的两个边缘,近东和远东。同近东打交道是从北非的伊斯兰教国家开始的,最初的关系是非常耻辱的。同远东的最初接触是在开国之初的年代中到广州去的贸易航行。当然,要经过几代的时间远东才变为对美国来说不仅仅是一块遥远的异国地方,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如二十世纪现代这样,才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大的外国问题。现在来谈一谈同亚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开始是合乎条理的。

美国商船到东地中海的不定期的航行最早可以追溯到1785年。数量可观的贸易,在没有条约保证下,开始冒着受到北非伊斯兰教国家海盗船的攻击的危险,到土耳其的士麦拿港口进行。第一个访问君士坦丁堡的美国官员是威廉·班布里奇舰长,他以进贡者的身份在1800年到达阿尔及尔。那个小王国的统治者按照他同美国所订的条约(1795年)英文译本的不合理的解释——或者只不过是一种专断行动——强迫班布里奇和他的船(这艘船的名字不是别的而是“乔治·华盛顿”)载运一个阿尔及尔使节去见将来可能成为北非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的土耳其国王^①。虽然美国

^① 当时英译本和土耳其本文是一同批准的,条约的第十四款一部分如下:“假如统治者想租用停泊在本国港口或土耳其的任何尚未出租的美国船时,由于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希望在付出其它国家所出的相同租费的情况下享有优先使用权。”在供美国条约的可靠的米勒版本用的1930年所作的仔细的译文中没有发现任何与这句话涵义相同的词句。

国旗是在这样一个不体面的情况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出现的，班布里奇在鄂图曼帝国的首都还是受到友好的接待，在那里他了解到当地欢迎美国派一位公使去。一个美国领事在士麦拿正式被承认（1824年），但只是在过去了好几年以后相继派去了几个代表团^①，才终于批准了（1831年）第一个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双方商业上的相互的最惠国待遇，允许美国商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并在英文本上（不在土耳其原文本上^②）规定了在土耳其的美国公民享有治外法权的地位。

除了关于治外法权的纠纷外，同土耳其的关系保持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时期——虽然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由于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使美国舆论暂时与它疏远——直到1917年美国参加了世界大战。美国从未象欧洲的一些大国那样转过土耳其领土的念头。相反地，人道主义的推动力倾注在这块控制着欧洲到东方贸易财富的陆地路线的战略地带。传教士们，改变思想的教育家们（罗伯特学院创建于1863年）和办医院的人们都受到欢迎，他们在虔诚的无私的事业中都非常顺利^③。在巴尔干国家（希腊于1829年，罗马尼亚^④于1881年，塞尔维亚于1881年，保加利亚^⑤于1908年）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了独立之后，美国接着就同他们建立了通常的外交往来——没有定约——一种直到二十世纪世界大战

① C. D. 保林在前述的《美国海军军官的外交》（第122—153页）一书中记述了这些代表团。也可参阅里斯顿的前述著作：《行政官员》，第319—334页。

② 米勒：《条约集》第三卷，第554页。

③ L. J. 戈登（Gordon）：《从经济上来说明的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1830—1930年（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urkey, 1830—1930,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1932年）。

④ 通过总统给罗马尼亚亲王的1878年8月15日信件，那个国家在订立柏林条约不久以后得到承认，该条约把罗马尼亚建立为一个独立的小王国。1880年6月11日美国委派了一个外交代表和一个总领事到罗马尼亚去。

⑤ 在1903年6月5日以前，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到过保加利亚，虽然在1901年4月24日曾委任了一个。保加利亚在1908年才得到完全独立。

以前都没有什么特别重大意义的关系。

到东亚去的第一批美国人是在 1784 年乘“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出发绕过合恩角直接到广州的。这次航行的适度的利益激起了仿效。其它港口和商人,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商人,于是从事到中国的贸易,也到马尼拉、爪哇、巴塔维亚、印度、阿拉伯和甚至非洲东海岸。贸易在持续进行着,但贸易量却时大时小,并且遭受到封港和 1812 年战争的严重干扰,但不久就超过了通过地中海的路线到近东贸易的价值。在这些私人贸易航行上挂星条旗的船在两个美洲的西海岸上下航行,并且有时到过南海的许多小岛。远东贸易集中在广州,该处是准许外国货到中国销售的唯一港口。它的发财的第一笔生意同西半球的丰富的毛皮存货有关:南大西洋的海豹皮和美洲西北海岸的水獭皮。从东亚带回来有销路的南京棉布、香料、茶叶,和新奇的东方出产物品。我们已经谈过中国的毛皮生意对俄勒冈问题发展的重要性。同从欧洲到广州贸易的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商业超过除英国外的任何国家,英国的贸易额当时大约为美国的五倍。

有些美国船通过另一条路离开大西洋港口,往东到亚洲,带着硬币、人参、从美国搜集的毛皮和一些更为普通的船货,驶往欧洲以及非洲和印度洋的殖民地的停靠港口。在 1812 年战争之后,同中国的贸易稳步上升,但在任何时候没有超过美国总出口额的百分之三。毛皮生意衰竭之后,在同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成长中的美国的农产品和提炼品(主要是后者)的平常交易发展起来了。

与外国相比,美国的第一个关税法案(1789 年 7 月 4 日)给予由美国船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货物很大的优惠,但除此而外,政府只是消极地听从海上贸易者的主意。任命了待遇很低的领事或海员代理人到加尔各答(1784 年);广州(1787)年;法兰西岛(1794

年); 巴塔维亚(1807年); 马尼拉(1819年); 檀香山(1820年)。托马斯·阿普·凯茨比·琼斯舰长率领舰只于1826年到太平洋游弋, 在路程中他同塔希提、社会群岛和夏威夷的土著统治者们谈判了友好接待美国船只和美国商人的条款。琼斯认为这些条款是临时性的协议, 只在能知道总统的意见以前有效。而总统对这件事的意见却始终未得到通知^①。英国和西班牙对美国同它们的美洲殖民地的贸易给以种种限制, 但它们的远东殖民地港口却敞开大门, 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区别对待^②; 法国的港口如象法兰西岛(即毛里求斯)一如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也完全开放。

在广州的中国贸易的竞争上, 美国商人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欧洲列强是通过他们的在非洲, 印度或马来群岛的中途殖民地到达远东的——他们在这些殖民地上建立了海军基地, 从那里他们很容易地集中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国民和推进他们的商业的和政治的利益。另一方面, 美国除了偶尔进行的软弱的海军训练巡逻外却没有任何陆军或海军的支持——美国的最近的海军基地是在地球那一边的大西洋海岸。美国政府很少注意它的冒险在亚洲做生意的公民们的活动或利益, 也无力在发生麻烦的时候帮助他们。在理论上, 中国人在他们非常有限的同西方世界进行的商业接触中, 对不同国籍的人并不加以区分; 在中国人的眼里, 所有外国人, 特别是为了赚钱远离自己祖先坟墓到外面游荡的那些人, 都是粗野的野蛮人^③。一种合作和联合保护的精神, 一个统一战线, 在广

① 米勒认为这些条款有足够的价值而把它们包括进他的严格编辑的《美国的条约和其它国际法案》中去。

② 杰伊的1794年条约第十三款允许美国船只和商业进行从美国到英属东印度港口之间的直接贸易, 并且通过地方特许, 在欧洲战争的时候, 常常扩展到允许美国船载运印度产品到其它亚洲港口。参阅下面引的登尼特(Dennett)著作, 第27页。

③ K. S. 拉图雷特(Kenneth S. Latourette)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早期关系史, 1784—1844年》(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耶鲁大学出版社, 1917年)一书中详细叙述了美国和中国在订约以前时期的关系。

州以下的黄埔停泊处的所有国家的商人和航海人员中间自然形成——在对付亚洲君主上，西方的个人们，包括派到东方的外交人员，比他们的各自政府更自然地合作；但当这种合作到了要受到运用武力的考验的时候，美国人就置身于事外。由于自己缺少实力，他们势必采取一种尊重中国主权，与中国当局妥协和解的政策，因为他们的贸易和运气都依赖于中国当局的宽容。因此中国人和美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总的来说，虽然有一些例外，还算是成功的。在344 广州的美国商人的政策日后就成为美国的政策：尊重和保持中华帝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为自己的公民要求取得同其它西方国家不时用武力强迫中国所给与的同样贸易机会。把领土让与外国就会意味着美国贸易被排斥。在另一方面假如中国官员任意停止英国或法国的贸易，他们就会遇到麻烦；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军舰就停泊在不太远的地方。

到亚洲去的第一个外交使节是埃德蒙·罗伯茨，他是一个在印度洋地区的早期美国商人，后来当了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他和美国驻巴塔维亚领事的再三的要求，英国最近同暹罗所订的条约（1826年）以及美国船在苏门答腊海岸被土著抢劫激怒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政府。罗伯茨接受了同交趾支那，暹罗，麦斯卡特和日本订立条约的任务。他是以三只小军舰的舰队“司令的秘书”的低头衔出去的。交趾支那的统治者拒绝接待他，除非他“叩头”——一种拜倒地上的敬礼姿式——罗伯茨自然拒绝这样做。他随即到暹罗，在那里签订了一个同英国的条约相似的条约（1833年），以后又到麦斯卡特，同这个小王国的苏丹签订了一项条约，麦斯卡特的苏丹同时也是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的统治者。他在1835年回到东方来交换条约批准书，在此期间国务卿促其前往日本。罗伯茨把日本之行推延为他的最后的而不是主要的使命，后来在赴这个岛国的途中死在澳门。就同日本交涉的成功的机会来

看，罗伯茨到达那里与否都是一样的：幕府当时还未准备向世界打开大门。罗伯茨同马斯卡特和暹罗签订的条约按最惠国条件把这些领域开放给美国贸易并规定了固定的最低关税。自此，美国同暹罗的关系直到1942年暹罗对美国宣战之前一直是良好的。

345 同中国所订的第一个条约来源于1839—1842年英中战争带来的情况。所有到广州的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商人——只有极少数的个别例外——都做鸦片生意，但大多数是英国人做的，他们能从印度运鸦片到中国去，获得最大利润。中国皇帝为了道德上的原因同时也出于对外国野蛮人的憎恨试图根除这种毒品贸易。美国人愿意照办。英国人拒绝遵从，因而他们的贸易被切断了。鸦片问题固然是后来发生的战争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商人希望为他们的贸易谋取有利的条约保证。他们把商船从黄埔港撤走。英国海军封锁了这条河。很明显，引发的战争将强迫中国接受英国的要求，并且英国假如打胜的话，还将为自己的商业开放许多港口，还可能是只对英国开放的。美国商人向自己的政府吁请保护他们的利益免受任何可能发生的这种排斥。泰勒总统派凯莱布·C. 库欣为全权代表，他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名委员^①。英国在战争结束时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库欣接到指示要他“获得美国船和美国货按英国商人享受的同样有利条件进入这些港口(广州、厦门、宁波、福州和上海)的权利”。他没有得到要他保护鸦片贸易，或获得一块如象根据条约割让给英国的香港那样的土地的指示。

库欣的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因为中国人自己已经在南京条约里面说允许欧洲其它国家的国民“为了贸易的目的进入新条

^① C. M. 富厄斯(C. M. Fuess):《凯莱布·库欣的生平(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两卷本,纽约,1923年); T. 科尔尼(Kearny):《蒋廷黻文件(The Tsiang Documents)》载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第十六卷(1932年),第75—104页。

约开放的港口,英国人不得反对”。因此制定后来的门户开放主义所由发生和扩展的原则的是中国自己。美国的一个海军军官卡尼司令和他的舰队似乎对这个立场也有所鼓励。他争取到在新开放的条约港口完全平等地对待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贸易的临时协议。

库欣的望厦条约(1844年),在交涉过程中曾使用过隐约的威胁,规定在条约开放的口岸给美国公民和船只按规定的关税和吨位税表和最惠国保证的全部贸易特权。在条约口岸可以设置领事,美国公民可以在那些地方居住,租用土地进行住宅和营业建筑,以及进行医院,教堂和公墓建筑。他们可以自由雇用中国教师,翻译和仆人。英国条约里面明显地包含了一些治外法权的权利,但英国更多地依靠新近割让的香港岛上的海军基地来保护它的臣民。美国没有任何海军基地,只得依靠明白的治外法权形式的外交代替品;但它同意不把这种保护扩展到走私的人或鸦片生意。应当说,走私者宁愿如此而不愿采用英国条约的条款,那种条款使英国政府负有对违反关税法和条约规定的自己的臣民采取警察行动的责任。同美国所签订的条约相类似的条约在中国与法国、比利时和瑞典—挪威之间直接进行了谈判^①。通过它的以前条约的最惠国条款的运用,英国于是照样获得望厦条约所给与美国的所有利益,特别是此时非常肯定地规定的治外法权的权利。事实上,这个第一个美国条约成为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当中直到天津条约签定(1858年)之前国际关系的法律模式。

根据中国原来作为抵制任何一个如象英国的国家的独占垄断的主动行动,对所有在中华帝国的外国的平等的商业机会的门户

^① 亨利·科迪埃(Henri Cordier):《中国通史及其从最早年代到满清王朝的垮台阶段的对外关系(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四卷本,巴黎,1920年),第四卷,第26页。

开放就这样扩展开来。“这成为一种方法：自此以后每一个国家都能为自己取到别国从中国用武力勒索或用欺诈方法骗取的任何特权而不对获得这些让与的方法担负道义上的责任。在以后的年代里，中国在插手于国际事务中时往往必须单独行动去对付整个联合起来的一夥强国，它的最不讲理的对手对它所行的一次欺骗，可以使这一夥强国全体都得到同样的利益。”^① 虽然如此，平等对待的原则成为防范独占剥削（假如不是防范略取领土的话）的一种方法，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可以促使它的几个敌国互相反对。

扩张主义势力在五十年代里在美国的突进使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新条约港口上海同美国更接近了。1846年的俄勒冈条约，同年同新格拉纳达订的地峡条约，1846—1848年的占领墨西哥，和1849年的加利福尼亚的采金热等等，这些都是在新近得到的太平洋海岸迅速定居的前奏。快船的采用，地峡铁路的修建，以及后来的使用蒸汽发动的船在横贯太平洋的航道上航行来从事贸易，使同东方的接触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十年中增加了几倍。新的事件和发展加强了东亚在将来美国的商业和政策上的重要性。在印度和香港具有设防的海军基地的英国成为东方的统治力量，美国的重要的贸易竞争者。在世界那一边同英国政策竞争，美国不得不依靠没有武力支持的外交代替品。这就是如望厦条约所制定出的早期到广州的经商者的政策，一种和解和道义上支持中国完整的政策，同欧洲的威胁和瓜分的政策相对立。在其中还夹杂有在中国与欧洲列强发展着的斗争中对中国的同情，这种同情是由占大多数的美国新教徒传教士们的努力所产生的^②。这种对中国完整的

^① T. 登尼特 (Tyler Dennett): 《美国人在东亚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纽约, 1922年), 第 111 页。

^② 1851年到中国的一百五十个新教徒传教士中, 十五个来自大陆欧洲, 四十七个来自英国, 八十八个来自美国。前述登尼特的著作, 第 181 页。

支持,这种对中国友谊的有意的和必要的保持,使美国能够向中国提出商业特权的名义上相等的一份的要求总是获得成功,但绝不是欧洲列强以侵略强行要求的领土割让^①。

同亚洲的接近不断地强调和增加了夏威夷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夏威夷最初是一个通过合恩角和西北海岸长途跋涉到中国去的经商者的休息地点;以后成为北太平洋的捕鲸基地;再后成为到日本去的商业的踏脚石,我们不久就要讲述到开辟与日本往来的美国外交;最后,汽船航行的出现使这个群岛成为不可缺少的加煤站的合理地点。这个群岛距离美国本土比距离任何国家的属地更近;美国占有它不会威胁任何国家的领土,但其它国家占有它则非常容易成为对美国本土的一个威胁。它至少是一个在粮食方面自给的海军基地,它在海洋的交叉路口控制着横贯太平洋的贸易。此地距离美国的有效的海军力量既然是这样远,很奇怪的是与太平洋有关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特别是英国,俄国,法国或西班牙——为什么没有在美国成为太平洋强国之前把这些岛屿抓在自己手里。然而,到过夏威夷的那些国家的海军军官们肯定不是没有活动的。 348

虽然这些群岛是在1778年被库克船长发现的,并且自此以后成为所有航行者的一个中途站,但美国的影响从最早的那些年代起就是占优势的。在十八世纪的末叶经商者就到了那里。美国的传教士在1820年就在檀香山定居,把态度温和的土著和所有遥远西方海洋国家的任性的航行者之间的生硬的接触变得融洽了。有

^① 新条约制度允许外国领事和其它外侨在五个条约港口居住。在上海,英国领事租借了土地,以后他宣称对这些土地以及从居民转租来的土地有完全的控制权。美国领事事前对租地一事曾有谅解,他对这项控制提出抗议;以后美国的专员,在1863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也提出抗议。因此在一开始美国就提倡反对在条约港口建立独占的外国租界,这样的租界可以容易而迅速地发展为势力范围和保护领。代替这种租界,一个按工部局章程组织的公共租界在公认的中国主权之下发展起来了。

些传教士成为土著国王的政治顾问。在琼斯舰长同夏威夷国王于1826年签订了协约——它的约束力是值得怀疑的——之后一个英国军官在1836年签订了一个条约，一个法国海军指挥官在1839年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些是其它条约的先驱，通过那些条约，列强在没有真正的治外法权的条款下承认了夏威夷的独立。在这个群岛上的欧洲势力导使泰勒总统听从韦伯斯特国务卿的建议，在1842年声明说美国对夏威夷的独立没有任何企图，但看到任何其它国家占有这个群岛，使之殖民地化，或颠覆土著政府将感到“不平”。这样的威胁发生于1843年，当时一个英国军官夺取了这个群岛。卡尼舰队司令当时正从中国返回，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国务院也提出了抗议。英国迅速否认这个劫夺。在阿伯丁勋爵推动下(1843年)英国和法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约定尊重夏威夷群岛的完全独立。美国拒绝了参加接受这样一个义务的约请。美国的第一个外交代表(不同于领事)在1843年作为专员去到夏威夷。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获得大大加强了这些群岛对现在面临着太平洋的美国的的重要性。在墨西哥战争之后，布坎南国务卿于1848年8月28日指示派到檀香山去交涉订立条约的专员：“假如由于这个群岛的虚弱，诱使英国或法国夺取了它，那对我们的利益将是极端有害的；特别自从我们有了新近从墨西哥得到的太平洋沿岸的领土之后更是如此。”当法国在1849年暂时夺取了檀香山的时候，克莱顿国务卿宣称美国“绝不能坐视它们被置于其它任何国家的统治或独占控制下而不管。我们自己也不垂涎它们的主权”。法国人撤退了。

在夏威夷群岛以东四千英里，半个世纪以前，联邦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对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采取了辉格党和民主党现在对夏威夷采取的同样态度。同样地，不过在时间上往后一些，这个政策将导致合并。第一个条约(1849年)限于友好、通商、航运和引

渡。1851年，夏威夷国王对法国可能侵略感到惊恐，企图把自己的领土割让给美国。按照辉格党的政策，韦伯斯特国务卿（再次出任）拒绝了这样的提议。他重复说虽然美国的目的是严谨地注意夏威夷的独立，但他绝不允许见到这些群岛被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占有。辉格党把对古巴的同样政策应用于夏威夷。菲尔莫尔总统将会愿意，假如他继续留任的话，同英国和法国缔结一个关于夏威夷以及古巴的三方的自我克制的条例；但1852年的选举阻止了这件事^①。在佩里同日本缔结的1854年条约之后，皮尔斯总统的一个全权代表交涉了一个合并条约（1854年），这个代表是一名行政长官，他曾公开宣称他将“不会对扩张有怯懦情绪”。在英国提出尖锐抗议之后，皮尔斯拒绝了这个条约，理由是它不明智地规定了接纳这个群岛为联邦的一个州。有理由相信夏威夷人在英国驻檀香山公使指教下把这样一个规定写在条约里，使其必定不能订立。一个互惠条约在1855年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以后在1867年又未被批准，当时认为这是合并的一个步骤而公众舆论这时正在反对扩张^②。虽然不愿承担主权上的责任，美国仍然决心阻止任何国家占有这个群岛^③。格兰特总统宣称，“我们希望另外类似的前哨地点（例如百慕大）不要落入那些有朝一日可能利用它来使我们遭受侵害的人的手中。”这个既定的政策体现在最后在1875年批准的互惠商约中，该条约规定夏威夷群岛的任何领土不得租借给任何第三国或由任何第三国处理，以及这个条约上的所有特权

① R. W. 范·阿尔斯太因 (Van Alstyne): 《英国、美国和夏威夷的独立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awaiian Independence)》，载在《太平洋历史评论》，第四卷（1935年3月），第15—24页。

② 霍尔特的前述的《被否决的条约》，第102—106页，解释这个条约的被否决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制糖业者的嫉妒。

③ 参阅“自从本政府派第一位领事官到夏威夷以来美国同夏威夷正式关系的报告”，1893年2月15日。参议院行政文件第77号，第5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J. B. 穆尔的《国际法汇集》，第一卷，第475—509页把夏威夷政策加以更简要的分类索引。

不得给与任何其它国家。

在这里我们必须转回来再谈中国。在该世纪中叶淹没着这个巨大国家的内部动乱中，美国在维持这个帝国的完整上和皇室的最高地位上给以道义支持。俄国，法国和英国则利用了这个局势来强索更多的让与。法国和英国联合对中国打了一场战争（1857—1858年），这一次战争是为了保证1842年条约得到爽快的执行，获得到全中国各地的机会，及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使它们的代表能随时得到适当的接待。由两个交战国同时谈判的，以及又由俄国和美国分别谈判的四个单独的天津条约（1858年）开辟了另外十一个条约港口给外国贸易和侨民居住。在治外法权保护之下，外国人可以从这些地方到中国各地去旅行和经营商业。英国条约进一步规定了外交代表到北京的权利^①以及对基督教传教士和信教者的容忍。附带的关税协定把进口税一律定为百分之五——由外国官员在中国主权之下征收——并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其使节埃尔金勋爵^②曾在天津条约中强迫中国作出主要的让与的英国在这个世纪中始终是远东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它的1858年条约为其它国的关系起了模型作用，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在351以后四十年中固定下来。法国是它的盟邦，俄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中立国^③；美国是一个真正的中立国；这三个国家把通常的最惠国条款包括在它们与中国订立的新条约里，这些条款使它们安享英国所取得的一切特权。较小的国家也仿效了英国的做

① 在这以前，中国朝廷始终限制一切外交接触通过低级官员来进行，最好是在广州。皇家政府避免同外国人接近借以避免接触外国人提出的权利要求，不满和要求。进贡的使节可以被允许到北京，借此支持在群众中散布的幻觉认为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② 他就是在华盛顿交涉最近的1854年马西-埃尔金条约的那个人。

③ 我们说俄国是一个名义上的中立国。它已经利用了中国的内乱和外患在璦琿条约（1858年）中强迫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把乌苏里江东岸的沿海地方留待将来解决。俄国的所得远远超过实际作战的国家：它得到了领土。

法。^①

美国正式拒绝同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②利用中国的困境；但它并不拒绝，事实上是急于接受，按照它的1858年条约，仿效新的外国特权的平等待遇^③，而那些特权是由欧洲列强的领土侵略产生的。进一步的冲突引起两个盟国采取另外的军事行动（所谓的第二次英法联军对华战争，1859—1860年）强制执行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条约规定。它们占据了满清帝国的首都。在结束这个再起的战争的和约里，英国强迫割让九龙，该地是中国本土伸到香港湾而控制着这个英属岛的地岬^④；两个国家并且强迫中国偿付这后一次军事行动的费用。俄国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形势来取得中国承认俄国对沿海地带的主权。法国鉴于中国日趋衰弱，出兵侵入它在印度支那的属国，获取了（1862—1867年）交趾支那的一些省份，并在另一次对中国的战争中把安南和东京（1882年）置为自己的保护领。英国继占据印度之后，在1885年又占据了一直为中国的属国的缅甸，并进而向北方扩展，把尼泊尔和不丹置为自己的保护领。中国于是被剥掉了它的松散的外沿领土。巨大的核心于是暴露在外了。

1861年到达北京的第一任美国公使是蒲安臣。同所有美国 352
驻华使节一样，蒲安臣急于同欧洲各国的代表合作来谋求条约规定的执行，但，一如历来的情况，美国方面的合作所能做到的只是

① H. B. 莫尔斯(Morse):《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三卷本,纽约,1910年),第一卷,第512—570页。

② 英国向华盛顿建议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中国,这个交涉未获结果,此事记载在丹尼特的前述著作中,第300—303页。它也将是对待日本的类似行动的开端。

③ 美国全权代表 W. B. 李德(William B. Reed)交涉了一个单独的权利要求协议,由中国付给735,288元来满足由于中国违反1844年条约美国所提出的要求。一个美国委员会判决美国债权人的要求,定为489,694.78元,把钱分给他们。1885年的国会法案把余数连利息共453,400元退给中国。

④ 1898年,割让的九龙的面积又扩大了。

和平劝告。当南北战争占据了美国全国的精力的时候，事实上更是如此。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人格的力量，蒲安臣在北京树立了如此的一种道义上的权势以致他实际上被中国委任为其对外的第一个全权代表。在他于1867年辞去美国公使的职位以后，他成为中华帝国派到所有西方国家的一位使节。作为中国三人代表团中的最显著的成员，他在华盛顿同西沃德国务卿交涉在美国的天津条约中另加八款。其中一款给中国到美国访问、旅行和居住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就把美国向中国的移民开放。在伦敦，蒲安臣成功地缓和了英国对华政策。在去欧洲各国首都的外交旅行中他死在圣彼得堡(1870年)。中国的档案^①表明蒲安臣并不象他自称那样是代表团的团长。他有两个中国同事。但他的这个特别任命证明中国对他和他的国家的友好政策的巨大信任。

在获得加利福尼亚之前，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兴趣，如同对暹罗和麦斯卡特一样，是附随中国而来的。在十六世纪基督教传教士闯进日本和通过一次大规模迫害根除了基督教之后，日本把自己关闭起来与西方商人、西方文化和西方军舰相隔绝。只通过一个入口透进西方世界一点微光——那就是在长崎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商店，它享受日本给与的独占的特许。即使这个商店，也是在多石的小岛出岛上，象一所隔离病院一样，在港口中被与外界隔离开来。二百年来对于封闭的日本王国来说，长崎是一把锁，而出岛则是锁眼。除少数几个机灵的商人外，美国人对这个封锁的王国并不感兴趣。签订一个条约的唯一必要性是保护偶然失事遇难的水手，这些人落在日本人手里——由于日本同西方世界的隔绝——就很难回家；以及把偶然在海上或横渡太平洋时候从破损的帆船上救起的水手送回日本。在那些早前的日子里，据说失事遇难

^① K. 比格斯达夫 (K. Biggerstaff): 《蒲安臣使节 (The Burlingame Mission)》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四十一卷(1936年7月)，第652—682页。

的美国水手常常被日本人虐待。同日本缔结条约的委任曾送给在远东执行任务的美国全权代表们^①，但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实际到过日本，当时公众对这个事实并未感到失望，甚至没有注意到。比 354
德尔司令在 1846 年到中国交换条约批准书，率领两只快速舰进入江户湾（东京城就在它的源头），询问日本是否愿意订约把港口开放给美国。日本人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小看了美国人，因为比德尔急于避免引起冲突，没有报复一个日本兵士打了或者推了他的侮辱。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同日本的任何交涉，假如要使其产生深刻印象的话，不单是显示宽宏大量，还须显示力量以及令人确信的使用力量的意愿。

在比德尔访问日本以后不久，同日本订立通商友好条约问题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中国的新条约港口上海的贸易日益增加，以及在太平洋上开始使用汽船航行似乎指示出把日本作为必不可少的上煤的停靠港口的必要性。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展使许多美国船更接近日本的水域，在那里，船只失事的事情越来越多。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突然归属预示出同所有亚洲国家贸易的远大前途。日本当时距离旧金山只有三四个星期的航程，比欧洲近得多。美国东部的工厂主，特别是纺织业者，由于地峡铁路的修筑和将来有朝一日开凿运河的前景，期待参加这个将来日益扩大的贸易。劝导菲尔莫尔政府的国务卿克莱顿考虑同日本签订一个按照同中国所订的 1844 年模式的条约的正是这种贸易企业中的一个代表^②。

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欧洲列强在侵略中国的领土：英国从南方，俄国从北方。这些国家的军舰开始在日本的一些

^① 给埃德蒙德·罗伯茨，他在 1832—1835 年同暹罗和马斯卡特交涉条约；给 C. 库欣，他在 1844 年同中国交涉望厦条约；给亚历山大·埃弗雷特，他在 1844 年把权力委托给比德尔(Biddle)舰队司令。

^② 此人是经纪商，“美国和外国代理店”的 A. H. 帕尔默(Palmer)。

港口出现。这个无防备的岛国的居民感到惊恐，唯恐遭到中国的命运。在长崎的荷兰代理人把外面世界的情况相当及时地传达给日本人。例如，他们知道美国最近在一场战争中打败了墨西哥，合并了后者在太平洋沿岸的大部领土。通过出岛的锁眼，西方科学和军事技术的光亮开始射入日本。当西方国家似乎会集在日本的时候，日本本身也正迅速成熟起来，以进行不久之后把它从封建制度转变成现代国家，从孤立状态转变到征服大陆的事业，最后被彻底打败回到本国岛上的奇迹般的变革。

菲尔莫尔总统就是在这种即将到来的转变的形势之下在1852年派马修·卡尔布雷思·佩里到日本去的。克莱顿的继任人韦伯斯特国务卿在一年前就拟好了指示，授权某个海军官员缔结一个附有一些与暹罗、马斯卡特和中国订立的条约类似的贸易条款的加煤条约——“仅只是友好通商来往的条约”。在韦伯斯特死前生病期中，代理国务卿 C. M. 康拉德根据佩里舰队司令本人的建议，重新拟了指示；当时佩里已被任命率领五只轮船和六只帆船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最后的指示强调了在那些海面上保护美国航海人员的责任以及最近太平洋沿岸地区归属的意义：

近来的事件——使用汽船在海洋航行，本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广阔领土并迅速在这些地方定居，在那里发现了金矿，建立穿过隔开两个海洋的地峡的快速交通——实际上使得东方国家更加接近我们的国家了；虽然这些事件的影响还很少有人开始感觉到，但它们与我国之间的交往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这种交往在将来的扩展是不能限定的^①。

这支舰队是支持佩里交涉的“炫耀的说服者”。虽然这位司令兼全权代表握有很大的自由决定的权力，但他所接奉的指示强调了他的使命的和平性质。指示吩咐他除了保护船只和他所率领的水手们的自卫行动或报复施加于他或他的官员的人身侮辱^②外

① 前述丹尼特的著作，第 262 页。

② 与 1846 年对比德尔的侮辱和日本的解释相对照。

不得使用武力。人们提醒他，总统无权宣战。在这里说一下这点是适当的，除非在舰队开往的日本海外，不会发生需用武力来报复的对佩里或其官员的侮辱行动的。司令随身携带了总统写给皇帝的适宜的礼节信件和大量礼物，特别是新的机械器具，包括一套电报机和一套带有车厢和钢轨的蒸汽机车模型。

这支舰队只包括两只蒸汽机战舰，比原来计划的力量小，在 1853 年 7 月 8 日开进江户湾，在进入日本港湾时，战舰的甲板上都清除了杂物，做好战斗准备。佩里拒绝遵照日本的立刻把船撤至长崎的命令，但他把总统信件交给皇帝的顾问官——两位职位高的亲王之后，率领舰队离开日本。他通知说他将要在明年春季率领更大一支舰队再来。假如在那个时候总统的信件还未送给皇帝并且得到适当的回答的话，他“将不对发生的结果负责”。日本人在那个时候对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在离开日本的时候，佩里占有了在日本群岛东南五百英里的小笠原群岛的一些岛（以后成为日本主要海军基地之一），并在琉球群岛（位于日本和福摩萨之间的一串群岛）的冲绳岛上设置了加煤基地。他同这个群岛的统治者订立了一个条约^①。佩里的宏大计划是占有小笠原、冲绳（大琉球岛）和福摩萨，作为美国在远东的领土据点的开始，借以支持他所谓的美国在那一部分世界仿照欧洲列强并与其竞争的美国的“海上权利”。由于他的政府^②对于他的建议的否决，这样

^① 参议院批准了（在 1854 年 7 月 11 日签订的）这个条约，该条约规定保护失事遇难的水手并把那霸（Naha）开辟为贸易和海运补给品供应地点。日本在 1872 年恢复了对那里的主权并承担了维持美国的条约权利的责任，美国予以真诚的默许。

^② 没有证据来认为佩里的建议可能被接受，假如辉格党继续当权的话。这样的，以及进一步笼统的论断说联邦主义者——辉格党人是比民主党人更富于侵略性的扩张主义者（见查尔斯·A·比尔德 [Charles A. Beard]：《国家利益的概念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纽约，1934 年）在南北战争以前这一阶段并不适用。杰斐逊主义者在 1812 年想征服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后来在杰克逊的时代里在吞并加拿大的冲动上民主党和辉格党是一样的。反对拥护奴隶制的侵略者的计划和反对吞并古巴的是辉格党人。在皮尔斯时代试图吞并夏威夷的是民主党政府。佩里接奉的指

的变更被推延了半个世纪。

当佩里回到日本的时候,发现日本当局已倾向于和解政策。这位美国海军军官在最巧妙的交涉中,在大胆的显示尊严中掺杂着隐约的威胁。他表示假如日本拒绝签订一个同中国所签订的相似的条约,美国可能增派更多的船前来和发给其指挥官更严厉的指示。他获得了(1854年3月31日)一个附带极为有限的贸易特权的友好条约。美国的船只和公民被允许进入日本的两个不重要的较小的港口,在北部北海道大岛上的函馆和在江户湾附近本州本岛上的下田,领事住在下田,但未规定美国人的永久性居住地。所有贸易必须在政府的严格监视下用现金进行。“实际上这个条约同一个海难协定差不多,条约上广泛地规定了遇难船员的必需品。它同望厦条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能相比。”^① 它没有规定加煤,没有治外法权条款;但它确实有一个最惠国条款,规定美国可以享受将来给与其它国家的特权^②。

佩里的条约,在美国同时代的外交史上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日本的历史上,以及最后在现代世界史和美国史上则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是日本同其它西方国家缔结类似条约的先声,最后

示是缔结一个类似杰克逊政府同遥远的暹罗和马斯卡特所签订的条约,如此而已。除了皮尔斯关于夏威夷的建议外,在南北战争以前的阶段,或者在哈里逊想吞并夏威夷的1893年以前,没有一个政府想吞并遥远的岛屿;并且必须记住夏威夷距离美国比距离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近。

① 丹尼特前述著作,第269页。

② 佩里的使命和交涉在F. L. 霍克斯(Francis L. Hawks)的《一支美国舰队遵照美国政府的命令在美国海军 M. C. 佩里舰队司令指挥之下于1852, 1853和1854年远征中国海和日本纪事(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三卷本,华盛顿,1856年)里面从美国的官方观点加以描述。这是用佩里和他的官员们的原始记录和日记中的资料编辑的。一本新近的著作是A. 沃尔沃思(Arthur Walworth):《日本海上的黑船(Black Ships off Japan)》(纽约,1947年)。

导致西方的工业、军事和外交技术被一个有高度文化的、社会结构纯一的、好战的民族所采用；这个民族，一旦开始自己的事业以后，决心在成就上超过西方，同时还保留和珍爱自己祖先的性格和精神。没有一个人当时能看到佩里的条约意味着亚洲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亚洲的力量是在下一个世纪才被充分认识到的。

在同其它国家所订的每一个新条约中，日本给了附加的特权，美国根据最惠国待遇也得到了这些特权。海军上将詹姆斯·斯特林爵士率领一支英国舰队，为英国缔结了(1854年)一个附有最惠国条款和些少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驻香港的一支海军在1856年虚张声势地准备要到日本去扩大这个条约的范围。荷兰在两个条约里面(1855和1856年)规定了治外法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一支俄国舰队的司令普提亚廷伯爵未能劝说佩里在1854年同他358采取共同行动，他同日本签订了一个通商，航运和划界(确定两国在库页岛和北千岛群岛的主权范围)条约，规定相互的治外法权和开放长崎、下田和函馆三个港口作为贸易口岸和领事驻地。利用强迫日本进一步开放迄今仍在对外紧闭的门户的形势，还留待一位能干的美国外交家来做。汤森·哈里斯作为美国第一任领事(1859年以后任第一任美国公使)^①在1856年到达下田。他是在日本对俄国人由北方和英国人由南方推进感到十分惊恐的严重关头到达的。他签订了一个条约(1857年)，在书面上规定了由于佩里条约上的最惠国条款而已经得到的治外法权、贸易和设立领事。在1858年他完成了一个协定，后来变成日本在那一世纪的其余年代里同外国的商业关系的基础，如像英国的天津条约之于中国。它规定了一位日本公使和一些领事驻在美国，和美国的外交

^① M. E. 科森泽(Cosenza):《第一位美国驻日本总领事和公使汤森·哈里斯的全部日记(The Complete Journal of Townsend Harris, First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and Minister to Japan)》(纽约,加登城[Garden City],1930年)。

代表驻在幕府将军的首都江户(东京)。美国领事可以驻在开放的港口(六个^①),并可以自由在日本各地旅行。在条约港口之内,美国公民可以永久居住,租用土地和建筑房屋和仓库,并自由信奉任何宗教。条约上规定了固定的关税,对于占从美国进口的货物的大部分的原料税率订得低,对于主要来自英国和欧洲的酒和奢侈品税率订得高。条约约请日本到美国学习造船并购买战舰和平时用的船只。总统同意在日本请求的时候,担任日本和外国之间的调解人。美国的战舰和美国的领事,在中立的义务范围之内,随处给与友好的帮助。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立刻签订了类似条约(1858年),略减了其中一些税率。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余所有的与日本订有条约的国家都获得了这些条约所给予的特权。

359 哈里斯,没有使用武力^②而是以向日本强调指出以下几点而订成了这个条约:(1)美国政府禁止在远东获取领土——它甚至不允许如象已经提出请求的夏威夷这样的一些地方加入联邦;(2)英国和俄国由南方和由北方逐渐在亚洲逼进,可能不久就要发生战争^③,在这场战争中两国之一可能劫夺日本的领土作为作战基地;

① 下田(到1860年),函馆,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庫。

② 哈里斯对日本交涉者堀田老中(幕府执政官日文官名——译者)说,“十分了解美国和日本是不会有变为敌国的危险的”。“不管你是否给与或者不给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总统都不会对你们怀恶意。请确信这一点。假如你拒绝这个条约,我们的关系也不会疏远,只要你能抱着谅解的精神那样做的话。”

日本的委员在同哈里斯谈话的时候,通过秘书,对于所有说过的话都做了逐字记录。正式文件的原本已烧毁,但堀田保留了抄本,他允许东京帝国大学在《幕府时代末期外交关系文书》丛刊(东京,1910—1933年,共二十四卷,在印制中)中发表。国务院远东事务科的E. H. 杜曼(Eugene H. Dooman)允许我阅读了这些文件的译文。其中一些,包括上面所引的一段,由美国驻日本使馆的译员大卫·墨莱(David Murray)博士翻译登载在《美国外交关系,1879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9),第620—636页。

③ 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把两国牵制在近东,对美国在远东的和平外交很有利。

(3)日本最好的保卫受到威胁的本土的方法是“西洋化”，在美国指导之下训练自己按照欧洲的做法来应付欧洲国家；因此日本应当放弃闭关自守政策，允许外国人自由通商，用使敌人相互敌对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独立和完整。哈里斯能举出中国的事例为证，列强在炮口之下刚刚在那里拿到了天津条约的种种权利。他说香港的英国总督正在准备率领五十只军舰到日本来要求缔结一个条约。他说最好是按照同美国和平缔结的那个条约模式，通过体面的条约条件，开放同各国的来往。

他宣称，“我是作为美国的代表来的，绝无意漠视我可能对你产生的麻烦，也绝无意制造纷扰。总统命令我获得的东西对日本将是有利的，但我们无意违反你们的意愿和用武力来获得这些权利。但你应当记住假如你拒绝这些建议的话，将不可避免地来到的灾难。这种危险不会来自美国，而是来自别的国家……假如接受我现在向你提出的这个条约，没有其它国家会要更多的东西了。假如我向欧洲人展示这个条约，他们都会希望缔结类似的条约，而事情只通过派一个公使前来就解决了。”^①日本人已经从荷兰方面得到关于好战的英国的计划和英国在中国战争中的破坏性质的夸张的报告。他们相信了哈里斯的话。

汤森·哈里斯的政策完全符合当时所理解的美国正在扩展的商业利益^②——保全东方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使它们不沦落到遭受任何一个或一群欧洲国家的垄断的剥削的境地。它是一种和平而有利的、外交均势的政策。它也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即保

^① 美国使节在“蕃书调所”(日文原名，按系幕府教授和翻译外文的机构——译者)在十二月十四日(1858年1月28日)同井上“信浓守”(当指井上清直，信浓守为官衔——译者)和岩濑“肥后守”(当指岩濑忠正，肥后守为官衔——译者)的谈话记录。前述杜曼的译文。

^② 最初的日美贸易数额非常之少。1855—1860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和入口总额是212,272美元，只占美国总贸易额的0.0053。

持和发展自己的自然力量，直到自己强大到足以破坏这个均势和开始确立自己在亚洲的霸权。哈里斯曾预言道，“假如你接受我的建议，日本将会成为东方的英国。”^①

在京都皇帝朝廷上提出新的与外国订立条约的政策的时候，幕府将军的首相堀田“老中”用奉承的狡滑的词句辩解说，“在现在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中，没有一个高尚或卓越到足以统治宇宙，或德泽普及全世界的。使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统治者无疑是符合天意的。”为了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帝国，第一步必须通过友好或同盟条约，研究外国事务，并且“在同外国建立关系中，目标必须永远是为取得对所有国家的霸权打好基础”。声明继续说：

361

“当我们的力量和国家地位被承认之后，我们应当率先惩罚违反国际利益的原则的国家；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当同与我们持同样原则的国家携手合作。这样组成的一个联盟也应当用来保护无害的但无力量的国家。这样一个政策不是别的而只是执行天命托付（给我们）的力量和权力。我们的国家威望和地位这样就得到了保证，世界各国将尊奉我们的皇帝为所有国家的伟大统治者，而他们将奉行我们的政策和服从我们的判断。”这个声明的结论说，“现在是世界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所提供的使我们抛掉三百年来的传统政策的适当时机，我们应当以统一的全国的努力来抓住这个实现上述等待着我们国家的伟大命运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我恭敬地请求迅速准许开辟同外国的往来。”^②

虽然如此，但这些条约仍然在没有得到天皇的允许的情况下签订了。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前夕，第一个日本外交代表团到达美国的时候（1860年5月），美国已经同地球上所有文明的独立的国家签

^① 美国使节哈里斯在“蕃书调所”在十二月十九日（1858年2月2日）同井上“信浓守”和岩濑“肥后守”的谈话。前述杜曼的译文。

^② P.J. 特里特（Payson J. Treat）的前述著作，《美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第一卷，第67页所引。关于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我大部分依赖这部标准著作。特里特从佐藤（Satoh）的《堀田“老中”的生平（Life of Lord Hotta）》引用了这个文件。

订了条约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个共和国幸运地同每一个国家和平共处。在这次战争当中，在实行一项同欧洲各国在远东积极合作的政策方面采取了最初的步骤。日本同外国各国所订的 1858 年条约是以“大君陛下”(幕府将军)的名义订的。当佩里到日本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怀疑幕府将军在这样属于君权的行上的权力问题。在江户的幕府将军朝廷几个世纪以来从一个王室大管家的地位逐渐接管了统治帝国的实权，留在京都的天皇差不多变为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事情正在迅速变化着。日本的贵族或者“大名”(日本旧时诸侯的称呼——译者)利用了群众仇视外国人的心理作为推翻幕府将军而建立在天皇之下的另一个政权的一种手段。他们强迫堀田“老中”告退并限制他的权力，虽然这位政治家是尊敬天皇的。他们杀害了在江户的最强有力的大臣和同外国订约的主张者井伊“大老”(原文为“Lord Ii”当指井伊直弼，幕府最高执政官，日文名“大老”——译者)。反对外国人的骚动发生了，谋杀事件不断发生，美国使馆的一个翻译员霍克森在 1861 年也被杀害了。这种事件正是日本政府在 1857—1858 年同哈里斯交涉时候所担心的，假如过于骤然开放这个国家的话^①。在英国的使馆被焚烧之后，美国的使馆也被焚烧了(1863 年)。名义上受条约 362 保护的外国的国民在民众暴乱中却遭到侮辱，虐待和杀害。排外分子向法国，荷兰和美国的船只开枪射击。

很明显，为了在日本维持新条约，外国必须进行报复。美国船“怀俄明”号在日本水域打毁了两只向其开火的敌对的“大名”的船只。英国海军轰炸并毁坏了鹿儿岛城和那里的几只船。国务卿西沃德允许一小只美国(租用的)武装船参加九只英国的，四只荷兰

^① “当我们对你说政府严重关切到群众的情绪，我们不是在进行没用的辩论”。井上“信浓守”和岩濑“肥后守”在“蕃书调所”在十二月十八日(1858 年 2 月 1 日)同美国使节哈里斯的谈话，前述的杜曼的译文。

的和三只法国的战舰对敌对的“大名”的长州采邑内的下关进行惩罚性的轰炸（1864年8月）。这种国际性的惩罚征讨得到幕府朝廷的暗中认可。美国得到了向日本索取的三百万元赔偿中自己的一份。在1883年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退还了“作为总是促进着美国对日关系的公道和公正精神的有力表现”而接受的^①这笔钱，并不再提出要日本建造一所新的美国使馆的要求。

下关事件在排外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制止了它。列强这时（1865年）得到了皇帝对他们的条约的批准，还附带一个类似中国那样把关税减至百分之五的新的协定。顽强的“大名”们了解到日本不能抵抗外国人除非他们也采用后者本身的技术。他们推翻了幕府将军，把皇帝置于无可争议的宝座上（1868年），改变了他们反对同外国接触的政策，把日本在一个世代（明治时代）内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从一个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强国，这是近代世界史中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在日本第一个大胜利即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前夕，不平等的关税和治外法权的负担等等在条约的总修改中（1894—1899年），所有奴役性的条款统统被废除（在1911年），并把帝国按照西方的样子完全自由地开放与外国的接触。在这之前汤森·哈里斯的条约一直是日本国际关系的基础，如同埃尔金勋爵的1858年条约对中国一样。日本在没有被占据领土和没有丢脸的情况下开放了自己的门户，这应归功于美国和两位卓越的和具有同情心的美国外交家汤森·哈里斯及其继任者罗伯特·H.普鲁恩。

363 当然，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与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化——就门户开放在最初的短时间内限于在中国（包括条约口岸和地区）所有国家的贸易机会均等的定则而

^① 约翰·W.福斯特(John W.Foster):《美国的东方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纽约,1903年),第194页。

言——之间是有一种历史上的联系的。这是作为美国早期远东外交的基础的商业最惠国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假如美国没有得到菲律宾的话，门户开放也不大可能作为美国的一项主要政策呈献给世界。在1899年之前最惠国条约的定则只是单只对中国的。在1899年之后，我们将在第二十七章看到，美国把这个格式扩大为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获得一项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中国的完整的协定的企图。这是一个大得多的外交规则，并且是一个根本性的变更。人们常常会想到西沃德在远东的外交也制定了1900年义和团暴乱时期美国所回到政策：同欧洲各国合作来保障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结构。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地这样说。美国参加下关讨伐就是打破这个政策的一个孤立事例。假如西沃德不急于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培养外国政府的好意，这件事也许本来就不会发生。我们下面就将谈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外交史。

第二十一章 南北战争

(1861—1867年)

内乱招致外患。这是一个外交上的原理。南北战争在美国外交史中是一个独特的阶段，因为自从美国在1789年建国以来这是把这个共和国真正束缚在内部动乱中的唯一的时期。在此期间它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什么在灾难时候会强加于它的不利条件呢？

国家当时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来专心致力于一场内战。当它失去抵抗力的时候，它没有可以被别人夺取的重大海外利益。它没有防守薄弱的边疆可供强大而蛮横的邻国利用机会来侵略，如像在欧洲司空见惯的。当同英国在中立权利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防卫薄弱的加拿大将对英国挑起冲突的念头起一种遏制作用。主要忧虑的事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防止国家的分裂，而分裂正是世界列强所最适意的。除了防止外国承认南部联邦以维持联邦的完整这个主要的问题外，有两件突出的随时有失去的危险的东西：当时海上最大的商船队之一的美国的商船队，假如南部联邦能在善意中立的外国建造一支海军就可能危及这支商船队，和门罗主义政策；美国一旦爆发内战，这个政策就会变成一纸空文。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人在这些年代的主要关心的题目是：外国承认南方为交战一方的地位或甚至其独立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英国的）中立权利和中立义务的问题；以及保卫门罗主义的问题。本章将讨论前两个问题。它们自然涉及欧洲对美国的总的态度。

当作为对于任何抱有共和制与民主理想和献身于这种制度的

一个国家是否能长期存在的第一个巨大考验的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成功的共和式的政府和民主制在美国的出现并没有使欧洲各国的统治当局对美国有好的印象。英国虽然长期以来实行了代议制政府，但距离成年男子选举权制度还甚远。所有大国的统治阶级都热切相信大西洋那一边的民主制正在胡作非为，终将失败。新民主党人的侵略性外交，美国对废除奴隶买卖的反对，“明显的命运”的振振有词的说法，以及侵略者的掠夺等等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恐惧。过去二十年的英美关系特别充满了一些刺激性问题，始终存在着同一个麻烦的敌人进行一场无益的战争的潜在的可能性。英国舆论对于民主制在美洲遭到的灾难并不是不高兴的。

英国对于民主共和制的美国的迫在眼前的崩溃感到满意不仅仅是基于政治哲学和情感上的原因。南部独立就会分裂新世界上这个可畏的国家并为英国利益向这个半球的前进消除一个障碍。它还将拆毁在南部市场上保护北部各州竞争性工业品的大部分关税壁垒。它还将使棉花供应的一个来源摆脱华盛顿政府的政治权力（英国有四百万人直接或间接依靠纺织工业生活）。除为了加强争取扩大选举权和加强民主信念的自由主义者的抱负和反对奴隶制的人道主义者的希望外，没有什么东西迫使母国为联邦的目的祝福的。甚至英国的人道主义的眼光也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被林肯的宣言——旨在把不稳定的边界各州保留在联邦内——弄得有些模糊了，林肯说他不打算干涉一个州内的奴隶制。

法国在经过第二次广泛的民主的试验以后又屈服于另一个拿破仑皇帝。虽然有眼光的观察家可能已经看出他的权力在美国冲突开始的时候已经在下降，但表面上他仍然处在他的权势的顶峰。渴望用“光荣”和威望来把群众从困难的残余共和势力的奋斗中吸引开，他已经发展了一种冒险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新近在克里米亚和奥地利-意大利战争中得到胜利。新皇帝企图在保护领的掩

饰下恢复在美洲建立殖民帝国的计划。墨西哥的政治混乱似乎提供了在那里建立一个作为进一步扩展法国的影响和权力的根基的傀儡政权的机会。挡住他的路的是门罗主义，南北战争损伤了门罗主义的元气，从而为他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提供了便利。因此他迫切希望看到美国分裂为相互仇恨的两部分，同南部订立一个适合于他的目的的条约，但他除非同英国共同行动外不敢采取决定性的承认的行动；因为干涉意味着战争。法国的纺织业也依靠美国的棉花。六十万法国人直接或间接依靠纺织业生活。棉花的供应不足和失业可以为推进法国皇帝在美洲的政治企图提供很好的借口。占优势的表达出来的法国舆论^①支持帝国政策，但是消失了的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则始终对北方表示同情。

西班牙与英法两国的官方观点相同。西班牙的外交部门没有理由感谢美国，西班牙在这场战争期间企图重占圣多明各。奥地利为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的冒险计划提供了傀儡大公，它关心那个冒险行动，并且希望看到君主制的天主教影响在拉丁美洲扩散。欧洲小国对于北部并不是没有同情，但一般都表示冷淡。这种同情在日耳曼各国可能比在其它地方更为普遍；那里的投资者承接了大量的美国债券，由于对美国通货的疲弱的兑换率，这些债券可以非常有利的价格买到。由于本利都由黄金支付，这些债券显然是一项极好的投资。日耳曼各国当时在横贯大西洋的政治中还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②。俄国虽距美洲遥远，但希望使美国继续作为抗衡英国的力量，并急于同北方保持友好关系，借以利

^① W.R. 韦斯特 (W.Reed West):《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同时代的法国舆论 (Contemporary French Opinion 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约翰斯·霍普金斯历史和政治学研究,第四十二卷,第一期,巴尔的摩,1924年)。

^② 斯托尔堡·魏尔尼杰洛德伯爵奥托 (Otto Greff zu Stolberg-Wernigerode):《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im Zeitalter Bismarcks)》(柏林和莱比锡,1933年),第55—76页。

用其港口作为一旦同英国在令人不安的波兰问题上发生战争的时候，准备俄国巡洋舰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制裁英国商业的基地^①。可以说在挽救这个庞大国家免于分裂的生死斗争中，林肯的新政府不能指望任何地方的帮助或积极的同情。研究外交史的人们应当记得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一个大国的瓦解悲叹的，除非另一个危险的竞争国家会因此变得更强大。 367

公认为共和党最杰出领袖的威廉·H. 西沃德出任国务卿，使外国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家们感到不安。西沃德是一位具有高度智力的政治领袖，虽然在逻辑原则上不似林肯那样强。他是一个公然自认的扩张主义者，“明显的命运”的共和党使徒。西沃德宁愿为了以一场对付外敌的共同斗争来使全国团结起来而挑起同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争吵，而不愿因他的党得到胜利而面临可怕的内战的前途。他告诉汉萨诸城的公使说，“假如上帝给美国一个同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开战的借口，那将是重新建立国内和平的最好方法。”^②他的这种见解在他就任国务卿以前已经为外交使团所

① 一支俄国舰队在 1863 年访问了纽约和旧金山。这次访问受到美国的热烈欢迎，美国认为这是新近废除俄国的农奴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一个新近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所作的一个友好表示。这个解释直到 1915 年为历史学家们所接受。1915 年，已故的 F. A. 戈尔德 (F. A. Golder) 教授在仔细查看了俄国档案之后在《美国历史评论》第二十卷 (1915 年)，第 801—812 页上发表了《俄国舰队和南北战争 (The Russian Fleet and the Civil War)》。这篇文章说明这次舰队游弋系俄国预先估计到在波兰问题上同英国可能发生战争，并为了把这支舰队驶出波罗的海到远的海洋，在那里可以击毁英国的商船队。参阅他的另一篇文章：《由一个俄国外交家的眼光看美国南北战争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a Russian Diplomat)》，载在同处，第二十六卷 (1921 年)，第 454—463 页；和 E. A. 阿达莫夫 (Adamov)：《在南北战争时期的俄国和美国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of the Civil War)》，载在《近代历史杂志》第二卷 (1930 年)，第 586—602 页。

② 关于这个时候英美之间的事件的最重要的著作是 E. D. 亚当斯的《英国和美国南北战争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两卷本，纽约，1925 年)。罗兹 (Rhodes) 写的 (1899 年)，钱宁 (Channing) 写的 (1925 年) 和麦克马斯特 (McMaster) 写的 (1927 年) 标准通史用很大篇幅来叙述南北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罗兹的著作着重叙述了英美关系并有坚定的判断；但从那时以后曾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其中大部分 (截至出版那一年) 包含在钱宁的较短的但非常敏锐的分析中。

熟知。这位新国务卿用一种侵略的口气撰写他的第一批文件，好象在为战争铺平道路。就任三星期之后，他在一个名为“提供总统考虑的几点意见”的令人吃惊的备忘录中向总统建议他的出名的“对外战争万应药”：

我将绝对地立刻向法国和西班牙要求解释（关于对墨西哥和圣多明各的意图）。

我将向英国和俄国寻求解释，并派代表到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洲去激发起一股昂扬的本大陆的反对欧洲干涉的大陆独立精神。

并且，假如从法国和西班牙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将召开国会并对它们宣战^①。

368

西沃德提议接收政府的实际领导权来进行这样一场战争。林肯不声不响地把文件搁置起来，让历史学家们在很久以后去加以公布。国务卿不久就安心在总统领导之下在南北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始终在和平的基础上进行美国的外交事务。他虽然缺乏在政府的这个部门工作的以前的经验，但却能十分干练地做这项工作。和平，那就是说，除非没有外国插进来帮助南方。因为假如他们这样干的话，那就意味着战争，对这场战争政府将会作出迅速一致的反应，并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外国承认南部联邦。分裂和叛乱产生了大规模的真正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西沃德希望说服外国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暴乱，并不发生引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法及其中立条款的问题。在南部炮击萨姆特堡三天以后，林肯总统（1861年4月15日）向义勇军发出“收复”被南方占据的联邦要塞的号召。紧跟着（4月17日）南部联邦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布告给征用的私掠船发捕拿特许证。林肯迅速

^① J.G.尼科莱(Nicolay)和约翰·海(John Hay):《亚伯拉罕·林肯,一部历史(Abraham Lincoln, A History)》(十卷本,纽约,1890年),第三卷,第445—447页。

(4月19日)提出封锁南方各港来抵制这种活动,并切断这些港口进口军事和其它供应的商业来源。他着手封锁各分裂州的海岸并宣布任何滋扰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的南部联邦当局都将作为海盗处理。这是企图把叛乱划到不受战争法影响的纯粹国内事务的范畴中去。从前的政府曾拒绝照原样依附禁止私掠的巴黎宣言,现政府却急于无条件地依附这个宣言,但未成功。在英国领导之下各国拒绝了这样的无条件依附,除非只限于这个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但是除了废除私掠的第一款外他们愿意在战争期间接受巴黎宣言。这是因为南方,在受到非正式的征询时^①,已经表示愿意接受除第一款以外的所有款项。虽然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私掠对南方联邦并没有什么用处。外国对私掠船和捕获品封闭了它们的港口,合众国的海军很快把战争开始时候南部装备的六艘私掠船全部撞沉。在1863年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总统发捕获特许证,但这只是对英国的一个恐吓,当时认为在南方联邦在英国港口建造铁甲舰这个问题上同英国爆发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个法案从未被执行。

简单地把南方联邦称为海盗并不能免除国际法上所规定的战争状态的法律上的责任。封锁状态的存在牵涉到视察和检查外国船只,但除非在战争期间,在公海上是没有这种视察和检查权的——这是一项已经确立的美国原则。也是一项国际法上无可争

^① 这是通过英国驻查尔斯敦(Charleston)的领事罗伯特·本奇(Robert Bunch)进行的。那里的法国领事也接到同样指示。本奇给一个拿出他的归化美国证的英国商人一个不定期的护照,叫他携带文件到英国去。这个人正在准备从纽约上船的时候被逮捕了,在他身上搜出一百多封给南方联邦在国外的代理人 and 同情者的私信。其中一封提到本奇曾说他的使命是英国承认南方联邦的第一步。国务院把这个文件袋封着口送给英国当局,立刻撤销了本奇的领事认可证书。法国领事更谨慎一些,未遇到麻烦。前述E.D.亚当斯的著作,第一卷,第184—198页;M.L.博纳姆(Milledge L. Bonham):《在南方联邦的英国领事(The British Consuls in the Confederacy)》(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 and 公法研究,1911年)。

议的原则，欧洲国家在得知这些事实之后十分正确地宣布了中立，因而承认了南方的交战一方的地位并给它事实上的专为进行战争的国家地位。承认独立是一个更具有决定性的问题，要视南方联邦的政策和军事上的胜利而定。不过，英国政府似乎有点迫切和急促地宣布了它的中立，因而在一开始就伤了美国的感情。它甚至在得到封锁的官方消息之前，在美国新任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刚到达伦敦尚未被接见之前就发出了这个声明。事实如此迅速地顺应局势，以致亚当斯不能有效地提出抗议。欧洲的中立已成为一个事实和叛乱无疑演变成一场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放弃了关于暴乱的法律上的捏造，着手引用国际法的原则来规定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

现在阻止任何外国承认南方独立已成为一场斗争。如同通常在发生战争时的情况一样，真正决定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的是战场上的事变而不是外交上的策略；但南方联邦政府却竭力靠外交
370 来帮助它的事业。它派出能干的代表去乞求承认，发行公债，购买战舰和进行宣传。其中最著名的人有弗吉尼亚的詹姆斯·M. 梅森和波尔克时代的老资格外交家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莱德。他们成功地突破封锁到达哈瓦那，准备分别去伦敦和巴黎。他们在哈瓦那登上直达丹麦属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中立港的英国的特伦特号邮船，他们计划在那里再乘开往英国的船。美国“圣贾辛托(San Jacinto)号”军舰的查尔斯·威尔克斯舰长从远处巡逻回来正在这个非洲口岸。他在西印度群岛听到南方联邦的代表在特伦特号船上的消息。没有接到指示，他就直接在公海上截住了那只船，用武力带走了这两个使节(1861年11月8日)并把他们当做囚犯送到波士顿。英国宣布中立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准许因运送敌方文件而将船送交捕获法庭审判(威尔克斯忽略了这一点)，舰长的错误在于他不是带走船只，交付判决，而是带走反叛的美国

公民，似乎是强迫他们服役^①，虽然不是在海军服役。当捕获这两个人的消息到达北方的时候，一个遭受挫折的国家正在渴望着尚未实现的军事胜利。人民以一种发狂的不可想象的欢呼来欢迎这个壮举。国会立刻通过发给威尔克斯一枚金质光荣奖章，几乎没有想到这次捕获的历史意义及其在如此严重关头在外交上所发生的影响。

在英国，政府方面鉴于一只美国军舰新近来到南安普敦，已经想到假如联邦的军舰从英国船上把南方的代表劫走的时候应当如何对付的问题。首相已经对亚当斯说过劫走文件或代表将会发生严重问题。亚当斯回答说不会在英国港口外发生这种事情。预料到这种事件，英国法官们提出意见说，“美国的战舰可以把他们拘捕的船员放在一艘西印度船上，并把这艘船带到一个美国港口交给那里的捕获法庭判决；但美国的船无权把梅森和斯莱德尔先生 371 作为囚犯带走，而让船继续航行。”当按照这个方式在西印度公海上劫走了两位使节两个星期之后，消息到达英国的时候，激起了舆论的愤怒；即使按照英国法官所假设认为合法那样把“特伦特号”船交给捕获法庭，大概也会引起舆论同样激烈的愤怒的。不管舆论多么激烈，官方对南方多么同情，英国政府完全依据它的权利说，劫走这两个既非军人也非得到承认的外交代表的人员是非法的，应当把“特伦特号”船送交捕获法庭。英国政府指示其驻华盛顿公使要求立即交回梅森和斯莱德尔并对这个侵略行动适当道歉，假如七天之内这个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就关闭使馆立即回国。英国海军部赶紧进行备战；英国政府又派八千人的一支军队直接

^① 自然这里有一个法律上的区别。美国说他们是叛乱的公民，正如英国曾说在美国商船服役的它的水手是反抗的臣民一样，但事实上美国是把叛乱的公民作为交战国来对待的，世界各国也承认他们为交战国。这就在事实上给他们以敌国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在 1812 年战争之前，在强迫服役的许多事件里，归化（在美国法律看来）把称为英国臣民的人变为外国人。

开往加拿大进行防卫；英王宣布暂时禁止武器和军火出口。

在华盛顿，大部分内阁成员对这件事与群众同声欢呼。林肯则更谨慎一些。在英国最后通牒到达之前，西沃德已经看到这件事是做错了。他指示亚当斯，秘密通知帕默斯顿说威尔克斯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指示，但他放过了根据美国对国际法的传统的解释，从不准许在公海上从别国船上带走一个国家的臣民或被当作的臣民而把这两个人立刻交给英国保护的大好机会。在英国最后通牒到达以前，对这个暴行没有做任何事情。这时，林肯的政府被英国立场的正当性和当时局势的必要所迫不得不交出被捕获的南方联邦代表。西沃德宣称威尔克斯把这两个人（即使他们是到一个中立国去的）作为“人的违禁品”劫走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错误只是没有把这艘船和它的乘客带到捕获法庭以作出司法判决。因此应当将梅森和斯莱德送回去。这个可笑的关于违禁品的解释既不符合美国的实际做法也不符合国际法，同时还损坏了回答英国的最后通牒的说法，美国在回答中说英国终于接受了美国的原则，现在向美国要求其一度曾经拒绝给予的东西。国务卿表示满意说，“一个问题彻底地正确地解决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迄今不仅举行过各种式样的和平谈判而且作出过许多对战争本身的裁决，在半个多世纪中使两国相互疏远并使其它所有国家受到恐惧和不安的困扰”。这样说法使国内舆论得到一些安慰；而英国人主要关心的则是交出这两个人来和战争危机的消失^①。

372

^① 关于“特伦特号”事件出版了大量的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调查，罗兹、E. D. 亚当斯、钱宁和 H. W. 坦普尔（《美国国务卿》第六卷）都对这些文件和调查做了很好的考查，他们的文章都是在 1896 年 T. L. 哈里斯的《特伦特号事件》专题论文发表之后写的，后三个人并且从公使的儿子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几篇文章中受益。J. P. 巴克斯特第三（Baxter 3rd）教授在《美国历史评论》第三十四卷，第 84—87 页（1928 年 10 月）发表了英国法官的 1861 年 11 月 12 日和 11 月 28 日的意见。

首先，南方依靠“棉花国王”来取得外交胜利。南方的政治家们深信英国和法国的纺织业对原料棉花的需要的百分之八十依靠他们来供应，这将迫使这两个国家进行干涉来停止拖长的冲突。为了这个原因，南方最初欢迎封锁并且实际上还以威胁要在战争的第一年实行国内禁止棉花出口的方法来补充这种封锁。

后来的事实证明，棉花国王因其丰富乃是一个虚弱的君主。近几年以来棉花大量丰收；当战争爆发，封锁开始的时候，1860年的收成已经运出口了。在外国仓库里面储存的不是一年的正常供应量，而是足够两年半用的棉花。经纪人们对封锁感到很高兴，它解除了存货过多的现象而使这种原料的价格猛升；他们自然不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当1862年下半年供应开始缩减的时候，由于高价，开辟了埃及和印度的代替来源。几千个锭子停下来了，失业的大灾难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英国特别严重；但到那个时候，军事形势由前十八个月对南方非常有利开始转变为不利于分裂得胜的前景。英国的纺织业的失业职工自然同情林肯的政府，特别是在他们相信奴隶制的结束已经在望之后。因此，这种经济局势的受害最重的人们抵消了统治阶级的倾向和南方代言人们的喋喋不休的宣传。在宝座上无能为力的老棉花国王当时还不得不同373
年轻力壮的谷类国王竞争。结束战争和解除封锁的英国干涉将意味着同美国战争和暂时不仅切断棉花进口而且也切断在欧洲和其它地方歉收时期^①的小麦进口。另外还有供应交战双方军需品的获利日益增长的贸易，通过封锁的缺口来供应南方，通过正式贸易来供应北方。在英国有更多的经济因素不利于进行干涉。

拿破仑皇帝却极力主张进行这种干涉。他提议由法国，英国和俄国联合起来提出停止战争的调解，双方停战六个月进行和谈，同时解除封锁。这会成为承认南方独立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英国

^① 参阅本章末注解。

内阁已经考虑过这样的行动。外交大臣拉塞尔勋爵表示赞成，首相最初也赞成，但帕默斯顿听到李在安提坦失败的消息(1862年9月16—18日)之后踌躇了。这个消息使内阁决定反对调解。当法国皇帝提出这个正式建议(1862年11月1日)的时候，英国和俄国都准备加以拒绝。后来，在联邦遭到弗雷德里克堡之战的失败(1862年12月13日)以后，拿破仑单独在1863年二月向交战双方提出调解，没有提出条件。林肯政府有礼貌地谢绝了。英国领袖们还继续玩弄这个主意，但美国的军事形势从来不是充分有利于提出这个主意，而一旦同北方决裂又始终会使薄弱的英国侧翼加拿大处于暴露的地位。英国议会里面的南方同情者从此以后就未能再提出调解的计划来。联邦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胜利(1863年7月4日)的消息彻底破坏了外国承认南方独立的任何机会。

当南方的最后军事失败已成定局，而英国认识到黑奴解放宣言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南方的宣传迅速衰败了，这也得归功于英国本土上的政论家和人道主义者们的努力，美国在这些岛上的反击
374 宣传和北方事业的道义价值。在林肯遭到暗杀的时候，这个感情的激变是如此剧烈以致等于全国改变了以前的信念^①。已经面临失败的南方联邦政府在1865年派一位特别使节邓肯·F.肯纳到欧洲去试图通过订立南方联邦承担逐渐废除奴隶制的条约来赢得

^① 奥斯莱(Owsley)的下述著作里详细描写了南方代表在英国和法国的宣传的巨大努力。E.D.亚当斯的上述著作在对宣传战的评价上也有很大价值。D.约旦(Donaldson Jordan)和E.J.普拉特(E.J.Pratt)在他们的《欧洲和美国南北战争(Europe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纽约,1931年)一书中对英国和欧洲的舆论作了精心写成和极值得一读的叙述。L.F.斯托克(Stock)在他的《美国驻罗马教皇国公使：指示和文件,1848—1868年(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美国天主教历史协会,文件：第一卷,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33年)的序言里面描写了南方外交争取罗马教皇朝廷承认的没有成功的努力。

对其独立的承认。这个使命本身就是承认南方外交的道义上的失败。肯纳到达欧洲过迟了。他的这个提议在 1861 年的时候成功的机会本来会比现在大得多。赢得对独立的承认（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通过调解）的运动失败了，首先由于战争的形势，其次由于染上这样重的奴隶制色彩的南方的道义上的虚弱。南方在利用英国中立的努力上比较更成功一些。这引导我们再谈一下中立权利和中立义务这个历史问题。

我们回想到美国在 1861 年以前在中立权利上是一贯采纳“小海军”观点的：那就是，在关于 1756 年规则，违禁品的性质和在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财产的地位的大的纠纷中，它曾经主张和实行那些对于只有一支小的海军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交战国或中立国最有利的原则。因此，它反对 1756 年规则，主张列举出来严格限于武器的违禁品，拥护在中立国的船上的敌方财产（除违禁品外）的豁免权——自由船舶可以自由载运货物的原则；并且主张封锁的现实性，那就是，封锁必须用足够的战舰来维持，以使进入被封锁的港口成为真正危险的事情。巴黎宣言——美国从未参与其制定——将自由船舶可以自由载运货物的原则和封锁的定义定为法典；美国在西沃德的无条件依附这个法典的努力失败之后实际上遵守它（保留了反对私掠的条款——这个条款也被遵守了）。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观点把巴黎宣言上的关于封锁的定义作为国际法来接受：“封锁如要有约束力的话，必须是有效的；那就是说，由一支足以真正阻止到达敌方海岸的力量来维持。”

375

在南北战争中，美国最后以一个具有“大海军”利益的交战国的新角色出现。它的做法在适当程度上符合于这个新形势。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海军力量极为分散，完全不足以迅速而有效地封锁所有南方港口。林肯的 1861 年 4 月 19 日声明谨慎地宣称，他“认为”对南部各州：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路易斯

安那和得克萨斯的港口，“按照美国法律和国际法在这种情形所规定的原则着手封锁是适当的”。在4月27日又延伸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执行这样封锁的任务落在海岸线的海军指挥官身上。为了避免仅仅是纸面封锁的一切可能性，船只除非接到命令它离开的警告之后将不会因为违反封锁而被拘捕。这一点在确立真实封锁的真实性上是非常重要的。封锁整个南方事实上大大减少了违禁品问题的重要性^①（除了在战争期间通过陆地边界外），因为封锁切断了同南方港口（除被收复的港口外）的不管是违禁品或非违禁品的一切贸易。

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关于封锁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上的根据一直是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但不管所有说了和写了的言论，我们还是没有准确的足够的资料来下一个确定的判断。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封锁变得越来越有效，但由于海岸线过长，并有许许多多浅滩和湾凹，使一种特别建造的吃水浅而速度快的小船越过封锁成为可能^②。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船维持着一定形式的来往；它们实际上供应了南方联邦军队最低限度的军火和重要的必需品^③。

① 不过，关于违禁品的一个解释，以一种给税收人员的指示的形式出现了（1862年5月23日），这个指示禁止从美国港口出口到被联邦政府军队占领的波弗特，皇家港（Port Royal）和新奥尔良三个港口。这个指示按照旧日的方式列举了武器和爆炸物品，加上造船用具，在敌军中服役的军人，敌方文件和“性质同那些特别列举的相类似的东西”。萨维治的前述著作，第一卷，第446页。不过，这是一个国内规则而不是言明的国际法的执行。虽然如此，它却被应用到离开那些港口的被禁止从事沿海岸贸易的外国船只，因为指示里面说，在这一点上不能把外国船置于比美国船更有利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里面加进去造船用具、军事人员和文件。在1855年4月29日约翰逊总统宣布了一个类似的国内违禁品单子，其中包括“能制造弹药的物品”。《美国法规大全》第十三卷（1866年），第776—777页。

② J.R.索莱(Soley):《封锁和巡洋舰》(The Blockade and the Cruisers)(纽约,1883年)。

③ 下述奥斯莱的著作，奥斯莱教授争论说(第25—291页)，在战争的第一年封锁几乎是不存在的，在其余的几年中，在四只船中从来未能阻止超过一只船；在战争期间捕获的平均数的比例是六对一。在战争当中一共捕获了1,500只船，他估计至少有7,500只船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他的这个计算的特点是，机巧而不是统计资料的完整。

虽然如此，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封锁是使南方联邦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于北方的海军优势，以及英国和法国在这个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商业封锁——一种严重影响到它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封锁——中采取了(虽然是勉强地)默认态度。”^①

假如英国和法国对于美国联邦的崩溃至少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感到满意的话，那么它们为什么如此欣然站在一旁并接受这个不完全的封锁的合法性呢，巴克斯特教授^②的最近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整个问题在于英国，出于重大的必要和利益，它传统地主张交战国可以对中立国的商业施加广泛的限制。假如英国接受这个封锁，认为它是充分的话，法国就很可能诘难它。如已有的文件证据所充足地证明了的，英国接受了它，因为鼓励美国采取这样的前例是对它有利的。英国的海军部认为，有朝一日英国可能要利用关于封锁的充分性的不严谨的解释，假如美国(那时可能是一个大的中立贸易国)已经自己树立了这样的先例，那就好办了。那一天果真来到了，在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不管已经变化了的情况的某些细节——一般地提到了1861—1865年的先例，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政策的制定上，从来没有一个例子比英国

现在不可能搜集齐全)。读者应经常记住的是，通过封锁的船中大部分是很小的船并且根据1861年5月1日的第一个指示，中立国的船只只有在被警告离开之前是不加以捕获的。这个规定在1862年8月18日扼要重述的指示中就没有提及了。

① J. H. 拉塔内(Latané):《美国外交政策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纽约, 1927年), 第361页。

② J. P. 巴克斯特第三:《英国政府和中立权利, 1861—1865年(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Neutral Rights, 1861—1865)》载《美国历史评论》, 第三十四卷(1928年), 第9—29页, 第77—91页; 及《关于中立权利的几种英国意见, 1861—1865年(Some British Opinions as to Neutral Rights, 1861 to 1865)》, 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二十三卷(1929年), 第517—537页。著者在一篇博学的研究中论证了《铁甲战舰的采用(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ronclad Warship)》(哈佛大学出版社, 1933年)对于海军史和外交史的影响。

默认南方港口的封锁更精明和更有远见的了。

377 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的海军法庭制定了“继续航行”说来阻止专断的 1756 年规则的绕过封锁的航行。美国既没有接受 1756 年规则也没有接受支持它的继续航行说，虽然双方政府愿意通过条约安排来达成一个实际的妥协，这个条约却由于其它原因始终未获批准。1862 年 8 月 18 日的海军指示^① 命令准许中立国船只继续航行到一个中立国口岸，如果发现它是“诚实的而且未带违禁品”。船上有违禁品包含这个船货的最终目的地是敌方，这就使得把这只船作为违犯封锁带至捕获法庭是正当的，即使它当时是开往一个中立国的口岸。捕获法庭在最高法院在战争末期的三个著名决定(百慕大、斯普林博克和彼得霍夫决定)的支持下，应用连续航行说以阻止用第一步表面上在中立港口之间而实际上最终的真实的目的地在敌方的绕过封锁的航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②，英国及其盟国进一步使这个学说完善起来，把到中立国口岸的中立国船上的所有货物(不管是违禁品或非违禁品)，假如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不论由海路或是由陆路，是敌方领土的话^③，都判定有罪。美国南北战争的做法是采取最后这一步骤的有用的根据。

由于封锁和外国港口对私掠船封闭而无法进行私掠劫夺，在本土又没有建造战舰的设备，南方转向中立国的港口去建造巡洋舰。为一个交战国实际建造战舰是违反国际法和英国的中立法例的，虽然有些英国人提出通常的论据说出售军舰并不比出售军火更违反中立。前美国海军的一个上尉詹姆斯·D. 布洛克舰长是南方联

① 前述萨维治的著作，第一卷，第 450 页。

② J. W. 普拉特发表了对于英国在大战中的做法的一个很好的分析：《英国的封锁和美国的前例(The British Blockade and American Precedent)》，载在《美国海军协会会报》第四十六卷(1920 年 11 月)，第 1789—1802 页。

③ 参阅本书第 596 页。

邦派到欧洲去接洽建造巡洋舰的代表^①。他征询了一位英国律师的意见,这位律师指出一个绕过体现在1819年外国征募法案的中立法的方法来。这个法律上的婉转说法的要点是这样的:一条船必须既在英国属地建造又在这里装备用来对一个友好国家从事敌对行动才算违犯这个法。一条船可以合法地建造但不加装备——以后在英国之外甚至用从英国本土送去的武器加以装备,只要这些装备不是造船者送去的就行。布洛克遵守这些专门事项,签订了建造两只巡洋舰的合同,这两只巡洋舰后来命名为“佛罗里达号”和“亚拉巴马号”——作为这种交易的第一宗。 378

自1782年的和平交涉以来,落在一个美国驻外的外交官身上的没有像驻伦敦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任务那样重大的了。他的任务是阻止在英国的船坞建造出一支南方联邦的海军,这支海军会把美国的商船队从海洋上消灭掉,打破封锁并在南方的独立战争中获胜。他的情报人员迅速带来建造中的船只的真正性质的情报。他向拉塞尔提出强硬抗议。“佛罗里达号”(化名“奥雷托号”)在1862年3月在英国注册后已经离开了,表面上说是开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在拿骚美国领事对这只船提起诉讼,但无结果。在一个距离该口岸六十英里的荒凉小岛上,它接受了从英国开出的另一只船上的装备,并悬起了南方联邦的旗帜。第二只巡洋舰,化名为“第290号”和“恩里卡号”就是这只出名的“亚拉巴马号”。在它正在准备下海的时候,亚当斯重新提出抗议。他向拉塞尔提出了一位著名的皇家法律顾问R. P. 柯利尔的意见,柯利尔认为有证据确实表明“290号”是前去加入南方联邦海军的,假如准许这只船逃脱的话,中立法案“将成为比一纸空文好不了多少的

^① J. D. 布洛克:《南方联邦各州在欧洲的密探,或者,南方联邦的巡洋舰是怎样装备的(The Secret Service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in Europe, or, How the Confederate Cruisers Were Equipped)》(纽约,1884年,两卷本)。

东西”。拉塞尔这时第一次对这件事表示关心。海关人员不顾已经向他们提供了一份柯利尔的意见这个事实以缺乏证据为理由拒绝对“290号”采取行动。拉塞尔把亚当斯的证据和其它有关文件交给司法官征询意见(1862年7月23日—7月26日)。这些文件在高级司法官,皇家辩护士的家里存放了五天,在这个期间,在这只受到嫌疑的船上紧张地进行着最后的准备。拖延的原因由于司法官生病,而事实上他发疯了。直到7月28日其他司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检察长,才拿到这些文件。他们迅速在第二天建议立刻截住这只船。当时它已经离开英国海岸出海了。即使在这个时候,只要英国海军部采取有力的行动,本来还是可以扣留住它的,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英国海军部没有作出努力。这只船在亚速尔群岛命名为“亚拉巴马号”,按同“佛罗里达号”同样的方式得到武装,并同样编入了南方联邦的巡洋舰队。英国政府并不是如当时美国所普遍相信那样,只是为了那只船可以掠夺一支竞争对手的商船队对自己有利因而默许了它的逃脱,而是被狄更斯一度称为“繁文缛礼的官厅”的搪塞推诿,玩忽大意,犹豫不决和拖延使这只船得以逃脱。

亚当斯所即时焦虑的不是这个重大损害的最后责任,这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而是如何阻止更多的战舰离开英国港口开往南方联邦以拯救他的国家。机智的布洛克舰长由于巡洋舰的成功而感到洋洋得意,他准备建造更多的战舰:一只炮舰,“亚力山德拉号”和准备用来打沉联邦木制军舰并打破封锁的两只铁甲的带撞角的军舰。在亚当斯的请求下,政府扣留了“亚力山大德拉号”,但法院释放了它(1863年6月23日),根据是中立的英国臣民有权利为一个交战国建造和出售军舰。它下海了。这个判决证明英国没有足够的成文法规,正如在1836年得克萨斯战争时候美国没有足够的成文法规一样。在缺乏足够的立法之下,英国的行政方

面是否会使自己受到不充足的法律条文的限制而如像杰克逊总统所做那样无所作为呢？

英国政府是在海军部了解到默认不完全的联邦封锁的意义之后才理解到在它的中立港口内建造交战国的军舰对于英国本身的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帕默斯顿、拉塞尔和他们的同僚们开始明白了这个问题：假如英国同一个像俄国或日本那样的小海军国作战，而敌方，按照英国的例子，被准许在美国装备一支由许多“亚拉巴马号”组成的舰队来在两个半球掠夺英国的商业，又将如何？南方联邦的第一只铁甲舰——由莱尔德公司建造——在1863年7月4日下水。7月11日，亚当斯告诉拉塞尔说假如这只有撞角的军舰逃脱了，英国就算是参加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使在7月16日接到了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的消息。在外国眼光里，那意味着战局的转折点和南方的最后失败。亚当斯继续不断把关于有撞角的军舰的证据和抗议送交英国外交部。在9月3日，从拉塞尔那里听到英国政府法律方面的意见说政府不能干涉这些船只之后，他送出了最后一个抗议。拉塞尔回答说，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而热切的考虑之中”。在这个时候，外交部至少考虑到预防“亚拉巴马号”事件的重演。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亚当斯得到一个有撞角的军舰将要下水的情报。第二天（1863年9月5日）他向拉塞尔递交了他的著名的声明：“向勋爵阁下指出这一点是多余的：这就是战争。”这样的声明得到了期待的结果。英国当局查封了这些有撞角的军舰^①。

不顾1863年以后英国当局的真的警戒，其它的一些船离开英国去从事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敌对活动。被法院释放的“亚力山德拉号”，后来在1864年12月在拿骚又被缉拿，被判有违犯外国征

^① 《本杰明·莫兰的日记(The Journal of Benjamin Mora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二卷，第1218—1219页。

募法的罪。南方联邦的代理人暗地买了一只轮船，成功地下了海，在海上得到从英国运来的装备，作为南方联邦军舰“佐治亚纳号”开始作效率不高的巡逻。幸而美国海军能够在这只军舰做出任何较大的损害之前就击毁了它。另一只这种巡洋舰，“佐治亚号”（1864年4月）证明经不起航海，开回英国，卖给一个中立国的企业主，后来被捕获判罪。同样，在1864年10月，他们买到另一只轮船并在海上以从英国运来的武器装备起来。作为南方联邦军舰“谢南多号”，这只军舰在著名的环绕地球五万八千英里巡逻上可以同“亚拉巴马号”的掠夺行为相颉颃。在战争结束之后，它的舰长在利物浦把它交给了英国当局^①。南方联邦也在法国定造军舰。拿破仑三世秘密地批准了，但美国公使戴顿的抗议和机警的总领事J.比奇洛的工作破坏了这个计划。

对北方来说，这些在英国建造又从英国得到装备的巡洋舰成为海上的灾难。英国殖民地的港口在物资供应和人员招募上给与它们的非中立性的优待进一步增加了英国在这一方面的责任。这些巡洋舰以及它们把捕获的船和供应船装备成的小巡洋舰捕获了许多悬挂星条旗的商船，并在海上没有经过判决的程序就烧掉了许多船——在封锁线外没有可以送交这些捕获物的捕获法庭。对
381 国家利益的损害大于实际的掠夺。保险费大涨，美国的商船队由于把船卖给中立国其中大多数卖给其政府对这种破坏负有责任的英国^②而解散了。南北战争是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商船

^① 关于这些巡洋舰的列举，它们的活动和捕获，参阅 J. T. 沙尔夫(Scharf)：《南方联邦海军历史 (History of the Confederate Navy)》(纽约，1887年)，第782—818页。

^② 英国商会主席在1864年1月20日宣称，1863—1864年英国船的出港吨数已增长到一千四百万吨，而包括所有外国船只的出港吨数为七百万吨，这使得在英美之间的美国船的吨数减少约47%。美国船转挂英国旗的在1861年是71,673吨；1862年是64,578吨；1863年是252,579吨；1864年是92,052吨。前述希尔(Hill)著《美国条约》，第283页。

队的没落的最后一步。在1860年有2,379,396吨的私人海运业从事美国的对外贸易，其中美国船载运了66.5%；在1865年，在1,518,350吨这个总数中，美国船只载运了27.7%^①。

在联邦的外交上的危险在英国，以后又在欧洲消逝之后，使英国惊悚的事情就是加拿大边界上的事态。南方联邦的代理人们，一反1837年加拿大反叛者利用美国作为支援加拿大叛乱的基地的做法，组织了越过边界线向南进行的袭击。在这类胡乱放枪中的一次，相当轻微地抢劫了圣奥尔本斯的在沉睡中的弗蒙特村庄（1864年10月19日），袭击者又越过边界线逃回去。袭击的领导者被殖民地当局捉到之后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没有个人责任，表明他们是奉南方联邦政府的命令行事的。一个加拿大法官释放了他们。由于这个事件，联邦军队不得不派出一个师来保护北部边界，使得林肯发出取消拉什-巴戈特的1817年裁军协定的通知（当事情平静下来，通知又被撤回），并导致在几个月期间中对从加拿大方面来的所有人实行以前完全不必要的严格的护照检查。总的看来，加拿大的英国官员在阻止这种挑衅事件的重演上比联邦当局在1837年“加罗林”事件之后表现出更大的热忱和敏捷。胜利的联邦军队可能容易地转向北进。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1865年2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谈到美国以及一旦它实现和平似乎即将到来的我们与它发生战争的危险；谈到我们保持加拿大的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为之奋斗；最好是让加拿大成为一个在一位英国亲王统治下的独立王国；^②

对于林肯的政府及其继任人的政府来说，在其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利用南方联邦巡洋舰从英国船坞逃走在美国人的心中激

^① W. L. 马尔文 (Marvin): 《美国商业海运 (The American Merchant Marine)》(纽约, 1902年), 第284, 353页。

^② 乔治·E. 巴克尔 (George E. Buckle) 编: 《维多利亚女王信件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第二辑 (三卷本, 伦敦, 1926—1928年), 第250页。

发的激昂的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受到“明显的命运”的没有消失的野心的煽动和大量现在没有使用的兵力的支持，来以一种可怕的效力对付英国，是并不困难的。西沃德虽然是一位热心的扩张主义者，却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报复。在同母国解决“亚拉巴马号”的权利要求上，美国最初寻求的是友好仲裁的道路。约翰逊总统的政府采取迅速行动同加拿大当局合作来消除由仇恨英国和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组织的芬尼会会员们所策划的对加拿大的入侵。为了这件事，总统得到英国政府的“最热烈的感谢”。南方联邦从加拿大侵袭的整个事件所带来的净结果是1854年订立的马西-埃尔金互惠条约的废除，这是按照条款规定以正式通知办的。国会相信，西沃德无疑也相信，加拿大商业失调的结果可能加速志愿合并的自然冲动^①。这种冲动确实存在过，但被英国在1867年成立加拿大自治领所做的建立国家的实验的成功^②所永远平定了。

尽管这场冲突的殊死性和不得不单独进行，在南北战争中美国外交上真正损失的只是美国商船队的繁荣。国家的安全和联邦的永久存在却不能完全由如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这样的有高尚思想的能干的外交家们的忠诚的努力而得到保证。单凭北方具有更大的道义上的优势这一点是不够的。胜利是由几百万青年人决心牺牲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国家的完整在战场上取得的。只有许多个人决心作出这种牺牲，伟大的事业才能胜利。只有这样，值得尊敬的国家才能生存下去。

① J. P. 史密斯(Joe Patterson Smith)个人出版了一本对1864—1867年间加拿大和美国关系的有益的研究著作：《早期改造阶段的共和党扩张主义者(The Republican Expansionists of the Early Reconstruction Era)》(由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发行，1933年)。

② R. G. 特洛特(R. G. Trotter)：《加拿大联邦，它的来源和成就：一个建立国家的研究》(Canadian Federation, Its Origins and Achievement; A Study in Nation Building)(伦敦，1924年)。

小麦对棉花的影响没有清楚地确定下来。在1859年英国从美国进口了99,000“夸特”(quarter,约二十八磅——译者)的“小麦和面粉”；在1860年超过2,000,000“夸特”；在1861年超过3,500,000“夸特”；在1862年超过5,000,000“夸特”；在1863年大约为3,000,000“夸特”。参阅E. D. 费特(Fite):《在南北战争时期西部的农业发展(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During the Civil War)》,载在《经济季刊》,第二十卷(1906年2月),第259—278页,和L. B. 施密特(Schmidt)写的《在南北战争时期小麦和棉花对英美关系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Wheat and Cotton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ivil War)》,载在《衣阿华历史和政治杂志》,第二十六卷(1918年7月),第400—439页。F. L. 奥斯莱教授在他的卷帙浩繁、资料丰富的《棉花国王外交;美国南方联邦各州的对外关系(King Cotton Diplomac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1年)里面叙述“在这些人(英国政界人士)的公私文件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一次小麦灾荒可能伴随着与美国的战争”。(E. D. 亚当斯却在福斯特的一篇演说里面找到了这一点。)奥斯莱把这个观念归之于联邦在英国的宣传。他把英国在1860, 1861, 1862和1863年从美国进口的超乎寻常数量的小麦解释为英国接受军火贸易付款上的方便,并且指出当军火需要消失(在北方的制造者赶上来之后)的时候,小麦进口也减少了。这至少不能解释1860和1861两年的不正常的进口,也不能解释英国贸易为什么觉得接受小麦比其它东西更方便,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军火工业统计数字来支持他的论据。

第二十二章 门罗主义 南北 战争以后的扩张

(1823—1872年)

当美国为南北战争所分裂的时候，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补充当时正在陆地和海上进行的挽救联邦和国家的军事努力，也就是说，阻止外国在共和国之内进行干涉。迄至当时，确定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好像是放任自流的。这些确定的政策是什么呢？它们是门罗主义，在美洲大陆上扩张，和海洋航行自由。如我们以前所说，它们并不构成非常重要的随时会失去的东西。在墨西哥和圣多明各门罗主义被法国和西班牙践踏了，但这是能够由一个拥有一百万战胜的兵力的国家加以恢复的。在大陆上扩张的进程被打断了——曾经给予向西南扩张以很大的刺激的奴隶制消失了——但是，假如愿意的话，这个进程是可以恢复的。美国的封锁限制了海上自由，为海上霸主树立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前例，但后者对南方联邦巡洋舰的轻率态度也为它自己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前例，因为不久这对美国的外交是有利的。在这场战争以后，西沃德又得把由这次国家的伟大经历所修改和调节的传统政策捡起来，并面对由这场内战的后果产生的外交问题。被打断了的扩张主义的冲动的残余表现在这个时代又出现了，现在这种冲动已缺乏群众的支持了，但它却得到这位生气勃勃的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力量的支持。最简便的方法是在本章中先谈法国在美洲的冒险举动，然后再谈西沃德的扩张主义的方案。关于所谓“亚拉巴马号”的权利要求的

解决将留在下章讨论英美仲裁的时候再谈。

拿破仑三世在 1861—1867 年间在墨西哥的干涉,是自西班牙殖民地革命以来法国在美洲的野心谋算的最高峰,这肯定违反了门罗总统的警告。

门罗在 1823 年的宣言里曾说在美洲扩张欧洲的殖民地,或者欧洲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自由命运的干涉,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不友好意图的表现”。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使用武力来在新世界保卫任何一个美洲国家抵抗这样一个不友好意图呢?我们回忆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屡次拒绝讨论同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盟问题,并在准备后来流产的 1826 年巴拿马会议的时候,回避了承担义务的可能性。门罗宣言是否是一个从英国海军木墙的后面安全地向世界吹嘘的幼稚的恐吓呢? 385

对这个主义的第一个真正的挑战来自南美洲的最远部分。英国在 1833 年无视阿根廷联邦的抗议占据了控制着南大西洋到太平洋入口的战略要地福克兰群岛。杰克逊总统的政府回避了这个问题,认为这只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过去占领的重申^①。一个更鲜明的事件发生于法国奥尔良王室的统治期(1830—1848 年)。人们记得美国是第一个承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的国家。这个事实同英国的踌躇对比起来,再加上门罗主义的公开宣告,首先起了在整个拉丁美洲建立对这个北美姊妹共和国的优越的好感的作用。英国在乔治·坎宁领导下进行对抗,它迅速承认了(1824 年)西班牙从前的殖民地的独立并同它们交涉订立通商条约^②。这些

^① J. L. 戈贝尔(Julius L. Goebel):《福克兰群岛的争存;法律和外交史的研究(The Struggle for the Falkland Islands; a Study in Leg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纽约,1927 年),有力地论证阿根廷对这个群岛的权利是正当的。

^② H. W. V. 坦珀利(Temperley):《乔治·坎宁的后期的美洲政策(The Later American Policy of George Canning)》,载在《美国历史评论》第十一卷(1906 年),第 779—797 页。J. F. 瑞皮(Rippy):《英美在拉丁美洲的竞争(1808—1830 年)(Rival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ver Latin America (1808—1830))》(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29 年)。

条约里没有提到海洋航行自由这个特别之点，而这点正是美国同拉丁美洲订立的同一时代的条约中的一个显著的部分。其中一些条约，如像同阿根廷的(1825年)，给英国臣民以特殊待遇，把英国商人置于同本国公民在商业上的平等地位。英国很快在普拉塔地区赢得了威望，而美国^①则直到1853年才在那里享有条约关系。

386

坎宁是使法国和美国吃亏而取得成功的。法国同大陆南方的新国家没有订约，因为复位的波旁王朝顽固地遵守正统的神圣原则，拒绝同推翻帝制革命中产生的国家打交道。法国正统本身在1830年被推翻，新的革命的国王路易·菲利普迅速承认了前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南美洲特别是普拉塔地区继续为一个逐渐复元的好战国家的不安定性提供一块有吸引力的地域。机警的坎宁博士曾在1823年以他的波利纳克备忘录^②的使人不愉快的规定约束了这个国家的过早的努力。在1838—1839年，一位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国领事同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发生了纠纷，后者拒绝给法国公民以英国臣民所享受的条约权利。为了树立法国在南美洲的威信，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抓住了这个问题和同墨西哥的另一个较小的问题。一支法国舰队以封锁维拉克鲁斯(1838年)和炮轰圣胡安·德·乌略亚要塞来强迫实行法国人对墨西哥的权利要求。在这个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引用门罗主义，建议向法国要求解释和总统进行调解。虽然范布伦总统已经表示愿意进行调解，法国和墨西哥在英国公使调解之下^③在维拉克鲁斯签订了一个权利要求协定。国会的决议还同样提到普拉塔地区发生的事件。在那里，事实证明热忱的罗萨斯是一个更

① 杰克逊的政府由于在英国重新占领福克兰群岛以前那里夺取了一些美国船和财产卷入了一场同阿根廷政府的纠纷。这件事大大推迟了建立两国之间的令人满意的关系。

② 参阅本书第205页。

③ 前述 D. 佩金斯：《门罗主义，1826—1867年》，第40—49页。

难对付的问题。法国的外交，陆军和海军在乌拉圭和上游省份组织了这位独裁者的敌对势力来反对他，封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普拉塔河的阿根廷河岸，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到巴拉纳河——南美洲的俄亥俄——并在普拉塔的河口占据了马丁·加西亚岛。英国在最初就反对法国的政策，在阿根廷和东方班达^①爱国力量团结在独裁者的周围。法国未得到成功，在1840年从这个第一次冒险行动撤退，法国的威望受到了损害。英国在那些地方的优势却继续完全保持下来。

英国辉格党政府在1841年垮了台，帕默斯顿勋爵从外交部退休，由和平的阿伯丁来代替，在阿伯丁的领导下许多英美之间的麻烦问题在1841—1846年期间都解决了。阿伯丁急于建立和加强一个与法国的协定以巩固欧洲和平，但同时又忌妒法国在南美洲的政策，他拉法国在普拉塔地区联合进行干涉来巩固那里的外国权利，特别是英国的商业和银行业的利益。两个国家于1845—1849年又一次封锁了阿根廷海岸，这是一次“和平的封锁”，帕默斯顿后来指责它为海盗行为，“等于在公海上阻截中立国的船只叫它们交纳敲诈费。”^②他们又在那个大河的河口劫夺了马丁·加西亚岛，一支外国舰队又一次上溯巴拉纳河，并炮轰沿途的要塞。罗萨斯已经把他的政敌们驱逐到乌拉圭；作为抵制这个有势力的罗萨斯的一支矛头，欧洲盟国批准了一支由法国移民组成的外籍军队来保卫蒙得维的亚和消灭罗萨斯在东方班达的影响。法国武装和津贴了这些军团。如像法国在当地的代理人不断竭力主张的那样，在法国有不少的舆论要求法国军队在蒙得维的亚登陆。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英国永远不会容忍这一行动的。事实证明，独裁者的活

^① 拉普拉塔河和乌拉圭河的东岸。

^② 这段话引自约翰·F·加迪(John F. Cady)，他贡献了《外国在普拉塔河的干涉，1838—1850年(Foreign Intervention in the Rio de la Plata)》(费城，1929年)的历史，明白指出了这个事件同波尔克把门罗主义限在北美洲的关系。

动不是这两个盟国的不彻底的措施所能对付的，由于它们的政策分歧，合作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它们不能真地用武力来侵入阿根廷。帕默斯顿在 1846 年重新上台后，很乐于在最困窘的情况下清算整个的干涉，并且警告法国也要这样做。在 1848 年另一次法国革命使它未能作出它在美洲的冒险的最后一次表现。路易·拿破仑当了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不久之后(1852年)登上了第二帝国的王位。在南美洲再一次进行冒险之前，他想要牢固地建立起自己在法国的地位，并使法国在欧洲更加强盛。

388 外国在普拉塔地区的干涉是对 1823 年宣布的门罗主义的直接违反。这次干涉没有成功，这是由于罗萨斯的顽强抵抗和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分歧，而不是由于门罗主义起了作用。如同 1823 年一样，英国的外交又一次阻挠了无论什么样的法国在那里占领领土的危险——而这个危险是曾经有过的。美国则对此不加过问。一些最重要的东北边界的外交问题：得克萨斯、俄勒冈以及最后墨西哥战争和地峡问题等使美国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后来的情况证明，特别是英国在 1845 年到 1848 年之间被纠缠在遥远的阿根廷这件事对美国非常有利。南美洲的南部离美国太远当时不能成为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的地方。波尔克总统通知两个盟国说他不准备反对他们的干涉行动。即使这种干涉导致占领那里的领土，我们可以相信，这位当时忙于他自己的在北美洲的扩张问题的总统也会予以默认的。在他的 1845 年、1847 年和 1848 年的由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尤卡坦和地峡问题上引起的，重申门罗主义的著名国会咨文里，波尔克故意把门罗主义的应用限制于北美洲。

从 1823 年到 1861—1867 年的在墨西哥冒险，法国对拉丁美洲的受到制止的欲望是连续不断的。在 1859 年以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很不巩固，不能在新世界有效地反对英国，更不必说美国了。但就在那一年，奥地利-意大利战争结束之后，拿破仑三世似

乎恢复了法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 1861 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 门罗主义被削减到限于在波尔克所引用于其上的一个剩余的大陆上^①。打败美国和使法国影响在拉丁美洲处于最高地位的机会终于到来。法国皇帝敏锐地指出, “美国的战争使它不能进行干涉了。”^②

墨西哥的政治混乱从 1857 到 1861 年招引了布坎南总统的扩张政策的干涉, 它也给法国提供同样的机会, 人们记得在法国看来, 1838 年的墨西哥证明是比阿根廷更容易对付的。墨西哥当时正处在倾向帝制的保守的牧师教权党和在土著领袖胡亚雷斯领导下的共和党的内战当中。布坎南政府承认和支援了胡亚雷斯的政权, 希望它以割让领土来报答使墨西哥免遭欧洲的干涉的美国的保护。这样的发展事实上被增长着的美国内部的地方主义的反对阻止了; 但墨西哥的保守势力却真地吃了一惊因而转向了欧洲, 特别是法国: 他们说, 墨西哥只能借助于欧洲的干涉才能免于被美国吞并; 他们愿意为了这个目的接受法国的保护。这样做会附带引起法国的牧师们的注意, 他们会把这件事看做是保存一个天主教国家使其免受北方来的侵略性的新教徒的侵入。最初他们谈到建立一个法国保护下的帝国, 以西班牙的波旁王室亲王为国王。这些建议是通过一个名何塞·德·伊达尔戈的墨西哥牧师, 传到拿破仑三世和他的西班牙籍的年轻的欧仁尼皇后^③的耳朵里去的。在巴黎有些在高位的收买被废掉的墨西哥公债的投机家为了个人

① 前述加迪著作, 第六章; 前述佩金斯著作, 第三章; 和波尔克的《日记》。

② 拿破仑三世在 1861 年 10 月 9 日写给弗拉俄伯爵(Comte de Flahaut)的信, 前述佩金斯著作, 第 965 页做了较充分的摘引。

③ 考尔提伯爵厄贡·恺撒(Egon Caesar)在他的著名的传记《墨西哥的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Maximilian and Charlotte of Mexico)》(纽约, 1928 年, 两卷本, 译自 1924 年德文版)中讲述了这些接触的背景和拿破仑同马克西米连的关系以及又如何抛弃了这个不幸的马克西米连。

的巨额利润^①竭力推行干涉计划。在 1861 年的夏季，墨西哥仍然处在无政府状态中。外国政府因自己的公民甚至使馆（例如英国）不断遭受的抢劫提出很多的抱怨。胡亚雷斯政府（7 月 17 日）明确停止了它以前所缔结的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不久之后，英国驻塔斯科的副领事被暗杀。这使英国更倾向于同热心的法国皇帝和诚心的西班牙达成某种国际合作。这三个国家在 1861 年 10 月 30 日的伦敦协定中同意使用他们的联合部队“在墨西哥海岸”和“采取其它行动”来实行对付墨西哥的协定上规定的权利，但不为自己索取“任何领土或特殊利益，也不在墨西哥的内部事务上施加任何足以损害墨西哥民族自由选择 and 自由组织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的影响”。在英国建议之下，增加了美国可以参加的一款。这一款是一个姿态，是一个空形式；这几国同意不等美国参加就向他们的目的进行^②。英国希望（除使它的国民的权利要求得到平等的满足外）制止其它国家侵占领土；它也暴露了薄弱的加拿大侧面——这一代英美关系中必须随时记住的因素。它对法国的在墨西哥的企图所抱的不无同情的态度后来由于它迅速承认墨西哥的

① 一个瑞士银行家，热厄克（Jecker），以墨西哥公债票面价值七千五百万法郎相抵贷给米拉蒙（Miramon）政府（胡亚雷斯的前任）三百三十七万五千法郎。胡亚雷斯停止偿付公债。热厄克的银行在 1860 年倒闭了。在 1861 年一月里，拿破仑三世的异母兄弟和立法机关的首脑毛尔尼公爵（Duc de Morny）从已由他使之归化为一个法国公民的热厄克那里得到从收进这批公债可能得到的任何利益的百分之三十。法国外交为这笔公债撑腰，最初按票面价值，以后（1864 年）从马克西米连接受了减低到票面价值的 30%。在 1865 年热厄克实际收进了一千二百六十六万法郎。前述佩金斯的著作，第 382 页；前述考尔提的著作（参看索引热厄克条）。

除累计利息外，收进的款项得到九百二十八万五千法郎的利润，其中的 30%（分给毛尔尼的份额）应为二百七十八万五千五百法郎。毛尔尼本人在这笔钱收进之前死亡。数千名法国在墨西哥的士兵和更多的墨西哥人也是这样。

② 协定的本文载在 E. 施密特·李特·冯·塔维拉（E. Schmit Ritter von Tavera）：《1861—1867 年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统治和法国干涉墨西哥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 Maximilian I und die Französische Intervention in Mexico, 1861—1867）》，两卷本（维也纳和来比锡，1903 年），第一卷，第 12—13 页。

新皇帝这件事而表露出来。

西班牙的态度更少保留，但它的心思被它的占领圣多明各的兴趣所分散，这点是不久就可以看出来的，而当英法两国预定让一个奥地利的亲王而不是西班牙的亲王去登上墨西哥的新天主教王位这个情况透露出来之后，它就不那么积极跟在法国后面去进行联合干涉了。拿破仑三世完全是一个欺诈的人。在订立同意不干涉墨西哥内政的伦敦协定的三个星期以前，他已经计划把奥地利皇帝的兄弟弗兰西斯·约瑟夫，以马克西米连大公的名义立为墨西哥的新的统治者^①。

联合军占领了维拉克鲁斯，劫夺了关税，但当地人并没有起来响应他们。胡亚雷斯也没有屈服。法国决定向首都推进；最后二万八千人，加上由八千名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一个小的外籍军团在福雷元帅，后来在巴赞元帅领导下占领了全国。英国人预料到会发生这样一种战争就立即撤出了。西班牙人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这样的战争，改道到圣多明各去，企图在美国全力忙于国内事务的时候把那个岛重新置于自己主权之下。在墨西哥城，法国的司令官纠集了一个挑选出来的著名人士会议，这些人宣布(1863年)建立帝制，约请马克西米连担任国王。在同法国签订了一个协定之后，这位前大公携同他的年轻夫人卡洛塔(她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女儿，路易·拿破仑的孙女)前往他们的新的热带帝国。米拉马尔协定(1864年4月10日)规定法国在墨西哥的军队应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减至二万五千人，但在一个秘密补充协定中答应“无论欧洲局势变得怎样，法国永远不会不帮助这个新帝国”。按照这个补充协定，这时在墨西哥的军队，包括外籍军团，应当在1865年减至二万八千人，在1866年减至二万五千人，在1867年减至二万人。马克西米连答应赔偿法国二亿

^① 前述佩金斯的著作，第359页。

七千万法郎作为到1864年7月1日为止的干涉军费，从这个日期开始增加3%的利息，此后付给在墨西哥的法国军队每人每年一千法郎。按年分期付的二千五百万法郎现款将立即付给法国。这位新皇帝甚至在他看到自己的领地之前，就命令按63折发行二亿零一百万法郎的公债，利率6%。从其中他立即得到八百万法郎；法国国库得到六千六百万法郎作为应付给它的款项的一部分^①。其它款项留付1851年英国的一千零二十万镑（票面价值）贷款的利息。一家伦敦银行发行了这种债券，它为满足英国臣民的有几分可疑的权利要求提供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不幸的认购者大多数是法国人。

这样，一开始，在没有同墨西哥人民或国家商量的情况下，新政权就背上了对法国的巨大债务（还不算伴随着原来的干涉的过分的权利要求），这可以作为将来要求增加政治让与的手段。马克西米连这个时候成功地抵抗了一个给拿破仑政府开发索诺拉所有矿产和派军队保护这些矿的权利的法国条款^②。这正是法国对马克西米连傀儡国家的影响在将来所意味的重要之点。在马克西米连那方面，他幻想吞并整个中美洲、巴拿马地峡和南美洲北部，并通过安排他的一个兄弟同巴西皇帝的女儿的婚姻来把他的势力扩展到巴西。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英国、葡萄牙、比利时、普鲁士、

392

^① 前述考尔提的著作，第一卷，第325—327页。协定文本和附随的命令载在前述E.施密特·冯·塔维拉的著作，第一卷，第235—240页。在1865年在巴黎又发行了第二笔二亿五千万法郎，利率6%的公债，按68折发行。其中只有七千万法郎归新墨西哥帝国动用。

^② 由布坎南政府在1859年交涉的麦克莱恩-俄坎浦（McLane-Ocampo）条约也是这样性质的一个文件，被美国参议院否决了（27票反对，18票赞成）。按照这个条约，墨西哥将得到四百万元贷款，而美国将有穿行特旺特佩克地峡的永久权利，附加穿过北部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海湾两条铁路线，两条铁路线终点上的自由港口，派军队保护这个通道，以及，在极危险情况下，甚至无须取得墨西哥同意进行干涉的权利。根据佩金斯的著作，这个条约的第一款进一步将给美国在墨西哥全国享有一般的警察保护权。

意大利和瑞典迅速承认了这个新墨西哥帝国。它比得克萨斯得到的承认还多。当马克西米连从奎尔纳瓦卡的愉快的山中别墅眺望他的美丽的新国土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吉兆的开始吗？

傀儡皇帝的王位和他的人身安全是依靠法国军队继续留驻在那里来保护的，这一点不久就很明显。美国北方军队的胜利逐月地更加确定，假如必要的话，大批军队不久就可腾出手来帮助胡亚雷斯的爱国分子把法国人赶出去。即使美国不逼迫法国，法国和欧洲的事态此时正在图谋强迫法国撤退。从一开始，墨西哥的冒险行动就惹起法国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的恶感。出丑的热克的权利要求又给反对者的攻击渲染生色。随着这个冒险事业的困难和化费的增加，反对它的力量也增长了。莱茵河对岸正在酝酿发生重大事件。当普鲁士正在准备进攻奥地利来成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时候，拿破仑在 1865 年受了俾斯麦的哄骗保持了中立。继续占领墨西哥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人，而这两者当时都是国内所需要的。这个不合时宜的干涉的浪费已经加重了经济负担，迫使法国为了在北美维持成千上万的军队而不得不减少国内的兵力。由于普鲁士的萨多瓦战役的胜利，俾斯麦在 1866 年夏季击溃了奥地利而制造了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的这个战役的胜利很快震惊了有深虑的法国人。使法国遭受损害的拿破仑在各个方面的错误正在不祥地增加。 393

在这种困难的结合当中出现了声调越来越高的美国提出的抗议。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前，国务卿西沃德被迫不得不在墨西哥主权的竞争者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政策，并明白表示相信法国的诚意^①。他克制自己只发警告和通告来反对对墨西哥领土的永久占领。国会的抗议决议只是一些没有行动的空话。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使国务卿有可能坚持他以前所提过的建议。供由

^① J. M. 卡拉汉的前述《美国在墨西哥关系中的外交政策》，第 278—340 页。

皇帝的顾问念给皇帝听的他致美国驻巴黎公使的文件的口气越来越强硬了。1865年11月6日,他声称,“在墨西哥存在着—支法国军队和有军事行动,这支军队在那里维持着一个基于武力而不是基于墨西哥人民的自由意志的政权”是“使美国感到严重关切的原因”。上面附有西沃德亲手写的字句修改的约翰逊总统的年度咨文(1865年12月4日)宣称:“假如任何欧洲国家向美洲人民保卫共和制度,抵抗外国干涉作可称之为挑战的举动,我们将视为那是对我们自己,对良好政体的事业,以及对世界和平的巨大不幸。”西沃德把这一点在一个文件里面提得更尖锐(1865年12月16日),说法国在一个美洲共和政府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外国帝制的企图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最后,1866年2月12日他要求法国定出撤退的期限。拿破仑鉴于国内和欧洲的日益增多的困难,以及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美国联邦及其经验丰富的军队的不容置疑的力量,已经决定“断绝法国与墨西哥帝国的关系”,让马克西米连去听凭自己的命运。西沃德从美国公使比奇洛那里得到的情报中知道了这一点^①;事实上国务卿发觉自己有必要约束美国的舆论,特别是在如像格兰特将军那样的高级军官中,格兰特曾要用南北战争中的退役军人把法国人从墨西哥赶出去^②。他宁愿从法国本身的必要中榨取一个外交胜利。美国的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要求——这个要求为准备寻求与格兰德河那一边的胡阿雷斯的部队联系的一支驻扎在得克萨斯由谢里登将军统率的五万军队所支持——不容许有更多的迟延或推托。年轻的卡

① C. A. 达尼韦(Duniway):《法国从墨西哥撤退的原因(Reasons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French from Mexico)》载《美国历史协会1902年年度报告》,第一卷(1903年),第313—328页。

② 斯科菲尔得(Schofield)将军由格兰特将军准假去协助组织胡阿雷斯政权的军队,也许有美国退役军人参加。西沃德机智地把他从这个任务支开,派他到巴黎作为私人代表去把美国的激昂态度告诉拿破仑。

罗塔皇后派出一个使节到拿破仑的朝廷和罗马天主教皇那里拼命求救,但俱无效果;由于过度紧张她的精神失常了。曾经发誓无论欧洲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保护马克西米连的拿破仑抛弃了他。美国给奥地利的一个强烈抗议,再加上普奥战争的需要,阻止了奥地利招募一师志愿军去支持这个墨西哥的摇摇欲坠的王朝。1867年春季,最后一批法国军队上船回国。这是哈布斯堡王室遭到的一长串悲剧中的第一个:马克西米连在克雷塔罗的当地的行刑队的前面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1867年6月19日)。还不到三年以后,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崩溃把拿破仑三世从王位上撵下来。他逃亡到英国,死于1873年。墨西哥的灾难,以及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臣民的拥护至少也是他的垮台的原因。在法国和墨西哥的两位皇帝的不幸的寡妇的一生中世界起了多大的变化啊!她们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

在对付拿破仑三世的时候,西沃德小心地避免提出门罗主义这个名词。他提到美国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共和制政府的废墟上建立帝制的既定政策。这使他在国内形势迫使他放慢步伐的时候有时间分析法国的意图。他终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的机会,无须发出一个措词尖锐的最后通牒。当法国从墨西哥撤退的时候,看上去是按照美国的要求似的。马克西米连的事件大大加强了门罗主义的持续力,使它获得了广大的民众拥护。通过鲜明的事例,人民了解到欧洲国家热中于利用任何机会来推翻门罗总统所禁止的事情。在南北战争中对门罗主义的其它威胁是在胜利结束这次冲突之后把那个主义作为一种国策来加强。 393

我们已经谈过西班牙在圣多明各方面比在墨西哥方面化费更多的力量。那个岛的东半部在1844年曾反抗过海地的统治^①。岛

^① 由于种族问题和其共同国内政治的纠缠,美国在1862年前一直不愿意完全承认黑人的海地共和国。为了要多米尼加割让萨马那湾来做海军基地,皮尔斯政府在

上黑人统治面对着的靠不住的和平和独立迫使白种人不断地向英国、法国、美国和西班牙提议对他们的国家实行保护，甚至加以吞并；但列强间的互相嫉妒阻止了任何行动。第二共和国的插曲及以后拿破仑三世最初几年的欧洲政策转移了法国的注意；但西班牙则注意地等待时机。美国南北战争一爆发，它就设法使现任的多米尼加总统发表一个并入西班牙的“自发的”宣告。西班牙立即宣布合并了这个岛(1861年5月19日)并派兵到那里去。西沃德在1861年三月间得到了这些行动的最初的消息，当时他正认真地建议通过进行一场对外战争来解决美国的内部分歧。我们必须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他给西班牙公使塔萨拉的通知，这个通知说假如西班牙政府批准合并的话，那将被认为是对美国表示的一种不友好精神，美国将“采取迅速，顽强，并且，可能的话，有效的抵抗来对付无论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或美洲大陆的任何部分或岛屿所进一步实行的这一类的冒险计划”。这个声明不容西班牙有踌躇的余地。西班牙尽量利用了它的机会，而林肯则拒绝了他的国务卿的发动一场对外国的战争的万应药方。西沃德不得不自食其言，等待时机。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尽管西班牙派了一支二万八千人的军队到那个岛去，它在圣多明各的军事行动于1865年初就完全失败了。这个对门罗主义的挑战，在美国腾出手来接受它之前，就自行崩溃了^①。

西班牙在1864年还利用美国南北战争的机会对秘鲁作战(它

1854年同多米尼加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但条约包含了一款，暗示将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公民有所歧视假如他们到美国南部各州去旅行或进行贸易的话。法国和英国承认了这个共和国而没有这种种族歧视，他们的代表很快指出了这一点，劝告多米尼加政府除非修正不要批准这个条约。美国政府不喜欢这些修正，因此没有把这个条约送到参议院去。1854年的全权代表的委派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承认。

^① 玛丽·特鲁得莱(Mary Treudley):《美国和圣多明各, 1789—1866年(The United States and Santo Domingo, 1789—1866)》, 载在《种族发展杂志》, 第七卷(1916年7月), 第83—274页; 前述佩金斯著作, 第253—317页。

从未承认秘鲁的独立),因而不久又卷入了对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1865—1868年)的战争。西沃德指示(1864年5月19日)美国驻马德里公使通知西班牙政府说“美国不能同意以西班牙的名义所采取的立场,或无视以占领和再次将其领土并入西班牙帝国的方法征服秘鲁的尝试”。西班牙否认了任何这种意图,但它劫夺了钦查群岛作为试探美国的战争意向的行动。对于这件事,西沃德准备了将由美国公使送达的一个声明(1866年七月)说,假如西班牙坚持这样做下去,它不能指望美国“维持其在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共和国之间的现行中立态度”。把这个态度秘密地透露给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就够了,不必要正式提出这个警告。对于美国反对法国在墨西哥的军队的坚定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印象,西班牙在美国从南北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情况下不想积极继续进行战争;虽然事实证明直到1871年以前不可能安排正式的停战^①。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放手让他的国务卿完全负责掌管外交事务。由于被授予这样的地位,能干的西沃德就努力继续进行被南北战争严重妨碍了的扩张的进程^②。我们已经认出他是禁止蓄奴地区共和党的“明显的命运”的宣传家^③。他想利用新的国家自信心的精神以及陆军和海军力量的骤然增长来把美国势力扩张到连接的大陆领域之外并获取加勒比海上的战略岛屿。他预期有朝一日能用和平方法把古巴和波多黎各从西班牙手中接收过来。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这些在大西洋上和太平洋上的扩张计划,他使通过尼加拉瓜的任何运河航线通行权确定下来(1867年条约),美国方 397

① 前述 J. B. 穆尔:《国际法汇集》,第六卷,第 508 页。

② T. C. 史密斯发表了一个使人信服的分析:《南北战争以后的扩张, 1865—1871 年(Expansion After the Civil War, 1865—1871)》,载《政治学季刊》,第十六卷(1901 年),第 412—436 页。

③ 西沃德在美国的“明显的命运”上的观点的最充分的表达是在他的 1860 年 9 月 18 日的出名的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演说里,他当时设想美国以和平的方法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将来的首都距他当时的所在地“不远”(大概是明尼阿波利斯)。

面保证运河的中立，而不是如像 1846 年同新格拉纳达所订的条约那样保证尼加拉瓜领土的中立。他想合并夏威夷群岛。他对远东事务有强烈兴趣。他抓住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从俄国人手中买到阿拉斯加。他只是暂时不願被收回的墨西哥，而希望最终吞并加拿大。可以想像得出，引人注目地和成功地领导一个旧日的强有力的扩张运动使他在总统已经失去了一切政治上的支持的时候能够得到民众的政治上的好感。

对于阿拉斯加——按照现在的叫法——民众并没有什么要求。除了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曾起过从俄国手中收买这块领土的几乎是想像不到的念头。在旧金山和西雅图普季特湾上的新居留地，有少数人对取得南阿拉斯加领海的捕鱼和毛皮贸易的权利有兴趣，但这些人从没有想把阿拉斯加置于美国主权之下。出卖阿拉斯加是由俄国提出来的。自 1799 年以来管理阿拉斯加的一个准政府公司——俄美公司陷入了财务上非常窘困的境地。这块领土太远，难于防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哈得孙湾公司和俄美公司之间达成了—个协议，把彼此的属地置于战场之外。但是，在另一次海战中^①，阿拉斯加非常容易被人占领，这一点是明显的。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格温曾有建立一个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在太平洋上的统治区的计划，他声称他是最先尝试劝俄国驻华盛顿公使出让阿拉斯加的人。以后在 1860 年，布坎南总统背着国务卿卡斯，转弯抹角地通过格温参议员重新把这个建议提出来，并提出五百万元作为收买价格。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的期间帝俄当局曾在他们的御前会议中几次权衡过阿拉斯加的价值^②，达到这个结论认为最好在这样一个可能的事件发生之前出

① 俄国在俄日战争之前没有进行过第二次海战。

② F. A. 哥尔德(Golder)是第一个从俄国档案文件考查这个问题的人。他从斯托克尔(Stoeckl)的文件中发现同加利福尼亚的格温参议员，马西国务卿以及(在 1859

卖,并把它卖给美国这个英国的领土上和海洋上的对手,因而在英国和俄国属地之间夹进一个美国领土构成的缓冲地带。南北战争阻挠了俄国处理这个地区的计划。没有证据表明西沃德在1867年三月以前曾经想到收买阿拉斯加;俄国驻华盛顿公使斯托克尔男爵(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记载)在1867年三月按照指示设计使西沃德向其询问俄国是否愿意出卖这块领土。斯托克尔回答说是。西沃德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们至少曾想到有一天阿拉斯加——以及他的许多本国人所期待的英属北美——可能由于它们的明显的命运被和平地吸引到美国联邦里来。他欣然接受了收买的机会^①。内阁同意了。一个以七百二十万元为代价的割让条约于是很快制定并签订了(1867年3月30日)。

这个只能由路易斯安那与之相比的幸运机会是西沃德的多种多样的扩张计划中的唯一的成果。他立刻把这个条约送至参议院。他得到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的有力支持,萨姆纳在条约签字的时候亲自出席,并把它视为走向最终吞并加拿大的一步。在十天之内,在全国能够真正觉悟到什么事情在发生之前,参议院以三十七对二的表决批准了这个条约(1867年4月9日)。在众议院实际拨出收买款项之前,俄国就移交了这块领土(1867年10月18日)。在众议院引起了一次大辩论,几个轻率的有利害关

年)助理国务卿阿普尔顿(Appleton)(但不是卡斯国务卿)的谈话,据称这些官员们表示愿意收买。《阿拉斯加的收买(The Purchase of Alaska)》,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二十五卷(1920年4月),第411—425页。参阅B.P.托马斯(Thomas)著:《俄美关系,1815—1867年(Russo-American Relations, 1815—1867)》,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和政治学研究》,第四十八卷(1930年);H.M.麦克菲尔逊(McPherson)著:《W.M.格温在收买阿拉斯加上的兴趣,1854—1861年(The Interest of William McKendree Gwin in the Purchase of Alaska, 1854—1861)》,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三卷(1934年),第28—38页。

① V.J.法拉尔(Victor J. Farrar):《阿拉斯加的收买(The Purchase of Alaska)》(华盛顿,1934年,修订版,1935年)。著者在《华盛顿历史季刊》上在1920,1921,1922,1923年写过几篇文章,讨论对阿拉斯加的兴趣的背景。

系的众议员采纳了一些据称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运送过供应物资给俄国因而有对俄国政府的无充分根据的权利要求的人的诉讼理由^①。但是，“明显的命运”的精神，由于相信俄国在南北战争中对北方事业特别友好而产生的对俄国的热烈感情，以及斯托克尔和西沃德的积极的宣传赢得了这一天的到来：众议院以 113 对 43 的表决通过了必要的拨款（1868 年 7 月 14 日）。明尼苏达的伊格内修斯·唐纳利说这只是把美国的仁爱的政府制度扩展到从巴拿马地峡到北方冰封地带人类居住的最远地点遍及整个北美洲的不可避免的³⁹⁹运动中的一步。俄亥俄州汉科克郡的一位蒙根先生这样说：“我们把英国狮子关在太平洋海岸的笼内；我们使哈得孙湾公司那个庞大贪婪的垄断机构无能为力了。”

蒙根先生的见解是肤浅的。西沃德把阿拉斯加视为朝向亚洲的海军前哨地点。美国在 1867 年 9 月 30 日占有了夏威夷以西的无人居住的中途岛，而西沃德则竭力主张吞并夏威夷群岛^②。但国会不愿意随从他向超出阿拉斯加以外的地方扩张。当时没有一个人，连西沃德在内，充分估计到这个向亚洲的领土跃进的将来的政治上的后果。在西伯利亚可以望得见阿拉斯加。跨北太平洋伸向堪察加的阿留申群岛还指向日本群岛。1875 年的日俄协定承认日本对千岛群岛的主权以交换确认俄国对库页岛的主权。当时没有几个美国人认识到日本的最北端的群岛同美国的最西端的群岛如何在北太平洋的白雾中几乎是面对面地对峙着。这是二十世纪的空中和海上战略中的重大因素。美国人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

^① 关于佩金斯的权利要求参阅前述哥尔德的著作，及 W.A. 登宁(W.A. Dunning)：《为买阿拉斯加的付款 (Paying for Alaska)》，载《政治学季刊》，第二十七卷（1912 年 9 月），第 385—398 页。T.A. 贝利 (Bailey) 在他的《美国为什么购买阿拉斯加(Why the United States Purchased Alaska)》，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三卷（1934 年 3 月），第 39—50 页一文中曾经分析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表决动机。

^② 前述登尼特的《东亚》，第 416 页。

都感觉到阿拉斯加，那个神话般的自然资源仓库，那个超过百倍地偿付了西沃德的收买价款的北极领域，作为美国二十世纪的防卫棱堡已经变得更为重要了。

由于西沃德的迅速而使人吃惊的一举而获得的阿拉斯加，民众对之并未感到需要。参议院前后不一致地拒绝批准同夏威夷的互惠条约(1867年9月21日)，有些人认为它是走向合并的第一步，而西沃德则认为它走得还不够远。由于几乎没有认识到夏威夷群岛是同阿拉斯加的防卫紧密相关的，参议院拒绝了这个条约。参议院对以后总统在1872年提出的同萨摩亚群岛的条约也未采取行动，这个条约本来会给美国一个位置在太平洋南半部的交叉路口太平洋上最好的港口的名为帕果帕果的海港作为独占的海军基地^①。民众对西沃德在1865—1868年同丹麦，西班牙，瑞典和圣多明各共和国交涉获得的加勒比海上的岛屿也没有感到任何需要。

西沃德刚刚处理完马克西米连的事件，他突然“为了他的健康”乘船巡弋到丹属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并到圣多明各(1866 400年1月)、海地和古巴。这些岛以及插入的波多黎各岛控制着由大西洋到加勒比海的主要通道——向风海峡和莫纳海峡。南北战争时期海上的那个危急关头以及在墨西哥和圣多明各的外国干涉使美国政府确信^②在加勒比海上拥有足够的海军基地以阻止将来的这种入侵和掩护到地峡的通路的好处，后者对西沃德的在太平洋和远东扩充贸易的期望有重要的关系。

到西印度群岛的巡弋是西沃德从它们的国王手里收买丹属西印度群岛以及从西班牙刚刚撤走的圣多明各那里争取割让广阔的

^① 关于夏威夷，参阅本书第347—350页。关于萨摩亚，参阅本书第454—459页。

^② 海军部长韦尔斯(Welles)赞成要圣托马斯，而不赞成要在圣多明各上的一个基地。

萨马纳湾海港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已经向丹麦驻华盛顿公使建议(1865年1月)购买在维尔京群岛的一些岛屿;在圣多明各,自1854年以来曾以一个美国代表的身分几次到那个还未被承认的共和国的威廉·L.卡兹诺正在那里敦促订立一个提供海军基地,甚至承认为保护领的条约。对萨马纳湾和维尔京群岛的交涉在1867年同圣多明各和丹麦同时进行。受到随处可能发生革命或从海地黑人共和国的入侵的烦扰,历届多米尼加总统都提出租让萨马纳,甚至直截了当出卖它,或者接受对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保护。西沃德同丹麦签订了一个条约(1867年10月24日),在当地居民投票同意的条件下,以七百五十万元的代价收买丹麦的圣托马斯和圣约翰两个岛^①。众议院在购买阿拉斯加拨款上的反对,加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丹麦条约的潜伏着的反对这时正在发作,使他在收买萨马纳的条件即将与圣多明各达成协议的时候不得不停顿下来。

401 这个犹豫只是使那个岛的巴厄兹政府对这件事更加热心了,它敦促美国直截了当把这个不稳固的共和国接收过去;它甚至提出宣布自己已被合并,期待着在美国制定出合并的详细办法以前作为美国的一个保护领。西沃德回答说合并是由国会办理的事。他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同意。总统在他的1868年12月9日的年度咨文中宣称:“由本政府给与有效的帮助来解决圣多明各的两个共和国不断向世界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必要的到来不会太久了,而这些问题也在古巴岛上正在显露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如此热切地把这个问题交给你们考虑,因为我认为时间已经到了,即使现在直接进行合并圣多明各岛上的两个共和国

^① 丹麦认为有此必要,因为以前它承担了一个义务,在移交圣克鲁兹(Santa Cruz)的其余岛屿时必须先得法国的同意。后来,在1868年,它解释说这个同意已经获得了,可以谈判割让圣克鲁兹的补充条款了。

不仅会得到当地有关人民的同意，而且也会使所有其它外国都感到满意。”引文里面的异体字表明西沃德的思想对于一些包罗广大的观念是多么敏感。海地政府没有建议合并，虽然它的总统萨尔纳夫提供了摩尔·圣尼古拉斯港，假如美国承担海地欠法国的债务^①。

在古巴没有合并运动，那里正在形成一个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在这个时候，西沃德还同瑞典进行交涉是否可能收买圣巴托洛默夫岛，并正在准备问西班牙是否出卖波多黎各海岸外的库莱布拉和库莱布里塔两个小岛^②。海军部长韦尔斯的日记里提到在1868年12月11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对西沃德的建立一个多米尼加保护领的提议未采取行动。众议院以36对126的表决（1869年1月13日）否决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纳撒尼尔·P.班克斯提出的授权总统把圣多明各和海地置为保护领的决议。印地安那的奥尔士提出的旨在把圣多明各合并到联邦内的提议也以63对110的表决被断然否决了（1869年2月1日）。西沃德把奥尔士提案的失败解释为由于众议院因政府拒绝把同多米尼加当局来往的所有秘密信件交给它和对“现在的政治事务的时机”感到愤慨所

① 我感谢 C. C. 谭西尔 (Charles C. Tansill) 教授借给我阅读他的还是手稿的关于美国和圣多明各的部分著作，使我有所获益；以及他的有教益的《丹属西印度群岛的购买 (The Purchase of the Danish West Indies)》(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2年)，本章有关各段我都依靠这部著作。

② 乔治·班克洛夫特在赴德国的任所途中被指示同美国驻西班牙公使 J. P. 黑尔 (Hale) 商量这个计划。后者说向西班牙政府提这样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就未提出此事。

瑞典政府曾在 1818—1819 年提出愿以二十万元的代价把圣巴托洛默夫岛出卖给美国，以后又在 1825 年提出五十万元的售价 (K. E. 卡尔逊的前述著作，第 68 页)，因此证明瑞典政府在西沃德的时代是可以允应割让那个岛的，但在丹麦条约签订之后，这样的商量中断了。在 1878 年瑞典把圣巴托洛默夫岛转让给法国，很明显这违反了同门罗主义密切相关的不可转移原则。这个岛是如此不关重要，因而美国没有提出来反对这个转移。这是唯一的一个明显的这类违犯门罗主义事件的例子。

致。人们对他的说法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提案毕竟是符合美国人民和政府的普遍的感情和期望的^①。

西沃德曾使用平行交涉的方法来使其互相刺激；特别是他故意显示获得萨马纳的可能性作为催促审慎的丹麦人的方法，后者主要目的是为这些没有利益的而且(对丹麦来说)无法防卫的岛得到一个尽可能高的价格。丹麦迅速批准了这个条约。岛上的居民期望通过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而恢复正在衰退的繁荣，迅速地几乎一致地投票赞成合并。在美国，这个条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它签订一个月之后，众议院以 93 对 43 的表决通过决议说：“在国家现在经济情况下，再购买任何领土都是不适宜的，本院将不承担拨款来进行任何这类购买的义务，除非有比现在所提出的更大的必要理由。”这个国会敌视总统是恶名昭著的。在 1868

^① 1856 年 8 月 18 日的国会法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可以以美国的名义和平占有无人居住的，未被其它任何政府占领或占有的岛屿，包括储藏的鸟粪(用作肥料)。这导致到 1880 年的时候共占有了七十个小岛或成群小岛。其中有些得到鸟粪法案担保的岛屿的位置报告得不正确，不能验明是任何现在已知的岛屿。在鸟粪储存量消耗殆尽之后，许多这些岛屿后来又被放弃了。其中之一是在圣多明各海岸以南十五英里的阿尔塔·维拉(Alta Vela)岛，美国的开发者在西班牙重新占领的前夕从那里被赶走了。业主们聘请前国务卿 J. S. 布莱克(Jeremiah S. Black)为顾问，他辞去了约翰逊总统的关于 1868 年弹劾的辩护律师；约翰逊在 1868 年因未命令西沃德国务卿批准阿尔塔·维拉的权利要求而受到弹劾。

这些鸟粪岛的占领还引起一些其它小纠纷，例如南岛(Marcus)岛(同日本)，洛沃斯(Lobos)群岛(同秘鲁)，纳伐萨(Navassa)岛(同海地)，阿弗斯(Aves)岛(同委内瑞拉)。事实上美国获得海外领地的第一步是从占领鸟粪岛开始的。这样占领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岛是：贝克(Baker's)岛(北纬 $0^{\circ}-15'-00''$ ，西经 $173^{\circ}-30'-00''$)，圣诞(Christmas)岛(北纬 $1^{\circ}-58'-00''$ ，西经 $157^{\circ}-10'-00''$)，豪兰(Howland)岛(北纬 $0^{\circ}-52'-00''$ ，西经 $176^{\circ}-52'-00''$)，贾尔维斯(Jarvis)岛(南纬 $0^{\circ}-22'-30''$ ，西经 $160^{\circ}-01'-00''$)。参阅 J. B. 穆尔：《国际法汇集》，第一卷，第 567—569 页；R. F. 尼科尔斯著：《纳伐萨：一个被遗忘的获得物(Navassa: A Forgotten Acquisition)》，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三十八卷(1933 年 4 月)，第 505—510 页，及《拉丁美洲的鸟粪外交(Latin-American Guano Diplomacy)》，载《近代西班牙属美洲》(乔治·华盛顿大学，1933 年)，该文是暑期学校座谈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前述 E. M. 道格拉斯的《边界》。

年它弹劾总统。一次灾难性的飓风袭击了圣托马斯。一次可怕的地震摇撼了它。一次巨大的浪潮淹没了它。这些现象不适当地加强了民众对在批准了收买阿拉斯加以后迅速到来的合并的反动，并给巨大的反对势力增添力量。

参议院也没有表现出热情，条约的提议者宁愿把它移交给下一届的格兰特政府去办。丹麦政府如此关切它的这笔好生意的命运以致它准备在一个有名无实的价钱之下再把圣克鲁兹的其余岛屿也加进去。它的代理人拉斯洛夫将军雇佣政论家来在美国争取民众拥护购买领土，但未产生效果。1870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建议否决这个条约。在这个条约的批准时期到来之前，参议院始终没有对它进行表决，屡次推延，最后终于失效^①。虽然条款上规定着条约的批准取决于参议院采取的行动，但这个条约遭到参议院以及格兰特政府的否决却引起了国内和国外的许多批评。丹麦内阁曾相信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后该条约一定会被接受，这时宣告辞职^②。

格兰特总统的态度是更加令人赞许的，因为他正在热心地努力去实现西沃德的另一个计划——合并圣多明各。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E.巴布科克将军于1869年7月去到圣多明各，同该共和国的授权代表签订了一个协议，其中包含一些最后条约的基础。多米尼加人声称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国家以一百五十万元代价移交给美国来偿还圣多明各的国债。另规定假如不愿意合并的话，多米尼加政府可以二百万元的代价把萨马纳湾卖给美国。这些“条约基础”包含了一个奇怪的款项，声称“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阁下”愿意私下允许使用他的一切影响使多米尼加合并于美国这个意见能够在国会议员中得到足以使这件事情得以实现的必要程

^① 关于1899—1900年和1916—1917年的交涉参阅本书第521页。

^② 前述谭西尔的著作。

404 度的赞成。内阁(可能除非什一人外)大吃一惊。由于接受格兰特的多米尼加政策,国务卿菲什得以更自由地处理同英国的“阿拉巴马号”权利要求和有关的古巴问题等重要事项。巴布科克又回到圣多明各,签订了(1869年12月3日)两个条约:一个是租借萨马纳湾,一个是合并整个共和国。格兰特答应在条约未订定期间保障多米尼加共和国抵御所有外国的干涉——正如泰勒曾经同意得克萨斯那样。在1870年在多米尼加领海有一支支持条约签订人巴厄兹总统,抵制革命的反对派的美国舰队。

格兰特积极实行他所答应的用尽一切力量使合并能够得到批准。他甚至拜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萨姆纳参议员,错误地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支持条约的保证。他还向其它参议员做工作。但参议院却以28对28的表决否决了这个合并条约。另一个条约未付表决。萨姆纳曾赞成合并阿拉斯加,并且还想要加拿大,但他坚决反对让加勒比海的人民加入美国联邦。这时,他正运用他的巨大威望和同他的朋友美国驻伦敦公使摩特利的亲密关系来阻碍“阿拉巴马号”权利要求问题的解决,除非英国从北美洲撤走。萨姆纳反对多米尼加条约激怒了总统,他借口这位参议员干涉了政府的对英外交而免去萨姆纳的朋友的驻英公使职务,并且成功地运用党内在参议院的压力解除了萨姆纳自从1861年以来享有很大声望担负着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格兰特以后的通过联合决议的方法来完成合并的努力失败了。

在收买阿拉斯加以后所发生的反动浪潮中,国会反对,公众也反对进一步扩张领土。事实证明,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并入了过多的领土了。它现在热中于重建国家的新政治问题、远西地区的定居和开发问题,以及紧紧掌握着东部地方的工业革命的兴旺的推进力。西沃德的远大的扩张幻想的纯净结果是阿拉斯加和中途岛。

第二十三章 几件重大的英美仲裁

405

(1870—1914年)

美英之间曾有过比美国同任何其它国家更多的纠纷而且是更严重的纠纷。自1815年以后，所有这些纠纷都和平解决了。除了两件(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通过外交方法解决外，南北战争以后的英美纠纷都是采用仲裁的方法平息的。这两个同种民族的外交表现了这种和解方法可能做得到的明显的例证：这两个民族在现在世界某些区域的防卫上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的紧密合作。这种常识是以这个普遍事实为依据的：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在更大的威胁面前它们最好暂时撇开自己之间的口角。在这一时期中，这些威胁主要是针对英国的，当我们着手讨论逐步缩小直到最终消除各项纠纷问题的一系列显著的仲裁的时候，这种威胁的性质将会显现出来。这些仲裁是：日内瓦仲裁，白令海的海獭问题，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阿拉斯加的边界问题和北大西洋的捕鱼问题。它将给我们一个观察美国通过一些普通的仲裁条约来建造国际和平的机会，例如两次海牙会议和伦敦海军会议。在这个方便的英美关系的分类办法中，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讲述这个问题以前，按年代顺序叙述下去。

紧接着南北战争之后，总的国际形势有把英国卷入另一个海洋战争的危险。在远东，在执行最近同日本订的条约上发生了麻烦，在欧洲，纠纷来自同德意志帝国统一有关的大陆战争及许多外交反响，以及东欧问题等使和平成了问题。有思虑的英国人不久就开始理解到帕默斯顿(自由党)政府在南北战争时期在处理美国

事务上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对联邦事业所抱的和所显示的天然不友好态度，为英国的敌国在中立国港口装备军舰树立了先例，以及在战后傲慢地拒绝把美国对“亚拉巴马号”及其同级船只的掠夺事件上所遭受的损失的权利要求交付仲裁。在将来的战争中，一个如像德国，俄国或日本的国家，即使它们没有一支舰队，根据英国宣布的政策，将可以自由地在战争中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中立港口建造巡洋舰。公海上将云集着大批的新“亚拉巴马号”，到处破坏英国的商业，或在英国中立旗帜下把英国的商业赶回本国。众议院在1866年七月一致通过了一个议案，取消了美国中立法上所禁止的把军舰出售给同美国和平相处的外国公民或政府的规定。这个威胁是明显的，公然的^①。

1866年英国政府的改换使得保守党内阁得以转变帕默斯顿和拉塞尔的立场，作出愿意排解权利要求问题的暗示，但不能考虑任何关于据称过早承认南方联邦各州的交战地位的赔偿问题。西沃德在1868年和1869年同英国交涉缔结权利要求协定。这些协定后来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包括“亚拉巴马号”权利要求的特别规定（这一类权利是如此称呼的）。在新的格兰特政府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是政治生活中最显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总统。他在1869年四月的一篇有力的演讲里，对这些协定中的第二个（约翰逊—克拉林顿协定）作了最后的否定，结果参议院以1对54的表决否决了，这个协定是西沃德在即将届满的

^① 关于华盛顿条约的外交，参阅：小查尔斯·F. 亚当斯：《华盛顿条约前后：南北战争和德兰士瓦战争（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War in the Transvaal）》（纽约，“纽约历史协会”印行，1902年）；罗兹前述书，第六卷，第355—376页；J. B. 穆尔：前述《仲裁》第一卷，第495—753页。前述C. E. 希尔的著作《条约》根据这个材料写了关于华盛顿条约和日内瓦仲裁的有益的一章。参阅下述巴克斯特的著作。最近的著作是L. B. 西皮（Lester B. Shippee）：《加拿大—美国关系，1849—1874年（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 1849—187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纽约，1939年）。

约翰逊总统任期的最末几天提交参议院的。他指出这个协定里面没有包含一个字的歉意，甚至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曾)忍受多年的重大的悲愤”。他暗示不止于是巡洋舰的掠夺(一千五百万元)，驱逐这些巡洋舰的费用(金额还未估计出)，和美国商船队的毁灭(一亿一千万元)，而且四十亿元战费的一半应当公正地由英国担负。他辩论说，假如没有这些巡洋舰的话，战争本来会在早得多的时候就结束了。这篇演讲的目的是在美国和英国的人民的心里投入这样一宗权利要求，其赔偿金额大得只能以把加拿大割让给美国才能满足。芬尼会^①会员们的袭击和美国通过中止互惠条约来迫使加拿大就范的明显的企图是消灭在加拿大存在的合并情绪的重大因素。事实是加拿大人不愿意与美国合并。即使只由于这一点，也就没有一个英国政府能采取这样一个解决方法了。

假如曾经有一个引起美国产生侵略念头的邻国的话，那就是1866年的加拿大了。对新世界的人民来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明显的命运”的本质上是和平性质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合并假如美国愿意用武力这样做的话。

还未曾同萨姆纳在圣多明各问题上争吵过的新总统格兰特将军支持这位显要参议员的主张；新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最初也是支持这种主张的。菲什期待着加拿大的最后独立，继而由美国吞并，但他看到任何因而产生的权利要求都是无用的，更不必说以割让加拿大来解决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了。他放弃了这个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要求“英国方面只做一个道歉的表示，发表一个可以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的声明和偿付权利要求”。英国政府正在转向这种可以接受的原则，这件事可以由1870年夏季议会通过的一个

^① 芬尼会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反英组织。
——译注

旨在阻止建造, 装配, 武装如像“亚拉巴马号”的船只或为其招募水手的议案表示出来。但强迫英国政府同美国和解的最后原因还是预兆不祥的欧洲形势: 普法战争和俄国在 1870 年 10 月 31 日宣布废除巴黎条约上那些使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在一次对俄国的战争中, 英国不能确信美国会守中立; 至少俄国将能在美国船坞建造“亚拉巴马号”船只^①。

408 菲什和约翰·罗斯爵士进行了非正式交涉, 后者是一个苏格兰人, 在加拿大取得了成功的成就而后由英国外交部在 1871 年机智地委任来进行这种“非正式的讨论”^②。同时, 在菲什的推动下, 总统在其年度咨文(1870 年 12 月 5 日)里明言放弃了解决的念头, 建议成立一个国内委员会来认证个别的权利要求, 由国会予以偿付, 因而由美国占有这些权利来和其它国家权利要求一同起诉。这个建议在罗斯在 1871 年一月由英国回来同菲什进行第二次谈话的时候已经生效。很快得到同意, 把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交给一个联合委员会, 由该会提出一个条约形式的解决方案来。圣胡安群岛纠纷也等候“亚拉巴马号”权利要求和渔业问题的解决。

一个包括五名美国代表和五名英国代表^③的联合高级委员会

^① J.P. 巴克斯特, 第三 (James Phinney Baxter, 3rd): 《1871 年的英国驻华盛顿高级专员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s at Washington, in 1871)》, 载《马萨诸塞历史学会会报》, 第六十五卷 (1937—1939 年), 第 334—357 页。

^② 罗斯曾担任仲裁哈得孙湾公司及 1846 年俄勒冈条约承认的附属哈得孙湾公司的普季特湾农业公司的权利要求联合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他在这个职位上同美国顾问 C. 库欣有着最友好的关系, 库欣介绍他同菲什接触着手进行这种讨论。从 1869 年到 1880 年罗斯任非正式的加拿大驻伦敦专员, 这个职位在 1880 年正式由 A. 高尔特 (Galt) 爵士担任。M.H. 朗 (Morden H. Long) 在《约翰·罗斯爵士和加拿大高级专员职位的非正式开始 (Sir John Rose and the Informal Beginnings of the Canadian High Commissionership)》, 载《加拿大历史评论》, 第十二卷 (1931 年 3 月), 第 23—43 页, 一文中描述了他的显著的事业和职务。

^③ 委员成分出色地代表着美国的和英帝国的各种政治的和地域的利益。美国委员是: 国务卿菲什, 最高法院的 S. 纳尔逊法官 (Justice Samuel Nelson), 曾任格兰特政府的首席检察官的 E.R. 赫尔 (Ebenezer R. Hoar) 法官, 新委任为驻英公使的

在 1871 年春季(2 月 27 日—5 月 8 日)在华盛顿开会。为着将来美国中立的战略打算,英国委员们不是不愿意以一个协议的对国际法的解释的方式在原则上承认担负赔偿对“亚拉巴马号”的权利要求,这种对国际法的解释将把仲裁化为一个调查事实的问题。留待要去做的事是:满足加拿大对于因据说是从美国来的芬尼会员的侵袭所遭受的损失提出的权利要求,解决麻烦的捕鱼问题,以及如果可能安排恢复加拿大—美国之间的互惠办法。

人们记得,根据 1854 年的互惠条约,美国重新得到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属北美的近海捕鱼权,这个权利曾于 1812 年战争中失掉(这个战争结束了 1783 年条约的有关条款,而在 1818 年条约上只 469 在指定的海岸恢复);交换条件是英国臣民在美国大西洋海岸南至 36 度纬度圈以内享受互惠的捕鱼权。这个互惠的捕鱼权随着条约期限的届满(1866 年 3 月 17 日)而失效。1871 年在华盛顿,新英格兰的捕鱼业者希望收回他们在 1818 年条约规定的海岸以外的全部特权而不给英国臣民以互惠的特权,他们甚至还想排斥加拿大鱼和鱼制品的自由进口。俄亥俄盆地和大淡水湖的人们还想自由航行圣劳伦斯河及其附属运河。这些关连着的问题须要与“亚拉巴马号”权利要求一道解决,而这个委员会还必须制定出美国参议院会批准的文件来。无疑是回想起埃尔金勋爵在 1854 年的有用的款待而得到的成功,英国委员们不惜化费大量金钱来招待美国官员,他们要使这个条约在香槟酒的浪潮之上漂过美国参议院;伦敦支付加拿大首相在华盛顿的一切开销,唯恐他的选民们

R. 申克(Robert Schenck)将军,和俄勒冈的 G. H. 威廉斯(George H. Williams)参议员。英方委员是:格雷和列本伯爵(Earl de Grey and Ripon), 格莱斯通(Gladstone)内阁的成员(这时再度取代保守党的自由党政府), 牛津大学国际法教授 M. 贝尔纳德(Mountague Bernard), 驻华盛顿公使 E. 桑顿(Edward Thornton)爵士, 哈得孙湾公司总裁和反对派保守党的著名人士 S. 诺思科特(Stafford Northcote)爵士和新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的首相 J. A. 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爵士。

因为这笔花费就找到一个反对这个条约的借口。这个委员会最后同意了包含如下内容的一个条约：

(1) “对于‘亚拉巴马号’和其它船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由英国港口逃出,以及这些船所进行的掠夺”表示道歉。由此产生出英国同意在将来仲裁中使用的规则的解释。英国代表成功地表达了女王政府的观点认为这些“应有的注意”的规则在巡洋舰逃走的时候并不是国际法,但只是为了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才为这个特定目的和为将来予以同意。这些现在著名的规则是:

一个中立国的政府必须——

第一,以应有的注意来阻止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装配,武装或配备任何它有合理的根据相信其企图是对一个与它和平相处的国家进行巡逻或战争的船只;并且以同样的注意阻止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加以特殊改装的这样的船从它的管辖范围离开;

第二,不允许或忍受任何一方交战国利用它的港口或领海作为敌对另一方的海军基地,或者更新或增添军事装备或武器,或招募人员。

410

第三,在它的港口或领海,以及对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行使应有的注意来防止对上述各项义务和责任的任何违反。

缔约国双方进一步同意“在彼此之间将来遵守这些规则,并把这些规则通知其它海洋国家,请它们也遵守”。

接受这些原则意味着英国政府有意义地建筑了一道预防危险前例的防线,而没有放弃原来的争论说这些规则在现在应用于其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国际法。它含蓄地处理了加拿大关于芬尼会会员的侵袭的抱怨,因为英国政府,在它做了以前的满足的表示之后^①,不能再严厉地抱怨美国没有以应有的注意来阻止这些事情了。这进一步意味着“亚拉巴马号”权利要求已经在原则上预先得到胜利了。美国完全指望着这些规则不久将被写入一个中

^① 参阅本书第 382 页。

立法典之中^①。后来英国人拒绝这样做。直到^②第二次海牙会议(1907年),这些规则才以更果断的形式,作为处理在海战中中立权利和义务问题的第八协约的一部分而被完全接受为国际法^③。

(2) 把英国臣民和美国公民的所有其它权利要求都提交给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判决和偿付。

(3) 在最长不超过^④十年的期限内重新允许美国公民享有在英属北美近海捕鱼的特权;交换条件是,美国同意允许加拿大的鱼和鱼油免税进口并开放北纬 39 度线以北的沿海岸捕鱼权。将在哈利法克斯设立一个特别联合委员会来决定为了恢复这个近海渔业特权而可能判给英国的另外的补偿金额。 415

(4) 把圣胡安岛海上边界纠纷^⑤交给德国皇帝仲裁。

(5) 美国公民可以在纽约的北部边界以北到海的英国的圣劳伦斯河永远自由航行;英国臣民可以在从英国领土经过阿拉斯加到海的育空河,波丘潘河和斯提金河的美国境内一段永远自由航行;英国臣民至少在十年之内自由航行美国的密执安湖^⑥;双方分别向美国有关各州和加拿大自治领建议相互使用沿国际边界连接

① 穆尔:《国际仲裁》,第一卷,第 666—670 页。

② 国际法协会在 1874 年在日内瓦开会,投票决定这些规则只是“宣言性的”国际法。

③ “第四款:禁止一个中立国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供给一个交战国军舰,武器或任何种类的军用物资。第七款:一个中立国不负阻止为供任何一个交战国使用的武器,军火,或一般对一支陆军或舰队有用的任何东西的出口或运输的义务。第八款:一个中立政府必须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阻止在其管辖范围内配备或武装任何它有理由相信将用来对一个与该政府和平相处的国家巡逻或从事敌对行动的船只。它还有义务以同样的警觉来阻止任何已经在其管辖范围内全部或部分地为用于战争而进行的改装的旨在巡逻或从事敌对行动的任何船只从其管辖范围离开。”

④ 在此之后这种特权还应继续直到任何一方在通知之后两年予以废弃。这个条款在美国的 1883 年通知以后,于 1885 年满期。

⑤ 参阅本书第 283 页。

⑥ 这依据渔业条款并在 1885 年随该条款到期而終了。它被成立国际联合委员会的 1909 年水路边界条约恢复。

大淡水湖—圣劳伦斯河系统的地方运河^①。

(6) 至少在十年之内在彼此的领土上相互运输货物^②；不对沿圣约翰河经英国领土漂流而下的美国木材和木料征出口税^③。

这个包括一个前文和四十三款的内容广泛的条约，再加上单独的 1870 年的归化条约^④（已批准）把英美之间当时存在的所有纠纷引上了解决之路。这是和解的一个很大的胜利。由于仔细的准备和那个委员会对参议院的充分的注意，后者迅速地以 50 对 12 票的表决批准了这个条约（1871 年 5 月 24 日）。最初表示拒绝在不把英国旗帜从整个北美撤退的情况下的任何解决上合作的萨姆纳结果失掉了他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⑤。他并不反对这个条约，他事实上投了赞成票。

412 华盛顿条约并没有明白地撇开由南方联邦巡洋舰的掠夺而产生的间接的或因而产生的权利要求。在日内瓦的重大的仲裁上^⑥

① 这些规定由双方分别执行，一般为地方当局所遵守。

② 这依据渔业条款并在 1885 年随该条款到期而終了。

③ 根据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上规定的有限度的自由航行。

④ 参阅本书第 170 页。

⑤ J. C. B. 戴维斯 (Davis) 在给纽约《先驱报》写的一封题目为《萨姆纳先生，“亚拉巴马号”权利要求及其解决》的信中争论说格兰特免去萨姆纳的朋友摩特利的驻英公使和萨姆纳本人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非任何政治阴谋或对圣多明各问题上的报复，而是获得华盛顿条约的成功明智而必要的措施。前述小 C. F. 亚当斯的著作也强调提出这种看法，但 D. H. 张伯伦 (Chamberlain) 的《查尔斯·萨姆纳和华盛顿条约 (Charles Sumner and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02 年) 则驳斥这种说法。肯定地，由于萨姆纳反对格兰特的圣多明各政策，后者更易坚持这些免职。

⑥ 条约上规定把对“亚拉巴马号”的权利要求提交一个包括五位法学家的法庭仲裁：一个选自美国（查尔斯·F. 亚当斯因而被任命），一个选自英国（最高法院院长 A. 科克伯恩爵士因而被任命），一个由瑞士总统指定（J. 斯坦弗利法官因而被任命），一个由巴西皇帝指定（伊塔胡巴子爵因而被任命）。法庭的第五名成员是意大利的 F. 斯克洛皮斯伯爵，他充任庭长。美国的代表是 J. C. B. 戴维斯，代表英国的是坦特登勋爵。美方的顾问是 C. 库欣，W. M. 埃瓦茨和 M. R. 韦特；英方的顾问是 R. 帕尔默爵士，由两位专家 M. 贝纳德和科恩先生协助。作为美方代表的顾问，C. 库欣出版了一个记事，《华盛顿条约：它的交涉，执行和有关谈判 (The Treaty of Washington:

美国代表 J. C. 班克罗夫特·戴维斯坚持这种因而产生的权利要求。这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反对派领袖迪斯雷利说美国索要的赔偿大过征服这个岛而强派的数目。间接权利要求的再次提出有使仲裁遭到破坏的危险，但双方政府的和解努力，加上大西洋两岸著名人士为此感到的焦虑，解除了这个危险。由美方委员查尔斯·F. 亚当斯和英方委员 A. 科克伯恩缔结的裁判权以外的协议中排除了这种因而产生的权利要求；在全法庭的一项声明中宣告了这一点。对于“亚拉巴马号”和“佛罗里达号”及其僚舰以及“谢南多号”在离开墨尔本港口以后所做的掠夺，最后判定的赔款总数是一千五百五十万金元^①。A. 科克伯恩爵士愤怒地不同意这个判定。他没有表现出英国人性格上所非常珍贵的好的竞技者的风度来。但是他的政府和国民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判定。这笔钱远远超过赔偿个别的美国的提出权利要求的人的数目^②。总的权利要求委员会在关于英国或美国公民的其它权利要求开会的时候，判给英国的权利要求者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八百一十九元，驳回了所有提出来的美国的权利要求。哈利法克斯委员会为了渔业上的让与又判给英国另外五百五十万金元的补偿。美国代表对这个判决的效力提出保留，但美国政府却承认了并偿付了它。华盛顿条约上的仲裁数字两抵下来之后，美方得到一千五百五十万元，英

413

Its Negotiation, Execution, and the Discussions Relating Thereto)»(纽约, 1873年)。在这本书里,除了其它有趣的资料外,还有关于这次仲裁中的人物的记述;美方秘书 F. W. 哈克特写的《1872年日内瓦仲裁法庭回忆录,对“亚拉巴马号”的权利要求 (Reminiscences of the Geneva Tribunal of Arbitration, 1872, the Alabama Claims)》(纽约, 1911年)也作了人物记述。

① 这包括了利息,但不包括保了险的损失;除非保险公司能证明它的在战争中的前述物损失超过了它所收的保险费,否则就不把保险费写进去。

② 一个特别的国内法庭判定的总数是 9, 316, 125.25 元。它在 1876 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第二个特别法庭(1876—1885 年)把差额按比例分配给那些按照日内瓦仲裁的判决未被承认的权利要求者,包括遭受日内瓦会议认为无罪的巡洋舰所造成的损失的权利要求和保险费。穆尔:《国际仲裁汇集》,第五卷,第 4639—4685 页。

方得到七百四十二万九千八百一十九元。对抵以后的差额八百零七万零一百八十一元是英帝国所有的投资中的极好的一笔投资。它产生了国际和解并加强了英帝国的海上防卫的丰富红利。用不比当时建造几只巡洋舰所需要的更多的花费，英国永远防止了小海军敌国在将来战争中在中立地区建造舰队的可能。在南非战争^①中它收获了它在1871年在华盛顿的明智政策的报酬，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从它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不抗议封锁的有远见的决定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一样。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重大的英美仲裁涉及到华盛顿条约以后出现的一个纠纷：白令海上海獭问题的裁决。关于此案的外交通信和司法文件堆集如山，但我们只能简略地谈谈。

海獭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分布于各地的、食肉的、一次只产一仔的、群居的、多配偶的动物。它们成群地在海里漫游，但每年回到栖息的岛上来繁殖生育。在这个时候雌海獭到邻近的广阔海域寻找供给它们及其幼仔生活的食物。雄海獭这个时候待在岛上晒太阳，消耗积存下来的油脂，看着自己的雌海獭的活动而消遣。在这个季节猎人可以非常容易地包围雄海獭，用棍把它们打死。在水里雌的和雄的分辨不出来，当它们游泳穿过狭窄的海上通道到它们每年一度的集合地点去的时候可以张网捕获它们。在回归时节，当雌海獭带着它们的幼仔游离岛屿的时候可以用枪射杀。

它们的皮非常值钱，而这些光滑的海上哺乳动物的生活习惯使它们成为海上猎人很容易猎取的猎物，因此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除了在北太平洋的白令海岛附近，特别著名的是自从收买了阿拉斯加以后就属于美国的，位置在阿留申群岛以北的普里比洛夫群岛以外这种动物几乎绝迹了。当国会对阿拉斯加实行领土管辖的时候，它采用了一些狩猎法律来保存那个地区及“其领

^① 1880—1881年英国同南非德兰士瓦的荷兰移民的战争。——译者

海”和“其邻近”的野生动物。它限定在普里比洛夫群岛每年只能杀一定数目的雄海獭，并把这个实业的开发租给一个公司来独家经营。它禁止杀害雌的和小的海獭。这些好意的措施并没有阻止这种动物的惊人的减少，因为外国猎人在公海上不加区别地乱捕它们，这就意味着被杀害的差不多总是雌的或跟随着它的独个的小海獭。一贯在平时反对在公海上所有形式的视察和检查的美国政府，现在能否加以干涉，并在北太平洋上实施警察制度来防止非美国人消灭这种全人类都感兴趣并且有用的动物呢？这个问题由于英国对美国没收在白令海的加拿大捕獭船提出抗议而被提出来，成为 1892 年 2 月 29 日的协议所同意的交付仲裁事项。

美国代表，不久前在哈里逊总统政府中任国务卿的约翰·W. 福斯特辩论说白令海，由于从俄国主权继承下来的权利和惯例，是在美国独占管辖范围内的领海。他还辩论说海獭并不是野生动物而是漫游出境的家畜，因此即使离开领海还是要按照国内规则来处理与之有关的事情。法庭作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反对美国这种 415 说法的决定。美国的做法如此明显抵触在白令海中的领海^①，如此一贯地抵触平时在公海上的视察和检查，以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得不到支持。

否决了美国的论点之后，仲裁人在条约款项里制定了将由两国政府充分执行的一些规则^②。这些规则还不足以拯救海獭，因为还有英国或美国以外的人继续劫掠它们。1911 年俄国和日本同美国和英国共同签了一个健全的四国协约来明确规定北太平洋的捕海獭业，并按一个确定的比例分享利润。自那时以后，这种动物

① 例如，对 1821 年沙皇谕旨的抗议；以及在 1824 年的俄美条约上规定缔约国的公民和臣民在太平洋的任何部分航行或捕鱼不得受到干扰或限制的条款。

② 根据一项单独的仲裁（由 1896 年 2 月 8 日条约所同意的），美国付出 473,151.28 元作为没收载运海獭的加拿大船的赔偿。

繁殖增长了十倍。这个协议还适用于现在将近灭绝的水獭^①。令人叹息的是，日本在1940年竟废除了这个协约。

一个关于有争论的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的更严重的纠纷突然在1895年爆发了。当1835年英国在伯利兹的移民侵犯危地马拉的边界时候，那个共和国请求美国根据门罗主义^②进行调停，但未生效。这个疏忽并没有立即给门罗主义带来多大损害，但美国在那个时候的消极态度无疑鼓励了英国在莫斯基托海岸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后来在1848—1850年成为对门罗主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危地马拉事件说明一个小的侵略，假如不加以反击的话，就可以导致别的一些更严重的侵略。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也是如此。

416 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在两个君主之间从未取得协议。纠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历史时期，而有关的地带最初只是一块价值很小的瘟疫流行的内地。在1840年罗伯特·朔姆布尔克为英国测量了这个边界。英国提出他的测量来“作为仅只是有待英国和委内瑞拉政府进一步讨论的一个初步方案”。它威胁着委内瑞拉对奥里诺科河的控制权。委内瑞拉不接受它，即使阿伯丁勋爵提出（1844年）离开奥里诺科但给英国留下一块在内地的相等面积的领土。这个南美国家的内部骚乱使任何交涉在1876年以前不可能进行。委内瑞拉在1884年提出可以接受阿伯丁勋爵建议的那条线，但这个时候英国又拒绝了。探矿者在两个国家的内地都发现了金矿。英国向西扩展了它所要求的领土，把委内

① 关于海獭纠纷及其解决，参阅J. B. 穆尔：《国际仲裁》，第一卷，第755—961页，概述在他的《美国外交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05，1918年）；J. W. 福斯特：《外交回忆录（Diplomatic Memoirs）》（两卷本，纽约，1919年）；T. A. 贝利：《1911年的北太平洋海獭协约（The North Pacific Sealing Convention of 1911）》，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四卷（1935年3月），第1—14页。

② 参阅本书第247页。

瑞拉的金矿包括进去，而委内瑞拉则把它所要求的领土大大向东扩展到把圭亚那金矿包括进去的埃塞奎博河作为反击。委内瑞拉没有力量保卫它的权利，而英国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1876年以后，委内瑞拉政府就一直请求美国的斡旋，但始终没有实际结果。它于是提出把整个有争议的地区，也就是两国的扩张了的要求，交付仲裁。美国向英国表示同情这个提议，但英国政府拒绝仲裁，除非委内瑞拉首先放弃朔姆布尔克线以东所有地区。委内瑞拉断绝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1887年)。克利夫兰总统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向英国提出安排仲裁的调停，但未成功。

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一个仍然在美洲大陆上保持殖民地的第一流强国，以提高边界要求并拒绝仲裁的办法，武断地扩张它的领土而违反禁止进一步把美洲大陆殖民地化的门罗主义的断定。英国的官方年鉴《殖民部一览》上面的统计在1885和1886年之间把英属圭亚那的面积突然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四十。克利夫兰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在1894年向英国建议仲裁。国会作出了一个激昂的联合决议来支持他。总统更由于英国在四月里劫夺尼加拉瓜的关税来强迫支付一笔权利要求，以及坚持拒绝把委内瑞拉纠纷交付仲裁而被激怒。国务卿格雷沙姆不愿意在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上惹事端；但在他死后，继任人理查德·奥尔巴在克利夫兰的建议下，以一个送给(1895年7月20日)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公文的形式，要求知道英国是否愿意把这个据他说牵涉到门罗主义(其原则已成为“美洲公法的主义”)的纠纷交付仲裁。没有一个负责的法学家曾承认过这个主义的这样一种性质。奥尔尼接着以一种令人回忆起韦伯斯特给许尔泽曼的照会^①的口气说：“今天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大陆的主人，它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的臣民来说就是法律。”兼任外务大臣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过迟地

^① 参阅本书第311页。

(1895年11月26日)作了回答,其大意是,虽然英国自1823年以来就愿意接受门罗主义的非殖民地化原则,但这不是一件牵涉到它的事情,美国把仲裁强加于争议双方的提议是不合理的,是不能用国际法来证明其正当性的。

这样,一个外国承担起向美国作关于门罗主义的解释。虽然英国在陆海军的力量方面大大超过美国^①,但它的加拿大侧翼却始终虚弱。还有其它将影响局势的因素存在,这使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不能不有所踌躇。贝亚德大使在1893年接任驻伦敦职务以后不久这样写道:“正在此时在世界的其它地区英国的双手已经攥住了许多掠夺品。美国是英国人民或英国领袖们在世界上最不愿意与之争吵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在我同他们接触中每天都有新的证据。其它欧洲国家象竞赛场上的拳击师那样正在彼此注视着。”^②

克利夫兰决心不接受英国对这个建议的拒绝。在给国会的一个特别咨文里(1895年12月17日),他请求授权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纠纷的是非曲直。他说,“当这样一个报告做好并被接受之后,我认为美国的责任将是使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当做是
419 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故意侵犯,来抵抗英国对经过调查之后我们判定应属于委内瑞拉的领土的霸占或政治管辖。在作这些建议

① 美国海军在1896年在海面上有如下的现役舰只:两艘第二级战舰,十二艘巡洋舰,九艘炮舰,六艘双炮塔低舷铁甲舰,一艘有撞角的装甲舰,一艘鱼雷艇。在1897年3月4日在建造中或批准建造的有:五艘第一级战舰,九艘炮舰,十八艘鱼雷艇,和一艘潜水艇。

同时期的英国海军的现役舰只是:四十四艘战舰,四十一艘第一级巡洋舰和一百三十六艘鱼雷艇。

美国陆军拥有25,000名士兵和2,160名军官。

英国陆军拥有147,959名士兵和7,496名军官。

② R. 麦克尔罗伊(Robert McElroy):《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的G. 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两卷本,纽约,1923年),第二卷,第178页。

的时候，我充分意识到由此产生的责任并敏锐地认识到将来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国会迅速地成立了这样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

克利夫兰声明的限制性质，如上面的异体字所表明，使总统留有充分的余地取消，假如全国人民在这个新外交问题上不合力支持他的话。现在已经印出来了的他的信札说明他对国内的过激的政治形势的不安超过他要保卫门罗主义的意念。克利夫兰在白宫的整个经历在外交政策上是如此的容忍，以致有些人怀疑他在这个惊人的例外上是在 1896 年政党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几个月采用自古以来的在一个国外问题上敲大鼓使全国人民听不到国内的不同的政见的办法。在西部，人民党员^①正迅速地集结力量，造成了夺取民主党的领导权的危险。在那个时候以及自此以后^②，在私下和公开讲话里克利夫兰曾对于他只采取门罗主义的立场以及相信英国将真正接受仲裁作出了解释。奥尔尼（作者 H. 詹姆斯）和克利夫兰（作者 A. 内文斯）的标准的传记接受了这种解释。被克利夫兰称为“二十英寸口径大炮”的奥尔尼的著名文件一直到总统致国会咨文之后才发表这件事就足以证实克利夫兰的解释^③。整个国家——尽管知识界感到懊

① 1891 年成立的一个政治组织，主张铁路公有，限制土地所有权，增发通货。——译者

② 参阅克利夫兰给驻英大使贝亚德的 1895 年 12 月 29 日的长信，载在内文斯 (Nevis) 的《G. 克利夫兰信件，1850—1908 年 (Letters of Grover Cleveland, 1850—1908)》(纽约，1933 年)；和克利夫兰的《委内瑞拉边界纠纷 (The Venezuelan Boundary Dispute)》(纽约，1901 年)。C. C. 坦西尔 (Tansill) 的近著：《T. F. 贝亚德的外交政策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omas F. Bayard)》(福特海姆 [Fordham] 大学出版社，1940 年)对克利夫兰有严厉的批评。

③ 一个前由德克萨斯州选出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托马斯·帕斯卡尔 (Thomas Paschall)，写信给奥尔尼，说委内瑞拉问题是国家内部疾病的对症药(载在 C. A. 比尔德 (Beard)：《门户开放在国内 (The Open Door at Home)》(纽约，1934 年)，第 100 页)。这封信的日期是 1895 年 10 月 10 日。奥尔尼似乎没有写回信。帕斯卡尔当时正在得克萨斯家居，期待着得到一个中央政府的职位，没有表明他已经看到直到十二月十七日才发表的奥尔尼的七月二十日照会的迹象。N. M. 布莱克 (Nelson M.

恼^①——是支持总统的。在世界的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正在配合着对他提供——如在 1867 年发生的那些事件对西沃德所提供的——一个显著的外交胜利的机会。在南非洲，德兰士瓦问题正迅速演变成一个危机。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赶走了俾斯麦之后正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海军和殖民地扩张。1896年1月2日，发生了詹姆森的袭击，一小伙英国臣民，为了煽动“外国人”起来反对南非荷兰国，侵入了德兰士瓦。这个行动遭受惨败。次日早晨，德国皇帝有意地发表了他给南非荷兰总统克吕格尔的一封电报：“在没有请求友邦的帮助下，你和你的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赶走了进犯你的国家的武装队伍，抵抗了外国侵略，维持了你的国家的独立，我特向你表示由衷的祝贺。”同英国在德国皇帝电报发表之后所受的震动比较起来，克利夫兰的委内瑞拉咨文对英国的影响还算是温和的^②；兰格^③把德国皇帝的电报称为近代外交史上的最大错误之一。在伦敦的音乐厅里，群众给“扬基歌”^④喝彩，而对“在来因河上警戒”^⑤发出嗤声。未来德国政策的趋势突然象在闪

Blake) 的《克利夫兰的委内瑞拉政策的背景 (The Background of Cleveland's Venezuelan Policy)》，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四十七卷(第二期，1942年1月)，第259—277页，分析得更为深刻。

① 苏格兰裔美国博爱主义者 A. 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 对于这个咨文自然表示惋惜。当时的助理国务卿 J. B. 穆尔竭力劝阻总统不要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滋生事端。另一方面，W. 威尔逊教授赞成总统的立场，总统深恶痛绝的 H. C. 洛奇也热烈地喝采。克利夫兰对之感谢的 T. 罗斯福也同样表示赞同。

② 贝亚德在 1896 年 1 月 15 日从伦敦给奥尔尼的信上说：“在这个国家里，在对美国——和对德国——冲突的可能性的讨论和对待的态度中有着一个令人高兴的可以觉察出来的明白的差别”。H. 詹姆斯 (Henry James)：《R. 奥尔尼和他的公务 (Richard Olney and His Public Service)》(纽约，1923年)，第 231 页。

③ W. L. 兰格：《帝国主义外交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两卷本，纽约，1935年)，第一卷，第 234—254 页。

④ 原文“Yankee Doodle”原系一支英国歌曲，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美国军队采用，后来广为流传，通常被视为象征美国的歌曲。——译者

⑤ J. L. 加文 (Garvin)：《约瑟夫·张伯伦的生平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第三卷，(伦敦，1934年)，第 96 页。“在来因河上警戒 (Die Wacht am Rhein)”系 1840 年的一支德国歌曲名称。——译者

电照射下显露出来了。当时英国在世界面前正处在没有盟国，在强国中没有朋友的“光彩的孤立”之中，在圭亚那的丛林边界这个不值一提的问题（牵涉到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原则而对英帝国来说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上同美国处于战争边缘。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力促首相（1896年1月4日）对德国举行一个海军示威，同时发表一个反对干涉南非事务的宣言，并“认真地努力同美国达成妥协……”。^①

从那时起，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了方向，转为与发生纠纷的国家妥协和拉拢盟国和朋友来抵制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可能同英国的大陆敌人联合起来推翻大英帝国的一个殖民主义的和具有强大海军的德国所产生的威胁。假如把最近已经与之解决了一切外交问题的美国加到敌对集团中去，那将是愚蠢绝顶的事。从克吕格爾的电报之日起，英国的对美外交就坚定地遵守着妥协，友好和如有可能就联盟的方针。从那时起，它就听任美国在美洲这块地域自由行事。旧的事物的秩序一去而永不复返了。一个欧洲列强和同盟关系的新的组合把另一次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同样的巨大的国际冲突引进了二十世纪。一个世纪以前，欧洲的灾难有利于美国获得独立，巩固它的国家和奠定将来的领土基础。现在一个类似的形势正在形成，不久之后当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地位的时候变得对美国有利。

当张伯伦在伯明翰的一个著名演讲（1896年1月25日）里说：“我们不贪图美洲的一英寸领土。两国（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罪恶……两个国家是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在情感上和利益上比地面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更紧密联结在一起。我对任何这种兄弟残杀性质的斗争感到十分厌恶，我将以愉快的心情来期待星条旗和英国国旗有可能飘扬在一起来保

^① 前述加文的著作，第96页。

卫由人道主义和正义所认可的事业”的时候，英美两国间的危机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萨利斯巴立勋爵在上议院公开宣称：“我确实认为把门罗主义提出来对美国来说是十分不必要的。鉴于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上的位置，美国对它感到关切，其自然程度同我们对荷兰和比利时所感到关切的程度是一样的。”在对具体条件的长期交涉以后，在几个星期之内委内瑞拉和英国就原则上同意举行仲裁，在交涉期间，约瑟夫·张伯伦曾到华盛顿做了一次时间很短的访问^①。在美国的密切谅解下，他们在华盛顿缔结了（1897年2月2日）规定具体条件的条约。仲裁法庭包括两个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两个英国法学家和四个人共同推选出来的一个俄国法学家 F. F. 马当斯作为公断人。它做出了判决（1899年10月3日），大致同阿伯丁勋爵提出来的 1844 年的朔姆布尔克线的修正方案相符合^②。

英国从它的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困境中发展起来的新的外交政策大大加强了美国在处理古巴危机上^③，调整巴拿马地峡的国际形势上^④，以及在我们不久将要谈到的同加拿大自治领解决阿拉斯加边界问题的一次新的严重的纠纷上的地位。

委内瑞拉纠纷最初显现出有助于对国际仲裁的一般原则的尊崇。在著名的 1895 年 12 月 17 日的咨文之后的通信里，国务卿奥尔尼曾建议缔结一个用仲裁方法解决包括委内瑞拉边界在内的美国

① 前述加文的《张伯伦》，第 159—160 页。

② 委内瑞拉纠纷的概括记载可以在罗兹的《美国史》，第八卷，和小蒙哥马利·舒勃（Montgomery Schuyler Jr.）关于 R. 奥尔尼的叙述，载在《美国国务卿》第八卷，第 291—319 页，里面找到。它们主要依靠 H. 詹姆斯的《奥尔尼》和克利夫兰自己的记录，还可以补充参阅 A. 内文斯的《克利夫兰》和坦西尔的《贝亚德》。

③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 1896 年六月告诉驻伦敦使馆秘书 H. 怀特（Henry White）说美国是否吞并古巴对英国来说是一件不相干的事。前述 H. 詹姆斯著《R. 奥尔尼》，第 244 页。

④ 参阅本书第 509 页。

与英国之间的一切将来纠纷的协定；而委内瑞拉边界，对于后者来说，将对委内瑞拉人的或者英国臣民的长期继续的占领给以应有的承认。索尔兹伯里勋爵也想把委内瑞拉问题归入某种仲裁的广泛安排中一并解决。虽然要这样做必须先由英国和委内瑞拉按照英国和美国商定的条文缔结一个条约；这时，双方政府都热心于按照当时还是新颖的缔结一个总仲裁条约的想法行事。他们在华盛顿签订了这样一个协定（奥尔尼-潘斯福特协定，1897年1月11日）。根据它的条款，如象领土权或国家权利这样的重要问题可以提交一个六名仲裁人的法庭，每方各出三人，以五人的多数可以作出有约束力的判决。假如不能作出判决，在纠纷的一方或双方请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友好国家进行调停之前，双方不得采取敌对行动。一个单独的法庭将以简单多数表决来解决较小问题。英国议会迅速通过了这个协定，但美国参议院却未表同意，主要因为它怕这样一来就将剥夺了它在特殊纠纷发生的时候通过允许交付仲裁的权力。参议院坚持这样做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停止采取仲裁的政策^①。

不管对奥尔尼-潘斯福特英美仲裁协定的反应如何，美国参议院还是无保留地签署和批准了1899年第一次海牙会议上同意的三个协定；其中第一个^②成立了“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这样一个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机构，假如双方自愿的话，纠纷国家可以把纠纷提交给由从国际法官名单上挑选出来的法官主持的法庭来解决。这个协定规定把纠纷提交这个法庭的国家应当每一次订立一个“专门决议”或者“协议”，明白规定纠纷问题和仲裁人的权力范围。美国代表团签了字但附了这样一个明白的保留：“不能将这个协定的任何条款解释为要求美国离开它的不干预，不干涉和不使自己

① 前述 W.S. 霍尔特的著作，第 154—163 页。

② 其它两个是关于陆战和海战的惯例的。

卷入任何一个外国的政策或内政的政治问题的传统政策；也不能将这个协定的任何条款解释为含有美国放弃了它在纯粹美洲问题上的传统态度的意思”。参议院在无进一步的保留情况下批准这个条约的时候明显地忽略了行政方面有安排一个不需要参议院批准的“协议”或仲裁议定书的可能性（在批准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上重订和在程序上修改的协定的时候，这种可能被一个相应的保留堵塞住了）。这个国际仲裁常设法庭接受的第一个案子是通过行政协定送去的1902年美国 and 墨西哥之间的“敬神基金”纠纷^①。1903年的委内瑞拉的特惠权利案件也送到那里处理^②。这些案子牵涉到的只是美国对别的国家提出的权利要求的问题；安排对这种权利要求的仲裁，在不牵涉对美国提出的权利要求的时候，只要达成行政上的协定就行了，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当一场十分重要争论即阿拉斯加的边界纠纷临近紧要关头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不曾打算通过同英国的行政协定把这个纠纷提交海牙常设法庭去解决。

俄国在1867年把阿拉斯加割让给美国，当时其边界是按照1825年俄国和英国的条约划定的，其走向如下：从波特兰运河河口“沿同海岸线平行的山脉顶端”向北到西经141度；但在那里这条线“将证明是在距海洋十多海里的位置，英国属地与按照以上所述应属于俄国的海岸线之间的界限将由一条同蜿蜒的海岸线平行而永不超距离那里十海里的线构成”。

把纬度54°40'以南的一条狭长海岸线（界线）保留给自己的俄国国会同意只给它海角的尖端而把港湾和凹入地方都留给英国的一

① Pious Fund Controversy: 这是关于很多年前耶稣会士们从虔诚的天主教徒们在墨西哥募集的为了向加利福尼亚的印地安人传教而设立教会的一笔款项。1848年之后，墨西哥拒绝给上加利福尼亚的天主教堂付这笔款项的收益。美国向海牙法庭提出申诉。——译者

② 参阅本书第522—525页。

条线，那是不可想象的。俄国和英国当然都没有这种想法。虽然在管辖权上发生了一些小的纠纷，加拿大自治领的英国当局直到1898年承认俄国及其接替的美国沿整个海岸线的主权而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并没有异议地承认美国法院对那里的英国臣民的审判权，从没有争论说英国的领土在任何地方达到海边。在那个难以到达的多山的旷野地带从未测量过实际的边界线。直到克朗代克发现了金矿之后，加拿大在1898年六月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才要求承认^①1825年的界线在那个锯齿形的海岸上横切深的阿拉斯加峡湾，以把太平洋港和对通到内地金矿的重要的河道的控制都留在54度40分以北的英国领土以内。这是一个可笑的，荒谬的要求，也是没有任何充分的根据的。在此之前的英国地图，在不同的时期，都标明这些水域是俄国的或是美国的。

一个大国政府愿意赞助它并坚持把它交付仲裁这个事实是这个要求的力量的唯一来源：假如英国在仲裁判决中遭到失败，对于实际所有权并没有任何损失；假如判决并不完全对美国有利，它将意味着加拿大由于提出了这个过分的要求而赢得一些东西。克利夫兰总统在其它事件上坚决坚持仲裁，在原则上给予英国把这个人多地制造出来的阿拉斯加边界纠纷交付仲裁的要求一个很大的支持。英国提出愿同美国商量安排所有其它事项，只要美国同意把阿拉斯加的边界交付仲裁。美国秘密通过当时在魁北克开会的联合高级委员会提出^②愿把边界问题交给一个六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双方各推选三名法学家组成，以过半数表决来做出决定。这个提议并未立即受到欢迎。加拿大人宁愿把整个问

^① 这个要求是在一个联合“高级委员会”在魁北克开会讨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十二项分歧的时候提出来的。除了阿拉斯加边界之外，大部分是关于较小的边界和航海的问题。

^② A. L. P. 丹尼斯(Dennis):《美国外交上的冒险行动, 1896—1906年(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纽约, 1928年), 第134—155页。

题交付一个具有一位中立公断人的联合法庭来仲裁，并坚持，无论这个法庭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皮拉米德港（那是平分南阿拉斯加的一条走廊地带）必须划归加拿大^①。国务卿约翰·海在南非战争时期成功地解决了巴拿马地峡问题而没有在阿拉斯加问题上做交易。阿拉斯加边界问题在一种权宜的状态下任其一直拖延到1902年。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最初拒绝仲裁。他在阿拉斯加的突出的狭长地区加强了卫戍部队。假如加拿大的要求如他所相信那样可笑——而且的确是如此——那是没有理由把它交付仲裁的。美国是能够保卫自己在世界的那个地区的领土的。罗斯福决心这样做。然而，作为对英国的一个友好行动和为了使那个政府从一个困难的和无法忍受的局面中体面地撤出来，总统同意采取仲裁的形式：通过一个协定（1903年1月23日）把边界提交给1899年约翰·海建议的方法来解决：成立一个由六名“公正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每方各推选三名，四人的多数可以作出判决。这意味着除非其中一人做出违背自己国家的要求的决定，就不可能作出判决来。加拿大首相威尔弗里德·劳里埃爵士认识到他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虚弱立场，乐于通过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仲裁同英国政府合作来从这个局面中解脱出来^②。

罗斯福留心保证使美国的代表不可能做出反对美国的决定——要找任何一个对这个问题在辩论之前没有固定见解的美国的知名之士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他任命了地理上最接近阿拉斯加

① T. 丹尼特：《约翰·海，从诗歌到政治（John Hay, from Poetry to Politics）》（纽约，1934年），第229页及散见全书。

② 前述A. L. P. 丹尼斯的著作，第143—147页；A. 内文斯（Allan Nevins）：《亨利·怀特，美国外交的三十年（Henry White, Thirty Years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30年），第192—197页；前述丹尼特的《约翰·海》，第224—239页，第350—363页。

的华盛顿州的前参议员乔治·特纳；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洛奇在早年就怀有强烈的反英感，是总统的亲近朋友和政治上的知己；和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鲁特是一位受到信任的总统的内阁成员，在他的监督下不久之前加强了那里的驻军。这时，谁也不能否认鲁特具备一个著名法学家的资格，但这两位参议员肯定是不够资格的。他们接奉的指示对于所期望于他们的说得非常明白：“你们自然将对摆在你们面前要由你们决定的问题作出公正的判断……”，总统为他们作了这样的规定：“在牵涉到的原则方面，当然是没有任何妥协的。”原则就是美国所作的对边界的解释。英国的代表包括两个加拿大人，他们并不比三个美国代表更具备公正的法学家的资格。他们是，魁北克省的副总督路易·A. 热泰和多伦多的律师A. B. 艾尔斯沃思；而第三个代表是英格兰最高法院院长阿尔弗斯顿勋爵。罗斯福写给美国驻伦敦使馆一等秘书亨利·怀特和正在英国休假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先生等个人非常“秘密”的信件，希望那些先生们把信件内容转达首相阿瑟·巴尔福和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罗斯福表示得十分清楚，假如法庭不赞成，将不再做仲裁的尝试；总统将划定并保卫边界线。

使许多加拿大人感到非常懊恼的是阿尔弗斯顿勋爵同三位美国“公正法学家”一道把这个案件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判决。他在回答从加拿大来的批评的风暴^①时坚定地宣称“假如实行任何种类的仲裁，他们就不需要根据法律和证据作出来的决定，他们不得把一位英国法官放在委员里面”。阿尔弗斯顿勋爵的情绪同A. 科克伯恩爵士在日内瓦仲裁中的情绪大相径庭。法庭的两位加拿大成员，如科克伯恩在日内瓦那样，拒绝在判决的这一部分签字，并在

^① G. W. 斯莫利 (George W. Smalley): 《英-美回忆录 (Anglo-American Memories)》(纽约, 1911年), 第270—271页。

较小程度上同美国委员抗议哈利法克斯的判决相似。委员会一致把四个在“锅柄”链上的南部的有纠纷的和无人居住的岛屿中的两个判给加拿大，这几个岛屿在罗斯福的“秘密”信件中是被认为有争辩的余地的。加拿大历史学家们^①以后评价这个判决时比他们当时的同国人客观得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们认为美国在海獭和白令海事件上的论据在法律上是无力的。所谓的阿拉斯加边界仲裁实际上是一个外交上的安排，通过它英国利用罗斯福总统的设计从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上光荣而体面地退出来。

罗斯福写给他的亲英的朋友马汉舰长说：“阿拉斯加边界的解决排除了我们同英帝国之间的最后的严重麻烦，其它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仲裁解决了……我对英国的看法同对德国的大不相同。”^② 国务卿约翰·海在1904年做了另一个尝试，缔结了两国之间的可以作为美国同其它国家间的类似条约的典范的总的仲裁条约。它事前同意把所有外交上没有解决的“法律性质的或解释条约的”分歧都交付仲裁，但在这个限制的范畴之内不包括牵涉到任何一方的“重大利益”，“荣誉”，“独立”或“第三国的利益”的问题。在美国政府内谁来决定什么是属于这一类的问题呢？参议院出于要维护它的处理外交事务的功能，修改了签订的条约，要求规定特别仲裁的“专门协定”，也就是“妥协”，必须每一次征求它的意见和同意。罗斯福总统对此不满意，从参议院撤回了这个条约；但后来他接受了对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在1908年同二十五个国家交涉的五年期限的类似条约所作的这样一种修正（这些条约在被新近

^① D. A. 麦克阿瑟 (MacArthur): 《英国外交和加拿大: 第二部分, 阿拉斯加边界判决 (British Diplomacy and Canada; II. The Alaska Boundary Award)》, 载《大学杂志》, 第六卷 (1907年), 第 412—426 页。

H. L. 金利赛德: 《加拿大和美国: 共和国和自治领历史的某些方面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and Dominion)》(纽约, 1929年), 第 210—229 页。

^② 前述罗兹的《麦金利和罗斯福》, 第 260 页。

的凯洛格式的仲裁条约代替之前，大都通过定期续约被延长到二十年期限)①。对于那些惋惜仲裁条约由于在其中紧紧系上了参议院的宪法赋予的权力而遭到“阉割”的那些赞成仲裁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必须注意到，在美国的政府制度里，总统完全可能自负责任把一个有关国家重大利益的事情交付仲裁而无须取得完全由另一个政党控制的国会的同意。自然，关于重大利益、国家荣誉、独立或第三国的利益的解释提供了许多毯子，其中每一条都可以用来掩盖一个问题使其不能交付仲裁。

鲁特同英国订的仲裁条约导致不在一个特别法庭下而是在 429
1907年海牙协定的规定下的最后一次重大的英-美仲裁；1907年的海牙协定是在经过一些程序上的修改以后，于1899年成立的常设仲裁法庭的继续。这就是历史性的北大西洋渔业问题。自从1871年条约期满之后，美国在英属北美领海之内的渔业“权利”已经转到1818年条约的规定情况，那个条约给予在指定的海岸而不是在英国领海的其它地带捕鱼的“自由”。但沿海各省及纽芬兰政府给美国渔民种种限制，使其与在同一水域捕鱼的英国臣民比起来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人受到当地警察规则的妨碍，得不到鱼饵和其它供应，无法将捕获的鱼转运出去，以及最后不得进入某些美国认为系公海一部分的大海湾，尽管美国曾成功地争论说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湾一向是它的领海的一部分。经过许多纠纷和不愉快的没收和抗议之后，整个纠纷被送至按照1909年的协定成立的海牙法庭去仲裁。这次诉讼过程以十二大册发表出来，为研究国际法的学者提供了一种教科书。法庭裁决了提交它的所有七个具体问题，从而节制了引起如此使人长期愤懑的各种地方问题。在它的判决里，它实行了未被批准的1888年贝亚德-张伯伦条约关于领土内的海湾的解释的规定，指定其中几个是专属英国的，其余

① 参阅本书第731页。

几个则接受一个领土内的海湾必须从一边的岬到另一边的岬不超过十英里的规则。

当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新的民主党政府总统的时候，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着手同各主要的大国交涉缔结他的调停协定。这些双边协定的专门名称是“促进和平的条约”，同二十一个国家缔结并获得批准。英国立即响应了这样一种安排（1914年）。布赖恩条约分别规定了一个五人特别常设委员会^①，由缔约国双方事前同意把他们在外交解决上失败了不能加以仲裁的一切纠纷提交这个委员会来调查和报告。调查和报告必须于一年的内提出；缔约国双方同意在调查和报告发表以前期间不进行战争或采取敌对行动。这些条约通常被称为布赖恩的“冷却”条约，因为在理论上它们提供一年的冷却时期，在此期内激动和愤怒心情可能平息下去。还没有过引用布赖恩条约的情况。在一个重大纠纷之中这一年究竟是冷却或是加剧民族的问题和激情还有待分晓。在以后的十五年中在许多事件上，由于许多委员会的委员人选的死亡，或者他们的国家政府忽略了任命他们，布赖恩条约沦为废物。在1928年这些条约由于国务卿凯洛格的和平方案^②而得以继续有效。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只有一个潜伏的但强烈的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即海上自由问题仍未解决。1907年海牙会议曾试图通过赞成设立一个国际捕获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在中立权利上未能达成协议因而不能成立这样一个新颖而崇高的法庭。代表们把这个问题提交1909年的伦敦航海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同意了一个经过仔细推敲巴黎宣言的条款而制

① 每一方政府各推举出一名委员；每方政府各从第三国人士中推举出一名委员；第五名委员由双方政府同意共同推举，当然这个人不得是任何一方政府的公民。

② 参阅本书第731页。

定出来的法典，在关于对违禁品的解释和分类和琢磨继续航行原则方面同美国历史上的释义相符合。美国参议院同意了伦敦航海协定，但是在英国上议院墨守英国关于海洋法的传统解释拒绝批准这个协定之后，塔夫脱总统停止最后交换批准书。我们以后还将讨论这件事情。

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时期的严重国际纠纷大多数是与英国仲裁解决的，与英国的仲裁记录是两个伟大民族的值得自豪的和平记录，他们的重大利益使它们获得协议比互相争吵对双方更有利。如果说他们在血统上不再是亲属了，他们此后在和平——和在战争——的问题上相互的关系却是亲近的。在讨论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美仲裁时候，我们已经远远超出本书各章的时期分划了。现在我们应当回转过来谈谈古巴问题和对西班牙的战争。

第二十四章 古巴问题和 对西班牙的战争

(1868—1898年)

“我们今天(1889年)同外国的关系只占美国政治中的微小地位，一般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如此彻底地把我们自己同其它国人民的事务分开以致我们很难认识到在成立政府的时候那些事务究竟占多大一个地位。”年轻的亨利·卡伯特·洛奇在《乔治·华盛顿生平》中的外交事务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这位作者当时几乎不知道在他那个世代的政治中外交事务将再次占据国家舞台的中心地位。

在标志着南北战争的结果的外交上的解决和扩张主义的冲动平息之后，美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同西部居留地有关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及与其关连的社会学上的问题——关于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关于新近获得的大陆领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关于发展巨大的工业功能来供应不受关税壁垒限制的广大的国内市场，这是美国公民在这时的巨大财富。一个有着足够供它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在其上进行各种活动的领土的富足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国家政策而得到精心的开发的话，一个在边疆上太平无事的民族；这样一个幸福的人民的国家似乎不会去关心对外事务的。当铁轨跨过大陆的时候，巴拿马地峡问题趋向相对平静。同加拿大在渔业和海獭问题上的冲突，对一个必须停下来去编修临时篱笆来隔开邻居的土地(随着事物的自然发展，他期望这块邻居的土

地有朝一日和平地和自己的土地合并)的忙碌的农民来说,只是一个微小的地方性的麻烦,刚果自由国、利比利亚^①、萨摩亚、夏威夷群岛^②、巴西、智利^③这些地方及外国商业是留给国务院设法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它们不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重要问题。古巴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麻烦。但即使这个问题在1878年也平息了一段时间;当时奴隶制已经废除,而令人苦恼的民族问题在南方的政治建设中一直继续存在,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想并入更多的在其上主要居住着会带来更多民族问题的民族的土地。中国移民只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内的问题,全国政党的政客们愿意阻止它来换取地方上的政治支持或赢得新近组织起来的各种工会的大批投票人的感谢;中国距离美国很远,不能在地方局势中成为一个有强迫力量的因素。所有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不怎么重要的,在一本象本书这样篇幅的历史书中最好同以后的二十世纪的外交关系的其他发展一起来讨论——但古巴问题却与这些问题不同。

古巴问题在十九世纪末,在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特的时代之末,变得严重起来。这是同美国在一个大陆上定着的完成,美国边疆的消失,以及全国的思想转向其它的关注方面时候同时发生的^④。这个情况在美国人民突然受到启发而意识到他们的年青世界的力量和他们已接近成熟的时候达到高潮。1895年克利夫兰总统的要求支持门罗主义的号角声唤起他们这种新的感情。铁路建成了,人们已经在美洲大陆上定居下来了,边疆消失了,国内市场看来已经接近充分发展,人们指出,现在人口众多的太平洋海岸需要在将来得到海军保护和发展海上交通。突然之间这个国家面临

① 关于这些非洲问题参阅第三十一章。

② 参阅第二十五章。

③ 关于拉丁美洲和泛美洲问题,参阅第三十九章。

④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在1893年设立大使这一个级别发生在历史学家们划定为边疆消失的时候。

着需要有一条地峡运河的问题。

假如美国想找一个同西班牙进行一场报复性和侵略性的战争并使古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的借口,那么,在紧接着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当时这个国家的陆海军在北美及其邻近的海洋上所向无敌)就可以容易地找到一个。本来可以在古巴叛乱战争所产生的麻烦中找到借口,正如西班牙为干涉墨西哥和圣多明各所曾找到的一个类似的借口。

古巴的继续实行奴隶制以及不让当地居民参加和享受统治的果实的在那里的西班牙驻军总司令的极权军政府是 1868 年岛上
434 爆发以独立为目的的革命的根源。西班牙国内同时发生的一个暴乱和革命使古巴的叛乱和混乱延长了十年。1868—1878 年的冲突比 1895—1898 年的战争流血更多,消耗更大而且同样加重了普遍的烦恼,但美国在两次叛乱中态度大不相同。1868—1878 年的古巴叛乱发生在美国突然改变了进一步扩张领土或进一步发挥国家影响的意向而美国人民已经转向国内问题的这一时期。1895—1898 年的叛乱发生于一个不同的世代,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对于待在国内的各种活动感到腻烦,这个时候精明的年轻的扩张主义者正在要求一个更远大的国策,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民族的精力和想象力正在期待着一些新的冒险的活动、感情和经验,这个时候美国人民把注意转到美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去了。

由于古巴与美国邻近使得 1868—1878 年的长期的血腥的叛乱对美国来说是格外令人烦恼的;这是因为对具有古巴姓氏和叛乱习惯的美国归化公民所采取的镇压措施的影响,也因为在十年的长时间内为了在本国领海内采取警察措施来阻止那些企图对一个友邦进行敌对行动的远征而花费了大量金钱。格兰特总统在 1869 年通过国务卿菲什向西班牙提出调停解决它与古巴的争端的建议,在废除奴隶制和古巴独立的基础上,美国保证由古巴付给

西班牙一笔赔偿。西班牙拒绝讲和除非叛乱者首先投降^①。尽管这些麻烦的归化了的美国人的性情乖戾，西班牙仍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身份和按照老的 1795 年平克尼条约的规定，他们享有免受专断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的充分保护的权利，除非被逮捕的时候正在手执武器（1877 年 1 月 12 日的议定书）。它还同意（1871 年）由一个联合权利要求法庭来判决美国公民的权利要求^②。菲什明智地劝阻了格兰特总统跟随国会承认古巴人的交战国地位^③。这样一个承认会给古巴叛乱者一种无必要的精神鼓励，会使得菲什同时期的反对促使英国在 1861 年承认南部联邦的交战国地位成为自相矛盾，并会给予西班牙以在公海上视察和检查有携带违禁品嫌疑的美国船并将它们带至审理有关捕获物资的法庭的权利。古巴的交战国地位未被承认这件事在 1873 年西班牙政府在公海上捕获了一只假冒（后来证明）美国船的海盗船“弗吉尼亚斯号”，并把船上的五十三名旅客和水手（经过了一个名义上的军事法庭审问之后）全部处死的时候使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在美国发出一个严厉的最后通牒之后，西班牙放回了这只船并给八万元的赔偿用来分发给被害者的家属。当美国确定“弗吉尼亚斯号”确实没有权利悬挂美国国旗的时候，就免掉了向美国国旗致敬的要求。处罚参与这个暴行的西班牙官员的允诺始终没有实行。西班牙也给英国一笔赔偿，因为被杀害的人中有十九名英国臣民。

“弗吉尼亚斯号”案件的重要意义^④ 在于它提供了开战的充足

① A. 内文斯：《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纽约，1936年)。

② 西班牙偿付了这些判决中的 1, 293, 450.55 元，并在 1896 年对未在 1871 年权利要求协定上得到解决的莫拉(Mora) 权利要求又付了 1, 500, 000 元。关于这些权利要求，参阅 J. B. 穆尔的前述《国际仲裁》，第二卷，第 1050—1053 页。

③ 解释古巴叛乱不能成为承认交战国地位的正当理由的格兰特的 1870 年 6 月 13 日咨文(J. B. 穆尔，《国际法汇集》，第一卷，第 194—196 页)，现在仍然是关于交战国地位的法律上的概念的一个标准的说明。

④ 关于来往文件，参阅前述查德威克著作，贝克尔著作，和 J. B. 穆尔的《国际法汇集》。

的理由，但美国政府中却没有一个人想利用它。舆论可能支持战争——在纽约和其它东部城市举行了群众集会强烈抗议这次处决并辱骂国务卿菲什——但没有黄色新闻来煽起不正常的兴奋，也没有真正的进行战争的要求。这个时候进行一场小的战争可能有助于把国家从1873年的工业衰退中拯救出来，这个时候西班牙实际上由于本国半岛上的内战而软弱无力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并且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举起一个指头来抗议。

古巴的叛乱继续考验格兰特政府的坚忍和可作为模范的耐性。扣留，没收，任意逮捕和处罚美国公民的事件继续发生，对“弗吉尼亚斯号”杀害事件负有责任的官员仍然未受到责备。菲什不愿意在没有得到欧洲国家至少是隐含的委托的情况下对古巴进行干涉。美国与英国之间的一切问题现在都已解决了。在全欧洲的认
436 可下与英国合伙来在古巴实现和平不是适宜的吗？这样确实可以表明美国的公正无私。菲什发给（1875年11月5日）凯莱布·库欣公使一个念给西班牙外交大臣听的长的照会，表明总统想尽一切方法在解放和自治的基础上导致古巴和平的决心。他指示美国驻伦敦公使建议，假如英国政府运用其影响来支持美国的立场，美国将感到愉快。还向其它政府（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暗示，美国极希望它们劝说西班牙使其了解放弃或结束古巴斗争的必要性^①。菲什在当时和以后，由于约请欧洲合作来解决一个美洲问题因而做出了危害门罗主义的建议——这样的提议在以前和此后都没有人提出过^②——遭到尖锐的批评。在提到这个奇怪的提议的时候，人们想到俾斯麦同奥地利合伙来决定霍尔施泰恩的

^① J.B.穆尔的《国际法汇集》，第四卷，第99—105页，印了有关文件。参阅前述查德威克、贝克尔、拉塔内、卡拉汉和内文斯的著作。

^②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6年建议俄国劝西班牙和它的前殖民地讲和；但那是在那些殖民地的独立已经得到承认之后和亚当斯明白拒绝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之后，而门罗主义的宣布正是由这样的局势下发生的。

地位，因而怎样容易地导致冲突(有意造成的)和战争。幸而欧洲国家那个夏天由于在它们的大陆有可能发生另一次德法战争^①或俄土战争而感到惊慌，没有时间去理会古巴的麻烦问题，虽然德国，意大利和俄国说他们已经指示他们驻马德里的代表劝西班牙明智地恢复古巴的和平。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宣称，“假如菲什先生的提议不过是打算为了和平而进行友好的调停，这个时候选得不对，而且这样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菲什在1876年向西班牙建议在古巴逐渐废除奴隶制和成立一个改革的政府的基础上达成和平。

和平突然来临了。“在古巴的斗争”于1878年结束，这是因为那一年西班牙内战由于阿方索十二世的继位而结束，因而腾出了足够的兵力来在此后的二十年期间平定这些已经筋疲力尽的岛民。经过逐渐解放之后，奴隶制在1886年结束了，实行了一种由古巴人代表参加西班牙议会的体制。古巴问题从此平息了十七年。 437

当古巴人从前一代的衰竭中充分恢复过来能够比以前更坚决地再次努力结束继续存在的总督的专横权力和西班牙对这个岛的剥削的时候，叛乱在1895年重新爆发。对暴政的不满加上带来普遍的失业和贫穷的经济危机的苦难使反叛者的队伍扩大起来。古巴财富的五分之四是糖。同西班牙订的1884年行政协定^②由于免除古巴和波多黎各产品的10%的特别从价税曾经给古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市场，而1890年的麦金利税则使古巴的糖可以在市场上顺利销售，但随着1894年威尔逊关税法的通过麦金利税则就突然停止生效。美国在经济困难时期又减少了糖的进口。和古巴糖业有关系的美国资本家远没有推动美国在1895—1898年

^① J.V.富勒(Joseph V.Fuller)在《美国国务卿》，第七卷，关于菲什的描述；以及W.L.朗杰：《欧洲的各纵联横，1871—1890年(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纽约，1931年)，第31—55页，第59—86页。

^② 参阅本书第743页，注1。

的事件中干涉古巴来保护那里的甘蔗种植园——学术界一度热心接受的一种传说——他们无力阻止国会通过结束互惠待遇而造成使这些种植园遭到毁灭的威胁；尤其是，他们宁愿要西班牙的统治而不愿要古巴统治。实际上美国的企业界是坚决反对同西班牙打仗的^①。

叛乱的战火又在岛上燃烧起来。古巴的革命者决心有组织地破坏甘蔗种植园和牧场来打破压迫者的力量，“决心即使在废墟和灰烬之上展开古巴共和国的旗帜”，如果必要，把这个岛夷为平地使其对西班牙没有任何价值。同以前一样，他们从本国人在美国和其它国里所组织的“秘密团体”那里筹集款项；同以前一样，这些人试图违反美国国内的“中立”法，从美国领海出发去进行敌对的远征。在西班牙方面，它决心用一种残酷镇压的“彻底”政策来对付这个恐怖破坏策略，于1896年委任韦勒将军执行这种政策。他着手把古巴平民按军事组织集中起来，把集中营外的一切人都当做叛乱者对待。在那些不讲卫生的年代里热带集中营里面的饥饿的被集中的人，男人，女人和小孩象苍蝇一样地大批死亡。但考虑到叛乱者本身所要进行的战争的野蛮和不人道的性质时，人们很难想出能够对付的任何别的有效的军事办法来。它肯定没有违反文明战争的法规。公正的学者们必须想到其它文明国家也曾被迫采用过类似的措施；英国在南非，美国在菲律宾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使用了相同的办法。对于这场战争的这种性质，古巴人本身的责任大过西班牙人。西班牙的责任在于未能适当地照顾被迫集中的平民，在于没有推迟采取这个集中步骤到平民可以得到供应物资和卫生设备的时候。

^① J.W. 普拉特(Pratt):《美国企业和西班牙-美国战争(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载在《西班牙属美洲历史评论》，第十四卷(1934年5月)，第163—201页；前述J.F. 罗兹的《麦金利和罗斯福政府》，第55页。

所有这些处置专断地干涉到居住在岛上的美国公民（归化的或非归化的）的财产和人身。格兰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如此坚忍地奋斗了多少年的同一个问题现在突然成为克利夫兰总统在第二任期的最后几年中所关切的事项了。克利夫兰和奥尔尼的政策实际上一般是格兰特和菲什的政策再版：不妥协地保护所有美国公民的条约规定的权利和再三要求西班牙接受美国的调停来结束这场斗争，以免它在又一十年中继续妨碍西班牙—美国的关系。

这些“秘密团体”现在由于有了经验，有了更多的资金和享有更多的群众支持和同情而得到加强，它们的活动比过去任何时候成为更大的治安问题。实际上整个大西洋的得到海军增援的缉私部队不得不去执行阻止机智的掠夺者和军火走私者^①从长岛到距离古巴只有拖船航程的格兰德河沿 5470 英里曲折的海岸线使用各种狡猾手段离开的勤务。西班牙政府几乎完全依靠美国来阻止他们离开美国的领土，而不是以自己的军队的损失、警戒和行动来在古巴水域阻挡他们。在已经知道的七十一件远征图谋当中，西班牙在古巴海岸阻止了五件；美国破获了三十三件，英国破获了两件；暴风雨破坏了四件，二十七件获得成功^②。这些远征大部是从美国而不是从英国或欧洲大陆出发的，如西班牙正统派党员^③在西班牙革命时期所做那样，这是因为美国距离这些“秘密团体”的目的地更近，费用更少，而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即使在没有被承认

^① H.S. 鲁本斯(Rubens)在《自由，古巴的故事(Liberty, the Story of Cuba)》(纽约，1932年)一书中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回忆他年轻时代同这些“秘密团体”和它们的掠夺活动的联系。

^② 马凯·德·奥利瓦尔(Marqués de Olivart):《西班牙和美国在古巴问题上的分歧(Le différend entre l'Espagne et les Etats-Unis, au sujet de la question cubaine)》，载在《国际公法评论》第四卷(1897年)，第577—620页，第五卷(1898年)，第358—422页，第七卷(1900年)，第541—629页，第九卷(1902年)，第161—202页。

^③ 原文 Spanish Carlist，系拥护卡罗斯(Don Carlos Maria José Isidoro de Bourbon 1788—1855)及其继承人为西班牙国王的党徒。——译者

战争状态之下没有国际中立法意义上的义务，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去制止它们。在这样说的时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1896年低级联邦法院的一些判决中曾给掠夺者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后来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才使法律严密起来^①。

在国会里，对古巴人的感情日益高涨，甚至主张由美国直截了当进行干涉来解放他们。两院通过了同时的(但不是联合的)决议(1896年4月6日)主张承认古巴的交战国地位，敦促总统向西班牙提出美国的旨在获得古巴独立的和平的调停。后一点正是格兰特总统在1896年所提议的，但他由于国务卿菲什的主张，拒绝承认古巴的交战国地位。克利夫兰满足于平静地提议同西班牙合作，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给古巴带来和平。他在提出这个建议的同时作出了反对任何篡夺西班牙主权的阴谋的保证，只是没有说出来西班牙的主权是古巴的稳定所必要的^②。经过一些踌躇和内部辩论之后，西班牙内阁有礼貌地谢绝了这个建议。他们怕美国是想把古巴同西班牙分开以便自己控制它。他们的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克利夫兰在美国国内的统治地位正在下降。在参议院里，象亨利·卡伯特·洛奇这样的一些年轻的好战分子们宣称上帝将要责骂美国人民，假如他们等候古巴独立直到这个岛会被火和剑化为荒野的时候。西班牙的国务大臣在谢绝克利夫兰的诚心的提议时对总统说，美国政府假如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去制止非法

^① 人们不能把在“中立的”英国装备“交战的”南方联邦的巡洋舰和从美国违禁运输人和武器到“叛乱的”但不是交战的古巴两件事加以对比。由于友谊上的义务和政策的指令才使用美国的国内法来禁止去古巴进行活动的军事远征队的出发。

关于有关法院案件的评论和国际法的其它问题，参阅 E. J. 本顿(Benton):《国际法和西班牙-美国战争的外交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Spanish-American War)》(巴尔的摩，1908年)；他批评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使法律严密起来之前低级联邦法院的早期判决给予掠夺者以活动的余地。

^② 1896年4月4日国务卿奥尔尼致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杜布·德·洛姆(Dupuy de Lome)的信件，载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7年)，第540—544页。

的掠夺者的远征队出发的话，对平息古巴的动乱会有更大的助益。感到失望的奥尔尼国务卿在1896年夏天警告西班牙驻美公使说，如果一个新政府上台，它也许不能约束敌视西班牙的势力。

在参议员洛奇的启发下共和党不久在1896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古巴独立、美国控制夏威夷和占有并经营一条尼加拉瓜运河的主张。克利夫兰总统在他的党在1896年大选失败之后在他给国会的最后一个年度咨文里宣称可以想象得到，一种局面可能发生，“在那个局面下我们对西班牙主权的义务将被一些更崇高的义务所代替而我们将会毫不踌躇地承担这些义务”。格罗弗·克利夫兰是一位具有宏大道德心的人，他严厉地对待一个强国——英国，但却以无限的耐心和说服的方法来对待一个弱小国家——西班牙。同时他充分保护了美国的公民和他们享受的条约权利中的财产，尽管有某些归化公民的成问题的牵连^①。然后，他把发展着的局势移交给新选出来的他的继任人。不出一年局势就难以控制了。

在政府更迭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克利夫兰曾努力做一个公众意见的领导者。麦金利也是如此。克利夫兰的稳健和勇气的推动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全国和新总统还继续产生影响，直到剧烈的不幸事件使已经充满了对古巴革命的真正同情的情感的公众及其政治家们的情绪激怒到了爆发点。麦金利曾一度想把古巴买过来，但向西班牙驻伦敦使馆试探的结果使他十分沮丧^②。即使西班牙愿意出卖古巴，收买一个一等的叛乱毕竟是不得当的。象格兰特和克利夫兰那样，但用了更迫切的辞句，麦金利又一次向西班牙提出(1897年9月23日通过驻马德里

① 前述内文斯的著作《克利夫兰》里有几页阐明了总统的古巴政策。

② L.B.西皮和R.B.韦(Way)在《美国国务卿》第九卷第44页上关于W.R.戴伊(William Rufus Day)的描述。

的新公使W. L. 伍德福特)美国出面调停的建议。西班牙又一次轻率地加以拒绝。西班牙政府回答(1897年10月23日)说它将以人道主义方式,不停止它的军事行动,同时采取一些“在不可动摇的西班牙主权之下”趋向自治的改良措施。它又一次说美国可以
441 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甚至修改有关的国内法,来阻止掠夺者出发以及解散古巴的“秘密团体”,这样来最有效地为谋求古巴的和平进行合作^①。

西班牙的新的自由党政府这个时候通过摄政皇后宣布把半岛上西班牙人享受的一切权利扩展到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居民的声明(1897年11月25日),通过在古巴实行西班牙的选举法,以及通过着手推行(在任何时候必须得到西班牙议会的批准)一系列向自治前进一大步的各种措施(假如古巴人停止战斗并接受这些措施)而将它曾宣告的那些事项付诸实行。萨加斯塔政府想在古巴建立象加拿大那样的地方自治制度的良好意图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的这些措施在古巴既为在哈瓦那及其附近居住的西班牙人所反对,因为他们将在自治制度下陷入困境;也为古巴革命者所反对,因为这时他们不愿接受独立之外的任何东西。

我们回想起英国在1778年怎样愿意取消美洲殖民地人拿起武器来反对的1763年以来的一切讨厌的立法,以及在帝国之内给与某种地方自治,以在快要引起法国干涉以前达到妥协。1897年西班牙愿意向已经起来反对比引起美国革命的那种压迫更大得多的压迫的古巴人提供同样的东西,也是由于这样的缘故。象1775年英国殖民者那样,古巴人本来会在1894年接受萨加斯塔三年以后提出来的方案,但在1897年他们也许由于怀有美国干涉的希

^① 它使人回忆起美国在1838年加拿大叛乱时候那样敏捷地修改不完备的立法,以及泰勒总统怎样撤销了对参加掠夺的美国公民的一切保护——对远征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恰当的起提醒作用的事情,但美国从未在其国境内解散具有外国政治纲领的外国政治团体,不管是古巴人,匈牙利人,加拿大人或是爱尔兰人的政治团体。

望而拒绝了它。虽然如此,这些迅速的改良措施,以及免掉韦勒将军的指挥权,使麦金利在1897年十二月在他的给国会的第一个年度咨文里,宣称在采取下一个步骤——或是承认古巴的交战国地位,或是承认独立,或是直截了当的干涉,但绝不是吞并,那会是不道德的侵略——以前,美国将不插手,让时间来考验这个西班牙新方案的诚意和效力。他说,没有听说有任何美国公民在古巴被非法扣留。不久之后他在一个讲演中把美国缉私队和海军——后者大部分是在海湾水域内动员的——在执行国内中立法上所作的辛苦的努力讲给西班牙听。

新的一年开始时,西班牙—美国事务表面上有了很大改进^①,⁴⁴²但却是在一种充满了由于在距美国海岸这样近的地方上的人民长期遭受苦难的景象面前产生的情感的气氛之中。这是在政治领袖们正在寻找岔开公众思想并为自己的党带来成就的新问题的时候由近来创办的黄色报刊以可怕阴暗的色彩以及惊人的标题和插图不断呈现出来的一种景象。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个国家此时已经为实行一项富有魔力的外交政策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不负责任的图谋私利的新闻界必须负西班牙—美国战争的大部分责任,但谁能以指出不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性质就得到满足呢?它可以最快地造成损失,也能够最快地完全逃避责任。说它给人民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不足以为它辩解。它使人民需要那个东西,而在使人民需要那个东西时候,使得国会也需要那个东西。古巴的情况无须夸大也是够坏的;在美国于1898年干涉以阻止这种情况之前,他们已经损失了二十万人;但今天的冷静历史检查表明古巴人在战斗中比西班牙人更不讲人道。“人们一般承认,大部分美国报纸对西班牙的激愤是由于赫斯特先生(纽约《日报》)的所有

^① 《国务大臣向议会提出的西班牙外交通信和文件,1896—1900年》(译件)(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05年)。

人)同普利策先生(纽约《世界》的所有人)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争夺纽约市的报道轰动新闻的优胜地位的有名的斗争这个偶然的情况。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斗,古巴的苦难只是适逢其会地供应了一些最方便的弹药。每当一方发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另一方做出的正常反应就是发表一个更轰动的消息。”^①

443 由黄色报刊策动的群众的狂热,以及政客们在支持对外事务中这个新的安全问题以谋求个人的显赫方面的热心,超过了商人们的不情愿而有利于一小撮年轻共和党人,他们利用这个局势来推动他们的“大”方针:为美国获得对加勒比海的战略控制和其必要性日益明显的从两个海洋通向将来的地峡运河的进路。控制古巴是这个政策的基石。这群人的领袖是马萨诸塞的参议员H. C. 洛奇和海军次长西奥多·罗斯福。他们的哲学顾问是著名的海上力量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阐述者A. T. 马汉,他自1890年以来就

^① W. 米利斯 (Walter Millis): 《尚武精神: 关于我们同西班牙的战争的研究 (Martial Spirit; a Study of Our War with Spain)》(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1931年), 第68页。这位作者, 如该书题目所示, 很好地描述了西班牙-美国战争的国民心理。J. K. 温克勒 (Winkler), 在其著作《W. R. 赫斯特, 一个美国现象 (W. R. Hearst, an American Phenomenon)》(纽约, 1928年)中说明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黄色报人”所愿意做到的程度。他派了一位有名气的画家 F. 瑞明顿 (Frederic Remington) 到古巴去画西班牙的暴行。过了一个短时期后, 温克勒说, 瑞明顿从哈瓦那发来这样一个电报: “纽约, 纽约日报, W. R. 赫斯特: 一切安静。这里没有什么麻烦。不会发生战争。我想回来。”据温克勒说赫斯特作了如下的答复: “哈瓦那, 瑞明顿: 请留在那里。你供给图画, 我将供给战争。”登在《纽约日报》上的瑞明顿画的一幅虚构的几个西班牙军官搜查一个裸体美国女子的图画翻印在前述米利斯的那本书中, 第68页。纽约《太阳报》是另一家叫嚣战争的报纸。

J. E. 怀森 (Joseph E. Wisan) 曾印行了篇帙繁多的对《反映在纽约报刊 (1895—1898年) 上的古巴危机 (The Cuban Crisis as Reflected in the New York Press [1895—1898])》(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研究》, 第403期, 纽约, 1934年) 一书的分析。

H. P. 维拉 (Herminio Portell Vilá) 著的煽动性的《古巴和美国及西班牙的关系史 (Historia de Cub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os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四卷本, 哈瓦那, 1938—1941年) 搜集了吞并古巴的一个世纪之久的计划的所有证据, 但没有充分解释美国历史上阻止住这样做的因素。

在期刊上^①不断地强调萨摩亚、夏威夷和加勒比海对于通过地峡运河保护海上交通的重要性，而有朝一日地峡运河将对保卫美国的两个海岸和控制太平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们的更有名气的使徒是《评论的评论》的主编^②，有学问的艾伯特·肖博士。这些美国史的活泼的学者和尚武哲学家，也就是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以一种好战的方式体现出“明显的命运”的旧日精神^③。他们期望最终统治整个北美大陆以及运河和两个海洋上的防卫前哨岛屿。洛奇和罗斯福期望最终统治超出那个范围的地方，甚至远至印度。他们把眼光放在遥远的菲律宾，把它看做东方贸易的一个通道。这就是不吉的1898年初的严重事件的背景。

表面上在改善了的情况下，究竟是谁派遣“缅因号”战舰到哈瓦那去恢复美国海军对那个港口的友好访问，现在还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驻那里的总领事菲茨休·李是一位出名的干涉主义者，他起初赞成那样做，后来因为在这个城的西班牙统治人物中间反美情绪高涨，又反对那样做。他建议不如在基韦斯特部署听候 444
召唤的军舰。“缅因号”在1898年1月25日在哈瓦那停泊。那里还有作友好逗留的一些别的外国军舰，格外显著的是两只德国军舰。作为一个尊严的姿态，西班牙的“布兹卡亚(Vizcaya)号”战舰在赴古巴的途中绕道访问纽约港。当“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停泊着的时候，纽约《日报》于1898年2月9日发表了被古巴“秘密团体”获得^④的西班牙驻美公使杜布·德·洛姆写给在古巴的一个朋友的

① 重印在《美国对制海权的关注，现在和将来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波士顿，1897年)。

② 这位主编一直任职到这个刊物于1937年停刊。

③ J.W.普拉特：《1898年的“大方针” (The “Large Policy” of 1898)》，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第十九卷(1932年9月)，第219—242页。

④ 前述鲁本斯的著作，第287—292页，解释卡那雷加斯 (Canalejas) 先生(德·洛姆的信是写给他)的秘书的一位朋友怎样从前者的哈瓦那书桌上偷去这封信并把它交给古巴人。

一封私人信件。在这封信中有对麦金利总统的直率的评价，假如是真的话，这些话留给总统的本国人去说就会更合乎外交手法一些。这封信进一步反映出在西班牙的古巴自治方案中缺乏诚意，并且表示出宁愿以武力解决。最令人不快的一段是对麦金利的评价，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哗众取宠者，而且可能成为一个试图同他的党内主战派维持良好关系同时又在他的后面开着一扇门的政客”。它完全没有提到麦金利的仁慈本性和不断表露人道主义的同情，而这些都是他的最可爱的特点^①。这封信的发表立刻使杜布待不下去了。他在他的政府同意召回他的要求以前就辞了职。这个不幸的插曲加剧了群众的情绪。几天之后，1898年2月15日傍晚，“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谁也不确实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造成死亡二百六十人的惨重损失。

西班牙立刻表示了由衷的哀悼并建议联合调查来判定责任。在哈瓦那给不幸的水手举行的葬礼得到政府和该市的居民的一切礼遇。不可能相信西班牙政府应负任何的责任，然而某个不负责任的个人，或者可能是一个参与阴谋的古巴人可能曾发射了一枚水雷。也很难相信这个爆炸仅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美国拒绝参加任何联合调查。西班牙海军军官们的调查结果把这场灾祸归之于该船的某种内部原因。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其中包括后来是一位最冷静的战争史学家 F. E. 查德威克舰长）组成的法庭的一份调查报告说（1898年3月21日）船底板被完全扎穿，说明是由一枚潜水艇发射的水雷从外部爆炸，可能还发生了第二次的内部爆炸^②。

① 1897年圣诞节前夕，总统通过国务院向群众呼吁征收救济古巴捐款，其中二十万元由红十字会化费在古巴。西班牙政府在使这些供应品顺利运入古巴和分发方面给与合作，虽然美国这个行动必定被认为是侵入性的，即使是以一种慈善的方式进行。

② 《传达海军调查法庭关于美国战舰缅因号遭到破坏的报告……》的美国总统咨文（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898年）。也可参阅前述查德威克著作，第361页，第一注。

民众被一些轻率的新闻记者所煽动，匆促地认为西班牙应对这一艘美国战舰所遭到的报复性破坏负责。政府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在此期间缅因号事件很快同总的古巴问题融合起来，大大增加了它的刺激性。在麦金利总统的唆使下^①，国会一致通过了(1898年3月9日)拨款五千万“用于国防及其一切有关的目的”。在缅因号事件正在进行调查当中，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古巴的温和人士弗蒙特的普洛克特参议员在参议院(3月17日)激烈控诉西班牙对那个岛的骇人的情况负有的责任。随即公布了(3月28日)关于缅因号遭破坏的美国调查报告。政府未向西班牙提出赔偿要求，等待那个政府自己提出来。两国政府关于古巴问题的外交文件来往这时达到高峰。

最后西班牙表示愿意大体上接受按照助理国务卿戴^②在 446
1898年3月27日给驻马德里公使伍德福特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全部美国的要求：

在1911年用围堰办法把缅因号露出来。这显示出船身的整个前半部被毁坏，甲板和舷侧都被炸掉了。这是船上弹药库和锅炉房所在的地方。在船的这一部分，约二分之一的船底仍然在原来的位置，主要在右舷一边。1911年的报告明智地没有确定爆炸的原因，并且在同样明智的指示下，工程师们把这艘破旧的船体拖到海里沉掉，使好追根究底的历史家们不能得到它。读者可以从缩减为上述普通词句的专门用语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认为可能是由于左舷前方的船底遭到外来爆炸而引起船内弹药库和锅炉的剧烈爆炸。参阅《从古巴的哈瓦那迁移失事战舰“缅因号”的最后报告》，第六十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众议院文件，第480号。关于失事船的情况的描述在第26—28页上。

西班牙1898年的报告的正式摘要刊印在前述《西班牙外交通信集》，第102页。

① 前述米利斯的著作，第116页。

② 麦金利已经任命过了服务年龄的约翰·薛尔曼(John Sherman)参议员为国务卿以便使俄亥俄州长可以任命总统的朋友和支持者马克·汉纳(Mark Hanna)继任薛尔曼任期中剩下的那段时期的参议员职位。W. R. 戴在薛尔曼领导之下作为助理国务卿来处理这项重要事务，后来在1898年4月28日继任国务卿。薛尔曼叹息说：“他们通过任命我为暂时的国务卿而免掉我的参议员的高职位。”罗兹所引，前述《麦金利和罗斯福的政府(Mckinley and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s)》，第32页。由于薛尔曼患病，因而使麦金利有必要以戴来代替他。

相信“缅因号”报告将短期内留在国会而不采取行动。国会两院的大多数议员都怀有一种审慎考虑的心情。看看是否能办到以下各点：

第一，停战到十月一日。在此期内，通过美国总统的调停在西班牙和叛乱者之间进行谋求和平的交涉。

第二，立刻废除集中命令，允许人民回到他们的田园；对需要救济的人，用美国运来的粮食和物资与当地官府合作救济之，以提供充分的救济。

假如可能，加上：

第三，假如到十月一日和平条件还未得到满意解决，美国总统将担任西班牙和叛乱者之间的最终裁决人。

假如西班牙同意，总统将进行调解使叛乱者接受这个方案。最好迅速采取行动。

这不是一个最后通牒。总统正在向谋求古巴独立的和平采取行动，而西班牙正在慢慢地朝那方面后退，但步步设防。

西班牙在3月30日取消了集中命令。在同一天它正式提议把缅因号事件所引起的一切分歧交付仲裁。伍德福特焦急地电问总统是否支持西班牙皇后和阻止国会的敌对行动假如她在叛乱者一旦接受停战时宣布无条件停止战斗的话。麦金利回答他只能把整个事情转交国会，这时，国会不同总统商量而径自宣战那是十分可能的^①。在最后的时刻，4月9日，在罗马教皇以及欧洲各国驻马德里的代表的劝告下，皇后命令古巴总督布兰科“允许在他认为准备和便利和平交涉所需要的时期内停止战斗。”虽然停战的期限由总督决定，这个行动还是朝向迎合美国的主要要求迈了一大步^②。

^① C.S.奥尔科特(C.S.Olcott):《威廉·麦金利的生平(The Life of William McKinley)》(两卷本,波士顿和纽约,1916年),第二卷,第27页。

^② 布兰科将军的停战令的本文是：“第一条，从各地区接到这个声明之日起，在古巴岛的领土上宣布停止战斗。第二条，执行前条的细节，将按各地区的不同形势和情况分别发给各军团的总司令特别指示，以最迅速和容易地予以执行。”印在《外交关系,1898年》，第750页，日期是4月7日，但马德里公布的日期是4月9日。停战令本文在11日交给助理国务卿戴，大概在麦金利的咨文已经送到国会之后，因为咨文里没有提到它。

西班牙政府不愿意采取超过这一点的行动，因为它怕由此引起可能推翻这个王朝的反应。警觉的共和党和正统党这两个反对党派将最大限度地利用把古巴割让出去这件事，需要一位有勇气的政治家来抵挡他们。但缺少一个言词清楚的最后通牒仍然使局势混乱。伍德福特打电报说他相信在停战期中可以达成使古巴独立的和平。在独立的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古巴人本身会不会从他们这方面自愿地同意在没有一个明白的和无条件的让他们独立的许可的情况下停战呢？这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如何，美国决不等待着看到出现这样的事情。

最后时刻这一次对西班牙说是过迟了。公众舆论压倒了总统的不情愿。他早在4月5日就已决定把古巴问题提交国会，那就意味着战争。他写好了他的咨文，但没有立即提交国会以便给驻哈瓦那总领事时间来撤退美国公民。同时，一些欧洲国家向华盛顿和马德里双方提出一定要维持和平的要求。

西班牙照以前那样吁请欧洲国家帮助保存它在新大陆的领土。自从德国的外交通信集《欧洲政府的重要政策(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发表之后，人们这时已经知道罗马教皇提出的在古巴独立的原则下的调解，是由德国外交部在罗马敦促出来的；德国急于阻止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任何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将影响德国购买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太平洋上的西班牙岛屿的计划^①。德国在马德里建议西班牙牺牲古巴来求和。为了同一原因，它还在华盛顿做阻止战争的工作，虽然做得很谨慎。但德国的外交策略不愿象西班牙所请求那样，领导组织各大国联合在华盛顿提出反对美国干涉古巴的抗议。这件事落在德国的欧洲盟邦奥匈帝国的身上；它的外交部长获得了英、法、德、意、奥、俄

^① L.B.西皮：《德国和西班牙-美国战争(Germany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三十卷(1925年7月)，第745—777页。

六个大国对一份联合照会的认可，由它们的大使在4月7日到白宫递交给麦金利总统，这份照会声称为了人道的缘故它们希望古巴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英国只是在事前就此事询问过美国政府之后才同意这样做的。在估计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后，麦金利迅速而适当地对那些大使们说他也希望如此，但是假如美国不得不进行干涉的话，那确实是为了人道的缘故^①。欧洲国家，甚至包括英国在内，冒险做他们在神圣同盟的年代所不愿意做的事情：采取联合行动帮助解决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的麻烦，这还是第一次。它是软弱的、令人懊丧的一步。它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和平愿望的表示。事实是在远东局势如此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处于被瓜分的边缘——没有一个大国愿意把自己牵涉到同美国的麻烦当中。于是，又一次，欧洲的竞争使美国得到利益。

关于皇后的命令的消息在4月10日传到华盛顿，那个时候麦金利的咨文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但还没有送到国会。他在4月11日将咨文送交国会。在叙述了古巴的情况和“缅因号”事件，提到了西班牙提出仲裁的建议以后，他建议授权他如有必要得使用美国军队来实行平定古巴。在咨文的末尾增添的两段中他提到西班牙皇后指示布兰科将军可以停战一事，“其期限和具体条件我还未接到通知”^②。“我相信，这件事及所有别的恰当的考虑将在你们

^① 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以后在给他的同一照会的抄本的回答中声称皇后已经下令在古巴停战；这个回答迫使外国代表再次聚会，由英国大使兼外交使团团长J.潘斯福特爵士拟出另一个联合照会，反对干涉，认为那是不正当的。这个照会始终没有送出。大使们把它向各本国政府请示，后者不同意采取这个第二步。A.法兹(Alfred Vagts):《世界政治中的德国和美国(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伦敦,1935年),第二卷,第1259—1307页,似乎有理由地认为潘斯福特写第二个照会的意愿可能直接来自维多利亚女皇,因为M.克利斯提那(Maria Christina)(西班牙摄政皇后——译者)曾亲自向她吁请。维多利亚对西班牙的困境感到非常苦恼。但唐宁街否定了英国大使的建议。参阅前述丹尼斯著作,第72页;西皮和加文的前述著作,及O.费拉拉(O.Ferrara):《上一次西班牙战争》(Last Spanish War)(纽约,1937年)。

^② 参阅本书第447页注1。

所要做的庄严审议中得到应有的慎重注意。假如这个措施获得成功的结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愿望就将实现。假如它失败的话，那将只是说明我们所打算采取的行动^①的正当性的又一个理由”。一阵歇斯底里的舆论的爆发促使这个不情愿又不果敢的总统，因为怕失掉共和党的控制，对古巴进行了干涉。^②

国会并不等候看皇后命令发表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它迅速授给总统他所请求的权力。在叙述古巴岛上的令人厌恶的状况“已经最后导致一艘美国战舰的毁坏”的一段前言之后，国会通过一个联合决议(1898年4月19日)，宣称：(1)古巴独立，(2)要求西班牙从岛上撤出，(3)指令和授权总统使用全部陆军和海军及几个州的民兵来实现这个决议，(4)否认“有任何对上述岛行使主权，管辖或控制的意图(除了平定该岛的动乱外)，并声明它的决定：在局势平定之后，将把该岛交给它的人民来管理和控制”。最后一款，著名的特勒修正案，是在原决议由外交委员会送到参议院之后加进去的。这是一个高尚的克己精神的表现，这个条款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通过了。参议院以68对21票的表决通过这些决议，众议院经过几次会议之后，以311对6票的表决通过。在参议院中投反对票的是十九个共和党人和两个民主党人，这说明战争并不是一个政党的方策。它是全国民众的决策。

总统在1898年4月20日在联合决议上签了字。同一天他发给西班牙一个正式最后通牒，附带这个决议的抄本，并指示美国公使说，假如西班牙政府在1898年4月23日中午以前不能对这些以保证古巴和平的条件表达的要求给一个完全和满意的答复的

① 异体字是加进去的。

② 欧内斯特·R.梅(Ernest R. May)：《帝国主义民主：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出现(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World Power)》(纽约，1961年)。

话，总统将不再发通知而径自行使他被授与的权力至必要的程度以实现决议。西班牙本来还有时间来表示屈服。它的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的时候没有这样做，而宁愿战争不要和平，宁要灾难不愿意丢脸。既然西班牙没有回答最后通牒，国会乃于1898年4月25日宣布从4月21日起并且包括这一天进入战争状态。总统在4月22日宣布封锁古巴北海岸和圣地亚哥港。

美国人民想要战争而得到了战争。西班牙由于拖延时间而冒一个重大的危险。它必须因此在历史的面前承担它的那一份责任。如果对克利夫兰的和平的提议，或甚至麦金利的1897年的第一个建议给予迅速而坦白的欢迎，本来会有许多不引起战争就可以解决古巴问题的机会。甚至到了除独立而外没有其它解决办法的时候，西班牙政府还是没有积极采取必要的步骤。研究西班牙十九世纪外交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重大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政府害怕了，它怕不得人心，因为受报刊引导的一部分舆论本身受到欺骗，不了解两国之间力量的巨大悬殊，因而表现好战；又怕正统派方面发起的革命运动。假如当时西班牙政府的首脑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他就会有勇气把实情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没有海军，因为我们没有海军，美国可以不须一击，只消用断绝粮食供应的办法就可以迫使西班牙在古巴的军队投降；他就会面对由此产生的后果，牺牲自己来挽救西班牙免遭灾难。古巴的丢失是无法挽回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抗议暴力的同时，应当放弃我们的主权，从而保全我们殖民帝国的其余部分。”^①

我们现在应当转过来谈谈表现在和平条约中和在太平洋一直导致这种结果的那些事件中的这场战争的惊人的和部分出人意料的结果。

^① 前述J.贝克尔：《西班牙的外交关系》(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España)，第三卷，第875页。

第二十五章 中太平洋岛屿

(1875—1899年)

西班牙—美国战争把半个世纪以来静悄悄进行着的美国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扩张进程发展到一个重大的阶段并出乎意料地突出。在下一章叙述在巴黎的1898年的和平解决和获得菲律宾群岛之前,在这里观察一下美国在具有战略价值的、在航路交叉点上的太平洋岛屿上的日益扩展的利益,是适当的。埋头于本大陆的问题和活动的美国人民改变到关心太平洋的过程是缓慢的。直到1898年(除了对阿拉斯加外)国会才最后愿意明白批准历届共和党总统所一贯主张的包括获得夏威夷群岛和萨摩亚的扩张。 451

我们回忆起在1875年参议院最后批准同夏威夷的互惠条约,其中包括一个政治条款,规定给与美国独有的特权,将这些岛屿明确地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南北战争以后开始的普遍的反对进一步扩张使格兰特政府通过一个条款同反对吞并者妥协,这个条款只是规定夏威夷群岛的任何港口或领土不得租借给任何第三国或由任何第三国以其他方式支配,并且美国所享有的任何特权不得再给与任何其他国家。这样一来,格兰特总统就能够在公众的思想达到容许采取吞并的行动以前打消英国或法国控制的可能性。允许这些同美国防务这样密切关连的岛屿落入任何其它海洋国家之手,使之成为对太平洋海岸或阿拉斯加的进攻跳板,那将是非常疏忽大意的事情。

历届共和党政府都继续执行这个他们所期望的吞并的政策。

夏威夷互惠条约最后在 1884 年续订^①，附加了一个重要条款，把在中太平洋的无与伦比的港口珍珠港(位于檀香山的近旁)的一个设防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利给与美国。在 1887 年，当美国赞成由英、法、美三方保护萨摩亚的独立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建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保障夏威夷群岛的中立和独立，但克利夫兰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贝亚德回避了这个提议。没有一个美国政府曾经保证过永不占有古巴或夏威夷——虽然菲尔莫尔总统在 1852 年几乎对这两个地方做出这样的保证。在加菲尔德的时代，国务卿布莱恩声明反对把夏威夷群岛交给任何第三国，宣布夏威夷是门罗主义对之适用的“美洲体系”的一部分。他把他的政府的这个信念记录在案：“由于作为美国的太平洋领地的关键地区的夏威夷群岛的位置对于美国非常重要，美国要求这个地区保持中立，美国政府将在这方面同当地政府真诚合作。假如，由于任何原因，夏威夷觉得中立的地位保持不住，这个(美国)政府那时将毫不犹豫地寻求公开宣布过的美国的解决这个出现的严重问题的方法来应付这种改变了的局势。”^②

这个几乎等于自由贸易的安排的互惠条约，开辟了夏威夷的空前繁荣的新纪元，特别是制糖业大发展的新纪元；制糖业现在已经代替了以前岛民在依次为毛皮贸易、收买檀香木、捕鲸和横渡太平洋的汽船航海家提供商业中心地方面的主要活动。这个条约使岛上的美国侨民发了财，他们大多是传教士和早期来此贸易的商人的后代，他们按照现代的方法种植甘蔗。西方文明的冲击对土著居民，如同对于美国印地安人一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 1860

^① 期限至少七年，以后直到任何一方于通知对方十二个月之后废除。1875 年的原条约的有效期也是这样规定的。

^② 异体字是加进去的。A. F. 泰勒(Alice Feit Tyler) 夫人在《J. G. 布莱恩的外交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James G. Blain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27 年)，第 191—217 页，一书中记述了共和党对夏威夷的政策。

年的时候，在本世纪初的二十多万原来的土著居民中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到1890年的时候，由于迅速地同从东方和西方来的移民混种的结果，就只留有34,436个人了。在劳动力方面，甘蔗种植业主依赖中国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事实证明，这些东方移民是使人最满意的，最随和的，而且是工资最低廉的。像墨西哥在得克萨斯居留地所做的那样，夏威夷的甘蔗种植业主们犯了一个实际上鼓励外国人口的浪潮来淹没这个群岛的大错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和日本人，最后单只是日本人，就将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数。到1890年，夏威夷迅速变为在东方移民劳工的基础上的白种人种植业主和商人统治的群岛。岛上的绝大多数成分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美国血统的居民。在这个世纪的中叶，他们为土著国王提供了主要的部长和顾问^①；现在他们控制了选出来的立法机构，而按照美国顾问们劝国王采用的议会制度，这个立法机构又反过来控制政府。

一度叫做“航海家的群岛”的萨摩亚群岛之在南太平洋，犹之乎夏威夷群岛之在北太平洋。它们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比同任何其它文明国家都更接近。英属百慕大和巴哈马群岛在战略上掩护着通往美国的大西洋航道，而萨摩亚群岛和斐济和汤加群岛则控制着从北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到英国的地球那面的领地的海上通道。在萨摩亚的土土伊拉岛上的帕果帕果港在广阔面积的安全性和战略的重要性上在太平洋的各群岛中仅次于珍珠港和马尼拉湾。象夏威夷那样，萨摩亚群岛迟至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仍然在土著的统治下。英国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达那里，同时美国的捕鲸人也不时到那里去，美国航海探险家威尔克斯船长(1839

^① H.W.布莱德雷(H. W. Bradley) 在《美国在夏威夷的边界(The American Frontier in Hawaii)》，载《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海岸分会会报，1930年》，第135—150页，一文中详细记载着美国顾问和官员的人员和他们的影响。

年)为土土伊拉岛的土著酋长拟定了一个处理贸易和船只失事的规则法典;最后在该世纪的中叶,德国商人和移民来到这里做椰子核生意和用手枪和烈性酒向酋长们收买部落的土地^①。在萨摩亚的所有外国人中,集中在乌波卢岛的阿皮亚的德国人的人数最多,最为跋扈。比起英国传教士来,他们不那么关心土人的福利,而只注重他们的汉堡的戈德弗洛伊父子商店^②的利益。当地的德国人会乐意看到新的德意志帝国吞并这个群岛,但假如能保证他们从剥削土人和利用其土地得到利益的话,他们对任何国家拥有那里的主权都会感到真正满意。俾斯麦愿意津贴这个德国公司,虽然德国议会拒绝拨必要的款项^③;但在1884年以前他拒绝实行任何扩张殖民地的政策。新西兰对于阿皮亚的德国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并且知道他们策划德国统治的意图,向母国呼吁接管这个群岛。当其时英国政府仍对占有更多的殖民地感到冷淡;直到1874年邻近的斐济群岛被吞并,英国才从它的殖民地饱足的麻痹中复苏,开始殖民地扩张的另一个阶段;即使这个时候它的兴趣主要还是在近东和非洲。不管新西兰的焦虑,英国对萨摩亚的政策仍只

① S. 马斯特曼 (Sylvia Masterman) 在只根据英国档案资料写的《在萨摩亚的国际竞争根源, 1845—1884年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Samoa, 1845—188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34年)一书中特别注意英国的传道的和政治的关系。这本书的写作明显地忽视了 G. H. 赖登 (George H. Ryden) 根据美国档案资料写的一部更长的著作:《美国与萨摩亚的关系中的外交政策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Samoa)》(耶鲁大学出版社, 1933年)。他们都没有采用前述斯托尔堡伯爵根据美国和德国档案所写的《德意志和美国》一书的材料。斯托尔堡认为英国是了解德美关系的锁钥,但英国在1885年以后的档案没有公开。法格茨 (Vagts) 的《世界政治 (Weltpolitik)》, 1935年, 第一卷, 第638—938页, 和坦西尔 (Tansill) 的《T. F. 贝亚德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of T. F. Bayard)》(1940年)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

② 1847年在萨摩亚开设,由于在欧洲的不当投资而在经济上发生麻烦以后在1880年改组为“汉堡南海岛屿德国商业和种植园公司 (Deutsche Handels-und Plantagensellschaft für Südseeinseln zu Hamburg)”。

③ 前述马斯特曼女士的著作,第161页,表明德国议会并不是因为反对殖民政策而是因为反对支持一个私人企业而否决这个议案。

是阻止这个群岛转到任何其它海洋国家的手中。

美国同萨摩亚的经济接触确乎极少，比英国或德国都少。最初的政治兴趣是从纽约的威廉·H·韦布的活动引起的，他是一位汽船航运发起人，曾向国会请求津贴从旧金山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轮船航线。格兰特总统赞成给予这种帮助，但国会拒绝了。然而新西兰却给韦布以他本国所拒绝的帮助，他在1869年开始经营这条航线，以萨摩亚为一个沿途停靠港^①。韦布派了一个名叫韦克曼的船长为代表去访问这个群岛并向他报告。韦克曼的报告强调了三十年前威尔克斯曾经称赞过的帕果帕果港的优点，这个报告经由韦布送给了格兰特总统及海军部和国务院。此后，曾有多位海军部长在他们的年度报告里一直表现出对于在萨摩亚设立一个基地来保护计划建设的地峡运河以及现在和将来到南太平洋的航路的关心。

455

司令官R. W. 米德没有招惹与政府商量的麻烦，而于1872年同土土伊拉岛的酋长们缔结了一个条约，给美国在帕果帕果一个独占的军港，并把那里的土人置于美国保护之下。格兰特总统力促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但这个机构虽然没有提出反对这项条约的建议，却没有采取行动。在经历过圣多明各事件之后，格兰特不敢进一步催促这件事，怕反而完全断送了它。不过，他运用了他的政府的全部影响通过行政行动来支持美国在萨摩亚的政治上的首要地位，等待反对的舆论的转变。萨摩亚人在这个时候似乎真诚地在准备好进行这样一种联合。格兰特的一个特别代理人A. B. 斯坦伯格上校是一个图谋私利的冒险家，一个由士兵升上来的幸运儿，他树立了对萨摩亚土人的个人的权势，把各个部落联合起

^① 这条航线在1872年停止经营。一群加利福尼亚的地产投机者，即“波利尼西亚地产公司”，也对于扩张美国在萨摩亚的利益有兴趣，主张使那里成为美国的保护领。看来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很小。

来,以显著的效率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政府,以后辞掉了特别代理人的职务。土人们最初把他看做是美国派来的总督。在没有损坏美国的声誉的情况下,他尽最大力量加强了人们对于一个美国保护领正在那里扩展开来的印象。斯坦伯格的奇怪的身份,美国否认同他有任何正式关系这个事实,以及英国和德国领事,确实还有美国领事对他的自然的嫉妒,导致他的垮台并被置于一艘英国巡洋舰上放逐出去。由于受到当地德国代表兼任汉堡贸易公司董事的特奥多尔·韦贝尔领事的侵略的压迫,顺从的萨摩亚人时而向美国,时而向英国——但从不向德国——呼吁合并,或至少成为一个保护领。经过一切考虑之后,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但也都不愿意见到那个群岛落入任何第三国之手——德国也是这样。萨摩亚人派了一个波利尼西亚的全权代表拉·马米到华盛顿来,他成功地同国务卿威廉·M.埃瓦茨谈判(1878年)他们的第一个对外条约。这个条约的交涉是由助理国务卿,那个伟大共和党扩张主义者的儿子弗雷德里克·W.西沃德相当适当地处理的。这是一个包含有最惠国商业、治外法权和类似保护的条款的友好条约。它规定了在帕果帕果^①给美国一个军港(不是独占的);并且规定假如萨摩亚政府和任何其它政府之间发生分歧,美国“将进行调停,以在一个令人满意和牢固的基础上排解这些分歧”。年轻的西沃德向拉·马米解释说对于扩充国家边界的公众舆论的改变使得只可能到此为止^②。虽然参议院里有某些人反对这个小心拟定的调停条款,但还是批准了这个条约。对于谋求太平洋上海军基地的行政方面的抱负来说,这不过是一个

^① 直到1899年瓜分之前,那里没有建立过军港;但在1880年曾派了一艘装煤的货船去证实这个条约规定的权利。

^② F.W.西沃德:《回忆一位战时政治家和外交家,1830—1915年》(Reminiscences of a War-Time Statesman and Diplomat, 1830—1915) (纽约,1916年),第438页。

微小的收获。此后1878年条约就成为美国对萨摩亚政策的基础。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在美国自己准备好占有它之前，阻止这个群岛落入任何其它海洋国家之手。对于行政方面要把统治扩展到这些遥远的岛屿和它们的原始土著居民的意愿，参议院和立法机构无疑曾经起了一种有力的制动作用。在七十年代的头几年，虽然不是1874年以后，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会遭到德国或英国的严重反对。

在美国条约之后，德国和英国迅速地同萨摩亚订了大致相同的，但有重要附加条款的条约(1879年)。德国条约取得了在阿皮亚附近的萨留阿法达的独占的海军基地，确认了广泛的德国的土地要求，以及通过一个治外法权的条款说在萨摩亚的德国人将“遵守将来在两个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的那些法律和规则”，为将来如果可取的话在那里成立一个保护领铺平道路。但英国条约则在通向任何摊来这种德国意图以及美国的野心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障碍，它约束萨摩亚政府不得给与任何其它君主或国家“任何超过已经给与或将来可能给与女王陛下的萨摩亚的任何权利，特权，权力或优先地位”。它还给英国在除了萨留阿法达(德国的)或美国可能选择的帕果帕果的一部分以外萨摩亚港任何地方建立一个军港的权利。竞争的几个国家因此得到均衡。

在英国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指示它在萨摩亚的领事同其它领事合作以在更迭的土著政权当中得到一个稳定的政府。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领事于是在主要的外国居留地阿皮亚成立了一个三头管理的自治市，后来通过同土著政府的书面协议扩展(1880年)为实质上管辖所有岛屿的一个联合保护领，以马利托阿国王为土著君主。知道参议院决不会批准这个协定，以后的几届共和党政府满足于只作为行政协定来非正式地遵守它。

俾斯麦亲王在1884年以前认为不值得为殖民地牺牲一个波

美拉尼亚的掷弹兵。在那一年，屈服于日益增长的商业压力，德国在俾斯麦领导之下参加了在非洲、马来西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可能得到的其余殖民地的抢夺。德国人侵略性地干涉土著萨摩亚的政治，并在1884年十一月强迫马利托阿·劳佩帕国王签订了一个在1879年德国第一个条约的辞句中就已预先计划过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规定成立了一个等于是德国保护领的政权。紧接着在签订了这个协定之后，马利托阿和四十八个酋长吁请英国合并这个群岛免得“其它政府”占有萨摩亚。德国人于是煽起了在一个王位觊觎者塔梅赛赛领导下的叛乱，向马利托阿宣战，并在阿皮亚附近的土著政府的所在地升起了德国国旗。在克利夫兰第一任政府（民主党政府）里任国务卿的贝亚德向德国提出了抗议（1885年6月19日），抗议它搅乱了萨摩亚的现状。他声称美国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来期望任何土著统治的更换不得消灭这个群岛的独立。在这个纠纷加剧的时候，贝亚德变得谨慎了。他宣布美国不愿意承担任何保护，“或者单独自己保护，或者通过任何联合的安排，使得萨摩亚的土著自治权将由一个永久性的^①三国政府来代替。”同时他召集三方面条约国在华盛顿开会来调整这个局势。这时，德国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和遵守旧的现状。在这个会议在1887年召集之前，英国和德国达成了关于太平洋和非洲殖民地的双方的协议，其中一款规定英国同意在华盛顿支持委托德国统治萨摩亚的提议。英国需要德国支持它在埃及和近东的政策。因此，当外交家们集会商量和讨论的时候，美国面对着由一个几乎完全不注意到美国利益的决定事先安排好的英-德统一战线。贝亚德坚决抵抗委托德国统治的提议，这个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德国立刻在萨摩亚成立了一个在塔梅赛赛酋长统治下，以得到德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支持的一个名叫布兰代斯的德国官员为

① 异体字是著者加进去的。

首相的新政权^①。这个新政权对德国贸易公司的利益给以种种优待而在地产权，纳税和地方改进事业方面对英美在阿皮亚的居民歧视得很厉害。贝亚德再度提出抗议，不是根据没有得到批准的1879年的三方管理方案，而是根据包含在1878年条约里面的美国调停。最初德国方面没有做任何让步。对于整个问题的拖延感到不耐烦，克利夫兰在1889年一月特别把它提交国会去讨论。鉴于有引起同美国严重冲突的可能，俾斯麦建议重新在柏林召开休会的华盛顿会议。同时他停止了萨摩亚的反对马塔法的战斗，后者是在德国人放逐了马利托阿之后起来捍卫本地人的权利，抵抗布兰代斯-塔梅赛政权的不当的战士。贝亚德接受了这个建议，由哈里森总统的新的共和党政府，在再次出任国务卿的布莱恩指导下贯彻。

在1889年的柏林会议上，这一点是明显的，美国能够阻止这个群岛在英国的默认下成为德国的保护领的唯一办法是勉强接受一个三方的保护领的观念。在总理的儿子德国外交大臣赫伯特·俾斯麦伯爵的主持下，三方缔约国制定出一个联合保护制的详细计划，其中规定萨摩亚的主要官员将不是三个领事而是两个中立的官员：一个是大法官，一个是选出来的阿皮亚市政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群岛在一个强加于它的三个外国共管之下的独立和中立，这就是这个条约的奇怪原则。它明显地是同美国外交的传统不相容的。同所有的共管一样，它是一个潜在的国际纠纷的秣槽，但美国是为了不愿见到帕果帕果沦于任何其它国家的独占统治之下而被迫参加这种共管的。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批准了这个三方合伙，这样的合伙后来永远作为一种纠缠的联盟而受到越来越

^① R.L. 史著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他的晚年描写了德国的干涉，包括在方加利(Fangali)的灾难性的登陆骚扰和1889年的大爆发，在他的著名的《历史的注释：萨摩亚的八年动乱(Footnote to History; Eight Years of Trouble in Samoa)》，发表在他的著作的许多版本中。

459 多的攻击。在几年之内共管带来了这个群岛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稳定，马利托阿国王恢复了部落统治者的职位。领事们和条约官员们之间有过一些争吵，而领事们本身之间的竞争也不时出现；虽然如此，这个新政权还是比萨摩亚以前的任何政府都工作得更好。在1893年重新上台的克利夫兰总统和他的第二任国务卿W. Q. 格雷沙姆一再表示反对对于美国来说是充满了麻烦，纠纷和负担的国际合伙。总统反对在任何地方、任何形式、任何时候的美国帝国主义，即使是在夏威夷。

1875年的夏威夷互惠条约通过恢复并大大增加那个群岛的繁荣，并使它依赖这个有着利害关系的大陆邻国而使它与美国的关系紧密起来。大多数美国血统的顾问从国王的各种机构中消失了，但在立法机构里美国的影响却占统治地位，并且美国的势力控制了农业和商业。同时原始的土著世系在迅速地缩减；卡梅哈梅哈王族在1872年绝了种。作为新土著朝廷第二任统治者在1891年登上王位的莉留奥卡拉尼女王是一位维护土著民族自尊的战士。她认为不应当把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割让给美国^①。她对“夏威夷人的夏威夷”这个口号表同情，她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来反对从宪法上限制她的权力，并决心阻止这个外国人的亲美的立法机构控制她的政府。这是外国人——欧洲和美洲血统的夏威夷人，美国人占多数——的叛乱（1893年1月17日）的信号，它使人回忆起1836年得克萨斯人的叛乱，不过这是一场不流血的叛乱。同得克萨斯人的叛乱一样，它的目的是同美国合并——在夏威夷的叛乱中是公认不讳的——而且是由任意改变宪法所促成的。同得

^① 参阅 R. S. 顾肯达尔 (Ralph S. Kuykendall) 的《夏威夷的历史 (History of Hawaii)》(纽约, 1926年), 第 259 页, 她的日记的照片。这位著名的夏威夷出生的学者出版了一部更详细的历史,《夏威夷王国, 1788—1854年 (Hawaii Kingdom, 1788—1854)》(夏威夷大学, 1938年)。

克萨斯叛乱不一样，它是美国政府默许的^①。国务卿在华盛顿知道了这个计划的内容，他给予驻那里的美国公使约翰·L. 斯蒂文斯（他是一个主张合并的人）一种自行决定的广泛权力。随时留一只军舰在夏威夷领海上，这种做法由来已经很久了。在斯蒂文斯的指导下，海军陆战队登陆并保护地方治安委员会去占据火奴鲁鲁的公共建筑物。斯蒂文斯悬挂了美国国旗来保护这个新的事实上的政权。他在写给国务院的信中说，“现在夏威夷的梨子已经完全熟了，这是美国摘取它的黄金时刻。”^②女王在抗议之下让出了她的统治权，并要求美国总统恢复她的权力。在桑福德·B. 多尔法官主持之下火奴鲁鲁企业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在同美国的合并条件进行商谈和得到同意之前存在的”临时政府。他们立刻派出一个外交代表团到华盛顿。在火奴鲁鲁革命之后一个月以内，他们同福斯特国务卿就签订了（1893年2月14日）一个合并条约。

哈里森总统在他离任之前无法使参议院匆促通过夏威夷条约。克利夫兰总统没有审查这个条约，并从参议院把它撤回，他派了一个专员詹姆斯·H. 布朗特——一个公开主张只保持小规模海军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到这个群岛去降下美国国旗并揭露斯蒂文斯同夏威夷革命的关系；总统接着把关于夏威夷的全部外交文件都公布出来^③。他确信有一个邪恶的阴谋，因而派出一个新的公使艾伯特·S. 威利斯去废除这个外国人的革命和恢复女王的王位，条件是她要赦免这些革命者。女王认为这点难以接受，

① J.W. 普拉特的《夏威夷革命，一个新的解释(The Hawaiian Revolu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一卷(1932年)，第273—294页，表明革命的原因不是避免由于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案的发给制糖业奖励金而破坏了互惠原则，而是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白人政府的普遍的愿望。

② 前述内文斯著作，第549—562页。

③ 《夏威夷事务，美国外交关系，1894年，附录II，众议院行政文件第一卷，第五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895年）。

她希望砍掉革命领导人的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临时政府那一方面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土著”统治的恢复。当这个条约失败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按照宪法建立的共和国，这部宪法上有一条明白授权总统在可能的时候同美国缔结一个商业的或政治的联盟的条约。克利夫兰总统对于事情的这样发展感到困惑，于是把整个问题交给国会去处理，国会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决策。克利夫兰乃仿照其它国家的做法，承认了这个新共和国。这个新的夏威夷政府显然想等待克利夫兰下台之后同美国合并，而美国的舆论暗中支持这种等待的态度。

夏威夷的革命对于如像马汉舰长和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议员这样一些扩张主义者似乎是一个天赐的机会，他们^①正确地评价了这个群岛对美国海上防务的重要性，特别是预料到将建设一条地峡运河。他们可能还强调了阿拉斯加的防务。地理上的实际情况是够明白的：这些群岛距离美洲大陆比距离任何其它大陆近，比起任何其它“体系”来更加属于美洲“体系”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群岛，在任何一个大海洋国手里，它将肯定是一个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在美国手里就不会成为对任何人的威胁。在野的共和党所立即拥护的吞并主义的情绪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到夏威夷为止。

麦金利总统在就职之后立刻把注意力转到夏威夷方面来，缔结了一个新的合并条约，并在签字的同一天把这个条约送到参议院(1897年6月16日)。在这个时候夏威夷政府对于日本移民数量的庞大感到吃惊并刚刚把其中一千名左右的人遣送回去。日本认为这个行动违反了它同夏威夷签订的1886年条约因而对此提

^① 参阅 A. T. 马汉的著名论文《夏威夷和我们将来的制海权 (Hawaii and Our Future Sea-Power)》，载在《论坛》，第十五期(1893年)，第1—11页，重印在前述《美国对制海权的关注，现在和将来》；及 H. C. 洛奇的《我们的错误外交政策 (Our Blundering Foreign Policy)》，载在《论坛》，第十九卷(1895年3月)，第8—17页。

出抗议。当 1893 年哈里森的合并条约签订的时候，日本欣然予以默认。自此之后，它已经在 1895 年的惊人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而现在自认为是一个在解决太平洋任何问题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大国了。它对麦金利的合并条约提出了抗议，理由是它可能进一步危害在夏威夷的日本居民的条约权利。当时在这个群岛上有一万五千个日本人，等于欧洲人和美洲人加起来的总数。在交换了一些信件，以及与夏威夷共和国商定，菲律宾将付给一笔移民事件的小额赔偿之后，日本撤回了抗议，它得到了美国将保护它的条约权利的保证。日本的这个行动刺激了麦金利，促使他加速进行合并^①。在参议院里，有足够的不同意这样做的民主党人和反帝国主义的共和党人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危及这个条约的通过。当这个条约 462 在参议院耽搁的时候，总统在 1898 年三月援引得克萨斯的先例，催促以国会联合决议的方式实行合并，这只需要在参议院里有多数赞成票就行了。因此，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之前，太平洋上已经发生了明白的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海上战略产生的。甚至政府提到国会的这个联合决议直到与西班牙的战争开始以后也失去了生气。在战争开始之后，夏威夷政府做到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帮助美国，因而加强了人们的合并的情绪^②。为骤然来到的战事——特别是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军事行动——所推动，国会终于在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的历史道路上跟上了行政方面的步伐。1898 年 7 月 7 日，焦急的麦金利能在合并决议上签字了。这个群

① T. A. 贝利在他的《日本对合并夏威夷的抗议(Japan's Protest Against the Annexation of Hawaii)》，载《现代历史评论》第三卷(1931 年 3 月)，第 46—61 页，一文中有一个有益的分析。

② T. A. 贝利在他的《在西班牙-美国战争时期的美国 and 夏威夷(The United States and Hawaii During the Spanish-American War)》，载《美国历史评论》第三十六卷(1931 年 4 月)，第 552—560 页，一文中提出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表明当时有一种反对这个条约和这个联合决议的势力，假如不是由于这场战争的话，合并即使会发生，本来也要在许多年以后。

岛在 1898 年 8 月 12 日正式移交给美国。美国派往菲律宾的军队在途中占据了荒无人迹的，位于火奴鲁鲁以西 2,305 英里的威克岛和位于威克岛以西 1,535 英里和马尼拉以东 1,595 英里的西班牙的关岛。威克岛于 1899 年 1 月 17 日正式合并于美国，关岛则由与西班牙订立的和平条约正式合并于美国（参议院于 1899 年 2 月 6 日批准）。人们把关岛当做一个备用的海军基地和海底电报中转站，但并没有怎样对它进行用作海军设施的开发。威克岛，连同中途岛（1867 年合并），夏威夷群岛的南方的巴尔米拉小岛，加上中太平洋的几个鸟粪石岛，贾维斯岛（1857 年占领），贝克岛（1857 年占领），和豪兰岛（1858 年占领），现在是夏威夷群岛以西和以南航空交通的一些重要的着陆地点。

进入太平洋区域——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及中途岛；夏威夷；萨摩亚和一些中太平洋小岛；是在南北战争和西班牙-美国战争之间的平静时期中美国外交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们现在准备谈一下结束美国扩张世纪的那个战争的结局，谈一下由此促成的划时代的政策决定，以及在地球的那一边突然获得另一个群岛。

第二十六章 1898年的重大偏差

463

于1898年四月开始的战争，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西班牙在东、西印度群岛的最后残余势力，也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始时谈到的1494年陶得西拉斯条约所承认的那个庞大帝国的几乎是最后的几小块崩溃了。在这个决定性的冲突里，美国的军事准备同它的尚武精神太不相称了，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新海军还是有战斗准备的，而决定问题的则是海上力量。西班牙在菲律宾有一支小舰队；它在马尼拉湾战役（1898年5月1日）几乎立刻被部署在远东海域的在舰队司令乔治·杜威指挥下的经过仔细准备的占优势的美国海军摧毁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其余海军中的一支舰队在海军上将瑟维拉指挥下开到加勒比海，采取了错误的战略，驶入瓶颈形的圣地亚哥港隐蔽，在那里立即被海军上将桑普森指挥的美国舰队封锁起来。一支由谢夫特少将指挥的勇敢的但是训练很差的一万六千名远征军，包括由伦纳德·伍德上校和刚辞去海军部助理部长职务的西奥多·罗斯福中校指挥的一支“义勇骑兵”，并且还包含一大批热情的战地记者在圣地亚哥附近登陆并包围了那个城市。瑟维拉的军舰陆续从那个瓶颈形的港湾驶出，英勇地力图冲出美国舰队的包围，结果是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1898年7月3日）。圣地亚哥于是投降了。当时占领西班牙的波多黎各岛只需要一小支远征军就够了。战斗结束了。战争迅速结束了长期的叛乱战斗所产生的恐怖和穷困，因而挽救了千万个人的生命，不只是西班牙兵士的生命，而且也挽救了古巴的叛乱者和男女老幼平民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场仁慈的战争。

决定性的战事的结局使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相信：继续战斗是没有希望的。通过法兰西共和国及其驻华盛顿大使的中介，西班牙要求停战^①，在8月12日按照战胜者的条件签订了停战协定。西班牙放弃了对古巴主权的一切要求，并同意把波多黎各和西太平洋上拉德伦群岛中一个由美国挑选的岛割让给美国，并立刻从古巴，波多黎各和西印度群岛的所有西班牙岛屿撤退。菲律宾的地位问题留待至迟于10月1日在巴黎召开的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上解决。停战协定宣称美国将“在等待缔结决定对菲律宾的控制、处理和管理问题的和平条约的期间，占据并保有马尼拉的城市、海湾和港口”^①。

在我们考虑美国须要做出的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之前，最好看一看杜威在他的胜利之前和之后在这个群岛上的情况，以及他同土著叛乱领袖和外国特别是德国的关系。派杜威率领一支美国舰队驻扎远东，准备在与西班牙发生战争时进行攻击，是出于年轻而警觉的海军部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的远见。他成功地操纵任命杜威去指挥太平洋舰队并设法使他的军舰为执行谋划的作战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从香港出发去马尼拉湾进行这个历史性的海军战斗之前，杜威司令曾同被从这个群岛流放出来的以埃米略·阿基那尔多所领导的一些菲律宾叛乱分子有所接触。杜威认为他们对于颠覆这个群岛的西班牙统治权会是有用的。在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之后，他把阿基那尔多及他的一些同伴召到马尼拉并把他们安置在吕宋岛。他们立刻在美国武器和军火帮助之下组织了一次叛乱。任何美国官员在任何时候没有同他们订立任何特别协议，说如果西班牙被打败菲律宾将得到独立，但阿基那尔多却认真地这样理解，这似乎是毫无疑义的，因而他热心地纠集土著来帮

^① 停战的消息直到16日才传到菲律宾。美国在13日占据了马尼拉。既然停战协定把这个城交给美国控制，就没有恢复13日征服时候的原状的必要。

助美国。在美国舰队从海上封锁马尼拉的时候，他的军队从陆地包围马尼拉。

在夏季里，各中立国的军舰作为观察者出现在马尼拉；在6月17日在海军中将冯·迪德里希斯指挥下的一支从吨位和火炮数量来说至少和杜威的力量相等的由五艘军舰组成的德国舰队；几天以后，在奇切斯特舰长指挥下的三艘英国军舰也开到这里；那里还有一艘法国军舰和一艘日本军舰。

我们从世界大战以后发表的德国外交文件中知道德国把军舰派到马尼拉湾去注视那里的局势是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德国可能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接收菲律宾的全部或一部，假如美国不保持它们的话。德国外交大臣冯·比洛在1898年7月1日写信给驻华盛顿大使说，“皇帝陛下认为德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利用由于西班牙-美国战争而可能产生的一切机会得到在东亚的海军支点”^①。德国力图使这个群岛中立化，以待瓜分它的适宜机会^②；但它在达到这一步方面不能得到英国的合作。在马尼拉，这位海军中将曾使杜威极度烦恼，他用种种方法破坏封锁，做出反对阿基那尔多军队的姿态，并打开同西班牙当局的交通——他倾听西班牙总督的在战争期中把这个群岛交给一个中立国保管的提议。使这种多管闲事的干涉行为达到最高峰的事件于8月13日发生，当时在一支从旧金山开来的远征军到达之后，杜威乘机炮轰西班牙的海岸炮台来支援梅里特将军向马尼拉防线的进攻。美国历史的一

^① 冯·比洛在1898年7月1日写给冯·霍勒本的信，载在《1871—1914年欧洲地区的大政方针（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柏林，1924年），第十五期，第44—45页。L.B.西皮教授在他的前述的启发性的文章：《德国和西班牙-美国战争》中利用了这个当时刚刚发表的新材料，代替了以前所有的讲法。

^② 在战争中美国驻柏林大使A.D.怀特使德国外交部了解美国将不反对德国在菲律宾或其它东方的西班牙属岛屿获得一个海军基地；由于这个保证，他遭到本国政府的责备。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纠正了这个错误的印象。

个传说是在炮轰的这一天奇切斯特舰长将英国舰队明显地开至德国军舰和杜威的军舰之间，好象是通知假如迪德里希斯向杜威开火的话，英国军舰将保卫这位美国司令^①。在马尼拉投降(1898年8月13日)之后，德国舰队突然离开，在那里再也看不见了。德国放弃了在短期间内不顾美国和或者英国而从菲律宾获得任何东西的希望。德国舰队在马尼拉湾的出现及其不友好的态度明显地加
466 剧了在两个新的世界强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这种竞争由于1902年委内瑞拉事件^②和德国海军部急于在加勒比海区域获得海军基地或海上支点而尖锐化。德国和美国海军军官们开始彼此较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海军的实力。在这个新的帝国主义竞争的背后还有着两国民众互相对对方的高的保护关税制度的憎恶^③。

彻底揭露1898年的英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在马尼拉的行动，包括奇切斯特舰长接奉的指示(假如有的话)的内部历史的秘密的档案现在还未公布，但这点似乎是清楚的：自从1896年的克吕格尔电报之后，英国已经改变了它的观点，正在寻找可能的盟国来结束它的越来越危险的孤立。鼓励美国在远东舞台上占有一插足之地使之可能在那里支持英国的保持中国对西方贸易开放的政策，而那个贸易主要是一种英国的商业，这样做也是对英国有利的。

英-美关系现在变得比自从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更融洽。我们已经看到这怎样导致把两国之间的悬案交付仲裁的结果，在以后几章里我们还将看到它怎样导致中国问题得到暂时的均势，调整巴拿马地峡问题以符合美国的意愿，以及美国在南非战争中热心

① T. A. 贝利“杜威和德国人在马尼拉湾”，载《美国历史评论》第四十五卷，第59—81页。

② 参阅本书第522—525页。

③ A. 法茨(Alfred Vagts):《世界政治中的德国和美国 (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两卷本，伦敦，1935年)，第一卷，散见各处，和第二卷，第1275—1635页。

地报答英国。这种复兴的英-美友谊的基础是在1896-1898年期间奠定的。在德国那一方面,为了它自己的明显的利益,努力去破坏这个新的英-美诚挚关系,但未能成功^①。

在西班牙-美国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德国同西班牙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1898年9月10日),看西班牙-美国战争的结果而定,由德国购买加罗林群岛中的库赛埃岛,波纳佩岛和雅浦岛。紧接着(1898年12月10日和1899年2月12日签订的两个条约)在美国没有表示反对的情况下^②,以五百万元(二千五百万比塞塔)实际购买了加罗林群岛,帛琉群岛,和除了在战争中由美国占领并467在和约中割让给美国的关岛外的拉德伦群岛。这些岛是西班牙留在太平洋的最后的一些岛屿。德国保有它们直到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攻占。它们在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时期成为日本的托管地,并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后,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受名义上的日本的托管。作为位于从北美到菲律宾的交通线上的飞机的歇息所和潜水艇的基地,这些岛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此外就没有多大重要性。日本在1898年曾表现出对菲律宾有强烈的兴趣。日本政府在9月8日给美国一个照会,在完全承认这个群岛的前途依靠于美国的决定的同时,建议假如美国不愿意单独承担菲律宾的管理的话,日本“愿意同美国一道,或者单独地,或者同另一个有相同兴趣的国家合作,在适宜的条件下,力图在这块领土上组织

^① 《大政方针》(Grosse Politik)第十五卷,第49页。

^② 靠南边的苏禄群岛作为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归属于美国。德国认为它仅次于西班牙,对这个群岛有最大的要求权(可能因为邻近它的新几内亚的殖民地),但表示不反对美国获得它,假如美国不阻碍德国获得未割让给美国的其它西班牙岛屿的话。(前述西皮的著作,第776—777页。)就在获得菲律宾的同时,美国默认了对它与这个群岛的海上交通的威胁。德国同英国订了一个条约(1898年8月30日),把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划分为势力范围,期待着葡萄牙破产,从而出卖或抵押这些殖民地。M.E.汤森(Mary E. Townsend):《德意志殖民帝国的兴亡,1884—1918年》(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1918)(纽约,1930年),第七章。

一个在承担保证国的联合保护或三方保护下的适当的政府”。这个建议被有礼貌地谢绝了，但未予公布^①。英国也极想购买这个群岛假如美国对于英国占有它的强烈愿望不在意的话。非常明显，假如美国走出来的话，西班牙以外的另一个国家就会跨进去，或者可能不止一个国家就会互相争抢头一个跨进去。虽然这不是充分的理由，但却是迫使美国政府继续控制它的理由之一。

468 在他的马尼拉湾的胜利之后，杜威本来可以直接扬帆回国的，但可惜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回国，却继续占有马尼拉湾并封锁马尼拉城市。他提出假如再给他五千人的话，他可以占领马尼拉。结果他得到了一万一千人而在8月13日占领了这个城市，西班牙守军只作了一阵预先安排的假装抵抗，他们与美国人协同行动，不让菲律宾军队进入城内，而后者曾帮助美国人包围马尼拉并且已经控制了剩下的群岛的大部分。梅里特将军接奉的指示是在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期间在那里维持秩序，并避免与土著叛乱分子联合占领。阿基那尔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于是组织了反对美国占领军的可怕的两年暴乱^②。由于命运的讽刺，美国同西班牙打仗来结束一场在邻近的古巴的暴乱，而不久之后在地球那一边的遥远岛屿上却在自已占领的地方面临着反对自己的暴乱。镇压暴乱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发生可耻的和不必要的野蛮暴行，这对于有关人士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因为开明的美国舆论曾对这些暴行进行了许多谴责^③。

① A. L. P. 丹尼斯在《美国国务卿和他们的外交》，第九卷第126页，一书中关于约翰·海的叙述中在1929年第一次发表了这个照会。

② J. A. 勒鲁瓦 (James A. Leroy) 在他的《美国人在菲律宾：征服的历史和占领的最初几年 (The Americans in the Philippines, a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and First Years of Occupation)》(两卷本，波士顿，1914年)，一书中详细描写了这些交涉和战役。

③ 人们从 M. 斯托里 (Moorfield Storey) 和 M. P. 利乔科 (M. P. Lichauco) 的《菲律宾群岛的征服，1898—1925年 (The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有两个主要问题留待解决：古巴债务和菲律宾的最后处置。西班牙在8月12日的停战协定中已经放弃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并且现在愿意把关岛割让给美国。它不成功地抵抗美国要求它担负约四亿元西班牙公债形式的古巴债务，这笔债务大部是为了降服这个岛的政治目的而积累下来的。因此，留给麦金利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保有菲律宾的任何部分或全部。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完全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的问题。这是自从独立以来要求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作出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在充满着战争情绪的狂热时候迅速决定的全新的问题。华盛顿总统在一个世纪以前曾警告国人不要使自己卷入欧洲政治问题。门罗主义又把这个问题定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美国是否现在应当使自己同时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问题（假如它接收菲律宾的话，它就势必如此），在它在那里的利益并不重大的那一部分世界里承担巨大的责任，跨进一个在那里它的脚步最不稳，它的视线最不清楚的政治迷宫去呢？它是否应当在远东，在同美国制度距离这样远，这样相异的土地和人民当中，选择帝国主义的危险道路呢？

在战争之前未曾有过取得菲律宾的最微小的要求。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能说出 *Filipinos* 是远东的土人还是一种热带硬壳果。美国人民当时对于这个群岛并不比他们今天对于马达加斯加有更大的兴趣。在杜威得胜的时候，麦金利总统本人得寻找它在地球上的所在；他曾说他不能在两千英里的误差内说出它的位置来。但是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亦即新帝国主义者，诸如罗斯福派，洛奇派，马汉派等人，“大”政策的代表者，他们知道菲律宾在哪里，而不久就希望美国取得它们；这些人如同勇敢的年轻的情郎恋慕自己

1898—1925)》(纽约, 1925年)一书中所提出的文件证据中无法抗拒对美国在1898年和以后对菲律宾的政策所提出的简单有力的控诉。

的情感直接对象那样，只知道现在的热情，只见到眼前的动人的引诱。他们激发了一些较小的领袖的喧嚷的欲望，而总统本人最后也被引诱了。在马尼拉湾之战以后不久，罗斯福上校写信给他的朋友洛奇一再反对任何“在我们取得波多黎各，而且使古巴独立，和无论如何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菲律宾之前”^①的和平。马汉舰长认为亚洲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在菲律宾拥有自己的基地的美国在内的条顿民族各国的保护来解决。麦金利总统在他的1897年年度咨文中，关于古巴，宣称强迫吞并是不可想象的，——“按照我们的道德法典，那是罪恶的侵略。”但这并不阻止他在战争开始以后想到吞并其它岛屿。他说，“在我们进行战争和直到战争结束以前，我们必须保持所有我们已经得到的；当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必须保持所有我们想要的。”^②这个国家想要什么呢？

伴随着美国军队的胜利，帝国主义的情绪为打了胜仗以后所产生的心理和自尊心所煽动，象野火一样燃烧起来并蔓延开来。报界起初只是猜测，不久之后被美国军队骤然闯入远东所迷惑，开始祈求美国统治菲律宾的可能性。等到夏季末的时候，调子就加强到要保存这个群岛了^③。曾经反对同西班牙打仗的企业领袖们现在开始看到由这个战争产生的扩张贸易的前景了^④。

在亚洲大陆上急速发展的事态帮助了这种情绪的迅速发展。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之后，欧洲列强出面干涉，首先是把日本的

① 1898年5月25日。《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卡伯特·洛奇通信选录，1884—1918年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1884—1918)》(两卷本，纽约，1925年)，第一卷，第299、301页。

② C.S. 奥尔科特，前述《威廉·麦金利的生平》，第二卷，第165页。

③ 根据《文摘》(Literary Digest)从192名报纸编辑的答复投票统计(1898年9月10日)，84人赞成美国占有全部群岛，63人赞成在那里有一个海军基地，14人赞成成立美国的保护领，6人赞成全部撤出，没有一个人赞成把群岛留给西班牙。

④ J.W. 普拉特，前述《美国企业和西班牙-美国战争》，第165、201页。

据点遏止在辽东半岛，其次是(1897—1898年)各自索要在中国的海军基地和势力范围地区。德国强迫租借了青岛，划山东省为它的势力范围。这件事促进了俄国租借旅顺和辽东半岛，把它的势力范围划在满洲。英国租借了山东北海岸的威海卫^①，把它占据的地方延伸到在英属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并划扬子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并划定海南岛和同法属交趾支那接壤的南部三个中国省份(云南、广西和广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被俄国、法国和德国从南满赶出之后，划在它新近占领的福摩萨岛的对面的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每一次，中国都被迫同意不得把指定范围内的任何港口或领土出售、出租、抵押或以其它方式让与任何第三国。

一般的想法是这些势力范围不久即将变成由各国海军基地所维持的保护领，它们发展演变到纳入实际统治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那个情况下，所有贸易均等都将消失，而变为只对各处的瓜分国有利，因此(人们担心)，其商人和航运业主长期以来根据西方各国同这个帝国的战争以后所缔结的种种条约享受最惠国商业特权待遇的美国最后将被摒弃在外。也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由于怕另一个对手会独占中国，或多或少是被迫划自己的势力范围的。

在中国濒于被瓜分的边缘时候，西班牙—美国战争偶然巧合地^{47E}使美国海军控制了马尼拉湾，随之控制了整个菲律宾群岛。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跟上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东方的步伐，免得被排挤在亚洲的商业之外的奇迹般的机会。菲律宾将是美国在远东的香港、胶州或旅顺，并有同太平洋海岸交通的一连串岛屿基地和海底电缆站。从这个新的占领地，可以继续推行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传统的美国政策。这些轻率的思想

^① 租借期限依照俄国租借地的期限。

家从未想到同被瓜分了的中国的贸易可能比同保存下来的中国的贸易额更大、更丰富。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美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他们的思想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的。几乎无人预见到美国下一代的巨大的内部发展和演变将使人民的消费量大大增长。当时似乎认为东方的市场对于一个建立在民族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竞争性的工业社会来说是将来的巨大的出路。菲律宾将是美国通向东方的无比巨大的贸易的连廊。这些向东方帝国主义冒进的投机家似乎从未觉察到在地球的那一边，一旦远东的外交势力均衡被任何一个海军国的完全统治所破坏，保护这些遥远的岛屿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困难的。他们没有窥见将来西方的崩溃和日本的同时兴起。

兴起了一个反对这些新冒险的主张者的组织，那就是以新英格兰的知识界为主组成的“反对帝国主义联盟”。他们根据政策和道德来辩论，反对以美国民族的祖先们所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在东方进行领土扩张和在遥远的岛屿统治异国人民。他们的最有口才的发言人是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参议员乔治·F·霍尔。

归根结底，必须担负获取菲律宾以及对西班牙开战的责任的是麦金利总统，因为统率陆军和海军的是他，向巴黎的美国全权代表发指示的也是他。当和谈代表团离开美国的时候，他们接奉的指示中关于菲律宾问题并不是决定性的：总统说，对文明、责任、人道、开辟新贸易和一般道德所作的保证使得至少必须要菲律宾割
472 让吕宋岛的全部权利和主权。

代表团员们在巴黎对于究竟多要多少的问题感到为难并且意见分歧。他们听取军官们和其他对菲律宾和东方有专门知识的人士(菲律宾人除外)的意见。曾经指挥过第一支远征军的梅里特将军指出保有所有岛屿比保有一个岛更容易。很明显，凡是美国离开的据点，别的国家就会插足进去。显然，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是

一个重要的看法),这是一个或者拿下全部群岛或者一个岛也不拿的问题。和谈代表团的民主党成员和坚决反帝国主义者参议员格雷反对占领任何地方。不久前任国务卿的戴法官赞成占有三个岛:吕宋,民都洛和巴拉望,他认为这三个岛就足以提供一个够用的海军基地了。代表团的多数,参议员弗赖伊,参议员戴维斯和怀特洛·里德先生反对任何分裂的控制而想要全部群岛。总统感到难于决定怎么办。在大约一年以后一个牧师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他的时候,总统在对他们的讲话中解释他是如何做出决定的。

他说“我每晚在白宫的地板上走来走去直到午夜,先生们我可以不感到不好意思地告诉你们我不止一夜跪在地上祈祷万能的上帝给我启示和指引。在一个深夜里我这样想到——我不知道怎样想出来的,但是想到:(1)我们不能把它们还给西班牙——那将是怯懦的和不得体的;(2)我们不能把它们给法国(原文如此)或德国——我们在东方的商业上的竞争者——那将是亏本生意和损害信用;(3)我们不能把它们留给它们自己——它们不适合自治——那样不久就将发生无政府状态和比西班牙统治时期更坏的紊乱;以及(4)剩下给我们的别无他法只有把它们全部拿过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信奉基督教,由于上帝的恩惠我们竭尽全力为他们谋福利,如同对基督也为之而死的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于是我就上床了,睡觉了,并且睡得很熟……”^①

总统于是指示和谈代表团要求割让全部群岛。奇怪的是,西班牙予以抗拒,最后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美国全权代表们实际提出了两千万美元的补偿。西班牙曾经同意把它的其它的太平洋岛屿卖给德国;这时它很快接受了这两千万元,心甘情愿地退出了东方。

和平来到了,带来的是,除了在战争中吞并的夏威夷群岛外,古巴成为保护领,并占有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除了为东亚的这个负担而付出的两千万美元之外,西班牙-美国战争共牺牲了二千

^① C.S.奥尔科特著前述的《麦金利》,第二卷,第108—111页,引自《基督教拥护者(“Christian Advocate”)》,1903年1月22日。

九百一十人的生命^①，用了二亿五千万战费^②，加上镇压菲律宾土著反对美国统治的两年叛乱的费用（一千人的生命和一亿七千万美元）。从那时起到现在共花费了三十三亿九千三百万元的邮金^③；这笔化费系由于国内的愚蠢，而不是战争本身造成的。1929年所制的自从占领这个群岛以后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的实质利益和损失的对照表说明美国人只有损失，而菲律宾人只有利益^④。不管它的德政，美国主权也遭到长期积累的恶意反对。

美国参议院仅以两票的需要多数通过了这个条约：57—27（1899年2月6日）。在批准的最后表决之后，它否决了一项允许菲律宾最后独立的决议。这个决议系由于副总统的决定投票而遭到否决，他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加勒特·A. 霍巴特。同时阿基那尔多和他的英勇的追随者决心反对美国的占领者而战斗到底。麦金利总统和他的党的领导人，以及共和党报纸成功地呼吁在1898年的国会选举中把共和党人选进国会，以使和谈代表们应付西班牙的工作容易一些。在参议院里，帝国主义分子的领导人参议员洛奇说否决这个条约就等于在文明世界的面前抛弃总统和使国家丢脸。总统实际上在参议院表决这个条约之前（1898年12月21日）已经宣布美国对这个群岛拥有主权。

① 根据陆军部长接到的报告，从1898年5月1日到9月30日在军队里由于各种原因的死亡数目。这不包括在完全复员以前的死亡数字。前述杜勒斯的著作的估计总数是5642人。

② C.A. 科南(Conant)：《西班牙战争的费用和金融(Cost and Finances of the Spanish War)》，载《美国评论的评论(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第十八卷(1898年)，第314—320页。

③ 这是截至1953年6月30日付给西班牙—美国战争的退伍军人和已故退伍军人的家属的邮金总数。关于美国历次战争的恤金开领的统计数字，我得向华盛顿首都的“退役军人总署”(“Veterans Administration”)致谢。

④ R.S. 塔克(Rufus S. Tucker)做了这样《一个菲律宾的损益对照表(A Balance Sheet of the Philippines)》，载《哈佛商业评论》，第八卷(1929年)，第10—23页。

不过在反帝国主义者和民主党的名义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华盛顿向他的党的参议员建议投票赞成这个条约以结束这场战争之前，参议院内还是有足够的反对力量来否决这个条约的。他愿意在下一一次总统选举中把帝国主义的问题置于自由铸造银币的问题之后的次要地位^①。民主党人为了想象的政治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原则。帝国主义的问题，如同二十年后的国际联盟的问题一样，说明外交事务怎样经常成为美国政党政治的玩具。

西班牙-美国战争促成了萨摩亚问题的最后解决。在美国国内经常有一种对参加一个“纠缠不清的”共管的不满。德国有一个占有这个群岛的百折不挠的野心。英国用自己各方面的殖民地负担，特别是在南非战争正在酝酿着的南非洲；除了为使新西兰满足外，它对萨摩亚是漠不关心的。共管的结束并非由于这个政府的垮台，总的说来，它工作得相当成功，而是由于两个新的世界强国——德国和美国——的现在已经成熟了的瓜分这个群岛的愿望和英国对此事的默认。马利托阿·劳佩帕酋长之死是新的土著骚乱的信号，而这些骚乱反过来又给予瓜分以借口。通过1899年12月2日的条约，德国得到了乌波卢和萨瓦伊两个最大岛屿和西经171度以东的所有领土；美国得到了土土伊拉连同帕果帕果港以及那个经度以东的所有小岛。英国从德国方面得到汤加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以及在西非的一些调整以为补偿。在1914年世界大战刚一爆发，新西兰的军队迅速攫取了德国在萨摩亚占有的一些地方——新西兰人几乎把这些地方视为民族统一主义的领土——而今天这些地方在国际联盟的托管下为那个英国自治领所占有。

^① M.C.柯蒂(Curti)曾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不同于一般接受的解释，布赖恩并没有为了把帝国主义作为1900年选举的首要政治问题而极力主张批准这个条约。参阅他的《布赖恩与世界和平(Bryan and World Peace)》(史密斯学院学报，第十六卷，第3—4期，1931年4—7月)，第128—129页。

无人居住的小小的威克群岛位于关岛和夏威夷之间。在美国1899年主要为了用来做横贯太平洋的海底电缆站而把这个群岛并入自己的版图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声明过对它有任何权利。1899年的扩张主义者几乎没有认识到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这一连串群岛以及夏威夷和萨摩亚之间的其它一些小岛对于今天太平洋的航空交通会是多么有用。

美国人民在没有事前计算到人和钱的损失的情况下卷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他们讲和的时候也很少注意到所涉及的义务或这些义务会在下一代带来新的战争和数额大得多的化费的可能性。胜利的主要好处是取得了对加勒比海和将来的地峡运河的海洋通道的控制；但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是否必要进行一场化费十五亿元的侵略性战争是值得怀疑的。今天很少美国公民会愿意取消就与加勒比海有关的来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的结果，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对这个战争在远东的结果感到非常遗憾。人们在1900年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在那一年麦金利和他的政党重新当选了。现在回顾那些年我国在它的少年时代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可以把美国扩张的最高峰——获取菲律宾看做是国家的重大偏差^①。

在美国主权之下的菲律宾群岛成为一块记载美国的德政和善意的纪念碑，全世界的殖民统治和管理的模范。它也成为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负担。它是美国防务上的唯一弱点，对于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来说，它是日本手中的抵押品。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看到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美国外交家们如何不得不多次对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侵略让步，以换取日本公开地或暗示地否认对菲律宾有侵略意图。美国对这个群岛的主要关心的事变为如何适当而体面地消除那里的令人不舒服的帝国主义，而使它能够

^① 参阅本书第821页，关于美国为撤出菲律宾所做的准备。

充满了鲨鱼的海洋里维持其独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群岛成为一场辉煌的后卫战的战场，这场后卫战在一段正好足够长的时间内挡住了日本的肉弹^①。这件事对于使联合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最后失败或取得胜利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在1898年并不是按照那样计划的。

① 原文是 Juggernaut，来源于印度神话。Juggernaut 是克里什纳 (Krishna) 的神像，每年例节用车载此神像游行各处，迷信者相传若能给该车碾死即可升天堂，所以有许多人甘愿被该车碾死。此处借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连人带飞机一起投入英美军舰烟筒将其炸沉的所谓“肉弹”。——译者